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二十世紀  
重大經濟謀略

eBOOK  
內置資料 非商業

## 二十世纪重大经济谋略

## 老福特博采众长 T 型车广销天下

1914 年 1 月 7 日，正是忙碌了一周的福特汽车公司管理者们难得的节假日，他们却突然接到上司亨利·福特（即老福特）的命令：停止休假，召开紧急会议。会上，老福特首先发话：“现在工厂的平均工资是多少？”负责公司财务的苏伦森不明其意，答道：“一天 2 元。”老福特似乎不满意：“上一期的利润很多，再把工资提高点。”苏伦森费了好大劲才说：“就加到两元半吧。”老福特仍旧不满意，旋即他就宣布自己的决定：“从明天开始，福特汽车公司的工人一天最低薪资升为 5 元！”在座的人听到这个数字无不目瞪口呆。这个数字意味着利润的一半分给工人。这是美国历史上的一次薪资革命。这次日薪 5 元的革命凝聚了老福特的多少心血啊。他博采众长而制造出来的 T 型车所带来的滚滚财源为这次革命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进入 20 世纪后，自由资本主义完成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垄断组织在经济中占了统治地位，企业规模和商品市场不断扩大，竞争日益激烈。老福特在 1903 年创办的“福特汽车公司”在这吸收合并的时代陷入了深深的危机。

当时汽车制造公司席卷全美，显示出蓬勃的生机。华尔街的大财阀摩根推行汽车业联合来扩大摩根商行的实力，福特汽车公司被列为联合的对象，但福特却拒绝以控股的方式进行联合，摩根的联合方案最终破产。推行联合方案的另一位重要角色杜朗只得联合其他较小规模的汽车公司，成立了以独占为目的的汽车制造协会。汽车制造协会有很强的影响力，各地的汽车展销基本上都受其操纵，福特在他们精心策划的孤立政策下，难免因势单力薄而吃亏。

老福特对于杜朗的汽车制造协会当然不敢有丝毫的忽视，还击是必要的，但时机尚未成熟。只能在确立福特车的大批量生产系统之后，还击才有取得胜利的希望。为此，老福特埋头制造 T 型大众车。

在这之前，老福特已推出了 8 种车型。1903 年，他首先推出的是 A 型车。A 型车上只有两个汽缸，因而座位很窄，更大的不足是发动机性能比较差。1904 年，老福特又推出具有 24 马力的 B 型车及二汽缸 C 型车，C 型车的散热器外露在车身前面的部分。尔后的几年里，老福特又先后推出 F 型、K 型、N 型、R 型、S 型汽车。这 8 种车型中，只有 K 型车是 6 个汽缸的敞篷车。经过不断改进和日益多样化的设计构思，从 2 个汽缸的 A 型车到 6 个汽缸的大型车；发动机的动力由 8 马力提高到 40 马力；从有篷车发展到无篷车。在暗地摸索之中，老福特并没有忘记进行市场预测，结果是：只有价廉物美并且坚固的产品，才能受到广大用户的欢迎。老福特将要推出的 T 型车就是这样的产品。其中有个难题，生产这种 T 型车必须找到一种坚固而轻巧的材料，老福特为寻找这种材料煞费苦心。苍天不负有心人，机会终于在一次汽车大赛上来临。

这场汽车比赛在观光胜地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湖进行，看台上座无虚席，比赛场面令人激动。忽然一辆法国产赛车翻滑出赛道，车体顿时支离破碎，面目全非。观众们正陶醉在选手角逐的跑道上，谁也不肯为那辆被淘汰的赛车分散注意力。老福特却在这时走下观众席，来到那堆汽车残骸前，从中找出几个活门和金属片，带着它们悄然离去。经过他和专家们的仔细研究，发

现材料很轻，强度却很硬。据了解，这是含钒的钢材。他立刻派人去访问出售这种钢材的商店和制造钢材的技师，并在国内试制，很快获得成功。这时，他才知道，以前他用的钢材强度约是 3 万公斤，而含钒的钢材强度约为 7.7 万公斤。老福特决定将这种韧性比普通钢铁要强上两倍的钢材作为制造 T 型车的材料，并且他打算采用标准化、规格化的生产方式来生产 T 型车。

所谓汽车生产的标准化和规格化，老福特对其部下是这样解释的：“标准化就是规格化，就是无论外型、颜色，完全是一致的！这样顾客也容易保养，产品也就统一标准化。这么一来，车子的价格也就可以降低了。”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可以采用通信的销售方式拓展业务。

采用通信的销售方式的灵感主要来自老福特对邮购业务普及原因的深深思索。当时，正是美国跨入现代化门槛的时代。到 1909 年，美国已有 AP、WP、INS 三大通信系统。以这三大通信社为中心组成了美国国内电报系统，实际通讯能力已超过 5 万英里（约 8000 公里）。从此美国进入了大众传播的时代，这对邮寄订购新兴事业的产生创造了条件。邮寄订购交易实际开始于老福特的同龄人，理查·席亚斯。他开办了一家钟表销售公司。由于他采用商品目条式宣传品进行宣传，为顾客选购商品提供了方便。后来，他和钟表修理师 A·C·鲁巴斯新办了邮购商品公司，主要使用和印第安人进行交易的方式，与此同时还将印发的商品目条分别邮赠给位于偏远地区的城镇，从而收取大量的购货订单。席亚斯和鲁巴斯用这种方法，创下了一年内销售额达 50 万美元的纪录。在邮购商品公司开办后的 5 年时间里，公司每年的实际收入都在 1100 万美元以上。这种销售方式刺激了老福特的兴趣。他想：“如果这种销售方式为我所用，只要请席亚斯和鲁巴斯在报纸上登一则广告，那么汽车的邮购销售不就可以普及了吗？”老福特打算把 T 型车作为拳头产品出击以前，他决定利用席亚斯和鲁巴斯的商品目条式宣传进行邮购销售，从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汽车市场。

1908 年 3 月 18 日，老福特和经营管理专家们秘密拟定了福特 T 型车销售计划。老福特不声不响地印发了 T 型车的商品目条，T 型车的照片也被附印在上面。商品目条上的 T 型车和未售完的 R 型车及 S 型车相比，是介于有篷车和敞篷车之间的一种造型，款式更新颖。

根据商品目条上的销售宣传，T 型车有以下几个显著特征：使用了软质坚固的钒钢合金材料制造；4 个汽缸都在由两个半椭圆形的钢板支撑着的同一个铸模内，发动机体积较小；变速器不像以前那样露在外面，而是全部隐蔽在车体内；方向盘与欧洲车方向盘的位置相反，不是设计安装在右边，而是在左边。通过这四点特征的介绍，人们就能对 T 型车的外型有个大致的了解。

商品目条印好以后，老福特秘密地将这些目条散发给福特汽车公司的主要经销商。经销商们突然收到福特邮寄来的信封，都感到有些莫名其妙，打开一看，里面全是商品目条、说明书和价格表，他们这才恍然大悟，无不赞同老福特的奇妙构思。令这些经销商们难以置信的是，老福特给他们的定价竟然只有 825 美元。这个定价让他们兴奋不已，许多推销商虽然还未将 R 型车和 S 型车的库存扫光，但都决定先买下 T 型车再说。老福特看到这种情形，毫不犹豫地决定在 10 月 1 日拉开一场新车宣传战的帷幕，这一举动是史无前例的创举，令世人震惊不已。

老福特调动了一切可以宣传的国素，不说报纸上、杂志上大篇幅的目不

暇接的宣传，仅以邮寄广告方式，在全美展开的唯一的规模空前的宣传活动，就让席亚斯和鲁巴斯甘拜下风。同时，老福特通过电报和电话的方式，直接迅速地告知消费者。他还在同年春天即将创刊的《福特时间》杂志上作宣传。在杂志中，福特作了这样的广告：“自从T型车发售以来，凡是购买T型车的顾客均可以享受邮资免费的优待。”这一系列宣传攻势为T型车的销售打开了一个广阔的前景。仅一年时间，T型车销售量就达6000部，创下历史的最高纪录，所获净利润比过去5年的总销售额还高出200万美元以上。不用说，这一盛举为老福特写下了一生中最灿烂夺目的一页。

T型车以出色的销售宣传、过硬的质量换来了许许多多的汽车订单，同时也向福特提出了新问题，即如何才能提高生产能力，以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老福特陷入了深深的思虑中。他脑中只有一个念头，必须提高生产效率，大量生产福特车。但这又谈何容易，因为福特汽车公司只是个汽车装配厂，汽车的发动机、车身、零件等差不多都是以外包方式在福特汽车公司的卫星厂加工生产的，这种生产速度远远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他脑中闪现出芝加哥屠宰场的工作现场图：活着的整条牛被宰杀，然后被一块块地分解，整个工作现场十分紧张但很有序，全过程有条不紊，工作效率相当高。在这幅图的直接启发下，老福特脑中形成了T型车大量生产的计划方案。他以屠宰业生产线为模式，但要反其道而行之，不是化整为零，而是化零为整，即形成按规格化流水作业而进行汽车组合的福特生产系统。

老福特为了实施这项方案，他停止了采购引擎和零件的方式，改成了引擎、零件的装配拼装作业形式。他的目标是大量生产价廉、轻巧、马力强的大众车。为此，他在海兰德公园绿地购买了一块地，修建了一个新工厂。该工厂是按照以屠宰业生产线为模式的流水作业生产系统进行设计的：总工厂是四层楼的四方形建筑物、机械厂房设在另一边，是一栋玻璃屋顶的一楼建筑，总厂和机械房在于井中有钢梁相通，上面安装有吊车，制造完成的引擎或变速器可以利用天井中的吊车搬到总厂。总厂4楼全楼面的天井装有吊车，还有重力倾斜方式的生产流水作业台，成品可以由高处向低处自然滑动，人可以不动，节省了来回跑动的时间，提高了生产效率。就是这样的生产系统诞生了福特93分钟的造车秘诀。与以前制造每辆汽车要花12小时48分钟相比，生产效率提高近十倍。老福特这样以屠宰业生产系统为模式，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条汽车流水装配线。为世人叹为观止的福特管理法在吸收他人经验的基础上终于形成。

老福特率先在制己的公司里推行泰勒科学管理法。它的主要特点是用科学方法对工人的操作进行时间和动作的分析和研究，在这一基础上确定最经济合理的操作方法，并实行相应的刺激工资制度，鼓励工人大幅度地提高生产率。这种管理方式有以下四项原则：一是规定每天的工作量，这种工作量是以第一流的工人的高工作效率为基准；二是为了使工人完成规定的工作量，将工具、机械、材料以及工作环境加以标准化；三是能完成工作任务的给予较多的报酬，实行计件工资制；四是工作任务不能完成则得以罚款。对这种管理方式连列宁都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即按科学来分析人在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精确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制等等。”福特曾说：“每个工人每天少走10步，12000名工人每天少走50英里！”这句话就直接体现了科学

管理方法的精神实质。

在汽车行业的激烈竞争中，老福特独具慧眼，采用了泰勒科学管理法，获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由于生产率的提高，T型车产量越来越多，成本越来越小，销售量越来越大，价格自然就越来越低。T型车自1908年问世以来，到1927年为止，在整整19年时间里，总共生产出了1500万又7033辆，创前所未有的纪录。在其顶峰时期，世界汽车市场的68%都属于T型车，真可谓形成了“广销天下”的局面。

如此辉煌的业绩使老福特赢得了“汽车大王”的美誉，后世的企业思想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到福特的启示。他博采众长，自成一体形成的销售战略及管理法规，掀起了具有历史进步性的大量生产的产业革命。

在资本主义经济由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的时代，多种力量分化组合，弱肉强食的竞争规律指挥着这一时代的精英们各显神通，企求在这风云变幻的争夺世界中力败群雄，独占鳌头。然而竞争无情，能独领风骚，摘取“大王”桂冠的只有一个。在20世纪初的汽车行业中亨利·福特就摘取了 this 桂冠。创建之初，老福特只不过是众多汽车制造商中毫不起眼的一位。但他能“博采众长，为己所用”，这是他成功的卓越谋略。他能在毫不起眼的汽车残骸里找到别人研究的精华，即是于己有用的钒钢合金作为T型车的材料：他建立的世界第一条汽车流水装配线，采用商品目条式印刷品邮购交易，规模之大，影响之深，无不令人叹为观止。正是这样的福特生产销售系统向世人推出了世界名牌——福特T型车，老福特本人也因此登上“汽车大王”的宝座。然而又有多少人能够想到福特生产系统来源于芝加哥屠宰业流水作业生产方式，销售系统受启发于一家邮购商品公司，这恐怕就是老福特别具匠心之所在了。尤其他采用省时省力的泰勒科学管理法，从而使T型车的大量生产变为现实，占领世界市场的梦想成真。老福特不仅能博采众长，还善采众长。然而“采”只是手段，在吸收他人成果基础上为己所用，自成一体取得事业成功才是他的最终目的。

## 富国须交通先行 十年当建路廿万

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为了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中国，改造成一个独立富强的近代强国，提出了一个具有时代特色的中国近代化思想。在这个理想中，他为中国精心绘制了一幅宏伟的铁路建设蓝图、并反复申明：“如欲立足于世界，唯有速修铁路，以立富强之基”。在 1912 年他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职后，即以极大的热情计划在 10 年年修筑 20 万里铁路，争取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强国”，不再受各国的欺侮与宰割。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孙中山的理想虽然未能实现，然而却给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留下了颇多启迪和思考。

孙中山的铁路建设思想产生于 1894 年前后。当时，帝国主义列强为了掠夺中国的资源以进行政治、经济、军事侵略的需要，竭力争夺修建中国铁路的权益。年轻的孙中山担忧国家、民族的危亡，在他 1891 年撰写的《农功》一文中就指出：“年来英商集巨款，招人开垦于般岛，欲图厚利；俄国移民开垦西北，其志不小。我国与彼属毗连之地，亦亟宜造铁路，守以重兵，仿古人屯田之法。”在这里，孙中山初次提出效法古人，修筑铁路，移民戍边，保卫国家的看法，表现了孙中山对待修建铁路的朦胧认识。

三年后，即 1894 年，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从“百货畅流，商贾云集，财源日裕，国势日强”而总结出，“凡为铁路之邦，则全国四通八达，流行无滞；无铁路之国。动辄掣肘，比之瘫痪不仁。地球各邦今已视铁路为命脉矣”。这表现出孙中山先生对铁路建设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已有了初步的认识，萌发了在中国发展交通，尤其是建设铁路，促使商业繁盛来加速中国经济发展的思想。

但此后，孙中山因忙于从事以武装手段推翻清政府的政治革命，无暇从事实业活动尤其是铁路建设。直到中华民国建立，孙中山于 1912 年 3 月辞去了临时大总统之职后，才决定以铁路建设作为他的实业活动的中心项目。

孙中山认真地研究了美国在 19 世纪后半期经济飞速发展的成功经验，认为美国经济的起飞，就是由于横贯美国东西部铁路网的建成和向西部大量移民的“西进运动”的结果。他因此得出结论，中国经济要起飞，也必须速修铁路，加强运河、水道的修治和商港城市的建设。美国是这样，英国、法国等 19 世纪后半叶经济飞速发展的成功经验都是这样：“无铁道无以立国。”中国呢？虽然“地大物博，如满洲、蒙古、西藏、新疆等处，皆是殷富之区，徒以无铁道，故全国不能受其利益”。而“美国新旧金山，昔日亦属荒凉，自筑铁道后，一变为繁盛之区。”这些看法更坚定了孙中山致力于铁路建设的决心。

1912 年 9 月，孙中山就任全国铁路督办职务后，一方面邀请当时在中国修建了唯一的京张铁路的著名工程师詹天佑作他的助手，并找马君武、徐谦等人协助他办理具体事务；一方面即开始视察铁路，足迹先后遍及华北的京奉、津浦和华东的沪宁、沪杭、南浔等铁路。所到之处都发表演说，宣讲铁路政策，受到各地人民和铁路员工的热烈欢迎，态度是十分诚挚和诚实。

为了实现他的铁路建设计划，为中国人民造福，孙中山于 1913 年 2 月亲赴日本长崎、东京、大阪、横滨等地考察日本铁路，并积极筹措筑路经费。可就是这时，袁世凯指使凶手刺杀了革命党人宋教仁，拍买主权，发动内战，

下令撤消了孙中山的铁路督办职务，废除孙中山签订的一切铁路合同。孙中山建筑铁路的计划受挫。然而孙中山并没有放弃从事实业建设，发展中国铁路的设想。在“二次革命”和第一次“护法战争”失败后，孙中山被迫回到上海。他超脱了繁剧的政事烦恼，“闭门著书，不问外事”，终于在1919年完成《实业计划》一书的写作，为他的实业建设拟定了“大方针”，为国家的政治、经济建设确定了“大政策”。

孙中山的《实业计划》这部书，不仅体现了孙中山的伟大爱国热忱，也表现了他的伟大气魄、智慧和胆识。孙中山认为，从事实业建设，发展中国富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已“不独为中国之利害而已”，也是：“世界人类之至大问题”。因此，他将他的“实业计划”称之为“国际共同发展实业计划”。在这个计划中，他不仅注意铁路建设，而且还将道路建筑、运河、水道之修治，商港、市街的建设统一起来，作全面、立体的规划。他拟定了三大港的建设和与之相适应的三大铁路干线的建设，把北方、东方、南方三大港作为中国和世界经济合作与交流的“策源地”，成为中外交通运输的枢纽和“关键”。而连接海港的开放式的铁路系统，又成了横贯中国大陆的“中枢”和大动脉。此外，孙中山还将中国的铁路建设作为连接西欧、中欧、印度、印度支那等地的陆路运输桥梁。

“实业建设”是国家的根本大计。为了使自己的计划得以顺利进行，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明确规定了国家经营事业、开发富源，发展实业的四项基本原则，即：必选最有利之途以吸外资；必应国民之所最需要；必期抵抗之至少；必择地位之适宜。此“开发计划”的四原则，也即铁路开发的原则。不过孙中山又认为，铁路建设在遵守上述原则的前提下，还应加上一条“铁路经济上之原则”。所谓“铁路经济上之原则”就是“从利益之点观察，人口众多之处之铁路，远胜于人口稀少者之铁路。然由人口众多之处筑至人口稀少之处之铁路，其利尤大”。孙中山说此即“铁路经济上之原则”，而且是：“铁路家、资本家所未尝发明者也”。根据这个原则，孙中山指出：铁路建设、必须坚持“斯为有利中之最有利者”来建设，因此选择铁路建设的路线必须“一方联接吾人所计划之港，以通吾国沿海沿江户口至多省份；又以现存之京汉、津浦两路，为此港暨多伦诺尔路线之给养，他方联大逾中国本部之饶富未开之地。”

早在1912年8月，孙中山就根据他所拟定的铁路建设原则而决定在10年内为中国建筑20万里铁路，并定下拟议建设的三大铁路干线：南路的起点于南海，由广东而广西、贵州，走云南，循四川间道入西藏，绕至天山之南；中路的起点于长江口，由江苏而安徽、而河南、而陕西、甘肃，越新疆而迄伊犁；北路的起点于秦皇岛，绕辽东折入蒙古，直穿外蒙古，以达乌梁海。为什么要选择这三大干线作为中国铁路建设的首批重点建设项目呢？孙中山说，这是由于三大干线的建筑有四大优点，即地理、种族、殖民、海道。他阐述说：地理，我国南北干线已有规划，而东西干线尚付阙如，如有此三线全国即可联络为一；种族，三线皆纬线斜行，包括西北两部五族交通，种族易于同化；殖民，西北交通可实行东南移民政策，且交通便利，则资本家自咸愿投资，劳动家自远出佣力，尤收无形殖民之效；海道，三路纬线其起点皆得独立出海口，可补原有铁路多平行线，而无独立出海者之缺，且水陆运输易于联络。

后来，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又作了补充，将三大干线扩充为六大



铁路系统，即西北铁路系统、西南铁路系统、中央铁路系统、东南铁路系统、东北铁路系统、高原铁路系统。并将六大铁路系统与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南方大港这三大港的建设，按轻重缓急、先易后难的原则联系起来，作了立体建设的全面考虑和细致的安排，表现了孙中山的经济头脑和建设才能。

孙中山拟建的铁路，既考虑到经济发展的需要，也考虑到了国防和对外贸易和文化的需要，也考虑到了发展少数民族居住的边远落后地区经济文化的需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将中国的铁路发展放在世界这个大范围去考虑和计划，他不仅将其拟议建设的铁路同三大港口相联系，而且也特别有意地将中国的各大系统铁路同周边国家的铁路相联结，以便于国际的联系和交流。

孙中山说：“余所拟敷设铁路之计划，其细目虽未厘定，但就大体言之，则吾人已知进行之头绪矣。今后将敷设无数之干线，以横贯全国各极端，使伊犁与山东恍如毗邻，沈阳与广州语言相通，云南视太原将亲如兄弟焉。迫中国同胞发生强烈之民族意识，并民族能力之自信，则中国之前途，可永久适存于世界。盖省区之异见既除，各省间不复时常发生隔阂与冲突，则中国人之交际日增密切，各处方言将归消灭，而中国形成民族公同自觉统一的国语必将出现矣。”就孙中山看来，铁路建设不仅可以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增加国富；更重要的是可以巩固国家的统一，增强民族的团结，保障中国的兴盛和长治久安，使中国列于“世界大国之林，不复受各国之欺侮之宰割”。

孙中山在提出了上述奋斗目标后，一面力之努力、一面并不满足于这个目标。他认为：“我国幅员之广大，修路二十万里，此为至小之计划。美国全国现有之铁路，已有八十万里之数，然美国之幅员，不敌我国之大，以此计之，我国十年之内，修筑二十万里，确系极小规模……”。他又进一步设想：“美国其铁路为世界甚多，而其富强亦为在世界第一。若以人数较之，则我国多于美国四倍，如是吾国之铁路应有四百八十万里。”可成为全球第一富强之国。

孙中山明白“铁路事业，显分建筑、管理、机械三大部分”。建筑铁路需要技术，更需要管理人才，尤其需要各种机械和大量物资。可是，民国初年正是“当民穷财尽之时”，百废待举，百事待兴。当时的中国不但缺乏人才，也缺乏资金和管理水平，要在10年内修筑20万里铁路，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如果不能克服种种困难，一切规划和构想都没有实现的可能。孙中山为此费尽心思，可结果仍不理想，“观今中国工业现状，凡兴造铁路，除资本外，如建筑、管理等事，亦属外人助力”。把建设铁路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外人的援助上，这就潜伏着极大的危机，外国人一方面对孙中山的铁路建设计划进行赞扬，说他的铁路建设路线联结广大之农业腹地与人口稠密之海岸，是在“铁路经济理论上致一具体之贡献”，赞扬他的铁路计划“宏伟精湛”，表示“应当竭力赞助”；另一方面又以中国无力负担国债为理由，拒绝贷款。尽管如此，孙中山关于吸纳外国资助资金和输入人才的一些主张，也还是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富有启迪的思想和见解。

从总的方面看，孙中山建设铁路的思想和主张，具有明显的超前意识，也带有若干盲目学习和模仿欧美各国，尤其是美国、加拿大发展铁路的意向，但他的思想和主张不是空想主义，因为他没有脱离中国的实际，只要具备了他在计划书中所提出的条件，完成他拟议的部分计划是毫无问题的。因此，孙中山建设中国铁路的思想和主张反映了时代的风貌，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意

志、气魄、要求、聪慧、胆识的明显特征和革新进取精神。正因为如此，对于孙中山建设中国铁路的思想和主张，连原清朝政府的邮传部尚书盛宣怀都予以称赞，说孙中山“造路以二十万里为断”是“伟论”，称颂孙中山“为文明之代表”，并指出孙中山“分别先后次序，由近及远，由内及外，路成一节，工商兴旺一节，将来必籍腹地之利源，挹注草陲之用费”的做法，是一个可行的方略。

然而，经济建设需要有一个安定的统一局面，更需要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孙中山为了创造经济建设的环境，努力奋斗了数十年，可惜在孙中山有生之年始终没有得到一个实现经济建设的安定统一的条件。此外，计划经济建设必须在统一的政府领导下，才能统筹安排，集中财力、物力、人力按照轻重缓急、先易后难进行建设。但从民国初年开始，孙中山就接连遇到了麻烦。帝国主义列强仇视中国。深怕中国富强损害了它们在中国的权益，不肯让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走上独立、统一、民主、富强的道路。因此，孙中山虽一再说他的建设计划是“国际共同开发中国的计划”，开发中国不仅有益中国，也有益于参与投资国。但是有意来中国投资开发的国家则不多。由于列强反对中国实现工业近代化，反对中国走向独立、民主、富强，所以孙中山希望越大，失望也大。

种种原因，使孙中山建设中国铁路的计划未能实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孙中山关于铁路建设思想和主张中所显示的真知的见，确实为中国人民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中国现代化的铁路建设，就是对孙中山建设铁路思想和主张的继承和发展。

俗话说：“火车一响，黄金万两。”交通的发展与商品经济的繁荣之间的关系，即交通运输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先行官的作用。在今天已成为人们的常识。而在本世纪之初，孙中山就提出大力建设铁路的思想和主张，其预见性就值得敬佩了。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交通不发达，原料进不来，产品出不去，商品流转受到严重阻塞，国民经济高效率的运转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交通的发展，必然推进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于落后地区的开发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是起着带头作用的。因此，孙中山把铁路建设看成“发展中国财源第一要策”，作为投资重点，是具有战略眼光的决策，充分反映了我国人民要求迅速富强起来的强烈愿望。而孙中山关于发展实业必须首先发展交通运输的谋略，更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启迪。中国古代兵法中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说法。孙中山关于铁路建设先行的思想和计划，正暗合这一谋略。

## 稳中求胜定大计 松下电器建“帝国”

“只有眼光广阔、远大的人，方能敢于面对困难。也才能找到寻找解决困难的良方妙策，从而在人生的道路上纵横驰骋，扬眉吐气。”这是当今世界备受推崇的经营大师松下幸之助的至理名言。他没有显赫的学历，没有强健的体魄，没有辉煌的资历，没有雄厚的资本，没有得力的后援，他仅靠自己的双手缔造了震惊世界的“松下帝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全世界的人们怀着惊奇而崇敬的心情关注着“松下”，十分放心与信赖地使用着“松下”。现在，“松下帝国”已经发展成为拥有 20 万员工、年销售额高达 300 亿美元的全球最大电器制造商家。“松下帝国”真是稳如磐石，松下幸之助成功的奥秘就在于“稳中求胜”。

松下幸之助于 1894 年 11 月 27 日出生在日本和歌山县和佐村，家世尚属小康。五岁时其父投机稻米生意失败，倾家荡产，全家陷于困境，七岁时大哥、二哥、长妹病死，9 岁时刚读完小学四年级的他就被迫退学，到大阪一家火盆店当小伙计。12 岁时父亲突然去世，20 岁时母亲又去世。历经磨难的松下幸之助意志变得像钢铁一般坚强，从 1904 年孤自一人来到大阪，到 1973 年退任顾问，他顽强地奋斗了半个多世纪。

离开最早工作的火盆店后，松下幸之助在一家脚踏车店当了 7 年店员，后来又在大阪电灯公司谋过生。24 岁时，年轻的松下毅然辞职，单枪匹马闯天下，几经周折，他终于创办了一个生产电灯插口的小工厂。

松下幸之助的全部资本不到 100 日元。他的阵容是这样的：松下幸之助和他在大阪电灯公司共过事的林伊三郎和森田延次郎，还有他的妻子并植梅子和内弟并植岁男。工厂就设在他自己的家里，总共只有两间。这在当时恐怕是全日本最简陋的一个小厂了，且资金不足，技术不精。但他们经过 4 个多月的苦干，第一个电灯插口总算造出来了。松下幸之助和他的 4 名助手喜出望外，随后他们便全力以赴投入生产和推销。

可是，他们面对的现实极为残酷，首次推销迎来的结果对他们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插口样品拿到一些商店竟没有一丝回音，有的商店甚至不屑不顾。好长一段时间过去了，只卖出去 10 个插口。

这是一次刻骨铭心的失败！

就在这当口，林伊三郎和森田延次郎两人看到前途渺茫，从松下身边离去了，这对松下来说更是雪上加霜。他是这样回忆当时的窘态：“现在想起来，那时对制造电灯插口的事打心眼里没底，那期间的处境当时十分困难。不言而喻，我的衣物和内人的衣物都送进了当铺。”

失败是成功之母。困境可以使人意志消沉，也可以促人拼搏奋斗，聪明者总是能从失败中吸取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创业初期的这段艰难历程并没有让松下在命运面前低头，它反而给了他受惠一生的启迪：创业艰难，必须具有百折不回的勇气。今天，松下电器集团中主要公司的徽章，是采用“松下”的首字母“M”和箭头构成的标志，这个标志作为商标使用在 1920 年初。在这个标志中，松下倾注了他全部的心愿，表达了他百折不回的勇气。

在奋斗过程中，松下意识到，应先求安全，后求发展，这样他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经营发展战略：稳中求胜。唯有稳打稳扎，方可稳如泰山。首先应该稳定的是员工之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整个经济界是每况愈下，物价暴跌。尽管如此，松下幸之助仍坚持稳步前进，在大阪建立了一定的基础，在东京已有相当的进展，所以面对经济大变动，他并不慌张，反而觉得应该好好干一番。

如何才能去好好地干一番？除非全体员工大团结，否则松下电器工厂的将来就没有希望。从这种思路出发，松下幸之助下决心要稳住员工心。他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用一个类似工会一样的组织把全体员工紧密团结在一起。这促使他发起并创建了“步一会”。

“步一会”这个名称颇有深意：其一，指全体员工步调一致，互相合作，上下一心，协同前进；其二，指全体员工和整个公司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地工作和进步，不尚空谈。这反映在“步一会”全体同仁步调一致，脚踏实地地向前这一宗旨中。具体说来，就是以修养精神、增进福利、亲睦友好、互相慰藉为目的，经常举办运动会和演出会等各种活动，使全体员工一心一意为公司的发展而拼命进取。

松下幸之助还规定：“松下电器工厂全体员工都是‘步一会’的会员，谁不是‘步一会’的会员，就不是松下电器工厂的员工。”

“步一会”成立之初仅有员工 28 人作为会员，其中包括松下幸之助本人。后来该会逐步发展，使松下电器工厂的内部体制得以稳固，公司也一天天成长，一天天壮大，为成为举世闻名的“松下帝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员工心也得以稳定，这真是：烂麻拧成绳，力量大千斤；三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接下来是稳住顾客之心。

松下幸之助长期担任会长和社长的职务，所以他常常会收到顾客寄来的信件。这些信件有的是褒奖，但大多数是指责和抱怨。松下对于赞美的信固然感谢，对于抱怨的意见，也同样接纳。

一次，某位大学教授曾经给他写了一封信，抱怨他们学校购买的“松下产品”发生故障。松下立刻派一位高级职员去负责处理这件事。一开始对方因为东西发生故障显得不太高兴，但这位负责人进行了诚心诚意的解释，并作了妥善处理，结果客户不但感到很满意，还好意地告诉这位负责人如何到其他学校去销售。

经过此事后，松下公开声明：“非常感谢会对我们抱怨的顾客。”他进一步强调：“借着顾客的抱怨，使我们得以与顾客建立起另一种新的关系。”而不把抱怨说出来的人，很可能只说出“再也不买那家的东西了”，就再也没有下文。

偶尔有向松下公司表示不满的人，本来想说“再也不买了”，但一看到松下派来的人，气就怎么也上不来。来人会说：“专程到这里来表示歉意。”这句话已足以让顾客感受到“娘家人”的温情。因此，当你接受到斥责一类的信，绝不应该气恼，而应该想“这正是获得顾客的机会”。然后你要去慎重处理，找出顾客不满的原因，诚心诚意地化解他们心中的怨气，稳住顾客的心。

不战而解顾客之忧，善之善者也！

最妙的是，松下幸之助不但坚持“稳中求胜”的发展战略，而且以“稳”功友人。

松下幸之助成功之后，前往他那里讨经取宝的人当然是络绎不绝。

有一年，当经济界稍感紧张，一位和松下幸之助有生意往来的中小企业

社长，就曾当面讨教：“松下先生，我的公司雇有 400 名员工，但由于最近的不景气，工作也跟着减少，实在令人担心。”

松下幸之助回答他：“你的顾客我很清楚，但在这种时候你绝对不能慌张。因为在长期的经营中，一定会偶尔陷于困境。而在这种时候，失败的人，都是一慌张就另谋他事。在不景气的时候，没有工作是必然的事。大多数经营者通常会采取降价以获取资金的方法。可是这样做的结果总是血本无归。”

事实上也正是这样，陷于困境的公司，多半是一遇不景气就慌张，然后是乱订货单进货，最后只能赔本卖出，公司损失惨重。相反，如果不那么慌张，能够冷静地思索：“停顿只不过是一时的现象，可以借此机会整顿公司，照顾平时怠慢了顾客，着手修理早该修理的机器。”

有这种处变不惊的气魄，公司绝不会有委绝之虞，反而会乘此机会发展起来。松下就是这样以“稳”而不慌乱劝说友人。

松下电器公司是以“无借款经营”的超级优良企业形象闻名于世。它之所以能有如此优异而稳定的企业素质，实在是得益于松下幸之助富含稳之精髓的“水坝经营”的构想。他经常说的一句日本民族名言就是“流水不争先”。这是松下幸之助“稳中求胜”的又一面。

“水坝经营”的构想，是松下幸之助在 1965 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关西财界讨论会上提出的。修筑水坝的目的是拦阻和储存河川的水，以适应季节或气候的变化。松下幸之助的“水坝经营”就是事先留有余地，对企业经营来说，在需要 10 成资金的情况下，不妨准备 11 成，这就是“资金水坝”。或者说，经过核算，设备运转率为 90% 是合适的、凭着 10% 的剩余，在产品需要量突然增加时，投入这部分设备，就可以顺利地保障供应，这就建造了“设备水坝”。进一步说，经常保持适当的产品库存，就形成了“产品水坝”，由此类推，不一而足。

以上各种都是有形的“经营水坝”。松下幸之助更看重的是无形的“心理水坝”，也就是需要先具有“水坝意识”。他认为，如果能以这样的“水坝意识”去经营，就会产生出各式各样的“水坝式经营”方法。他深信：“只要能遵循这种方法，随时作好准备，能宽裕地运用各项资源，企业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能长期而稳定地成长。”

“水坝经营”的战略构想，是松下幸之助“稳中求胜”的最好体现，他利用这一战略成功地使松下集团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最终发展成为举世闻名的“松下帝国”。

在商战中没有永远的赢家。因为一般人在成功之后，往往会变得骄傲自满，精神也就会松懈下来，目中无人，该努力的而不去努力，该考虑到的也不去考虑。纵观企业界，真正能够做到“胜者不骄，稳中求胜”的实在是凤毛麟角。但松下幸之助却是属于凤毛麟角之列。

对连续的成功，松下幸之助不会陶醉，不会激动，而是对此冷静地加以分析：大前年赚，前年又赚，而去年也赚钱。若是今年再赚，那是最好不过的。但是世上的事是不可能尽善尽美的，连续三年都赚钱，又希望第四年再赚，哪有这么简单的事？他曾对经销商说：“连续赚了 3 年，假如今年不赚，就退还一年，还剩下 2 年是赚钱的，‘尺蠖’就是进两寸退一寸的，这是很好的现象；三年赚钱，第四年又想再赚，那就好比‘尺蠖’一样，伸至极限后腿收不回来，只有死亡。那么是死亡好呢？还是退还一年利益而生存好呢？当然是选择后者。”如此辩证地认识问题，保证了松下幸之助“稳中求胜”

策略的最大限度的实现。

1963年，松下电器在报纸上刊登大版广告，广告语是——“松下电器是乌龟”。这句别出心裁的广告语，有的人认为是形容松下电器像乌龟一样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地模仿；有的人认为是形容松下电器像乌龟一样默默向消费者提供优质商品。实质上，这句广告词恰恰是松下电器公司“不创新，只改进”这一稳中求胜经济谋略真实写照。

兔子确实比乌龟跑得快，但乌龟就一定会输给兔子吗？龟兔赛跑的故事，尽人皆知！松下幸之助“稳中求胜”，创建了“松下帝国”，写出了一个新“龟兔赛跑”的寓言。

松下幸之助是日本松下电器的创业者。这位传奇人物不仅在日本而且在全世界都家喻户晓。他以“稳中求胜”的经济谋略创建了“松下帝国”。这一战略的使用，从表面看，发展似乎慢了一点。但是从长远看却并非如此。国为事物的发展有其反复性、曲折性和渐进性。企业的发展也是这样，今天适应了市场，前进了一大步，但如果发展不稳，到明天又有可能由于盲目扩大生产，从内部弱化企业“体质”，降低其抗风险能力，最终倒退几大步。如果稳打稳扎，步步为营，就可以减少前进中的反复性和曲折性，减少商战中的风险。这样前进速度似乎慢了些，但实际上却是快了，这正是稳中求胜战略的优越性所在，也是松下幸之助成功的奥秘。他没有很深的理论框架，而是取法自然，亲切有味。他采用稳住员工心。稳住顾客心、用“水坝经营”的战略让企业家稳步发展等一系列稳中求胜的经济谋略，乍看并无诡奇过人之处，但读之却像嚼橄榄，愈嚼愈有味道，而且饶有深意。一如松下的产品，精彩纷呈，历久弥深，这正是松下幸之助的过人之处。几十年来，松下公司不但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称霸世界，而且以其稳中求胜的经济谋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企业家，无怪乎长期以来，许多经济学家和企业家都对其刻意研究。

## 审时度势拓新路 娱乐大王撒欢乐

1910年冬，美国堪萨斯市一个风雪交加的早晨，到处都是厚厚的积雪。在一条冷清的大街上，一个9岁的小男孩正哆哆嗦嗦地向前走着。他单薄的身子仿佛要被凛冽的寒风撕成碎片，但他丝毫也未停止前进的脚步，他必须赶在上学前到送报人那儿领取报纸然后分送出去。忽然，他跌倒在一个雪坑里，已差不多冻僵的腿却对此无能为力，慢慢地他失去了知觉。雪越下越大，几乎要将他埋了起来。终于，一个行人发现了她，将他救出雪坑。这个正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小男孩就是几十年后被誉为娱乐大王的沃尔特·迪斯尼。这时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以后会创办迪斯尼乐园，其中的米老鼠和唐老鸭会给全世界的人带来无限的欢乐。虽然他成功的背后充满了艰辛，但他善于审时度势的敏锐眼光总能开拓新的道路而使一切都化险为夷。

沃尔特·迪斯尼1901年12月5日出生在美国芝加哥市。贫寒的家庭没有给幼小的沃尔特以良好教育，但也未能阻止他对画画的兴趣。他喜欢画片，更喜欢漫画。他在快速地翻动的画片中，发现画中的人物在雀跃，这就是卡通的雏形，那时他年仅9岁。

沃尔特16岁时入芝加哥麦金利中学读艺术函授班，还到芝加哥艺术学院学习解剖学和写作技巧，这些学习为他以后开创事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加入红十字会美国救护车队被派往法国。回国后，这个还不满18岁的年轻人对前途充满了信心。他放弃了父亲提供的到果冻厂工作的机会，尽管这份待遇不错的工作在当时很抢手，但他仍放弃了，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对绘画有浓厚的兴趣并且在这方面有很高的天赋，他决心朝绘画方向发展，做一名出色的画家。

1919年，沃尔特和好朋友乌比·依维克一道建立了自己的公司——依维克·迪斯尼广告公司，跨出了事业的第一步。但和其他资金雄厚的广告公司相比，发展前途并不大。不久，沃尔特看到一则招聘卡通画家的广告。这份工作对从小喜欢漫画的沃尔特来说再适合不过了。在乌比的鼓励下，他决定去应征。通过竞争，沃尔特成为堪萨斯市电影广告公司的一名职员。但他心里明白，他的画技并不能高人一筹。每当这个时候，他就用冷静的头脑分析现实，并多次巧妙地用创新来弥补自己绘画技术的不足。他的创新精神很快使他脱颖而出。由于他勤奋好学，很快就掌握了绘制卡通片的技巧，并用自己拍的欢笑卡通使名声小起，同时，他还学到了纽约卡通影片的制作方法。

在堪萨斯电影广告公司，虽然沃尔特受到老板重用，但他的发展计划常常得不到采纳。为求得事业上的更大发展，他于1922年5月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欢笑卡通公司。先后推出了《不来梅的4位音乐家》、《杰克和豆茎》、《金发小女孩和三只小熊》等5部影片。他还创造性地将真实的人物放进卡通世界里制作《爱丽丝梦游仙境》，可惜由于公司资金短缺，影片只制作了一半，公司就宣告破产。但沃尔特并未就此灰心，他决定更换环境，到好莱坞开辟新的发展道路。

1923年，沃尔特来到了公司林立的好莱坞，开始探求这个新奇的、充满阳光的世界。但是，在这个顶尖高手云集的环境里，22岁的沃尔特仅是一个人们并不着重的毛头小伙。为了杀开一条路子，聪明的沃尔特想到了未完成的《爱丽丝梦游仙境》，用它作为打入卡通影片行业的敲门砖。为此他联系

了曾与他合作过的影片发行人温克勒小姐并得到了她的支持。

1923年10月，沃尔特与在好莱坞的三哥洛伊·迪斯尼成立了迪斯尼兄弟制片厂。制片厂成立后，迪斯尼兄弟与温克勒小姐签订了一份合约，爱丽丝喜剧发行权由温克勒小姐购得。1924年3月，第一部爱丽丝喜剧推上了电影的银幕，发行人温克勒小姐在信中说：“对于此类卡通影片的前途，我本人极为乐观。”但此时的沃尔特没有被成功的喜悦所陶醉，他非常清楚自己的长处在于创作笑话，而在画技上要成为第一流的卡通绘制人，前途并不乐观。他知道，如果他专心构思剧本，公司业务的进展会更快。于是他聘请了以前的合作者乌比·依维克。乌比的到来，不但提高了爱丽丝喜剧绘制的质量，也加快了制作的速度。从此，迪斯尼兄弟制片厂终于站稳了脚跟。

为了使业务得到更大发展，1925年7月沃尔特兄弟俩在赫伯尼大道买下了一块地，准备建造一座更大的制片厂。这时沃尔特认为一个单独的人名可能更有票房吸引力，更容易为人记得，于是迪斯尼兄弟制片厂就改成了沃尔特·迪斯尼制片厂。随着爱丽丝喜剧出演时间的推移，沃尔特了解到人们对这些喜剧的欢迎程度已慢慢地降低，于是他将目标转向了《幸运兔子奥斯华》的制作。奥斯华的制作使这位年轻的制片人学到重要的知识：卡通片中，一位强烈而又吸引人的中心角色是不可缺少的，而且还需要一条好的故事主线。由于沃尔特的审时度势，人们保持了对他制片厂所制影片的喜爱程度。奥斯华影集的推出，得到众多报刊的很高评价《电影世界》说：“这些影片一定会吸引各类家庭去欣赏。”纽约市的卡通制作人也为奥斯华影集所具有的创新的幽默和流畅的形式折服。

奥斯华影集倍受观众欢迎，引起了制片商们的眼红。一位卑鄙的制片商用阴险的手段挖走了沃尔特制片公司的卡通画家，使公司业务受挫。为了挽回争夺奥斯华影集失败的局面，沃尔特决定制作新片集，风行世界的米老鼠卡通就是在这时诞生。在短短的时间内，沃尔特的制片厂制作了两部米老鼠影片——《疯狂飞机》和《骑快马的高卓人》。

就在这时，电影改革开始了，那时除了极少数不太成功的试验外，电影一直是无声的。1927年10月6日《爵士歌手》的首演，为电影带来革命性的转变。虽然那时大多影坛巨子并未发觉，但沃尔特却意识到了：卡通影片将不可避免地加上声音。所以，虽然前两部片子还未找到买主，他已计划摄制第三部，并且将它制成声音和动作相配合的影片。

1928年9月，第三部米老鼠影片《汽船威利》诞生了，沃尔特怀着无限的信心到纽约为米老鼠配音，经过各种努力，《汽船威利》终于有了声音，并且音乐和动作配合得很协调。11月，《汽船威利》上演，引起了轰动。《综艺杂志》评其是一部与众不同的卡通片。沃尔特怀着成功的喜悦，又着手摄制有声米老鼠影片。米老鼠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

为什么沃尔特要选择米老鼠？沃尔特的看法是：“米奇是一个好先生，从不害人。他常身陷困境，但不是他的错。他最后总能化险为夷，而且面带笑容。”他又说，米老鼠虽为小人物却具有尽力而为的精神。其实，对沃尔特来说，米老鼠图形具有起死回生之功能。到1931年，“米老鼠俱乐部”会员已达100万。人们对米老鼠的狂热，给沃尔特带来了财源。许多公司为了利用米老鼠的知名度以更好地销售商品，纷纷向沃尔特买得这项使用权，沃尔特由此获利不少。

巨大的成功没有阻止沃尔特前进的步伐，他又开始新路的探索，决定在



他的卡通影片里加上新特色——彩色。沃尔特公司以前曾为此实验过，但并未成功。1930年，天然色公司研究出把三种主色的底色合在一起的方法，沃尔特率先买得它的使用权，将它用在卡通影片上，后来又解决了脱落和褪色的问题，拍成了第一部彩色卡通片《花与树》。1932年7月放映，立刻引起轰动。11月，《花与树》获电影艺术科学院第一次为卡通片颁发的金像奖，米老鼠获特别奖。从此，沃尔特的成就得到政府的认可。

1934年，由于经济的不景气，电影院为吸引观众，被迫一次放两部长片。短片的生命力随之减弱。沃尔特预料到终有一天要拍摄长片卡通，于是他选择了人们熟悉的也适合拍长片的题材——《白雪公主》。1937年12月《白雪公主》首演获得很大成功，在80分钟里完全显示了它的娱乐价值。《白雪公主》第一次发行就赚了800万元，还获得一座特别的金像奖。

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对这场战争早有准备的沃尔特，瞅准机会，开始新影片的摄制。他为加拿大政府摄制了教新兵如何使用高射炮的影片，为美国海军部门摄制了一部《航空母舰飞机降落讯号》以及有关飞机识别的20部短片，这些影片都深入浅出，简化了复杂情形，受到政府部门的好评。更有甚者，美国财政部为了对国民进行鼓励缴税的宣传，也叫沃尔特摄制宣传片。据统计，当时的缴税人员中有37%的人受过这部片子的影响。在战争中，由于沃尔特及时地改变影片摄制的内容以适应战争环境，他靠拍摄战时影片又赚了一大笔钱。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贫乏，且不让资金外流，所以沃尔特的一些片子在欧洲放映收入不多，在国内收入也不乐观。卡通片的摄制成本很高，这对卡通制作人很不利。为走出困境，沃尔特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摄制真人电影。为此他想到了唯一没有开发的阿拉斯加。阿拉斯加那一望无垠的森林，那晶莹的冰河、那险峻的山峰，尤其是海豹的有趣生活大大地吸引了沃尔特。他派人到阿拉斯加，拍摄了记录片《海豹岛》，这部片子还获得了最佳记录金像奖。

这时电视业的兴起，使电影业受到很大冲击，沃尔特认识到了电视的价值，也看到了电视事业的发展前途，他决定向电视界发展。他接受电视公司请他制作电视节目的要求，开始了他的又一个发展方向。他首次推出的电视节目获得了电视艾美奖。1955年9月，沃尔特推出《邓波儿》影集，这部影集成了全美收视率最高的节目。稍后又推出《米老鼠俱乐部》，受到观众欢迎。

沃尔特在电视界得到巨大发展的同时，在娱乐界也开辟了一条道路，这得归功于他敏锐的洞察力和不同一般人的远大见识。沃尔特通过平时的观察注意到，慕名到好莱坞玩耍的人，总以为这里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但结果总让他们失望，因为这里并没有高质量的娱乐场所。同时他还发现带孩子们上娱乐公园的父母总是一脸的无聊，因为公园的设施、卫生、服务人员的态度总不尽人意。于是，在沃尔特的脑海里形成了建立娱乐公园的计划。

1952年12月，沃尔特为这个定名为迪斯尼乐园的公园组织了一个沃尔特·迪斯尼公司。他借用受观众喜爱的迪斯尼公司的节目向电视公司交换他们对迪斯尼乐园的投资，这一招很灵，几家大公司投资支持。沃尔特也没忘记向人们宣传这个还未诞生的乐园：迪斯尼乐园的理想是希望人们在这里找到欢乐和知识；这个世界的成就。喜乐和希望将充分地显示在这里，这些奇妙的东西都在这儿变为现实……。

1954年9月，乐园破土动工，按沃尔特·迪斯尼从摄制卡通片中得出的经验，乐园的颜色和建筑物的变化使各游乐区之间有一定的连贯性，使游客有自然产生玩下去的兴趣。经过工程人员的紧张施工，至1955年7月，迪斯尼乐园建成并开放。7个星期之间，有100万游客到过迪斯尼乐园，比预计人数多出50%，收入则多30%。

面对日益提高的知名度和巨额的财富收入，沃尔特并未裹足不前，他曾说：迪斯尼是一项标准，是一种娱乐，是一种全家可以共享的东西，这一切都归结于有质量保证的迪斯尼有深刻的说服力。慢慢地，他不断在乐园中增加新东西，不断提高技术水平，拓宽想象力；因为沃尔特坚信：只要东西好，就可以把大众吸引过来。迪斯尼因此而名闻世界，即使到美访问的外国皇室领袖也坚持到乐园一游。

迪斯尼乐园开业后的第10年，游玩点由原来的22个增加到47个。资本由1700万美元增加到4800万美元，游客共计4200万人次，荣誉不断降落到沃尔特身上。最使他感到自豪的是，1964年9月14日，约翰逊总统在白宫授予他平民所能得到的最高勋章——自由勋章，颂词上说：“作为一名艺术家，沃尔特·迪斯尼在娱乐方面，已创造出了一个美国民间的奇迹。”

在好莱坞奋斗了几十年，沃尔特·迪斯尼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远远超过了他的梦想。但他还想建一座比乐园更好的未来城市，这个宏大的计划在他脑海里构想，在这个新城市，人类的居住环境清洁、美观，而又能激发智慧。可惜的是，这个奇迹还未实现，无情的病魔就于1966年12月5日夺去了他的生命。

沃尔特的逝世，引起了世界的注意，人们为之伤痛不已。他的朋友，前总统艾森豪威尔说：“沃尔特·迪斯尼创造的奇迹，比生命的奇迹更伟大，他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将留芳万世，使世世代代都从中受到欢乐和启示。”沃尔特·迪斯尼凭借他敏锐的洞察力，审时度势的远大眼光，开拓进取的可贵精神，创造了迪斯尼奇迹，赢得了世界人民的怀念和爱

人人都能成功，但所有的成功在开始时都只不过是一个想法而已。娱乐大王沃尔特·迪斯尼也不例外。但他能恰当地观察时机，估计形势，并根据自身的特长和社会发展的趋势来选定人生之路，然后为之奋斗不懈。他的奋斗之路并非全都撒满辉煌，其中充满了奋斗的艰辛。难能可贵的是，他总以冷静的头脑分析客观现实，总以一种超前性的预测制定事业发展的计划。从制作爱丽丝影集到幸运兔子奥斯华的推出，沃尔特靠正确的判断力获得了成功。当世界上只有短片卡通时，沃尔特却注意到了长片卡通的广大市场；当人们还忙于无声卡通的制作时，沃尔特看到“有声电影抬头是大势所趋”；当世界上还从未出现彩色影片时，他能首先在自己的影片上加上颜色；当公司业务受到战争的冲击时，他能及时恰当地调换摄制内容的方向，从而使公司立于不败之地；战后卡通业不景气，他便瞅准成本低的真人电影；在电影业受到电视业的冲击时，他又不失时机地投入电视业；当他在电影业中独占鳌头，在电视业中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他又走进了萧条的娱乐业，从而创办了闻名世界的迪斯尼乐园。沃尔特成功了，他的成功来源于他的精明，他的胆识，更来源于他观察时机，估量时势后的稳步发展。

## “借鸡下蛋”驱贫穷 利用外资有万利

孙中山在他的《实业计划》中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化绘制了一幅宏伟的，令人鼓舞的蓝图。但是，孙中山在筹划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时候，深深感到资金、人才和技术的缺乏是十分突出的问题。“欲大兴实业，而苦无资本”。怎么解决这一矛盾呢？孙中山是一贯主张对外开放的，为解决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人才和技术，孙中山提出利用外资的见解。他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多次地论述了利用外资问题，他所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原则、方针、方法，对我们今天所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也是有所启迪和借鉴作用的。

孙中山当时所面临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既是一个侵略成性、弊病百出的世界，又是一个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创造了高度物质文明的世界。孙中山敢于正视这种客观与复杂的现实，他认为，欧、美、日本通过对外侵略和掠夺，积累了大量资本，中国不可能走这条路。那么，可不可以利用外资呢？孙中山明确主张：“我无资本，利用外资；我无人才，利用外国人才；我无良好办法，利用外人办法。”在孙中山看来，“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实行开放主义，借助外国的资金、人才和技术来发展本国经济，是很自然的事，中国也应当实行这一方案。因此，他强烈地主张中国应当“改变闭关主义而为开放主义”，“利用外资，利用外才，以图中国之富强。”

孙中山认为，中国应当“学外国的长处”，西方文明要“为我所用，为我服务”。说到外资，孙中山指出，世界上许多国家，如美国、日本等国之勃兴，“皆得外债之力”，同样，中国也应跟上世界发展的潮流，去学外国的长处，将先进国家的长处“转而用之”。孙中山把他的民生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在解释为什么必须利用外资时指出，其目的“盖欲使外国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要拿外国已成的资本，来造成中国将来的共产世界”。并说，“能够这样做去，才是事半功倍。如果要等我们自己有了资本之后才去发展实业，那便是很迂缓了。”

利用外资，使中国尽快富强起来，“和欧美并驾”，“与日本比美”，是孙中山的一贯思想，早在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的演讲中，即表达了“迅速建一大共和国”并利用大好资源“振兴中国”，以赶上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强烈愿望。在以后的文章和演说中，孙中山又多次他讲到，中国不仅要“突驾日本”，并且要“举西方文明而尽有之”，“和欧美并驾齐驱”。孙中山根据自己对国内外情况的观察和研究，认为利用外资“乃兴国之要图”。既然“美国发展实业之初，资本悉借之欧洲，人才亦多聘之欧洲”，使美国经济迅速崛起，那么，“以中国之地位，中国之富原，处今日之社会，倘我国人民能举国一致，欢迎外资，欢迎外才发展到我之生产事业，则十年之内我实业之发达必能并驾欧美矣”。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民国初年，孙中山就曾考虑过和西方人合办银行，专以输入外资为目的，还亲自到日本考察，学习日本的建设经验，争取日本给予经济上、技术上的支持和帮助。

孙中山在他的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实业计划》一书中，充分展示了他关于利用外资的思想。孙中山认为，利用外资、外才、外国技术，可以

争取时间和速度，“减少两百多年的光阴”。西方文明的发展用了两、三百年的功夫，中国振兴实业，发展经济，不能“随西方文明之旧路径而行”，而应“依西方已辟之路径而行之”，要“迎头赶上去”。为此，就要欢迎列强之雄厚资本、宿学人才、精练技术，为我经营，为我筹划，为我训练。他蛮有信心地预料，如此办理，“则十年之内，我国之事业，必能立足于国中，我实业人才亦同时并起。十年后，则外资可以陆续偿还，人才可以陆续成就，则我可以独立经营矣”。

孙中山有着强烈的时间意识和机遇意识。他十分赞同西方所谓“时间即金钱”的观点，批评一些人反对借用外资和使用外国材料是“知金钱而不知时间，顾小失大”，他主张多花一点钱，也要把时间争回来。他提醒人们要发展经济就必须重视捕捉机遇，不可“坐失良机”。

孙中山认为，中国利用外资以振兴实业，“不仅中国一国之益”，“世界也必同沾其利”。因为中国是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四万万人之中国一旦发达工商，以经济的眼光观之，何啻新辟一世界？”“中国不特可为各国余货消纳之地。实可为吸收经济之大海洋，凡诸工业国其资本有余者，中国能尽数吸收之”。因而、孙中山号召各国参与开发中国这个潜在的大市场，并指出“参与此开发之役者，亦必获超越寻常之利益，可无疑也”。

孙中山认为，中国要振兴经济，必须打开国门，实行“开放主义”政策。这个口号是1911年11月下旬，孙中山在欧洲时提出的。他当时是在回答共和国成立后实行什么政策时谈到的，不是专门论说“开放主义”政策，所以他只是说：“共和国成立后，当将中国内地全行开放”。至于应如何开放、他没有评论。1912年9月5日，孙中山在北京迎宾馆举行答礼会，招待国务院、参议院议员及各界、各团体人士，宣布解决外交问题时，再次宣布须取门户“开放主义”。他说：“民国自成立以来，及今已有九月之久，尚未得各国正式之承认。……故鄙人以为目前重大问题，莫如外交，将欲解决此困难问题，非改变从前之闭关主义不可。……我若改变闭关主义而为开放主义，……国中之矿山、铁路，皆准外人经营，不加以种种限制，因开放其小者，而获保全其大者。即如俄国之制造厂、兵工厂，皆由英、美人为之。日本、意大利国其关于制造事业，亦多由英美人主持。”这样做，是不得已而为之，“今欲急求发达、则不得不持开放主义，利用外资，利用外人。此皆急求发达国家之故，有不得不然者。”因此，“开放主义”便成为孙中山吸收外资、外才的理论基础。

孙中山的“开放主义”，并不是敞开中国大门，让外国政府和商人随便来中国为所欲为，而是根据一定的法律程序，遵守共同的协定。他规定：“寓于通商口岸以外之外人，应服从中国之治权；并设立特别法庭，以审关涉西人案件。”并强调各种章程、规约必须完备，“借款合同尤为得失所关”，各种公司的宗旨“务期权操于我，而不妨利溥他人，所有条件及抵押，总求较胜于前，断不令启彼野心，致滋妨害”。可知孙中山的“开放主义”与列强强加给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有本质上的区别。孙中山的“开政主义”政策，就是主权不受侵犯。在中国法律许可的条件下，允许外国人来中国投资共同开发中国的富源，共同创办中国实业。这个政策如果得以执行，它必将会大大地促进中国实业的建设，为中国的繁荣富强奠定牢固的基础。

孙中山在主张“开放主义”和利用外资的同时，对主权这一原则问题十分看重。他认为，中国利用外资以振兴实业，主权必须“操之在我”，而“万

不可授之于外人”。无论吸收的外资有多大，这一原则也没有协商的余地。

孙中山曾以极大的精力从事铁路建设，充分展示了他的利用外资思想和主张。

1912年，孙中山受任为全国铁路督办，他计划在10年筑路20万里，迅速推进商品生产的发展，使中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地繁荣起来。在当时，要兴建20万里铁路，首先就是资金问题，需要筹措60亿元，而国内正百废待举，百事待兴，正当“民穷财尽之时”，根本无力筹措。孙中山决定利用外资。可是，60亿元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要向外国人筹借，不仅外国人诸多疑虑不愿投资，就是国内也有很多人反对，担心“用洋人资本”筑路，会招致“瓜分之祸”。孙中山说：“要造路20万里，非吸取外资不可”。不过，他又说：“若为四所迫，则宁借本国人之款”，“中国之资财极大，不过无完善之机器，以取集之，……故今日愿取外国资财，以开放中国原有之大财源。现在政府初成立，取财于外国，较易于本国，故吾济乃乐设法以求外国之财。惟外国欲握我国财权，及多生阻力，倘仍不转机，吾济不得不另筹别法。”可知孙中山对于帝国主义可能会通过向中国贷款而企图控制我国的财权或造成重新瓜分中国的情况是有思想准备的，并决不妥协的。

为了吸引外国人投资，而中国又不致于丧失主权，孙中山提出了吸收外资筑铁路的三种具体方法。即：甲、借款自办；乙、华洋台股；丙、外人包办。孙中山分析说：“我国向来办路俱取甲说（借款自办），外国资本家专注重工程。以营业盈亏与资本无涉，往往多肝耗损，此甲说之不可用也。乙说（华洋台股）须视中国之财力，假令华人入股六分之一，已需十万万元，华人中能否出十万元之资本，投入铁路事业，实为一问题，故乙说于事实上恐办不到。有利无弊者实为丙说（外人包办）”。即是说，孙中山主张由外人包办中国铁路建设。

但是，由“外人包办”中国铁路，又如何防止修筑铁路的地区不至于成为投资者所在国的势力范围呢？这是国人最担心的问题。孙中山说：这一层则不必多虑，因为“近世经济之力，足以破除国界。如某地为某国势力圈，但须以各国资本群集于某地，某国之势力圈不攻自破”。又说：外国人在中国投资要遵守中国的法令，有了法律和政令的约束，外国人就不能随心所欲了。他指出：“从前私人交涉变为国际交涉，原以我国保护无力。如东清铁路守兵巡士，皆俄国所派，主权自随之而去。今令外人包办一切，保护皆由我任断，不致丧失主权。现政府方拟大开放；准各国人民内地杂居，但除商埠外，须受治于我国法律之下，并规定其财产制限，如是可无虑矣。”即是说，对待外资问题，关键是不能授人以柄，如果股债无损我国主权，谁人投资都应欢迎。总之，孙中山认定：中国筑路，只有“大股外款，始能成就”：然而，股债必须坚持“但能兴利，又无伤主权”的原则。

孙中山为此提出了以维护国家主权力前提的借款三原则，“一、不失主权，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轻”。当时，有的帝国主义国家企图利用借款而提出了损害中国权益的附加条件，如“置兵保路”、“财政监督”等，孙中山都坚决反对。他在论及中外合资办银行的原则时，曾指出：“现在中国因势力不如人，财力不如人，智识不如人，故合资银行我当得条件保护略优”，以获“平等权力”，以防“主权丧失”。其条件应当是：银行名号属中国；注册在中国；董事会为中国人；遵守中国法律。所以，孙中山后来在《实业计划》中又再次强调，吸收外资建设实业，主权必须操在中国人手里，

不能落到帝国主义手中。他说：“惟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入则亡”，并将此视为“中国存亡之关键”。

孙中山认为，将外资用于生产，“有万利而无一害”、不能把利用外资一律视为“鸩毒”。他针对有人“一言及外债，便畏之如鸩毒”的思想，强调指出，借外债“以营不生产之事则有害”，借外债“以营生产之事则有利”。他举借债修路为例，“京奉以三年收入，已可还筑路之全本，此后每年所进，皆为纯利，如下借债，即无此项进款”。1922年，孙中山在南宁作关于广西善后方针的演讲，主张“广西须大借外债，以筑铁路，开矿山，树农场，兴工厂”，并解释说，革命党人之所以反对情朝统治者和北洋政府借外债，并非反对外债本身，而是“反对其借而浪用耳”，“若借而用于兴利，必无反对之余地”。

孙中山关于利用外资的思想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那种闭关自守的状态已经过去了，世界上各国已经联成一体，各国彼此之间进行开放交往，取长补短，已成为各国走向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因此，孙中山强调利用外资，把中国纳入世界市场的认识，是值得肯定的，即使在今天，这一认识也未过时，仍然闪耀着光辉并值得借鉴。

## 新经济政策显奇效 苏维埃政权得巩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是苏联人民的伟大领袖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领袖。他从 17 岁起开始探索革命的道路，一直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总是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小资产阶级党派和集团作坚决的斗争。他的敌人都指责他吹毛求疵、爱争吵、小题大做，嘲笑他是一个无聊的幻想家，但他毫不妥协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始终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奋斗。他像一个真正的领袖那样，能够比许多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他勇于探索，敢于创新。1921 年他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就是他晚年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大创举、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1917 年 11 月 7 日（俄历 10 月 25 日），俄国彼得格勒的工人阶级在列宁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并取得胜利。当天晚上，全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列宁在会上正式向全世界宣布：世界上第一个工农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成立了。但是，取得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更加复杂和困难的任务还在后头，如何在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成了十月革命后俄国无产阶级面临的新课题。

十月革命后，经过对内镇压反革命势力，对外巧妙地运用妥协策略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苏俄退出了帝国主义战争，为苏维埃政权着手国内建设创造了条件。这时，列宁丁夫时机地提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11 月 8 日，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了土地法令，宣布无偿没收地主的一切土地，把全部土地交给人民。土地法令实现了农民的迫切愿望，使全国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获得了 1.5 亿公顷的土地，同时废除了农民欠农民银行近 15 亿卢布的土地债务以及欠地主、高利贷者的其他债款。苏维埃政权的第二十法令是“工人监督条例”，规定凡用工 5 人以上、资本 100 万卢布以上的工业、商业、银行、农业、运输业和合作社企业均成立工人监督机构，负责监督企业的生产、产品购销和一切财务活动。这实质上是在不改变所有制，适当照顾资本家权益的情况下，通过工人监督使企业的经营活动为无产阶级国家服务，并使其沿着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轨道发展的一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间接办法。这项法令受到了广大工人的热烈支持，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却受到资本家的抵制和破坏。资本家的疯狂破坏和即将来临的外国武装干涉，迫使布尔什维克党从已确定的间接过渡的方针转到激烈的直接过渡的办法上来，加速国有化进程，用“赤卫队进攻资本”的办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大、中型工业实行国有法，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

然而，列宁和党的社会主义革命尝试很快被迫中断。1918 年 5 月，英、法、美、日、德等 14 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以及由他们直接支持供养的邓尼金、高尔察克等俄国白匪军团，联合向新生的苏维埃国家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到同年 9 月，外国武装干涉者和国内白匪军占领了苏维埃国家四分之三的土地，共和国的粮食、原料和燃料来源均被切断，苏维埃国家和人民到了生死存亡的危险时刻。

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从 1918 年夏天开始，苏俄逐渐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也就是按照共产主义原则来组织和管理国民经济。它的主要内容是实行余粮收集制，国家用摊派的办法从农民那里征购余粮，征购的数量和价

格由国家规定；加速实行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工业国有化，对拥有 5 名雇工以上的企业都实行国有化；实行产品分配的国家垄断，取消私人贸易；实行主要消费品的配给制，工资大部分实物化；实行普遍的劳动义务制，严格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原则，强迫资本家和其他剥削分子参加劳动；实行高度集中的战时经济管理体制，工业管理实行“总管理局”制，国家包干企业的一切。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作为战争条件下的一种特殊的临时性政策既是必要的又是成功的，因为不这样就无法打败国内外凶恶的敌人，就无法保住新生的政权。同时，战时共产主义也是布尔什维克党向社会主义过渡道路的一次探索，它绕过一切中间环节、采取最激烈的方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在所有制上，城市经济从工业到商业几乎全部国有化了。从流通和分配方面来看，商品货币关系基本被取消了，整个国家经济实物化了。这不仅与十月革命前党的经济纲领根本不同，就是与十月革命后最初一年的经济政策也有很大的差别。在当时人们的认识上，既然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要剥夺剥削者，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化，取消商品经济和货币流通，苏维埃俄国在战时环境下做到了这些，因此，很多人自觉不自觉地把这些政策和措施看作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捷径。列宁也认为，在一个遭受帝国主义战争破坏的国家里，实行余粮收集制，禁止自由贸易，严格地计算和平均分配每一磅粮食，不仅仅是为了维持生存和对付战争，已经越出“一般革命”的任务，而是共产主义的任务，是推进社会主义的“真正的主要门径”。这些想法，载入了由列宁起草的俄共（布）八大通过的党纲中。党纲中要求“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准备消灭货币”等直接过渡的思想。

但是，直接过渡的思想是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因而在实践上是错误的，行不通的。在建国初期和进行战争的特殊时期可以而且只能这样进行，而一旦转入正常的经济建设时，其弊端就自然显示出来了。列宁以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所具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伟大气魄毫不隐讳地承认错误，他在总结这一时期的经验教训时说：“我国极大多数农民都经营着细小的个体经济。我们把我们拟定的共产主义社会纲领中可以实现的东西先建立起来，这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广大农民的常规”，“我们原来打算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

1920 年底，历时 3 年的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结束，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时的苏俄大地满目疮痍，国民经济已濒于崩溃。农业生产遭到破坏，谷物和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缩小了，总收获量和单产水平都较一战前大大减少，大小牲畜头数也急剧减少。尽管国家采取各种措施，要求甚至强制农民扩大播种面积，但农民没有积极性。工业的破坏更为严重，成千上万个工厂停工，1920 年、工业品产量只相当于 1913 年的七分之一，俄国总的生产水平倒退了几十年。经济状况的极端恶化，使人民生活陷入了空前的困难之中。粮食不足，交通瘫痪，早已使广大群众连续多年处于半饥饿状态。

怎么办？继续执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现实已证明了那是行不通的，它的结果必然是断送工农联盟，最终断送苏维埃政权。改吧，马克思、恩格斯从未经历此种情况，也未指明要怎么做。无产阶级的领袖列宁毕竟是唯物主



义者，他的伟大体现在他尊重实践，尊重实践对理论的检验，并从实践中作出新的理论结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遇到的挫折，促使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重新思考如何认识社会主义。

早在 1920 年底，列宁就开始酝酿调整现行经济政策。到 1921 年初这段时间里，列宁亲自对农业的状况和农民的要求做了大量调查。他阅读了许多的农民来信和申诉书，亲自接见了各地的农民代表，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呼声。农民向自己的领袖诉说：“在实行余粮收集中，懒汉和勤劳的人都同样地摊派，这太不公平了”，“要使农民看到好处”，“怎样才能使人们看到好处呢？很简单：按百分比收集余粮”。对农民这种坦率的意见，列宁极为重视，他亲自记录，并通知中央委员和人民委员研究。他也向农民代表推心置腹地讲：“我知道，当农民的一切都被拿走，而给他们的东西又是那么少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是何等艰难。我了解农民的生活，我热爱他们，我尊敬他们。我请求农民再稍微忍耐一下，我请求他们清醒过来并帮助自己的政权”。领袖的心中装着人民，以极大的热诚关心着人民，一种能恢复残破不堪的经济、能解除人民困苦、能给人民带来幸福的新方略在他的心中开始出现。

在调查研究，体察农民愿望的基础上，列宁于 1921 年 2 月 8 日写成了具有重要意义文献《农民问题提纲初稿》。文章建议满足非党农民关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愿望；减低粮食税额；同意使税额与农民的积极性相适应的原则；在缴足税款的条件下，使农民获得更大的自由来运用和支配其纳税以外的余粮。列宁的这些思想为俄共（布）十大所接受，大会通过《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征集制》的重要决议。3 月 21 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用实物税代替粮食和原料收集制》的法令，规定：取消余粮收集制，实行实物税；实物税额应低于到目前为止实行余粮收集制方法征收的税额；政府将以工业品来换取农产品；及早公布实物税额，以使土地耕作者在春耕开始前就尽可能确实知道自己承担义务的数额；完税后剩余的产品归土地耕作者自行全权支配；剩余农产在地方经济流通范围内可以交换，既可通过合作组织、也可在市场和集市上进。几天后，政府又颁布法令，规定 1921—1922 年的实物税额为 2.4 亿普特，比原定余粮收集额少征购近 2 亿普特。

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不仅仅是征集粮食方式的变化，而且是苏维埃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根本调整，它实行的基础是国家利益与农民利益的结合，这大大加强和充实了工农联盟的基础，它的实施力建立和加强工农之间的经济联盟开辟了道路。加强工农经济联盟的思想，是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提出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工农联盟思想的极大丰富和发展。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它涉及到国民经济发展的一系列环节，要求对国家经济关系的许多方面进行相应的调整。因此，粮食税的实行既是新经济政策的起点，也是新经济政策的核心和基础。

实行粮食税后，当个体农民交足粮食税后，既然国家允许他们自由支配自己多余的产品，这些多余的农产品中的大部分便成为了商品，不可阻挡地涌入市场。因此，开政自由贸易，促进商品的生产 and 流通就成了一种必然趋势。早先，列宁曾设想排除货币和市场经济关系，由国家用工业品向农民实行以物易物的办法，取得农民交税后“自由处理”的那部分余粮，并逐渐过渡到完全的物物交换。这一思想体现在 1921 年 5 月 24 日政府颁布的法令中，

就是对自由贸易作了严格的规定：只限于“地方流转”，即在一定的地域内买卖，不得长途贩运；产品交换，即以货易货作为交换的基本形式；交换主要由政府组织或在政府监督下进行。但是，商品交换的实践很快就冲破了这些限制，党和政府在1921年春夏精心组织的商品交换在秋季明显地落空了，失败了，“商品交换没有丝毫结果，私人市场比我们强大，通常的买卖、贸易代替了商品交换”。

面对新的形势，党内有的人主张制止商业活动的泛滥，实行强制性的产品交换。列宁则实事求是地指出：不是回到过去，而是“我们所作的退却是不够的，必须再退却，再向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通过商业这条更加迂回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1921年8月，人民委员会发布指令，取消商品流转的地区限制，准备向货币交换形式过渡。9月，正式决定把商品买卖作为交换形式；10月，取消不用货币的商品交换和固定等价物。

农产品自由贸易的发展，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合作社首先被拖到商业轨道上去了，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的生活品分配机构变成了纯粹的商业组织。紧接着，小工业、手工业也走上了商业轨道，它们的产品成为农民和城市居民自由选购的物资；私人商业资本获得了广泛的合法性；苏维埃政府从法律上不仅允许小型的，而且允许中型或大型的私人零售批发贸易。最后国营大企业也开始加入市场竞争。当时已经允许企业在市场上自由销售部分非国家统一分配的物资，对部分产品企业间可以自由议价。同时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自负盈亏，把职工的收入同企业的最终经营成果——利润结合起来。有鉴于此，列宁大声疾呼，一再号召共产党人“要学会经商”，他说：“如果我们建立了充分经济核算的托拉斯和企业，但又丁会用精打细算的商人的方法充分地保证我们的利益，那我们还是道道地地的大傻瓜”。可见，列宁对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想法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把商品货币关系当作了无产阶级国家应加以利用和掌握的对象，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工具了。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将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运用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这是他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最重大的和实际上的丰富和发展。

新经济政策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允许资本主义一定程度上的存在和发展。因为在小生产大量存在和自由贸易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同时战时共产主义的实践也证明了单靠国营经济并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各方面的需要，把小工业乃至手工业小商业都由国家包下来的作法不仅使市场商品供应紧张，而且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而允许这些小商品经济独立发展，却可以发挥它们所需资金少、周转快、设备和原料需求简单的优点，以补充国营经济的不足。特别是随着农产品市场的开放和农业的发展，急需用农具、日用品与农民交换。国营大企业一时又难以提供这些东西。1921年7月7日，国家做出决定，规定每个公民均可经营手工业和小型工业企业，经营者有权自由支配自己生产的产品，有权在法律许可范围内购置原料、工业和设备。8月9日颁布的《关于贯彻新经济政策的原则》中指出：“必须首先给大工业需要服务的和按国家任务或力消费合作社进行生产的那些小工业和手工业部门创造最优惠的条件”。12月10日又规定，凡工人人数在5人以下，拥有发动机的小型企业和人数10人以上没有发动机的小型企业，一律解除国有化；解除国有化的企业，有些归还原主，有些出租

给个人和集体；一些较大的企业，未开工者也可租给私人；同时鼓励私人投资开设企业。这些措施的实行，使个体经营和私营的小工业和手工业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

与此同时，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出现了几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

租让制，就是苏维埃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之间的一种协议，将一部分企业或资源（森林、矿山、油田等）租让给他们，在规定的期限内和条件下投资开发和经营，资本家是为获得高于一般利润的额外利润，苏维埃政权获得的利益是发展生产力，就是在最短期间增加产品数量。它的一般条件是：由资本家进口设备、出资经营，产品一部分给苏维埃国家，一部分归承租人自由支配，企业和资源的所有权属苏维埃国家。

租赁制，它是苏维埃国家把国有的中、小企业出租给本国资本家、合作社的一种形式，承租人同国家签订租用合同，并按照合同规定的条件组织企业生产、维修厂房和设备、交纳租金。租期一般为1—3年，最长为6年，可续订。期满后承租人应将企业完整无损地归还给国家。租借企业的经营活动直接受地方苏维埃机关的监督。租赁制发展比较顺利，租借给私人的多半是管理差、停工或国家无力维持的企业。俄国私人租赁制企业在国家资本主义中占的比重最大。取得的效果也较明显。到1923年7月1日，出租企业约51000家，几乎与当时的国营企业数目相当。1924—1925年度，私人租赁企业占工业总产值的3%，工人人数的1.4%。

合营制，它是苏维埃国家与外国或本国资本家合资经营企业的一种方式。这种企业由国家代表和资本家共同经营管理，资本家作为股东之一按其投资的比重和规定的标准分得利润，并有权要求抽回自己的资本。列宁认为，在这种企业中，共产党员、外国资本家和本国资本家在一起工作，开展竞赛，看谁搞得更好。他要求共产党人向外国资本家学习管理经验，用实际行动做得比资本家更好。同外资合营的公司是1922年开始建立的，主要集中在森林工业；同本国资本家的合营公司是在20年代后半期发展起来的，主要从事商业活动。

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允许非社会主义经济一定程度的存在和发展，建立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特别是城市经济多元化，是新经济政策时期苏维埃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条重要的经验，它是列宁在经过了曲折的探索之后才提出来的。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在拟定的党的经济纲领中就强调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改造要采取“迂回的”办法，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进一步论证和发展了这一思想。他指出，必须从俄国社会经济的现实条件出发，充分了解俄国现有各种经济结构的成分。革命胜利后的俄国，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生产力结构属多层次，既有高度社会化的大垄断组织和现代化大企业，又有汪洋大海式的小农经济以及各种各样的小商品经济，甚至还存在封建宗法式经济。不同的经济体现了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社会化程度，因而对它们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采取不同的方法与步骤。在这些结构中，小生产又占了优势，这就决定了改造的特殊的困难性和复杂性。革命胜利后的俄国，一边是先进的政治制度，一边却是落后的生产力，二者之间极不适应，这也决定了利用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大力发展生产力，使它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必要性。因此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即无产阶级应该学会利用“别人的手”

来建设社会主义。他说：“私人资本主义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帮手”，“我们共产党员什么时候能够用别人的手来建设经济，自己向资产阶级学习，并且使资产阶级走我们的道路，我们什么时候就能管理这种经济”。列宁的话时至今日还闪烁着历史的光芒。

新经济政策时期，还对国营经济进行了整顿，因为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那套管理机制把企业的一切都包下来，结果集体吃大锅饭。在战争这种特殊条件下，它起了很好的作用，但在和平建设时期特别是新经济政策时期这种商品经济发展的环境，它就显得极不台时宜了。整顿和改革主要是：整顿工业企业，实行托拉斯化，将其既作为一种管理组织，又作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经营组织；国营企业实行经济核算，扩大经营自主权，将企业的责权利结合起来；改革工资、奖励制度，贯彻物质利益原则，把职工的收入与个人劳动成果、与企业集体劳动成果联系起来；加强计划管理，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努力建立使计划管理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合理结合起来。这些改革与我们今天的改革有多么相似，真是让我们不得了由衷地发出赞叹：“伟乎哉，列宁！”

新经济政策在俄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解除了压在全国人民头上的饥荒，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余粮收集制的取消，自由贸易的实行，使广大农民感到他们现在才真正是在自己的土地上为自己生产，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使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到 1925 年，农业总产值已超过 1913 年的 12%，5 年里，粮食产量几乎翻了一番。生产的发展使农民生活也得到改善，农民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消除了，工农联盟巩固了。在城市经济领域，虽然非社会主义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比起国营大工业的发展就逊色多了，这表明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这也为进一步对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基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增强了苏维埃国家的综合实力和生存能力，国际帝国主义的阴谋更难以实现了。

## 速度优先抓关键 苏联步入工业化

1939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苏联与德国签订了为期10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似乎安全了，但仅仅在23个月之后的1941年6月22日黎明，希特勒撕毁了这一条约，出其下意地向苏联发动了代号为“巴巴罗萨计划”的进攻。成千的德国飞机轰炸苏联的飞机场；数百的坦克冲过边界，上万的摩托化部队蜂拥而至。希特勒声称有900万人参加了实际战斗，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进军”。斯大林迅速调集人力、物力进行反击。苏联凭借其实力取得了一系列战役的胜利，将德国逐出了苏联，并进而攻克了柏林。战争是实力的较量，尤其是经济实力的较量。苏联战前十几年由斯大林领导的工业化，为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1925年，苏联的国民经济恢复基本完成，但国内国际形势依旧严峻。

当时的苏联经济落后，生产技术低下，生产部门残缺不全，许多现代化工业都是空白，缺乏维护民族独立的经济基础，它只是一个输出农产品，输入机器装备的落后的农业国。国际环境更令人担忧。苏联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随时准备消灭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国内战争时期，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妄图把新生的苏维埃扼杀在摇篮里的阴谋虽暂时失败了，但它们亡苏之心不死，仍在寻求可乘之机企图向苏联发动新的进攻。就在1925年，德、英、法、意、比签订的洛加诺协定，便是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准备结成反苏联盟的一个重要步骤。为此，苏联从1926年起对国民经济进行改造，开展国家工业化，从而改变落后的国民经济结构，建立起大工业体系，使苏联从一个输入机器和设备的国家变成生产机器和设备的国家，消除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依赖，奠定社会主义的强大物质基础。

在苏联实行工业化的探索开始于列宁，他在十月革命前夕就指出：“战争是铁面无情的，它斩钉截铁提出问题：或是灭亡，或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在俄共（布）十大上，列宁认为：“增加财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和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他指出如果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特别是对于一个农业国家来说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会议上指出：“大机器工业是社会主义唯一可能的经济基础。谁忘记这一点，谁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他还强调，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是向建立在机器工业基础上的大经济过渡。大机器工业是社会主义物质生产的源泉和基础，而重工业又是社会主义的主要基石。他提出了发展大机器工业要以重工业为主的思想。

遗憾的是，列宁没有看到苏联工业化的蓬勃开展，更没有看到工业化的伟大成果，他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离开了他的事业。历史的重担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斯大林的肩上。

在1925年12月召开的联共（布）十四大上，斯大林代表党中央作了政治报告。他阐述了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任务。方针和政策，制定了工业化的总路线。总路线的实质就是发展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从技术上改造整个国民经济，使苏联从落后的农业国家变成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强国。联共（布）十四大标志着有计划、大规模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时期正式开始。

1926年初，斯大林对国家的工业化方针作出了新的具体的解释。他指出，国民经济的发展要依靠而且已经依靠工业的直接扩展，原因之一是农民市场已成为主要的国内市场，其二是小农经济的发展潜力已经枯竭。所以，

苏联已经“进入直接工业化的时期”，这一时期要发展重工业。

苏联的国家工业化从 1926 年开始，其间经历了第一、二个五年计划。在第三个五年计划还未完成的 1941 年，工业化就被战争打断了。工业化共经历了 15 年时间。在这 15 年中，斯大林坚持以高速度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方针。

斯大林认为，速度问题是关系国家命运、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问题。“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是要挨打的。”苏联要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必须不顾一切牺牲，尽最大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以“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速度”赶上并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斯大林说：“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 50—100 年。我们应当在 10 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莫洛托夫也指出：“我们五年计划的速度，并不是布尔什维克党想出来的。对于在敌对的资本主义包围下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国家来说，它是历史的必然。”

当时的国际环境决定了工业化的高速度。1927 年 5 月，英国断绝了同苏联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过类似的举措。特别是 1929 年，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席卷了资本主义世界，加上一战后各资本主义国家问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使得争夺世界市场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了，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在积极准备新的战争以寻求出路。在这样的环境中，苏联只能采用高速度来发展重工业，才能抵抗住帝国主义势力的进攻，才能保卫国家独立。正如斯大林在 1933 年 1 月说的那样：“我们不得不鞭策我们的国家，因为它落后了 100 年，并因落后而面临灭亡的危险。”

如果说高速度是工业化的灵魂，那么优先发展重工业则是工业化的核心。斯大林指出：“不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都算作工业化，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发展重工业还是保卫国家的需要，“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从发展重工业开始来实行国家工业化。”发展重工业是斯大林确定的工业化的突破口和重点。

斯大林提出的以高速度发展重工业能否成为现实，关键在于如何解决资金短缺、技术落后、干部人才匮乏等重大难题。这些关键问题的解决关系到苏联工业化的兴衰成败，关系到苏联能否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没有被困难所吓倒，他们为克服一个个的问题，殚精竭虑。

工业化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便是资金严重缺乏的问题。众所周知，沙皇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留给苏维埃的不是一座金库，而是满身债务。两次战争又使国民经济受到极大破坏，国家已没有任何储备。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它很少有机会利用外部援助，甚至资本主义国家常用的贷款方式，也很难运用。苏联只能依靠本身的积累来解决，即从内部挖掘，边建设边积累。斯大林指出：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地主、资本家被剥夺，以前几百万剥削者占有并用于消费的资金就可以用于工业建设；废除外债和没收外国垄断资本，苏联无需每年支付大量资金去偿付沙皇的外债利息和外国资本家的股息；由于工商业国有化和外贸由国家垄断，可以将企业的剩余产品用于工业建设；劳动人民具有积极性和创造性；全民厉行节约等等。通过这些渠道、可以积累大量资金用于工业化。

在实践上，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

施。

其一是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1929年1月，《真理报》及全国各大报刊登载了列宁在1918年写的《怎样组织竞赛》一文，一场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到处都在发起倡议和挑战。4月29日，党中央向苏联全体工人和劳动农民发出开展社会主义竞赛的号召。5月9日，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在各工厂中组织社会主义竞赛的决议》，并决定设立奖励基金，设立红榜，颁发奖状和流动红旗等制度，以推动社会主义竞赛的开展。随后，劳动竞赛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竞赛的精神深入到了每一个劳动者的心中，竞赛的气氛笼罩了全国各行各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竞赛的形式主要是“突击队”和“响应计划”。突击队是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主要带动力量，到1932年，参加突击队运动的工人占全体工人的75%。响应计划是把完成国家计划与劳动竞赛相结合，使竞赛成为完成计划的重要保障和推动力。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人的忘我劳动精神与深入掌握新技术、提高职工的熟练程度和科学技术水平更加紧密结合了起来，从而使竞赛达到了新的高度。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斯达汉诺夫运动”。斯大林曾高度评价：“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是我国工业的革新家，斯达汉诺夫运动代表着我国工业的未来……它为我们开辟了达到很高的劳动生产率指标的唯一途径，即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需的、为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所必须的劳动生产率指标的唯一途径。”这个运动充分体现了苏联劳动人民的精神面貌和素质，突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请听一听劳动者的心声：“人生最大的事情，就是工作。不，不仅是工作，而是创造！在我们生活着的这一段时刻，有着无穷无尽的创造机会。我难道能够从创造的工作中离开一个钟头去温存我的妻子或是按时去吃饭吗？”多么崇高的心灵啊！为了社会主义建设，苏联人民真是众志成城！一个国家的建设还有什么比人民的觉悟、人民的热情、人民的团结更重要的呢？

积累资金的措施之二即是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布尔什维克党号召，合理使用资金，反对浪费，精简机构，节约开支：“尽力做到使每个戈比都用得合理，把每个戈比用到某一时所绝对必需发展的事业上去。”通过努力，国家行政费用大大减少，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它为工业化积累了资金，也体现了苏联人民艰苦奋斗的精神。同时，在重工业部门中推行经济核算制，提倡节约原材料、燃料和动力，减少非生产性开支，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努力从重工业本身中积累资金。

措施之三是在分配政策上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方针。政府动员群众储蓄，还通过税收、公债和一次性捐款等方式吸收居民资金。这样，国民收入中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积累资金比重就不断上升，到1932年，已占三分之一。

农民和农业也为积累资金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斯大林主张从农业中吸取工业化资金。表现力：一是对农业给得少，对农业投资的比重不断下降；二是从农业拿得多，实行高征购、低价格。工业化开始后农业中的积累有三种形式，征收直接税；规定农民义务交售农产品的制度；集体农庄向国营机器拖拉机站交纳实物报酬。虽然苏联政府在对待农民和农业的政策上不免有些过火，因强调高积累而忽略了农民的利益，但以农民的牺牲所节约的资金并没有丢在水里，一座座工厂建立起来了，工业化的目标实现了。而且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特别是在国际局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除了节衣缩食高速度

发展重工业外，别无更好的良策。

工业化之前的苏联，不仅经济落后，技术也落后，机器设备十分陈旧，而且缺乏各种技术干部和管理人才，这些成为阻碍工业化前进的巨大障碍。为解决技术和干部问题，斯大林先后提出了三十著名的口号，并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一个口号：“革命青年向科学大进军”。这是1928年5月斯大林在共青团第八届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他号召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和布尔什维克要有掌握知识的愿望，要以坚定不移的决心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来武装自己，要“顽强地、耐心地学习。向所有的人学习，不论向敌人或朋友都要学习，特别是向敌人学习。”斯大林还批判了那种轻视知识分子和以“光荣出身”自居的错误态度。斯大林提出的这一口号推动了全国人民开展大规模的学习运动。

第二个口号：“技术决定一切”。1931年2月，斯大林提出“在改革时期，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号召全体劳动人民都来积极创造和掌握技术。斯大林指出，高速度发展工业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经验和知识。他说：“任务就是要我们自己掌握技术，成为内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计划全部完成。”他后来又指出，技术并不能脱离使用技术的人，离开了人，技术就是死的东西。“技术决定一切”的实质就是要求布尔什维克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不要成为空头政治家和事务主义者，而要成为熟悉技术的专家。

第三个口号：“干部决定一切”。他指出，在工业化中，有了技术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有掌握技术的人才，这样，技术才能被充分利用。斯大林说：“有了掌握技术的人才，技术就能够而且一定会创造出奇迹来。”因而，干部问题就显得非常重要。斯大林认为干部问题是“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干部问题不解决，建成重工业的问题就不能认为已经完全解决了，因此，党的任务之一就是切实解决干部问题，“无论如何要攻下这个堡垒。”他号召广大干部要努力“使自己成为专家，成为能手，成为精通经济工作的行家。”斯大林还要求人们注意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用正确的态度去对待人才、对待干部、对待工作者，要关心和爱护所有的工作者。

斯大林提出的三十口号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中著名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就是在斯大林提出“技术决定一切”和“干部决定一切”这两个口号之后出现的。为此，斯大林还在实践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解决技术和干部问题。

首先是国家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和中等技术教育。通过教育，培养出各种专门人才和技术干部，政府十分重视发展成人业余教育，建立了门类齐全的业余教育体系、有计划有组织地把一些党政军干部和优秀工人输送到大学进行系统的培训，使他们由外行变为内行。苏联还派遣青年专家出国学习，或聘请外国专家，以便尽快掌握外国先进技术。新型知识分子的成长有力地推动了工业化和整个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

其次是改革工资制度。斯大林认为必须取消原有工资制度中的平均主义，打破旧的工资等级制。工资改革的原则是：拉大熟练与非熟练工人之间的差别；在普遍提高工资的基础上，优先提高重工业工人的工资；在企业内部提高主要工种的工资；提高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工资，扩大推行计件工资和计时工资。工资改革虽有一些缺点，但基本上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至此，斯大林比较成功地将苏联工业化中遇到的三大难题全部解决了，这为国家工业化的顺利开展扫清了障碍。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工业化进程结束。

从 1928 年到 1940 年的 13 年中，苏联的工业化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两个五年计划都以四年零三个月提前完成。“一五”计划的完成，苏联由进口机器装备的国家变成了生产机器装备的国家，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建立。“二五”计划的完成，苏联的工业总产值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高速度发展工业化的特点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发展速度远远高于资本主义世界工业化时期最快的发展速度。

总之，工业化的开展，实现了苏联生产力的根本改造，建立了继续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采取的许多政策和方法给苏联经济的其他方面的发展也带来了刺激，从而使苏联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为以后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 新政解危济苍生 美国经济出困境

1933年3月4日，星期六，那是一个阴沉的日子。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天色一片灰暗，寒风吹动悬挂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两旁建筑物上的旗帜和条幅，冰冷的夹雷的小雨向观看新总统官兰克林·罗斯福就职仪仗的10余万民众扑来。人们紧缩在大衣后面，一些人跺着脚取暖，另一些人则踩在沾满污泥的报纸上御寒。这种凄凉的景象却恰与当时美国人民的心情相映照。自1929年10月美国陷入经济大危机以来，在混乱动荡中度日的老百姓，此时更加惆怅、彷徨，高官显贵也是忧心忡忡，一筹莫展；现任总统胡佛在前往国会大厦的途中木然端坐，眼睛低垂；更多的美国人民则静静地守候在收音机旁。他们——整个1.2亿美国人都急于想知道新总统能给他们带来什么。轮椅总统罗斯福就这样，在人民的期待中走马上任了。

富兰克林·罗斯福于1882年1月30日出生在纽约海德公园。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曾在英国贵族式的格罗顿中学念书。1904年从哈佛毕业，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攻读。1907年在纽约一所著名律师事务所从事一种惬意的生涯。他一生崇拜他的叔岳父和远房亲属西奥多·罗斯福（1900—1908年，为美国总统），并以他为榜样。1913年，美国总统威尔逊任命罗斯福为海军部助理部长。罗斯福是一位能干的行政人员，在威尔逊集团的二等官员中深罕众望。1920年，他赢得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提名。竞选固然未成，但他获得了非常宝贵的经验，变为了一个具有光明前途的实际政治家。

然而，幸运之神并不是总跟随着他，1921年8月，罗斯福灾难临头。他因救一场大火，使本已侵入他肌体的病毒诱发，患了骨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他曾说，那时他几乎被上帝抛弃。信心和勇气使他恢复了战斗之气，他在痛苦中亦取得部分成功。1924年，重又进入政界。1928年和1930年，两次当选为纽约州州长，任职共4年。1932年11月8日，美国大选，罗斯福在才华横溢的竞选活动中，以富于感染力的微笑，使人消除疑虑的声音，以及鼓舞人们信心的能力，使1932年选举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难忘的一次选举。罗斯福以压倒多数的选票竞选成功，他成为唯一一位坐在轮椅上入主白宫的总统。

“值此我就职之际，同胞们肯定期望我以我国当前情势所要求的坦率和果断来发表演说。现在确实尤其有必要坦白而果断地谈一谈真实情况，全部的真实情况。”这就是新总统罗斯福的开场白。那“全部的真实情况”究竟怎样呢？罗斯福不无忧心地说：“价值贬缩到难以想象的程度，赋税增加了；我们纳税的能力则已降低；各级政府都遇到严重的收入减少；贸易交往中的交换手段难逃贸易长流冰封，工业企业尽成枯枝败叶；农场主的产品找不到市场；千万个家庭的多年积蓄毁于一旦。更重要的是，大批的失业公民面临严峻的生存问题，而艰苦劳动却所得甚微的不在少数。只有愚蠢的乐天派才能否认眼前的暗淡现实。”

事实上，美国当时的“全部的真实情况”比罗斯福描绘的“暗淡现实”还要严峻得多。

1500万美国人绝望地从一家工厂的大门踉跄到另一家工厂的大门，去寻求那已下复存在的工作；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心脏的银行业不时传来倒闭，休假的噩耗，惊恐的储户包围着银行，徒劳地试图在银行关闭或破产前提取一

生的储蓄；在广漠的田野上，一群群脸色忧郁、缄默不语的人们不得不放弃农场。1.8美元就是一个农场的“拍卖”价；商业活动出现史无前例的低潮，“已无滴水可流”；不少家庭溃散，四处逃亡；社会道德伦理丧失，抢劫、暴力丛生，不满的人群自发地抗议、示威……

经济坠入低谷，民主制度濒于崩溃，资本家沮丧、老百姓绝望。这就是罗斯福就任总统时的险境。如果他能圆满地化险为夷，他就会作为伟大的总统载入史册，但是，如果他失败了，他将作为最糟糕的总统受到谴责，罗斯福真是“受命于危难之时”。

面对美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险情，罗斯福并不期望奇迹的到来。他甚至没有战胜危机的把握，也不知道该用什么办法才能使美国人民走出困境。在他当选为总统的当晚，罗斯福思绪万千地对他的长子说：“吉米，你知道，我一生只害怕一样东西——火。今晚我觉得我害怕的是另外一件事……我害怕我也许没有精力做好这件工作。”在宣誓就职的当天上午10时，他还特意去圣约翰教堂祈祷，乞求上帝的保佑。

罗斯福在就职演说中没有给美国人民更多的许诺，他仅把“增强信心”和“立即行动”这两件回春的礼物带给了他的人民。他首先要求美国人民要有信心战胜恐惧。“我们的国家过去经得起考验，今后还会经得起考验，复兴起来，繁荣下去。因此，首先，允许我申明我的坚定信念：我们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我们的祖先笃信上帝，无所畏惧，因而所向披靡，比起他们的艰险，我们还该说是万幸的。”“我们不应该听天由命，而应该让命运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同胞服务。”罗斯福还要求人们立即行动起来，“祖国要求行动，现在就行动起来。”“唯有空谈无用”。恐惧与坐视是自经济危机以来当时美国人的通病，信心与行动则成了医治的良方、它点燃了举国同心同德的精神之火。

罗斯福究竟要怎样行动？那就是广泛地行使大权推行“新政”的措施。

1932年6月27日，罗斯福在演说中提到“我保证为美国人民实行新政”。“新政”究竟是什么，当时的罗斯福是不清楚的，他只是说：“全国需要而且要求进行大胆的、持续的试验，采用一种方法并试行之，这符合常理。如果这种方法失败了，那就坦白承认，并试行另一种。首先总得试行某种方法。千百万贫困者在满足他们的需要的东西近在咫尺时，不能永远默然等待。”他还说过：“本政府上任以后，面临一大堆问题。我抛弃了什么也不想或等着瞧的政策。”试验、行动就是罗斯福推行新政的重要步骤。直至1937年11月，他才对“新政”一词作了较全面的归纳，这是试验、行动的总结。

“新政”意指政府通过它自身的积极、肯定的行动，来达到它公开宣布的目标，而不是袖手旁观。它以救济、复兴、改革等形式达到目标，即是：“在工作的男女获得体面的工资、合情合理的工时，农民从事体面的衣食之业；保障储蓄安全，投资而无危险，避免一些人用别人的钱投机，防止掮客，投机者的欺骗，人们有充分的娱乐、较好的住宅和健康的体魄；组织工商界；使之有合理的利润，反对垄断和不公平的竞争，为公众提供公正的价格；为了普通男女公民的利益，有计划地使用自然资源；保障老年，保障不可预测的季节性的失业，反对新的犯罪，反对战争。”罗斯福走马上任后，立即就率领美国人民投入“新政”政策的试验之中。

1933年3月5日，罗斯福入主白宫的第二天，他就做了三件载入美国史册的大事，为了恢复全国的信心，他下令全国银行“休假”，进行金融整顿；

为了阻止硬币、金银外流，他根据 1917 年的《对敌通商法》，禁止输出黄金、白银和硬币；他要求第 73 届国会于 3 月 9 日召开特别会议、这是宪法赋予一位总统的权力。

3 月 9 日，第 73 届国会召开特别会议。这次会议首先办的一件事就是通过《紧急银行救济法》。这个法案是财政部长伍丁马参议员卡特格拉斯奋战几天后草拟的。当把它送到国会议员们面前后，只花了 38 分钟就获得了众议院的一致通过，参议院仅象征性地“辩论”了一番就以 73 票对 7 票通过了这一法案。当晚 8 点 36 分，罗斯福就签署了它。从而成为新政的第一项立法。这一法案从国会介绍内容、通过到总统签署，前后只用了几个小时。这在美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形势的严峻与“立刻就行动起来”，可见一斑。

从 3 月 9 日至 6 月 16 日，第 73 届国会特别会议通过了 15 项重要法案，经罗斯福签署后成为法律，人们称之为：“百日新政”。它像旋风一样席卷美国大地。被危机弄得惊恐不安的大多数议员，有时连法案的内容也没有仔细阅读，就投票赞成，他们只想赶快行动，赶快将新政措施付诸于试验，他们相信法案起草人的智慧。罗斯福本人在“百日新政”期间，发表了 10 次重要的演说；建立了每周举行记者招待会和内阁会议各两次的制度；宣布废除金本位制；向国会送去了 10 篇咨文，指导议员们通过了 15 项重要法案；别具生面的“炉边谈话”在一定程度上架起了总统与民众交流的桥梁。在美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位总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进行这么多的国事活动，也没有哪一届国会在不足 100 天之内通过了这么多的法案。当时，没有人能预言“新政”是否会把这个国家从危机的困境中解救出来。但是，“百日新政”鼓舞了无数的美国人，他们增强了信心，又确实行动了起来。罗斯福嘴边经常挂着的一句话，可以恰当地评论“百日新政”：“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是我们毕竟已经上路了。”

1933 年后半年没有大的新政政策出现。1934 年 1 月，第 73 届国会召开年度会议，至 6 月 28 日止，国会又先后通过了 32 项重要法案。这些法案与“百日新政”的法案在侧重点上是一致的。它们的着眼点均在救济、复兴两个方面。其主要内容有；

金融方面：1933 年 3 月 9 日，通过《紧急银行救济法》，关闭所有的银行。经过检验后，凡有偿付能力的银行才允许重新开业。1933 年 6 月通过《银行改革法》，由联邦储备银行管理银行投资。1934 年通过的《证券交易法》，规定建立证券交易委员会以管理证券交易。1934 年 1 月，通过《黄金储备法》，规定由财政部掌握全国黄金，禁止黄金流通。

救济方面：国会通过了《国内资源保护队森林救济法》，这是一个既救济失业青年，又保护自然资源的法律。1933 年，罗斯福提出“以工代赈”的设想，一周后便拟出草案，这个草案维护了失业者的自尊心和自力更生的精神。另外还通过了《联邦紧急救济法》、《全国就业制度法》、《家宅贷款法》、《民用工程紧急救济法》等救济性的措施。

农业方面：国会先后通过《农场调整法》、《农场信贷法》救济农业。后又通过《农场救济法》，扩大了《农业调整法》所定基本农产品的范围。《棉花控制法》对棉花实行强制性减产。《糖料法》把甘蔗、甜菜列入基本农产品范围。另还有《烟草控制法》、《联邦农场破产法》，这是一项尽可能使农民不至破产的立法。《放牧法》则是一项保护土壤的措施。

工商、交通方面：国会通过《全国产业复兴法》，旨在复兴工商业，改

善劳工生活、劳资关系。另有《联邦证券法》、《紧急铁路运输法》和《法人破产法》等法令。

1934年6月28日，罗斯福在“炉边谈话”中说：“在我们回顾第七十三届国会的本届会议的成就时，越来越明显的是：本届国会的基本任务基本上是完成和巩固了它在1933年3月开始的工作。”第一期新政告一段落，经济危机最险恶的一年也在此结束。

1935年1月3日，第74届国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罗斯福新政进入第二个时期。其侧重点从救济、复兴转向改革。第二期新政的改革历经了一个较长的时期，它包括第74届国会和第75届国会所通过的立法。在这一时期国会公认为重要的法案计34项。主要内容有：

调和劳资矛盾：它包括《全国劳工关系法》、《社会保障法》、《公平劳动标准法》和《铁路退休法》。《全国住宅法》是一项解决和改善低收入阶层住房条件的法案，《政府雇员合同法》规定了最低工资、最高工时标准，故列入这一类。

涉及资产阶级利益：它包括《民用煤气电力控股公司法》、《联邦反价格差异法》、《公正商业法》等。1935年至1938年，国会每年都通过了《税收法》，年年都调整税收，按照罗斯福的说法，它们是为资本家的利益而设计的新准则；在交通方面，有《汽车运输法》、《商船法》和《民用航空法》，均旨在建立新准则。

稳定农业：在第二期新政期间，有两项极为重要的农业立法。一是《土壤保护与国内土地合理使用法》，它是继1933年的《农业调整法》之后的另一个实质上的农业调整法。二是《农业调整法》。以外，还有《土壤保护法》、《农场抵押延期付款法》和《农场佃农法》等。

金融方面：国会通过《1935年银行法》，把自实施新政以来的金融政策，加以系统化，这是国家政权监督、干预金融的强有力机构。

救济方面：国会通过的《紧急救济拨款法》最为重要，依此法成立了“工程促进署”(WPA)，用以工代赈的办法来试图缓解失业问题。后又建立了“全国资源委员会”、“重建管理局”、“农村电气化管理局”。

从内容看，第二斯新政期间，罗斯福显然给群众提供了更多的保障和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资本家，美国的进步运动也在此期间达到了高潮。

有人说，罗斯福政府的第一期新政主要是对病人进行急救，这叫“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第二期新政则在寻找病因，拟定长期的治疗方案。前者因病人病情危急，大夫显得有些手忙脚乱，有时开的处方并不那么有效，有时既有补药也有泄药。后者却因病人逐渐痊愈，大夫也比较冷静，所下处方带有久治性质，例如，《社会保障法》、《工时工资法》、《税收法》、《银行法》等药方，至今还在服用。

1939年1月4日，罗斯福在送给第76届国会的咨文中没有提出国内的“改革”纲领。他只是含糊地说，现在已经经历了社会改革的内部变动时期，充分释放的能量可使复兴趋干活跃。自罗斯福入主白宫以来，这还是第一次。相反，他在咨文中一再强调侵略势力对国防和平所造成的威胁与危险。这些已表明罗斯福的注意力已开始转移。一方面，美国要“繁荣”，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已有的新政立法，可以促使复兴的继续。况且罗斯福并不愿意采取“过激”的行动进行新政试验。归根到底，他仍是资产阶级利益的忠实代

表。另一方面，亚洲的中国已遭日本军国主义的蹂躏多年，罗斯福并不愿日本独吞中国，称霸亚太，他在1937年的“防疫隔离”演说中就传递了这一信号；意大利法西斯已经占领了非洲的阿比西尼亚；欧洲的法西斯德国侵略之心也已昭然若揭。罗斯福在心理上和军事上转向了迎接战争的准备。

新政立法就此结束了。

罗斯福就任总统时，曾以“工厂关闭，市场鸦雀无声，银行危如累卵，车船空荡无人”来描绘当时的美国。随着新政的推行，美国的经济有了明显的变化：对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来说，新政的确为它们带来了生机，一改罗斯福初任时所说的“工厂关闭”的冷寂状态，熙熙攘攘的顾客在抢购物的黄金时间出入商店，昔日“市场鸦雀无声”的惨淡经营已成为历史；作为经济晴雨表的股票市场渐趋稳定，走向复兴；公众购买力增强，个人储蓄率提高。至1941年，美国经济已完全走出困境，进入了新的高涨时期。

然而，罗斯福新政巨大的、深远的影响不仅在经济而且在社会和政治方面同样显著。罗斯福采取了一系列果断而及时的措施，恢复了人们对于美国国家政治制度的信心，相当程度上抵消了1929年后日益增长的左翼运动和喧嚣一时的法西斯右翼运动，从而巩固了资产阶级在美国的统治。罗斯福强化了美国联邦政府，扩大了白宫的权力。在美国的权力机构中，总统是国家机器的中坚，集国家元首、行政长官、三军总司令之职于一身。罗斯福在首次就职典礼上就“要求国会准许我使用应付危机的唯一剩余的手段，向非常状况开战的广泛行政权力。”“至罗斯福逝世时，现代总统机构已坚定地建立起来了。”白宫成了全国政府的焦点和充满生机的中心。新政措施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美国国内市场的开发和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收入的再分配，使得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现代化。而且，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人民的权力，从而有利于有组织工人运动的发展。

作为新政具体执行者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新政的推行中，把信心给了美国人民，把“安定”给了美国社会，把“繁荣”给了美国经济。他的“试验”使美国走出了困境，摆脱了危机，进入了正常的生活轨道。罗斯福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一个务实的政治家，他始终坚持“大胆、持续的试验”，在试验中找到新政的真正内涵。他总是面对现实，主张试验，主张行动，立即将想法与行动结合起来，而暂时不管是对是错。新政之初，他提倡紧缩开支，并通过立法削减政府官员薪水，此法行不通后，又奉行财政赤字政策；他想坚持自由竞争，却又采纳了推行“公平竞争法规”这类的试验；他部分地抛弃了20年代的官方口号“商业是商人的事情”。而试验对私人工商业进行控制、管理，有时还强迫命令，要商人做什么，不做什么。此种试验——错误——再试验的例子随处可见。在试验中，美国人民面对困境，战胜困境，走出困境。罗斯福在试验中显示出其过人的智慧，在美国历史上留下了永恒的一页，给了世界人民以启迪。加之，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战胜法西斯所做的贡献，他的姓名由此蜚声海内外，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领袖人物之一，成为美国建国200余年里最伟大的政治家。他深孚众望，打破了历史惯例，连续4次当选总统，成为迄今为止唯一任期

## 卡德纳斯顺水推舟 墨西哥国改革扬名

一只叼着蛇的鹰位立在仙人掌上，这是嵌在墨西哥的国旗和国徽上的图案，葳蕤挺拔的仙人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雄鹰则是勇敢的象征，这组图案代表着墨西哥人民世代代的斗争精神。1810年9月16日，墨西哥教堂响起了“多洛雷斯呼声”，它像惊天动地的春雷掀起了墨西哥独立战争的暴风骤雨。1910—1917年，墨西哥人民在“土地与自由”的呼唤下，又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颁布了《1917年宪法》。到了1930年后，亚非拉人民更新更大的民族解放运动此起彼伏时，墨西哥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则与世界合拍，顺应民意，领导了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将民族解放运动推向了又一个高潮，成为30年代拉丁美洲的重大事件之一。

说到卡德纳斯改革，需要追述改革以前墨西哥的形势，这是卡德纳斯改革能够成功的关键之一。

1910—1917年的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以皮菲利奥·迪亚斯为首的、代表大地主和外国垄断资本家利益的独裁政府，颁布了历史上著名的《1917年宪法》，在当时，这是世界上比较激进的资产阶级宪法，明显地反映了墨西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质。这场革命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墨西哥的势力，动摇了封建大庄园制，为进一步发展民族经济开辟了道路。革命胜利后，墨西哥开始了由半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由半殖民地向主权国家的过渡。

但政权的转换和新宪法的制定，并不意味着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任务的完成。墨西哥的大地产制虽然受到革命风暴的冲击，却远远没有彼铲除，封建和半封建的大庄园制，在墨西哥农村中占据着优势地位。虽然外国侵略者在墨西哥国土上为所欲为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帝国主义仍凭借租让制，操纵着墨西哥的经济命脉。因此，进一步实施《1917年宪法》的改革纲领，废除外国资本和国内封建势力，是放在墨西哥人民面前的最重要的任务。

然而，1917年革命后，更换频繁的资产阶级领袖人物，无意认真推行《1917年宪法》，他们所热衷的是如何才能保住个人的权力宝座，但谁也无法打破“不得连任”的规矩。自1924—1934年，中间虽有几个总统轮换，实权却一直掌握在卡列斯手里。他上台时曾以“左翼”自由主义者自居。后来完全与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合流，成为资产阶级右翼保守势力的政治代表。他先后也推行过一系列措施，这些政策一方面激起了人民群众的很大不满，另一方面又导致了政府统治基础的逐渐扩大，国家资本主义的初步建立，城乡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全国中央集权的巩固强化。并且随着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到30年代初，解决土地所有制问题的客观历史前提已经具备。

1929—1933年，世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大危机之中，墨西哥的经济也因此受到很大破坏。进出口贸易锐减。生产陡然下降，工人失业，农业破产。到1932年，工人和职员中共有将近100万人失业。罢工浪潮、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也受到冲击，特别是中、小企业因无力与外国公司竞争而纷纷破产。大地产制的腐朽，租让制的危害，以及卡列斯独裁统治的残酷得以充分暴露，于是在资产阶级内部，一个要求改革的左翼进步集团应运而生。他们坚决要求认真实施《1917年宪法》，并于1933年12月，通过了名为“六年计划”的活动纲领。这个计划拟定要加速实行土地改革，限制外国资本活动，发展民族工业，改善农业和提高技术水

平。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30年代墨西哥的这种形势造就了一个英雄，这个英雄的名字就叫拉萨罗·卡德纳斯，他生于米却肯州的一个印欧混血种人家庭。为了维持生计，从小就帮助家人进行手织工活以赚钱糊口，后又去印刷厂当排字工人。家境的贫寒，艰难的生活，培养了卡德纳斯坚韧不拔的性格，锻炼了他果敢处事、洞悉事物的能力。18岁时，墨西哥革命正处于高潮，他参加了革命军队，很快在军人中脱颖而出，25岁时就当上了将军。可谓年轻有为，前途无量。

1928年和1933年，卡德纳斯两度担任米却肯州州长。他励精图治，大兴改革之风，颇有政绩，声望再增。1930年，他出任过国民革命党主席。作为资产阶级左翼的忠实代表，他并不甘心当卡列斯的傀儡。1933年，他又融入要求改革的左翼进步集团，并成为这个激进派的领导人。顺应时势，这是卡德纳斯一生成功的重要原因。

1933年，右翼头子卡列斯集团为了缓和人民的不满情绪和稳定政局，就利用1934年选举总统的机会，推出了卡德纳斯作为执政党总统的候选人。卡德纳斯趁势推出“六年计划”参加竞选活动，并把计划作为他进行社会改革的施政纲领。在竞选时，卡德纳斯遍访了共和国的28个州，行程27609公里。他从大城市到印第安农村和矿山。他向无产阶级说：“无产阶级有权推翻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政府。”向农民说，“总统府的大门将永远向工农开着。”他主张政教分离，维护国家独立，反对帝国主义，要求改善农民的生活。这时，卡德纳斯的改革思想已经形成，被称为卡德纳斯主义。概括地说，那就是要使资产阶级左翼同工农建立联盟。对内，在经济上要彻底变革土地所有制，以村社和小地产代替封建大庄园，在政治上以资产阶级民主代替独裁；对外，要争取经济独立，为墨西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扫清道路。

1934年7月，卡德纳斯当选为总统，12月1日就任，直至1940年12月1日即任，在位共6年。他在人民革命运动高涨时当选。也在人民斗争的推动下，组织了一个左翼资产阶级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人民，并于1935年12月，粉碎了卡列斯及其党徒的政变阴谋，给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沉重打击，力进行社会经济的改革扫清了某些障碍。这样，卡德纳斯政府顺应业已成熟的客观历史条件，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改革之舟顺水启程了。

卡德纳斯在经济方面的改革，首先开始于人民强烈要求的土地问题。

土地问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核心问题，也是卡德纳斯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他在总统就职演说中指出：“农业是我们的主要财富之一；我国四分之三的人口以此为生；唯有农业仍旧几乎完全掌握在墨西哥人手中。然而，如果不在农业的更广和更深的方面即土地所有制方面完成变革的话，农业上就不会有丝毫进步。”在土地问题上，卡德纳斯部分地是以“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

卡德纳斯政府为解决土地所有制问题，对封建大庄园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这种庄园制，以债役雇农劳动为基础，把大量劳动者束缚在庄园土地上，经营方式落后，生产效率低下。它严重地阻碍着墨西哥的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1917年宪法》为土地改革提供了法律依据；但革命后掌权的资产阶级把土地分配仅仅看作是缓和农民不满情绪的权宜之计，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卡德纳斯上台后，大力推行地改革，加速土地分配的进程。1934年，颁布土地法典，规定在墨西哥农村进行土地改革，没



收大庄园主、大种植园主的土地，分配给在其间劳动的农民和印第安人。1937年8月9日，卡德纳斯颁布《关于修改墨西哥台众国土地法典若干条款的法令》，废除了那些限制债役农民得到土地的条文，扩大了分配土地的范围，进一步分割了大地产，债役雇农制基本上废除了。1940年，卡德纳斯又颁布新的《土地法典》，规定凡土地超过100公顷者，所超过的土地均予以没收，债役制实际废除。

与此同时，卡德纳斯又大力倡导建立“村社”组织，这是古代阿兹特克人留下来的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后逐渐为大庄园主兼并。1917年革命后，历届政府当政者的主导思想是视村社为暂时性的、过渡性的、辅助性的组织，卡德纳斯却抛弃这种看法，他大力提倡建立集体合作社村社。按照他的设想，村社土地所有制可以同村社以外的土地私有制，也可以同农业以外的私有制并行不悖。卡德纳斯建立的村社，分两种形式，一种是“个体村社”，另一种是“集体村社”。到1940年，全国已建立近1.5万村社，占农业人口42%的村社成员，拥有全国耕地的47.4%。

为了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卡德纳斯成立“农业信贷银行”，向中小农户发放贷款，成立“全国村社信贷银行”，专门向村社提供资金，并且政府还在各地兴修水利工程，筑路建桥，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经过土地改革，墨西哥农村形成了资本主义、小农经济、封建残余并存的新格局。在全国范围内，城乡私人资本主义同国家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占据了优势。可以说，半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基本实现了。

卡德纳斯改革中第二个突出的内容就是实行国有化运动。

本世纪初，墨西哥的主要经济命脉铁路、石油、矿山及其附近的大片土地，几乎全被控制在帝国主义国家手中，而墨西哥民族赖以生存的血液——石油与矿产也有大部分为外国垄断资本家所吸吮。卡德纳斯为解决土地、铁路、石油、矿山等主权问题，进行了震撼世界的国有化运动。卡德纳斯的改革也因此名扬天下。

1936年11月，卡德纳斯颁布了《征收法》，法令规定，国家可以根据任何理由征收产权，补偿期为10年，这样财力不足的弱国有可能随时征收帝国主义强国在墨西哥霸占的财产。1937年6月23日，卡德纳斯政府根据铁路工会的要求，颁布了《铁路国有化法令》，将外国垄断资本控制的铁路全部收归国有。之后，卡德纳斯政府的重点便转向石油国有化运动。

墨西哥曾被人们羡慕地称为“浮在油海上的国家”，早在1869年就打出了第一口油井，1921年，墨西哥石油产量为1.93亿桶，仅次于美国而居世界第二位。在墨西哥人民的心目中，外国公司霸占的石油企业是帝国主义压迫的象征。在这“国中之国”，石油工人惨遭剥削，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石油工人的罢工斗争持续不断。在这种形势下，卡德纳斯于1938年3月18日发表声明说：“墨西哥经济独立的日子开始了，没有经济独立，政治独立就是一句空话。”这一天，他签发了《没收石油公司财产法令》，宣布将所有17家美、英石油公司的产业全部收归国有。外国公司的财产由墨西哥石油股份公司接管，分十年偿还石油公司在墨西哥的财产。帝国主义发出种种恫吓和威胁，但墨西哥人民的反帝热情更加高涨，他们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来支持政府。有些人主动把钱，甚至结婚的戒指奉献给国家。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卡德纳斯政府克服了种种困难，石油开采量也不断增加，石油国有化运动取得了成功。为了纪念这一斗争，墨西哥人民把“3月18日”这一

天定为“征收日”，被宣布为国家的新独立日。

墨西哥是世界上最早实现石油国有化的发展中国家。它为世界人民瞩目，它推动了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潮。耸立在墨西哥城内的纪念碑生动地记载了这一页光荣的历史：纪念碑上的一组组浮雕铭刻着外国资本统治下石油工人的苦难，歌颂了先辈们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当时宣布石油国有化的卡德纳斯总统的黑色大理石陵墓，就在纪念碑的石柱下面。墓前那束束鲜花凝聚着墨西哥人民对民族英雄的缅怀之情，也表达了他们维护本国石油资源、发展民族经济的决心。

至卡德纳斯卸任时，他推行的改革基本获得了成功，极大地推进了1910年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务。

## 凯恩斯创新理论 国家干预成潮流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一位喜欢标新立异的人。4岁时就动脑子推敲利息的经济涵义；曾在对外汇与商品的交易中大显身手，积存达50万英镑；喜欢读书，常常午夜不睡，思考问题；他对巴黎和会期间签署的《凡尔赛和约》强烈不满，用高速度写成了《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由此成名：1923年发表《货币改革论》，抨击人们对黄金的盲目崇拜，又一次使世人瞠目结舌；1929年美国爆发大危机后，他又冲破传统经济思想的束缚，从新的角度对经济危机的产生及解决办法提出了新的答案。以后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中最主要的流派之一，至今还产生影响。

1929年10月的末一周，对美国来说，可能那是最可怕、最黑暗的一周。繁荣的股票市场一下子崩溃了。对股票持有者来说，就好像尼亚加拉瀑布从窗口冲进来，要将他们淹没似的，市场一片叫卖声。对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来说，如海覆江翻而至，使他们穷于应付。眼看着手中持有的财富，如阳光下的冰雪，都化成水了。当这场风暴过去，痛定思痛时，看看损失，才知道无数的人陷入了深渊，国家已处于瘫痪状态。最使人沮丧的是瞻望前途，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失业。成千上万的人找不到工作，到处流浪徘徊。这对国家说来就好像是肌体上的赘疣，一般经济学家对此只是说制度上出了毛病，除了搓手顿足之外实无计可使。不知症结所在，自然也就拿不出治疗方案。失业——这种形态的失业是制度病态中从来没有见过的。以前的经济危机可不是如此病重，真是越出常情之外，纯属荒谬绝伦，但它又的确存在着。

面对前所未有的严重局面，胡佛奉行自由经济主义的信条，政府采取消极干预政策，很快就宣告失败。这使得新上任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意识到，不能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调节，很难渡过大危机的难关。但是罗斯福的智囊团又拿不出什么高招，而且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提出要大量印制钞票，扩大货币供给；有人提出规定物价的最低额，以防价格机制的崩溃；也有人要着手贯彻执行庞大的开销计划，等等。罗斯福最后选择通过政府强有力的干预来应付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

然而，罗斯福对政府强有力的干预的具体内容并不是很清晰的，由于缺乏理论来为之证明国家干预的有效性，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带有临时应急的色彩。因为不知道病根所在，自然也就开不出“特效”处方，于是只能“头痛医痛，脚痛医脚”。哪里形势严峻，国家就先干预那里的经济。危机从金融业开始，对付危机的管理措施就首先从银行业开始。所以，最初的一些应急措施，后来被迫中断。我们可以说，当时的罗斯福还在摸索，还在试验，直到1936年，凯恩斯开出他自己认为可以“医治”绝症的药方为止。

凯恩斯在1936年1月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他突破了传统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旧教条的束缚，他承认现代资本主义有一系列的缺陷，同时，他也认为资本主义的这些病症是可以“医治”的。他开出的药方是：通过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办法来消除危机并创造“充分就业”的局面。凯恩斯所说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指的是鼓励消费、增发通货、降低利息、鼓励私人投资、扩大公共投资以补充私人投资的不足，扩大就业面，用累进税缩小财富分配的不平均等等办法。总之，国家可以调节资本主义经济，使之成为“有计划”的经济。这些主张恰巧迎合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需要。凯恩斯在解释“充分就业”这个名词时，他首先把失业分为三类：摩擦失业、

自愿失业、非自愿失业，前两类为社会生产的偶然失调造成或因工人嫌工资太低而致失业。后一种才是工人即使愿意接受现行工资也找不到工作。通过这种归类，凯恩斯实际是缩小了真正失业的范围，而把失业的责任大部分推给了工人，而且他还认为前两种失业不影响到他的“充分就业”。

凯恩斯理论的提出实际是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即从微观经济学向宏观经济学的转变。一向喜欢标新立异的凯恩斯在他开出的处方中也与众不同。他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书的序言写道：“本书之作，对于作者是个长期挣扎，以求摆脱传统的想法与说法。”新异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凯恩斯对经济问题研究的方法新异。传统的经济学派主要采用“静态的个量分析”，而凯恩斯则是“短期比较静态总量”分析法，他研究短期情况，对一个社会的经济总量进行比较静态分析，从而得出结论。可以说，在他之前，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简单模型中，把所有名义的和实际的相关因素同时贯通在一起，通过这个模型，它们的相互作用能被清晰地加以考察。今天的宏观经济学，就是从凯恩斯开始的。

第二，凯恩斯在《通论》中强调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什么是总产量的需求和供给的决定因素，这是传统的经济学派从来不敢正视的问题。凯恩斯认为，价格、工资和利率都具有刚性，它们的调节作用都是有限的，在此前提下，总产量是一个变量。他否定了萨伊定律，提出了一个决定就业和产量的学说，通过收入，就业和有效需求的决定因素的分析，说明为什么市场经济的自发调节不能保证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

第三，他得出了两个与传统的经济学派不同的结论。第一个结论是，资本主义市场不存在一个能把私人利益转化为社会利益的“看不见的手”，这个结论既是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核心，又是他经济政策纲领的逻辑起点。他反对自由放任，提倡国家干预，因为自发的市场力量，不可避免地要造成资本主义的危机和失业，所以，只有依靠看得见的手即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资本主义才能摆脱萧条和失业，第二个结论是，削减工资不能减少失业，相反，削减工资降低了有效需求，会增加失业。凯恩斯认为，工人的工资是有效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人工资降低势必影响到总产量的变动，资本主义非自愿失业不可避免。因为资本主义存在着失业和分配不均的缺点。

凯恩斯在《通论》中的标新立异被认为是对传统经济学派的一场“革命”，他提出的理论被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采用。

凯恩斯于1934年来到华盛顿，第一次和罗斯福见面，他就对罗斯福的手发生了兴趣，他有如此记述：“他的手很结实，相当有力，但是显得不大秀气或不大灵巧，他的指甲短而圆，像个商人的指甲。我无法如实地加以描绘，他的手（在我的眼里）虽然不是什么特殊的，可也不是什么普通的类型。”对这位“标新立异”的凯恩斯，罗斯福又如何描述呢？除了采取凯恩斯竭力主张的进一步扩大方案外，他说：“我跟凯恩斯作了一次有意味的谈话，我对此人倾倒之至。”不论怎么说，罗斯福和凯恩斯算是投机了，凯恩斯的经济学也同罗斯福的新政政策结合起来，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凯恩斯以“有效需求不足论”来解释经济大危机的原因，这就为罗斯福政府扩大政府开支，兴办公共事业，用课税即转移支付的办法来对付失业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此之前，罗斯福也采取诸如成立联邦紧急救济署，公共事业振兴署等计划来扩大人民的就业，但罗斯福没有认识到，政府投资的

扩大，能使总需求增大，刺激经济发展，给更多的人创造就业的机会。

面对 30 年代的大危机，凯恩斯认为，赤字财政是对付大危机的必要手段。罗斯福一直受着平衡预算思想的束缚，1932 年竞选中他就攻击胡佛没有平衡预算，直至 1937 年再次出现“罗斯福衰退”时，他还认为，这回应该是回到重新实现预算平衡的时候了。只是在凯恩斯理论形成后，罗斯福才自觉地缓慢地接受财政赤字的观点，并成为罗斯福新政的一个重要内容。

凯恩斯还认为，在大危机期间，用扩大货币供给量的货币手段来恢复充分就业的经济状况，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起码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这就为罗斯福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选择上提供理论依据。1933 年，国会通过的立法，授权总统发行高达 30 亿美元担保货币——绿色美钞的方案，很快被排挤在“新政”内容之外。

总之，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罗斯福总统成为凯恩斯经济学的第一个实践者，他们同被称为资本主义国家全面干预经济的开拓者，为当时处于走投无路的资本主义世界开拓了一条通过国家大规模干预经济，人力地刺激经济增长，来缓和与摆脱危机的暂时出路。罗斯福的“新政”确实成功地收拾了一个烂摊子，几年后的经济复苏超出了人们的预料。有人说，倘若没有凯恩斯，特别是没有他的追随者的解说，罗斯福的干预政策也许仍然是一个临时的应急措施，而不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只有当凯恩斯的经济学同罗斯福的若干干预政策相结合，资本主义国家干预才真正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凯恩斯主义在罗斯福“新政”中的地位。

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为罗斯福的继任者所采用。1946 年，哈里·杜鲁门就以凯恩斯的经济政策主张为蓝本，美国颁布了以实现“充分就业”为中心的《1946 年就业法》。艾森豪威尔也采用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以避免美国再度陷入危机。肯尼迪·约翰执政时期更是雄心勃勃地试图用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去解决资本主义经济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弊端。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干预不断加强，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主张对战后美国经济的发展起着最主要的作用。从理论上讲，它标志着美国由私人垄断向国家垄断的过渡；从经济运行机制的角度看，它是由单纯的市场机制向国家—市场混合调节机制的过渡，一种新的调节手段，在市场机制的“失灵”的情况下应运而生，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必要组成部分；从现实生活看，我们仍然可以衡量出国家干预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向国家干预经济进一步加强方向发展的趋势没有改变。

不仅如此，凯恩斯主义还为西方其他国家运用，自 30 年代以后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中最主要的流派之一。

当然，凯恩斯主义不是万能药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不可能彻底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尤其在 70 年代，西方国家纷纷进入经济滞胀状态时，凯恩斯主义失灵，代之而起的又是一系列新的理论。

凯恩斯是一个处处喜欢标新立异的人，而且不耐烦在同一时间里做一件事。当他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打腹稿时，还自备资本在剑桥建立了一个剧场，这就是典型的凯恩斯冒险主义。“标新立异”并非都能成功，凯恩斯却善用之，这使他从小就出尽了风头，并时时处于中心位置引人注目。他甚至以标新立异来建立他的经济学体系。当经济危机困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时，他以新异的理论打破传统，第一个把所有含义的和实际的相关因素同

时贯通在一起而清晰地加以研究的人。他还抛弃传统的研究方法，代之以短期比较静态总量分析研究法。他甚至承认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弊端，尤为突出的是周期性的危机和随危机而来的失业。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国家干预经济，目标是创造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消灭失业现象的资本主义经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否认这个目标。凯恩斯理论的第一个实践者是罗斯福，国家干预的政绩举世皆知，所以以后为西方国家纷纷采用，成为他们制定经济政策的典范。时过境迁，凯恩斯主义已不再适应新的形势，但他的理论仍为人们津津乐道，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仍为经济运行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法国舆论测验中，凯恩斯成为“改变 20 世纪经济生活的 25 位关键人物”之一。

## 毛泽东号召“自己动手” 大生产实现“丰衣足食”

在 40 年代初期，由于日军的不断“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加上华北地区连续儿年的水、旱、虫等自然灾害，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在 1941 年和 1942 年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解放区缩小了，根据地人口由 1 亿降到了 5000 万以下，八路军由 40 万人减少到 30 万人，新四军由 13.5 万人减少到 11 万人，干部也损失很多，解放区的财政经济遭到了极大的困难。面对这种严重的局面，解放区的军民并没有被吓倒。为了克服困难，坚持抗战，争取胜利，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制定了各项政策，而其中领导解放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则是战胜经济困难的重要谋略。

在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抗日根据地面临着军民交困的严重局面。那时候，“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毛泽东在 1939 年 2 月 2 日给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作生产动员的大会上，针对当时解放区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曾这样提出问题：“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党中央和毛泽东号召解放区军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走“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道路。从 1941 年起，解放区军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这个运动先从部队开始，接着陕甘宁边区的党、政、军机关，民众团体和学校都相继开展起来。再由陕甘宁边区发展到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一直发展到游击区。

为了更好地领导解放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以克服当时面临的困难，党中央发出了一系列指示，毛泽东在这期间，也用了很大的精力来研究解放区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写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等重摹著作，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领导解放区大生产运动的基本纲领，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等口号。

在财政和经济的关系上，毛泽东指出，要坚持发展经济的正确路线，必须进行反对错误观点的斗争。一方面，要反对不注意发展经济开辟资源，而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的陈旧保守观念；另一方面，也要反对不顾解放区的具体条件，冒险地、无根据地提出一些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如建立重工业、大盐业计划、大军工计划等。要把“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作为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当时根据地处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存在着落后的经济同巨大的战争需要的矛盾。陕甘宁边区生产力水平比较低，运输工具主要是毛驴，相当落后，有许多县连手括的纺车都没有，除粮食和羊毛外，其他日用品都靠外地运进来。这同当时的巨大战争需要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只有靠发展经济才能解决。而发展经济必须以发展农业为主，以解决衣食问题，同时也发展手工业、小型工业和商业。

在公私关系上，要发展经济，必须实行“公私兼顾”或“军民兼顾”的原则，既要发展公营经济，也要发展民营经济，只有如此，才能保障财政的供给，即抗日经费的供给。同时，在财政收入问题上也必须兼顾政府与人民。因此，既要反对那种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地强调施“仁政”的错误观点，也要反对那种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需要的“竭泽而鱼，诛求无已”的国民党思想。毛泽东指出，虽是在困难时期，我们仍要注意赋税的限度，

使负担虽重而民不伤、而一经有了办法，就要减轻人民负担，借以休养民力。我们的工作人员，必须以 90% 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解决他们的“救民私粮”问题，然后再以 10% 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这样，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另一方面又使人民的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使人民有所失，又有所得，并且得大于失。只有如此，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

发展生产必须依靠解放区军民同时发动大生产的办法，即“军民兼顾”，“劳力与武力相结合的方针”，而在组织生产和供给上必须采取“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部队和机关的生产，要以农业生产为主，实行生产自给的方针，分别不同的情况，达到自给、半自给和部分自给。为了刺激生产的发展，规定了“按质分等的个人分红制度”。为了更好地领导和组织生产，中央不仅把所有的党政机关、团体、学校和广大人民群众都充分地动员起来投入大生产运动，而且规定了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具体指导相结合的领导方法，有效地促进了生产运动的发展。

毛泽东指出，领导生产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实行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的方针。这就是说，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都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我们既有打仗的大军，又有劳动的大军，打仗的大军也一面打仗，一面生产，这样，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打败日本。

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主要是把根据地农民组织起来。因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经济，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贫困。毛泽东指出：“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化。”因此，党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以提高生产率。

在中共中央、毛泽东的领导和号召下，各解放区先后开展了军民大生产运动。

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是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口号的鼓舞下，部队、机关、学校和广大群众的生产搞得热火朝天。从党的领袖到通讯员，从军队总司令到普通一兵，都争先恐后地参加生产劳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云、任弼时和中央其他负责人，不仅经常深入群众，关心人民生活，关心生产运动，还抽出时间，亲自参加生产劳动，为边区军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毛泽东、朱德在分给他们的地里种上许多蔬菜，由于播种及时，经常浇水，多施肥，勤锄草，蔬菜长得很好，他们经常用自己收获的蔬菜招待客人。周恩来、任弼时纺的线又多又好，被评为纺线能手。

边区部队在“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口号的鼓舞下，开展了南泥湾、槐树庄、大风川等地的屯田生产运动。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在王震旅长的率领下，屯垦南泥湾，艰苦创业，成为全军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1941年3月，这个旅在“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下，开赴延安东南大约 100 华里的当时是荆棘丛生，野狼成群的南泥湾去屯田。从旅长王震到勤杂人员及随军家属，没有一个人站在生产圈外，王震还被评选为劳动英



雄。经过全旅将士的艰苦奋斗，开荒 26 万多亩。到 1942 年，蔬菜、肉、油及鞋袜全部自给，粮食部分自给；1943 年，粮食全部自给；到 1944 年，不仅做到粮食、经费、物资全部自给，而且每年向边区政府交公粮 1 万石。三五九旅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朱德、吴玉章、徐特立等以及毛泽东都先后视察了南泥湾。朱德还兴致勃勃地写诗称赞南泥湾的巨大变化：“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夜无宿营地，破窑亦难找。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屯田仅告成，战士粗温饱。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熏风拂面来，有似江南好。”

开展大生产运动后，边区各机关、学校也达到了大部分自给。边区农民也纷纷组织起来，参加变工队、札工队等集体互助的劳动组织。组织起来的劳动力，占总数的 80%，农业普遍增产，有的地区达到耕三余一。抗战前的陕甘宁边区本是一个经济很落后的地方，全区耕地不过 862 万亩，粮食产量不过 110 万石。大生产运动开展后，规模一年比一年扩大，运动一年比一年深入。经过几年的奋战，到 1942 年，全区耕地扩大到 1248 万亩，粮食产量增加到 181 万石；1943 年除消费外，尚余 22 万石；1945 年，更扩大到 1521 万亩，粮食产量达 260 万石。植棉方面，抗战前的陕甘宁边区很少种植棉花，到 1942 年棉田有 9 万多亩，1943 年达 15 万亩，1945 年更扩大到 35 万亩，基本了解放区军民的衣食问题。

在发展农业的同时，陕甘宁边区的工业也有了迅速的发展。在抗战前，边区只有国营纺织厂 1 个、纺织生产合作社 1 个、私营纺织厂 5 个，年产布 2400 多匹。大生产运动后，全区国营工厂发展到 62 个，职工由原来的不到百人发展到近 4000 人，能够纺织、炼铁、炼油、修理机械、制造某些军械。运输业、畜牧业、商业等各条战线，也都出现蓬勃发展的景象。1943 年是陕甘宁边区工业发展最快的一年，如国营纺织厂由 1938 年的 1 个厂，年产布 125 匹，增加到 1943 年的 23 个厂，年产布 32968 匹；这一年的民营纺织业中，有旧式布机 18467 架，年产土布 65334 匹。其他如造纸、化工、陶瓷、石油、制药、皮革等工业也都有很大的发展。1942 年陕甘宁边区还举办了农工业生产展览会。毛泽东、陈云、林伯渠等参观了这个展览会。

在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其他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区，在战争频繁的环境里，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他们按照中央提出的“劳力与武力相结合”、“战斗与生产相结合”的方针，不仅在比较巩固的根据地，而且在游击区和敌后之敌后，也开展了生产运动。他们以农业生产为主，利用一切闲散土地开荒耕种，并创造了许多既便于生产，又便于对敌斗争的组织形式。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不仅要进行自给性生产，而且要用武装掩护群众的生产，甚至强夺敌人碉堡下的土地。在武装保卫的基础上，实行抢种抢收，使许多地区的机关、部队都能做到蔬菜、肉食和粮食部分自给。此外，敌后各解放区还进行了手工业和运输业的生产，解决了部队、机关和群众的需要。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军民的一致努力，敌后根据地的生产运动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 1943 年内，仅在晋绥、北岳、胶东、太行、太岳、皖中 6 个地区，就扩大耕地面积 600 万亩以上，太行区部队机关的生产，能自给 3 个月的粮食和全年的蔬菜，其他地区也做到了自给全年的蔬菜和一个半月至两个月的粮食，同样也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要求。

刘伯承、邓小平所率领的一二九师在大生产运动中也搞得非常出色。在刘、邓的指导下，各部队的生产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师直属部队由李达参谋长亲自带队分批上山开荒，每期半个月；还普遍动员，自己动手纺纱。邓小平在办公室带头支起了纺车，在百忙中挤出时间摇动纺车，在阵阵嗡嗡声中，抽出缕缕白丝，他还手拿纱锭和参谋人员观摩比较。在刘、邓的亲自带动下，太行各部队 1943 年共种地 10.1 万多亩，其中垦荒地 8.1 万亩；总收入达 1500 万元以上，其中农副业收入占 77%，商业占 23%。各单位的经费、吃菜全部自给，粮食自给一到三个月。减轻了人民负担，改善了部队生活。

抗日军区是在敌人重重封锁、包围下进行生产活动，必须一面对敌作战，一面坚持生产，实行劳武结合。邓小平指示：“敌后经济战线，包含了两个不可分离的环节，一是对敌展开经济斗争，一是在根据地展开经济建设。没有对敌斗争，谈不上根据地建设；没有根据地建设，更谈不上对敌斗争。”要“减轻人民对敌负担，即打击敌寇对敌占区、防区、边沿区的掠夺和对根据地的摧残，必须军民结合，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减少损失至最低限度”。因而，以粮食斗争为中心的军事、政治攻势，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富有特色的对敌斗争内容。

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所取得的成绩具有重要意义：它说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不仅有战胜敌人的英雄气概，也有改变环境、改造自然的无穷力量。大生产运动的胜利开展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克服了严重的物质困难，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解放区的经济获得了恢复和发展，解放区巩固了，人民抗战的信心增强了，革命力量发展壮大，敌人妄图困死我军的阴谋破产了。

大生产运动可以说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特殊的时代的独创。我军通过自己动手取得的巨大成绩，在古今中外的建军史上都可以说是奇迹，这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而且使部队受到锻炼，培养了劳动观点、群众观点。在当时的情况下，敌人给抗日根据地造成了极端的经济困难，诚如毛泽东所言，如果我军不想饿死和解散，就只有自己动手。毛泽东和党中央正确地制定了“自己动手，战胜困难”的谋略，并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相号召，亲作表率，发动边区军民一起行动起来，开展轰轰烈烈的生产运动，这是正确地把握了时机，条件的英明决策。大生产运动不仅解决了当时的经济困难，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巩固了解放区，而且锻炼了广大干部，尤其是锻炼和培养了一批经济工作干部，使他们学会了生产斗争的知识，积累了作经济工作的经验，这对以后领导革命和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

## 戴高乐集权统筹 法兰西柳暗花明

夏尔·戴高乐诞生于上个世纪末的一个黄昏，那是一个洋溢着高昂的热情，又充斥着智者的颓丧的世纪。戴高乐自小就十分引人注目。在同龄人里，他的个子高出一截，鼻子大得出奇，而且他的性格刚毅，争强好胜，不愿屈于人下，显得孤高自傲，冷若冰霜。他把所有的感情都给了他的祖国，他从小就立志从戎，目的就是有朝一日能为法国立下丰功伟绩；他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旨在把法国从法西斯铁蹄的践踏下解放出来；而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则是为了拯救那些在大西洋公约庇护下昏昏欲睡的同胞。为了祖国，他总是与众不同，逆流而动；而每次他都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作为军人，他以杰出的政治才能闻名于世，就是在经济方面，他也写下了重要的一笔，突出地表现为法国的“国有化”政策。

夏尔·戴高乐出生于1890年11月22日，当时的法国“正孕育着一种伤感，同时又挥霍着国家的富源”。普法战争的失败还在纠缠着法国人民的心灵，都德的《最后一课》似乎时时都响在耳边。为了复仇，法国日益接近俄国，1894年两国正式结成了同盟。1907年，英法又抛弃前嫌，签订协约。英法俄三国协约形成以共同对抗以德为中心的三国同盟。战争的阴云越来越浓了，任何一个火星都足以引起燎原战火。戴高乐当时还不过是一个10多岁的瘦弱少年，但他却“毫不怀疑法国将要经历一场严重的考验”，他认为，“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有朝一日为它立下丰功伟绩”，而且他相信他将来一定能够获得这个机会。为此，他选择以军人为职业，并于1908年通过考试，正式进入圣西尔学校。从此，戴高乐与军队和军人结下了不解之缘，也与他祖国的前途共拍节了。

1940年，希特勒入侵法国，占据巴黎。6月18日20时，戴高乐在英国的BBC播音室，以他低沉的音调，坚定而有力地播发了当时谁也没有足够估价的文告：“请相信我，我是根据充分了解的事实在说话，我告诉你们，法国并没有完。使我们失败的那些因素，终有一天会使我们转败为胜。因为法国并非孤军作战！它不是孤立的！它不是四处无援！……无论发生什么事，法兰西抵抗的火焰不能熄灭，也绝不会熄灭。”这次广播是无与伦比的行动。它是一个标志，标志着法国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自由法国”的战斗开始了；它不仅表明法国要与侵略者战斗到底，也显示了戴高乐对贝当一伙的鄙视。它贵在于整个法国陷在泥坑里挣扎时，让全世界看到法国还是存在希望。继续战斗的火焰已被戴高乐点燃，他将用这抵抗之火燃遍法国，照亮法国。戴高乐又一次与祖国的解放事业密切联系。

进入1944年，二战胜利的曙光已冲破阴霾透入了欧洲大陆。从自由法国运动开始到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戴高乐政权，经历了4年的风吹雨打，终于得到了法国人民的拥戴和国际社会的承认。而这时的戴高乐又面临着更艰难的斗争。他于1944年11月9日的协商议会上发表演说：“我国战士的英勇奋斗和牺牲，全国人民通过斗争恢复国家的独立、自由和大国地位的坚强意志，盟军和法军的辉煌战绩，已经使我们摆脱了深渊。但是我们也非常清醒地正视我们恢复内外工作面临的严重困难。”他号召，要在与各大国合作中重新起到法国应起的作用，尽力恢复经济生活，实现全国人民所期望的重大改革，以便使法兰西人民真正成为法兰西自己事业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为了争得战后法国的大国地位，戴高乐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

英国首相温斯顿·邱吉尔讨价还价，誓死力争。法国出席了1945年4月25日开始的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成了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法语也被定为联合国工作语言。5月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法国代表参加签字仪式。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法国代表也参加了签字仪式。至此，法国在战后的“准大国”地位确立了。

为争取“大国”地位确实不易，但要成为名符其实的大国，更是难上加难。因为在他人眼里，法国已不是大国了。但是，对法国有着无限崇敬和热爱的戴高乐相信法兰西精神永恒，他坚持认为，虽然有人可以使法兰西失去光彩，他也必定能使法兰西恢复光彩。因此，戴高乐在建立政权并力争法国国际地位的同时，又投入了重建家园的努力之中。

然而，当时的法国又是何等尊客？国民经济已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战争使法国的经济损失达14000多亿法郎，相当于战前3年法国全部生产的总值。194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1939年的一半。全国毁于战火之中的农田有250万英亩，遭到彻底破坏和严重破坏的建筑物、工厂更不计其数。巴黎和各省市的通信已中断，机场不能启动，没有一条完整的铁路。由于生产停顿。交通中断，日常供应异常紧张，特别是燃料和食品，在1945—1946年那个“可怕的死亡的冬天”，巴黎儿童的死亡率竟比战争年代还高。而且法国还经常处于财政、经济和政治危机之中。当时的法国真是处于“山穷水尽”的困境之中。

戴高乐对当时的严峻形势有充分的认识。他知道，全国的解放并不会首先给这个支离破碎、被洗劫一空的国家带来任何物质上的方便。他决定采取种种措施，对法国集权统等，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奠定基础。

戴高乐在恢复经济方面的着手点是使交通运输正常。戴高乐这样做有几点理由：战争还没有结束，随着战事向欧洲腹地的推进，后勤供应问题突出起来，因此，交通运输的正常显得特别重要；经济要恢复，没有交通，就犹如流水不畅，甚至可能阻塞，交通中断很难保证中央权力在全国普遍实施，集权统筹也就很难在法国开展；戴高乐还特别担心西南部地区受法共游击队影响。

戴高乐在恢复经济方面最重要的措施便是法国的“国有化”政策，这是法国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

法国的“国有化”首先从企业开始，而企业的“国有化”又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当时的法国政府接收了德国交还的阿尔萨斯—洛林铁路，还成立了国家氮化物工业公司和阿尔萨斯国营碳酸钾矿业公司。1936年，当时的社会党勃鲁姆政府曾颁布一系列国有化法令，其中最重要的是1936年改组了法兰西银行，1937年铁路“国有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又将军火工业收归国有。

大规模的“国有化”开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戴高乐临时政府开始，历届政府都广泛扩大政府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而“国有化”仍从企业开始。由于一些大企业中不少人都曾犯下了与纳粹勾结的罪行，加上工业生产濒临解体，戴高乐政府立即对战时与德国法西斯密切合作的企业予以没收，使之成为国有企业，主要有雷诺汽车公司、电影工业、国营报业企业和法国染料公司等。

1946年5月17日，法国正式颁布大规模实行“国有化”的法令，对煤炭、电力和运输三个基础工交部门实行了“国有化”，加强了国家对这些部

门的计划调节。这些部门的国家企业包括法国煤矿公司、法国电力公司、法国煤气公司、法国航空公司、法国大西洋航空公司等。在金融领域，法兰西银行和四大商业银行以及 34 家保险公司都实行了“国有化”。到 1946 年底，国家占有股权在 50% 以上的公司已达到 130 家。

根据“国有化”法令，法国对“国有化”的部门不是采取没收的办法，而是给予大量的补偿金。如：四家商业银行的补偿金高达 122 亿法郎，煤矿资本家到 1950 年就获得了 250 亿法郎的补偿金。这样，国有化企业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很大一部分作为补偿金付给了原来的资本家。而且，有不少资本家将无利可图的企业卖给国家，然后，将得到的巨额补偿金，拿去购买有利可图的企业股票。

国有化企业的经营管理完全是按照垄断资本的利益进行的。国营企业对私人企业来说，是提供廉价能源、原材料的基地和有保障的销售市场，并且企业的管理大权仍然操纵在垄断财团之手，很多垄断财团的代表进入国营企业的理事会或直接充任董事长、经理。

根据国有化法令，国营企业亏损，国家要投资弥补。投资靠国家预算拨出来。固然国家对基础工交部门的巨额投资，为法国工农业的现代化创造了条件，但更重要的是为私人垄断企业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利润丰厚的大量订单，提供廉价的燃料、动力、劳务和商品，使它们得以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攫取更大的利润。一位法国金融资本家如是说：“交给主要‘国有化’部门支配的钱，只不过是……由它们过一下手，然后又通过装备和工程的订单，而由承制这些装备的私营工业的各个部门来重新分配。”这样，私人资本家不必动用自己的资金，就找到了一个提供资金和推销产品的既广阔又有保证的市场。

戴高乐在所有涉及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实行了国有化政策，将一些大企业集中到国家手里管起来，达到了在最困难的时刻最有效地利用资源和资本之效。为了更顺利地推行国有化政策，戴高乐还实行了配套的社会改革措施。为了缓和劳资关系，启发劳动者共度难关，创建了吸收工人参加的“企业委员会”，扩大了社会福利制度，给工薪者提供自动保险、家庭补贴，保证农村佃农的土地所有权。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国有化、享受社会化”，它为缓和战后初期的社会经济矛盾起到了一定作用，有利于国有化政策的推行。

在增强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的同时，戴高乐于 1945 年创设了一个计划专员公署，秘密着手制定“重新装备和现代化计划”。这项计划，由战时负责战争物资筹集工作的让·莫内提议并负责，旨在确定投资重点以及发展基础部门的种种措施。

国有化政策和现代化计划的推行，法国完成了重建家园的任务，“经济破产避免了；国库相当充裕，币制也暂时稳定下来”。到 1968 年，法国“国有化”企业资本已占全部资本的 33.5%，在西欧居首位。

法国政府在对企业实行国有化的基础上，还推行资本主义的计划化，成立了由政府各部并吸收各界专家和企业代表参加的“五年计划委员会”。国家统筹规定整个国家经济的增长速度、各经济部门的发展目标和投资指标，私人企业不包括在计划之内，但政府要求私营企业适应国家规定阶段总目标。在执行计划期间，政府通过总的经济政策（信贷、税收和价格等）以及专门的计划来落实国家的总计划。

戴高乐在法国山穷水尽之时，采用集权统筹的战略，实施了以“国有化”为主要内容的恢复经济的措施，使法国出现了“又一春”的景致，60年代，法国进入高速增长时期。真正的大国地位基本确立。

“法国是个大国”，这就是戴高乐心目中的法兰西。他一生为法兰西，可谓是功高盖世。他以报效法国为己任，他以报效法国为己荣，他以报效法国为己欲。他性格刚毅，善处逆境。他喜欢权力，主张独断专行。战后初期，法国处于困境时，他将权力收归中央，实行国家干预经济，采取集权统筹的战略。还在任临时政府主席时，他就掀起了国有化运动，这个运动使国家能够从全局出发，在最困难的时刻有效地分配和使用资源和资本，这是法国的第一次国有化高潮。国有化政策与法国现代化计划相结合，为法国家园的重建起到了作用，以国有化为基础的计划化又使法国的总计划得到落实，经济得到发展。法国不仅有了“柳暗花明”的前景，还凭借经济实力成了世界大国，一个名符其实的大国。为了这个大国的称号，戴高乐付出了伟人的智慧、伟人的才干和伟人的力量。但戴高乐对法国却终身无所求，即使在死后，也不求显贵，不要任何奖励，他只要求像一个凡人那样的葬礼。就是这样一个凡人却使法国人民永远难以忘怀，这样的凡人才是真正的伟人。

## 法国巧借“美援”西风 “莫内计划”再塑雄风

1945年5月8日，德国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结束。在战争中大伤元气的法国刚刚从法西斯铁蹄的践踏下解放出来，旋即又陷入了经济危机的困境：战争使法国财富丧失三分之一，大批工厂设备毁于战火，100万公顷的土地遭到破坏而不能耕种，资金拮据，债台高筑，昔日的世界强国如今已是伤痕累累，不经风寒。面对如此严酷的现实，法国统治者惊呼：要重塑法国，要统一欧洲，要在实践中建立以法国为领导的西欧集团。1946年，法国物资委员会主席让·莫内提出了重建法国的现代化计划，即“莫内计划”。这项计划在马歇尔计划的支持下，法国的经济又重新走上了正轨。

1945年9月，法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国际政界知名人士让·莫内回到阔别4年之久的祖国，来到了巴黎。当时人民正热烈地庆祝自己的解放。这位具有敏锐洞察力的莫内看到的不仅仅是人民对胜利的欢悦，他还读到了紧锁法国人民眉头的贫穷和疲惫。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法国实力毕竟太单薄了，单薄得与它那“西欧强国”的称号都有些不相符合了。法国的有识之士也已意识到：法国衰弱了！

其实，法国的衰弱并非始于二战结束之时，历史还要追溯到上个世纪末。

19世纪中叶的法国还是一个世界强国，其地位仅次于英国，且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就完成了工业革命。但是很快它就落伍了。在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时，它的发展速度缓慢了。由于高利贷资本发达，大量资本输出和食利者阶层的出现，又延缓了国内工业的发展，小生产者占了优势，于是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竞赛中，它的步子小了，其实力也由第二位降到世界的第四位。到了20世纪，法国的落后已是非常明显。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民生产急剧下降。经过长时期的苦苦挣扎，经济才稍有所恢复，但到1938年，新的战争灾难又开始再次渐渐地侵蚀它的肌体。1945年法国国民收入，按定值法郎计算，最多也不过是1929年的一半。这是一幅非常阴暗的画面。在现代世界中法国已远远落在了后面。在这种情况下重塑法国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从何着手？采用什么方式？具体步骤又怎样？这一切都是问号。然而，这些问号却又实实在在地等待法国人民去寻求答案。

莫内回到巴黎的几个星期之后就开始了探索重塑法国的艰难历程，亦如他所言：“这项事业是生死攸关的。它将占用我个人的全部精力，以及为了争取战争的胜利曾同我一同工作过的那些人的全部精力。”这位已是57岁的法国物资委员会主席又将如何用他及他的同事的“全部精力”去完成这件“生死攸关”的事业？这时的莫内虽感责任重大，却不惊慌。长期的不间断的政治生涯造就了他坚定的毅力和果敢的处事能力。1919年，三十刚出头的莫内就出任国际联盟副秘书长；1923—1938年，先后在美国、波兰、罗马尼亚、中国等一些国家担任经济或财政顾问；1939年代表法国与美国谈判购买美国军用飞机事宜；1940年又受邱吉尔之命为英国准备军需物资；1940年6月应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聘请秘密到达美国，帮助罗斯福筹建建联军武器库，为打败希特勒准备了大量飞机；1943年又被派往阿尔及尔调停戴高乐与吉罗之间的矛盾，并从此参加法兰西全国解放委员会的工作。这丰富的阅历锤炼了莫内个人性格的内涵，他有条不紊地处理法国重建的一切事务。

他首先采取的行动是统计法国经济发展中的各种数字，并仔细研究了这

些数字。在研究中，他发现，法国经济是有规律的衰退，而精神力量的减弱却是人们有意讳言的致命短处。法国人在科技进步中抱着放任自流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又严重地忽视了生产投资和现代化。法国机器设备的平均年龄是25岁、而美国的只有5—6岁，英国的也不过8—9岁。法国最新的冶金设备是1906年建成的，且还是德国人兼并洛林时装配的。法国人放任自流引起的精神涣散又导致了军事上准备的虚弱，在战争中法国迅速崩溃便是意料中事了。

在对统计数字研究的基础上，莫内认为重塑法国的着眼点应在于：重振法国人民的精神风貌，特别是要使那些认为只要法国一解放就会变得繁荣的人们丢掉幻想，让法国人民认识现实，面对现实，团结一致。为此，政府必须做大量的耐心的解释工作。要使法国的全部资源都集中于重建基本设备方面。把重建的目标确定为不仅是要恢复到战前的状况，而且还要达到最发达国家的水平。而最重要的措施是实现法国现代化。莫内曾有机会同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戴高乐将军谈论这个问题。他对戴高乐说：“为重建城市、港口和铁路，需要一定的时间，但这些事情将会办好，因为除此之外别无其它选择。然而要使人们懂得，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生产方式过时和设备陈旧。”他还建议，全体法国人民都应参加到从事设备更新和实现法国现代化计划中来。戴高乐要求莫内“在年底之前给我提出一份书面建议”。由此，莫内率领他的部下又开始了制定“法国现代化计划”的工作中。

制定计划的工作是从清除工作开始的。在莫内看来，用国家的全部力量去寻找谁都得不到好处的所谓的总体利益，并不可取，使每个人都从总体利益中得到一部分，才是更好的计划。因此，物资委员会从每个行政部门提出的计划中了解了他们的利益，采取了将每个部门确定的努力方向与行政手段结为一体的方法，统一认识使那些最迫切的需要和最长远的志向服从于物资委员会所确定的有一定指令性的目标，从而创造一个共同讨论的有利环境，既可以交流看法，互相讨论，又可以有自己的见解。集各种意见之长，物资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法国现代化计划”的设想模式。这个模式计划参照了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制定的计划，也参照了英国为进行共同的协商而制定的方案，还吸收了法国联合工业界、工会以及技术人员的工作队的作用，确定现代化委员会为执行现代化计划的主要机构。莫内等人很快就将现代化计划起草成文。到1945年12月初，莫内便去与戴高乐会晤，向他递交了一份用5页纸写成的备忘录，题为：“关于现代化计划及其装备的建议”。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阐明了法国赶上技术革命新潮流的必要性。在技术革命方面，法国在战前就已经落后了，因此“现代化和恢复工作应该同时进行。”这是一条不可更改和忽视的重建原则。

第二，强调增加生产降低成本的必要性，用以支付出口产品所必需的进口原料的款项。

第三，急待解决的问题就是“法国将全面使用劳动力和一切可以利用的工业资源”。

第四，方法问题。“全体法兰西民族都应投身到这种努力中去。……现代化计划不仅对政府和行政部门有益，而且使所有法国人都感兴趣。他们可以从中找到有关我国形势的全部资料和数据，找到引导他们发挥个人首创精神的一些方针和行动准绳。”备忘录写道：“实施本计划需要全体人民的合



作，而把法兰西民族的一切重要因素全都组织到修改和完善现代化计划的工作中去，是必不可少的。为此，我建议的工作方法是吸收各个领域的行政负责人、最有资望的专家以及各种职业协会的代表（其中包括工人、干部和企业主）们来参加。”

在经济领域里吸收各方面人士共同确定他们将要达到的目标，在当时是能够为所有人接受的。而且“国有化”这一目标刚刚实现，人们期待并同进步的另一目标，因此，莫内决心把现代化委员会变成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实体。他在备忘录中对这一实体进行了描述并成为最重要的部分：“法国的生产问题将成为现代化的研究课题并将由计划总署负责”。计划总署下设各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委员会，其最终目的是制定一份“总体规划”，使得各部门确定发展的“先后顺序”，并就“法国主要部门的生产和在一定时期里所要达到的目标等问题向政府提出具体建议”。

莫内于12月5日把建议交给戴高乐，两个星期之后，便在内阁会议上获得通过，1946年1月3日以法令形式予以正式公布。鉴于莫内在计划制订过程中的巨大作用，这个“法国现代化计划”被称为“莫内计划”。

根据“莫内计划”的内容，法国在1946年成立了“计划总署”，由政府首脑领导并由12位部长和根据条件选择的12位杰出人士组成。计划总署成立后，由莫内负责又制定了一个七年计划（1947—1953年），重点发展煤炭、电力、钢铁、水泥、运输和农业机械等六种重要工业。国家对这些基础工业部门实行计划调节，以新技术装备使之现代化。

法国要实现“现代化计划”，但自身实力不强却又使现代化计划的实施必然面临极大的困难。此时的莫内显示出他惊人的过人之处。他深知，凭借法国的实力是不可能完成重建和实现现代化计划。他的目光没有停留在国内，国内的资源毕竟太有限了；他的目光也没有停留在西欧，西欧也是一片狼藉，百废待兴。他的目光在向西，向西越过英吉利海峡，越过大西洋，停留在美国这片土地上。他要借助“美援”这缕西风，复兴法国，重塑法国，实现法国现代化。他在“关于现代化计划及其装备的建议”中毫不隐讳地说，法国必须得到外国贷款，这是一条重塑法国、实现现代化的捷径。莫内指出，拒绝外国贷款而走其它道路，对法国来说是致命的危险。“如果没有贷款，那么现代化的实现将会被拖延，实现的条件也将被改变，能够实现现代化的期限必然会更长，人民将为国内消耗作出更大的牺牲。”这样的结局不仅会影响法国的崛起，而且还会改变现代化潮流的方向，导致不同的命运。因而法国需要外援，法国瞩目美国。美国的反应又如何？答案是肯定的。其中的奥妙就在于西欧对美国称霸全球有着无比重要的战略地位。

战后初期，西欧面临困难重重的特定的局势，为美国控制西欧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便在考虑利用其在战争中取得的优势，在战后控制西欧。战后美国加紧制定控制西欧的政策和计划。1946年冬到1947年春，逐步形成了美国对西欧的总政策，即大西洋联盟政策。按照美国人的解释，就是要“帮助建立一个在军事上和其他重大问题上同美国和加拿大紧密结合的繁荣和统一的西欧、使它作为一个强大力量重新回到世界舞台，同北美洲进行广泛协作”。这项政策的要点就是支持西欧的复兴与联合，其重要步骤之一就是马歇尔计划的提出。

1947年6月5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援欧演说，演说提出了“复兴计划”的计划，即“马歇尔计划”。计划一提出，

西欧国家尤其是英法两国积极响应，这些国家都处于严重的困境，迫切需要“山姆大叔”的帮助，以渡难关。法国外长皮杜尔表示对马歇尔建议颇感兴趣，并企图利用这一时机，充当马歇尔计划的代理人，实现法国领导西欧集团的雄心。

1948年4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1948年对外援助法》，次日经杜鲁门签署，马歇尔计划正式开始执行。美国对法国的贷款援助保证法国人民的就业问题，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但这并不等于说。生活条件从此就会一直地改善下去，如果不充分利用美元为法国提供的喘息机会，独立和繁荣仍然只是一种幻想，而空抱幻想是非常危险的。美国提供的一切方便条件仅仅使法国有了实现现代化计划的可能，但并不等于这个计划一定能够实现，况且美国还向西欧各国提出了许多的限制。尽管有美国的援助，通货膨胀仍有可能再度抬头并吞噬一切。因而必须把美元和法郎结合起来，必须用外部条件来力实现现代化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在这一点上，莫内比其他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他主张，把出售无偿提供的产品所得的法郎用作计划内工程的资金，把美元用于发展作为现代化计划原动力的基础工业。

从1947年起，法国是马歇尔计划的主要受惠国，共获30亿美元的援助。“莫内计划”在美国的帮助下得到了较好的实现。战后初期工业生产恢复较快，到1948年，整个法国工业的产量达到战前1938年的水平。法国总算喘过气来了。待其实力有所增强后，便不甘心屈居“小伙伴”的地位了。莫内等人又踏上了为下一个目标——“欧洲共同体”努力的征途。

让·莫内负责策划的“法国现代化计划”是在战后法国极度衰弱的情况下出现的，“计划”把“现代化”与“重建”相结合，企图再塑法兰西“西欧强国”、“世界强国”的地位。然而，法国人精神涣散，法国经济又濒于崩溃，这严重地阻碍了“现代化计划”的实施。莫内则巧妙地利用“山姆大叔”的援助，把它化作新鲜血液，注入法兰西于瘳的肌体内。这无疑是一剂强心针，“计划”的实施有了较充足的资金，法国经济的恢复加快了节奏。在“美援”的扶植下，“莫内计划”与“国有化”政策互相呼应，“工业现代化”与“农业现代化”互相促进，法国最终走出了战争的阴影，走出了经济的困境。莫内力法国重建和崛起奉献出了个人的聪明与才智，他受到了法国人民的崇敬和爱戴，1979年3月16日，莫内去世时，法国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 重教轻军恢复经济 日本发展“重化工业”

1878年9月22日，吉田茂出生在日本东京都涩谷区神山町。生父竹内纲曾两次当选为日本众议院议员，养父吉田健三郎时为横滨一带有名的大贸易商，这使得吉田茂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和熏陶。吉田茂身材矮小，貌不惊人，却娶得名门闺秀为妻，她便是赫赫有名的明治功臣、“维新三杰”之一大久保利通的孙女、深受天皇宠信的当朝重臣牧野伸显的长女雪子。富裕的家境，优越的学历，又有牧野这样一位岳父作靠山，吉田茂很快成为日本外交界的显要人物，可谓是青云直上，春风得意。1946年4月举行战后首次大选，吉田茂被推为自由党总裁，并于1946年5月22日组成第一次吉田内阁。至1954年2月10日，吉田茂五次组阁，执政七年之久，对战后日本的重建和经济迅速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日本于1931—1945年发动了长达14年的侵略战争，这不仅给中国和亚洲其他各国人民造成空前的灾祸和牺牲，而且给日本自身也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日本经济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和损失。工农业生产极端萎缩，粮食危机，物资匮乏、物价飞涨，大批失业，这一切使日本人民的生活陷入了极端困难的境地。日本评论家曾刻画过当时人们的心理状态：“国家虽已陷入虚脱状态，但国民还必须一天一天地活下去，而客观现实是处于穷困潦倒的境地。”由于战败，“赖以维护的传统、道德、伦理、规范也随之化为乌有，失去了应该遵循的道德规范，加之欲摆脱现实的贫困，人们便开始不择手段了，不管干什么，只要能使自己快活就行。”美国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甚至说：“由于这次战争，日本已降为四等国。”

面对这尴尬的局面，战后日本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发展经济，保障人民生活。第一届吉田内阁的最大功绩就在于解决粮食问题。在世界粮食出现极度恶化的情况下，吉田茂巧妙地运用了麦克阿瑟元帅这根唯一的稻草，依靠进口最少限度的粮食，成功地摆脱了危机。

在重建日本、恢复日本经济的问题上，吉田茂以敏锐的“战略”眼光，敢冒风险的决心和魄力，果断而大胆地制定了一项重大的产业发展政策。一般来说，受到战争破坏的日本，应该首先恢复轻工业生产，而不具备发展重工业的现实条件。吉田茂在听取专家们的建议后，作出了完全相反的判断，提出了“重化工业路线”。1946年11月开始实施所谓的“重点生产方式”，按照“煤钢超重点增产计划”，在经济极度困难中，将资金、材料优先投入煤、钢铁、肥料等部门，加紧增产基础物资，创造条件，使各部门产业逐渐扩大。1947年，煤炭、钢铁业产量大幅度提高。这项富有远见的经济政策，为其后的历届政府所继承，使日本在战后不久来临的世界性投资与重工业产品需求热中，处于主动地位。这是日本战后经济迅速恢复和起飞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一届吉田内阁仅存一年，1947年5月20日，吉田内阁总辞职。吉田茂下野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美苏战时同盟分裂，对立代替了合作，美国向苏联发起了冷战。为此，美国重新制订了新的全球战略，决定把日本变成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军事堡垒和反共防波堤。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美国急需一个最能与美国合作、强有力的人物来组成一个亲美政府。于是，在美国的支持下，吉田茂于1948年10月15日再次组阁。

在经济问题上，吉田内阁基本上受制于美国。吉田茂认为：“战败后的

整个占领期间，日本的对内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对美关系的支配，这既是事实，也是必然。”为了扶植日本，美国也感到有必要使日本重新回到国际自由经济体系中来。1948年12月18日，美国提出了“稳定日本经济九原则”，为了实现这九项经济原则，美国政府于1949年1月底派遣底特律银行总经理约瑟夫·道奇为总统特使，主持稳定日本经济的工作。吉田茂认为美国提出的原则与日本政府的想法有些“近似”，便立即接受付诸实施。

正当日本政府按照“道奇路线”进行经济整顿的时候，1950年6月，美国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这场战争对日本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战争给日本经济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战争景气”，使日本经济很快找到了摆脱萧条的出路，为战后日本经济的全面恢复起到了“强心剂”的作用；另一方面，日本最终成为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一员。经济企划厅在总结这段历史时指出，由于朝鲜战争，“日本经济才得到了活路，从这个意义上讲，朝鲜战争是日本经济的回生妙药。”这话虽然有些夸大，但战争所带来的“特需景气”使日本提出了“经济自立”的口号，而且要在“没有‘美援’和‘特需’的条件下，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要在没有补贴的条件下，改善企业经营”，以求达到“经济自立”的目的。很显然，依靠如同在道奇路线时期所实行的以裁汰人员、冻结工资为中心内容的“企业经营合理化”，或者依靠如同在朝鲜战争时期所采取的把投资重点放在增加生产设备数量上的办法，都是无济于事的。出路只有一条：从欧美为各个产业部门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改造或者取代落后的生产工艺和陈旧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以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这在日本称为“产业合理化”。1953年，以“合理化投资”为中心的民间设备投资高潮出现。1954年12月10日，吉田茂完成组阁，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已经奠定。

吉田茂执政时期，正是日本经济的恢复时期。当时日本政府正受控于美国，但吉田茂却不总是依照美国的意愿行事。他在经济恢复方面可以说是我行我素，通过旁门左道，取得异曲同工之效。他不仅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采取了“重化工业路线”，而且还运用重教育、轻军备之策略恢复和发展经济，这是尤为人们注意的两个方面。

第一，吉田茂内阁推行“先富国，轻军备”的路线。

从朝鲜战争爆发到1954年吉田茂下台，美国一直对日本施加很大的压力，急催日本建立30多万人的地面部队。吉田茂一贯坚持所谓的“逐渐增强自卫力量”的方针，反对按照美国的要求，不顾日本的经济力量实行重整军备。他认为：“重建日本经济，需要投入很大部分国家财政资金，没有更多的余力发展军备。”他相信在美国的保护伞下，日本不会受到外来威胁，可以在美苏两大阵营对抗的缝隙中专心恢复经济。反之，经济上不发展，重建军备也无济于事。而且，重建军备只能加重日本的经济负担，阻碍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日本于1951年签署了旧金山和约，同时又与美国缔结了安全条约，其后一直将军备规模限制在陆军18万人的幅度以内。日本人民深受侵略战争的祸害，强烈反对复活军国主义，这对政府扩充军备是巨大的阻力。

吉田茂一方面考虑到国内政治环境，另一方面在战略上作了先富国，后强兵的长期安排，而不是经济建设与军事建设齐头并进。他的这种被称为“先富国，轻军备”路线，对于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确起了作用。据西方学者研究，如果日本军费增加到美欧同等水平，那么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便将下降40%，它就不可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了。

吉田茂后来在《激荡的百年史》一文总结道：“关于日本的安全保障问题，杜勒斯认为，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日本继续保持没有军备的状态，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的。因此，作为媾和条件，主张重整军备。但是，我公开反对了这种重整军备论。因为日本在经济上还没有复兴，而且如上所述，当时为了实现经济独立，日本正处于不得不强迫国民过艰苦生活的困难时期，……而且，日本已经失掉了作为重整军备后盾的心理基础，对于曾经被迫参加毫无道理的战争的国民来说，战败后的创伤依然存在。再者，日本如果重整军备，也许会刺激亚洲的邻国。”吉田茂的这种思想成为以后日本历届政府奉行的经济发展和对外交往的总方针。

不过，吉田茂的“轻军备”路线并不意味着他不重视军备，而是因为日本经济不景气。待日本经济刚刚有点起色，吉田茂就在1950年8月建立了警察预备队和海上保安厅。1954年6月制定自卫队法和防卫厅设置法，7月，正式成立防卫厅和陆海空三军自卫队，正式开始重建军备。

第二，吉田茂以教育发展促经济起飞。

在治国思想上，吉田茂强调“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教育。他在总结日本近百年发展的过程中，深信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原动力”，认为注重教育是日本近代化和现代化的“最大特点”。吉田茂在分析战败后日本的情况时指出：“如不集中有识之士的力量，重新教育日本人，把他们培养成卓越的，达到世界水平的人，则日本的前途是不堪设想的。目睹战败后的情况，使我痛感教育之重要。”吉田内阁初期，日本在“一片废墟”、“人们在疲惫不堪”、“食不果腹”的情况下，却将义务教育年限从战前的6年延长到9年。

吉田茂指出，战后日本所以能以惊人的发展速度赶过西欧，主要靠的就是明治维新以来长期培养起来的日本人的素质。战争使日本损失巨大财富，但是最为重要的——人的能力却没有丧失，这是重建日本的巨大力量。农业和工业技术革新所以能获得成功，根据原因就在于日本具有高水平的教育。

吉田茂所推行的教育，不是指那种少数重点的人才培养，而是指国民平均起来的高水平教育。由于平均教育程度高，日本拥有世界上令人羡慕的高质量劳动力。现在，日本成为世界上最重视教育的国家之一，日本民族成为最勤奋学习的民族之一，日本家庭把受到良好教育看成是留给子女的最大遗产。这正是日本能够迅速吸收和发展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经营技术、迎头赶上欧美的基础。日本全部的经济发展战略主要就是建立在发挥人力优势这个基础之上的。吉田内阁为奠定这个基础无疑作出了巨大的成就。从1956年开始，日本进入了发展和现代化时期，而且粮食基本上实现了自给。

战前的日本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过长期的侵略战争的消耗和破坏，战后的日本经济濒于绝境。经过10年的恢复、调整和准备，1956年开始了现代化起飞。在这10年中，吉田内阁执政达7年零2个月之久。他在经济恢复方面，采取了走旁门左道的策略，达到了异曲同工之效。他抛弃“受到战争破坏的日本，应该首先恢复轻工业生产”的传统观点，提出了“重化工业路线”，实施“煤钢重点生产计划”。1951年9月以后，吉田内阁的经济措施就从钢铁、电力、煤和海运等“四大重点产业”开始，为后来“国民所得10年倍增计划”铺平了道路。为了加速经济的恢复，吉田茂推行“先富国，轻军备”的路线，这条路线在当时是可行的，也是明智的，日本将军费开支的大部分都用于公共投资和对企业的支持，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从长远利益出发，吉田茂还致力于教育改革，把教育作为国家百年大计的基础。轻

军备和重教育与经济措施一样，促进了日本经济的恢复。从 1955 年起，日本进入了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从 1968 年起，日本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而为世人瞩目。可以说，青田茂为日本今天的辉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此，日本人尊称他为“战后日本复兴和发展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 路德维希对症下药联邦德国起死回生

路德维希·艾哈德是“社会市场经济”思想的系统提出者和具体执行者，他以脑袋圆、身体微胖、手捏一支粗大雪茄烟的形象为人们所熟知。在法兰克福大学期间，就学于当时著名的国民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弗里茨·奥本海默。奥本海默试图通过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结合来确定经济政策，这对艾哈德的经济思想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艾哈德毕业后，进入纽伦堡商学院的“经济观察研究所”工作，直到1942年。后来参加了反对希特勒的运动。作为经济学教授和纳粹主义的反对者，他在战后为美国赏识并成为联邦德国经济部长的理想人选。在德国实施经济改革时，他对症下药，开出了“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处方。联邦德国终于起死回生，由一个欧洲的弃儿变成了一个强国。

1945年5月9日零点正，欧洲大陆战场上的枪声停息下来，由希特勒一手策划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以纳粹帝国的失败和全面崩溃而宣告结束。6月5日，苏、美、英、法四国接管了德国的全部权力，德国及首都柏林被划分为四个占领区，一个统一的德国如今已是四分五裂。

战争结束了，但战争带给德国人民的痛苦和灾难却远远没有结束。这场空前浩劫，不仅危及整个世界，同时也对德国本身造成了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损失。许多城镇化为一片废墟，住宅和公共建筑遭到破坏，交通几乎完全瘫痪，远洋舰队全部被战胜国没收，东、西占区的划分使西占区失去了往日的“粮仓”，货币体系完全崩溃，代之而起的是严重的通货膨胀。可以说，战后的德国已是一个遍体鳞伤、满目疮痍的国家，一个缺乏食品和原料的国家，一个没有有效的交通网络和货币的国家，一分裂的国家，一个社会混乱、前途未卜的国家。

更为可怕的是人们绝望的心理，在物质损失的废墟上看到的是战败后人民精神的崩溃。人民遭受纳粹倒行逆施的统治已有12年之久，再加上战争的失败。家园的破坏和战胜国的占领，德国人民已是心力交瘁、精疲力竭。恶梦给人民的心理投下了长长的阴影。对战后经济和政治前景的捉摸不定以及对战胜国占领政策的恐惧和不安，又使人们或者灰心丧气，有自卑情绪，或者忿忿丁平，产生幻灭之感。这种无望、沮丧，听天由命和一蹶不振的心理状态加重了整个经济活动的瘫痪。战败后的德国人民确实还需要时间去面对现实，承认现实，才能从零开始，重建家园。

重建家园，为多少德国人民所向往。然而，德国的重建又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艰难，这不仅因为它受战争创伤最深，且要支付巨额赔款，还因为它面对的是英、美、法等国分而治之的统治和；日的经济体制的束缚。要重建，德国人民必须利用条件，注入活力。唯一的途径便是实行改革。

德国西占区分别由英、美、法三国主持。三占区中，美国的实力最为雄厚，它的占领政策因而举足轻重，在很大程度上支配。影响了英法的对德政策。但美国的对德政策从一开始就是矛盾的，一方面，它要惩治和限制德国，另一方面又竭力要将战后的德国纳入西方阵营。随着战后东西方关系的变化，美国统治集团逐渐将苏联视为其控制欧洲和称霸世界的最大障碍和对手。为巩固在欧洲的地位，美国需要的不是一个软弱的欧洲和混乱的德国，由此，美国对德政策转向扶植德国。英国则和美国不同，它在战争期间受到很大的削弱，战后又面临重建，没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关注德国，它甚至担心经济上衰弱的德国不利于欧洲大陆的稳定，进而影响英国的重建，所以，

英国在对德政策上基本上追随美国，1947年1月1日，美英联合占领区（简称双占区）成立，这为整个西占区的经济恢复和经济改革开辟了道路，它还是联邦德国成立的前奏。和英美相比，法国在占领区自行其是的做法最力明显，它力防上德国东山再起，主张尽可能地削弱德国，它的目标始终是分割德国。“马歇尔计划”出台后，法国为了确保法占区参加这一计划，便开始改变对德政策，而且它们还认识到只有缓解同德国的世仇宿怨才能加快欧洲恢复和促进欧洲稳定的步伐。三国对德政策的改变，为经济改革创造了政治上的重要前提。

同时，西占区的旧经济体制——统制经济失去作用，它根本无法促进生产和保证人民的日常生活需要，货币体系已经名存实亡，企业失去活力，生产无从发展，市面一片萧条，加之，广大人民群众已饱尝纳粹统治时期和占领区统制经济之苦，对旧的经济体制已是深恶痛绝，他们渴望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这种形势的发展和人心所向为西占区的改革提供了很好的舆论基础。1947年，占领当局任命路德维希·艾哈德为双占区的“货币与信贷特别委员会”主席。具体负责筹划货币改革的措施，这标志经济改革的绿灯已亮，时机成熟了。

1948年3月，艾哈德被任命为双占区经济管理局局长后即着手整顿混乱的经济局面，准备实行经济改革。

如何改？设计、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具体制定哪些措施？采用何种理论为指导？这些问题在当时可以说是见解纷坛，莫衷一是。新自由主义学派极力主张建立私有制基础上的自由市场经济，限制国家干预经济的权力。在各党派政治势力中间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十分强大，主张“资本主义的政权制度应当结束”。基督教民主同盟反对恢复以往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西方占领国顾问主张实行国家干预主义，美国对欧洲的经济政策基本原则之一就是恢复经济，解决失业，在经济领域实行国家计划和控制手段，并予以物质保证。当时刚形成不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学派看到了积极的社会政策或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意义，主张把自由市场经济同国家制度保证职能和通过积极的社会政策协调社会平衡、促进社会进步的过程结合起来。

在上面众多的理论中，艾哈德接受了新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观点，他注重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考察经济问题，把经济政策作为社会政策的一部分，力图实现经济自由与社会义务的协调一致。在这个基础上，他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系统化，使之更适应联邦德国经济发展的状况。几经补充、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形成，即是艾哈德针对德国的病症所开的处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吸收了社会民主党经济理论中的经济民主思想，吸收了新自由主义理论中的自由竞争制度原则。吸收了基督教社会学说中互助原则的经济思想，并承袭了德国历史传统上的社会保障思想。具体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包括五大要素，即：私有制下的自由市场竞争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中，私有制是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基础，占主体地位，国家为促进和维护市场自由竞争提供制度保证的职能，主要是通过竞争政策实现的，因而，私人经济决策和自由市场竞争优先，国家干预调节只是一种辅助形式。国家干预调节的范围与任务。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应该是建立和维护正常的秩序，以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因此。必要的国家干预调节措施必



须始终保持与市场一致的原则。社会保障制度。在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中，社会政策占有突出的地位，其目标与任务是协调社会平衡过程，实现社会的公正与安定。主要通过社会保险制度和救济制度来实现。共同决定制度。通过立法手段保障工人在企业中的共同决定权力，即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决策。收入再分配措施。这是纠正市场分配结果、协调和平衡社会发展过程的重要手段，国家通过税收等手段对市场的初级分配进行再分配，以防止社会过度的两极分化，保障社会低下阶层的基本生活需要。

艾哈德所提出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并没有马上被人们接受，而且还有人责难他。1948年6月21日，军政府的人问他知不知道：就连战胜国英国也还在实行配给制度；问他知不知道：只有占领军方“有权改变经济规章制度”。艾哈德沉着地回答道：“这些我当然知道。不过我并没有‘改变’经济规章制度，我是‘取消了’经济规章制度。”这就是后来被人们当成传奇谈论的有名的“艾哈德答问”。

1949年9月，阿登纳组阁，艾哈德入阁任联邦经济部长。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之后，阿登纳最终接受了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艾哈德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是否就真的适合联邦德国的病情？能达到起死回生之效吗？

当西方占领者支持德国重建后，便逐步把经济管理权移交给合并成立的联合经济区的经济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在艾哈德的领导下，于1948年6月进行了货币改革，接着基本上取消了统制经济管理方式，把经济活动的组织、调控交给了市场。按照币制法令规定，旧新马克的比例为1:1.1.通过这种掠夺性兑换率，从流通领域收回93.5%的旧马克。币制改革为治理通货膨胀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成为建立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起点。

币制改革和随后的税收改革、取消配给和放开价格改革及加强国家干预与社会经济秩序的改革，在短期内取得了较明显的效果，很快扭转了西占区经济混乱局面，呈现出一派恢复经济的生机勃勃的景象，更为重要的是人民对新的经济体制产生了信心。从1948年起，德国经济进入恢复和发展阶段。

1949年，阿登纳组成联邦德国的首届政府。他和艾哈德在制定政策时把经济复兴这一最迫切的任务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因而继续推行已初见成效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即是在灵活适应市场行情的基础上，采用一种综合性经济政策的有机手段有计划地刺激经济。这种经济政策通过货币、信贷、贸易、关税、税收、投资和社会政策以及其他措施的有机联系，使经济为实现其谋求全体人民的福利以及满足他们的需要这些既定目标服务。这些政策在实践中都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因而在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稳定物价、增加就业等主要目标方面相当成功。

与此同时，联邦德国还实行了一整套使人民消费需求得到满足、经济生活有一定保障的措施，这在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中是非常突出的一个方面。它包括：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和严格财政开支，缓和通货膨胀率，使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后的实际工资有所增长，借以提高人民的购买力；推行包括给失业工人发放补贴、给退休和丧失工作能力的职工发放退休金和养老金。医疗保险等在内的社会福利制度；大规模兴建住房、改善居民特别是工人的居住条件，以解除工人的后顾之忧；等等。由于这些措施的推行，联邦德国在1951年就完成了经济的恢复，实现了国民经济从战时体制转移到“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轨道上来的过渡，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为往后经济迅速、顺利的发展打下了比较牢固的基础。

自 1952 年开始，联邦德国进入了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所谓“黄金时期”。至 1965 年，联邦德国的经济实现了飞跃。以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来衡量经济增长速度，联邦德国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居于前列；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绝对数额到 60 年代初开始超过英国和法国，1961—1967 年这段时间里，联邦德国国民收入在西方国家中居于第二位；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举足轻重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在西方发达国家中联邦德国处于领先地位，几项主要工业品产量包括煤、钢及汽车等都居于前列；从物价看比较平稳，通货处于“爬行式”膨胀状态，以消费物价年上涨率来衡量的通货膨胀率保持着较低水平；联邦德国在对外贸易中连年顺差，国际收支地位大力改善，国家所掌握的黄金外汇储备迅速上升，1955 年就超过了英、法和日本；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各经济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增加，失业人数和失业率出现较大幅度下降趋势，到 1960 年，劳动力市场基本达到了“充分就业”的状态，这是艾哈德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从整个 50 年代看，马克贬值的幅度同其他西方主要货币相比是最小的，国内购买力基本上是稳定的，对外汇率也基本稳定，保持马克的稳定是艾哈德经济政策的另一主要目标。总之，联邦德国的经济实力迅速持续地增长，从而使联邦德国战后经济得以复兴并重新跻身于世界经济强国的行列，从一个欧洲的弃儿变成了一个经济巨人，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把这个时期突出的经济实绩称作“经济奇迹”。的确，这个时期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为联邦德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史上所罕见。

二战结束时，德国面临的是一个令人伤心的前景：政治分离，经济混乱，人心散漫，国际地位陷入最低状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路德维希·艾哈德才作为经济学教授和纳粹主义的激烈反对者为美国人赏识，而出任“货币与信贷特别委员会”主席，具体负责策划货币改革的措施。艾哈德是经济学家，也是政治家和实践者。他继承了导师奥本海默的思想，主张通过社会学和经济学结合起来确定经济政策。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上，艾哈德提出了“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设想，理论的经济政策主要由竞争、就业和收入分配三大政策组成。1949 年，艾哈德出任联邦德国的经济部长后，他的思想得以付诸实施。在一个被战争摧毁的国家，艾哈德的配方成了灵丹妙药，在西方国家占领期间，由于艾哈德的改革，西占区消除了混乱状态，经济从 1948 年起进入恢复和发展阶段，1952—1965 年间，联邦德国经济还出现了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艾哈德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在运行中也出现过种种问题，但是它使联邦德国起死复生，并壮大这一事实却不可否认。在联邦德国复兴发展这期间，艾哈德分别担任联邦议院议员、联邦经济部长。联邦副总理、联邦总理等要职，他又是“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系统提出者和具体执行者。鉴于他在联邦德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德国人民尊称路德维希·艾哈德为西德“经济奇迹之父”。

## 欧罗已战后百业待举 马歇尔计划一石数鸟

1948年1月5日，美国《时代》杂志封面的标题是：“饥寒交迫者的希望”。封面上有一张引人注目的乔治·马歇尔将军的肖像，肖像上面横着一行字：“今年风云人物。”在4年之内，马歇尔已是第二次作为风云人物和封面肖像出现在《时代》杂志上，杂志声称，马歇尔是一个朴实和信得过的人，从收音机里听起来，他丝毫不动感情，不令人激动。作为陆军参谋长，他以寸华横溢著称。国会议员们以及其他在华盛顿和他打过交道的人，还知道他是一个顽强的、堂堂正正的老实人——一个好人。他的同胞们一般都仰慕他，如此而已。就是这位“可敬不可亲”的马歇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提出了闻名世界的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

1945年9月2日是“亚洲胜利日”。美国陆军五星上将乔治·马歇尔完成了作为一个陆军参谋长的责任，博得了世界一致的尊敬。那时，马歇尔已经65岁了。11月19日。他向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了辞呈。这位曾称马歇尔“是美国所造就的最伟大的军人”的总统在第二无勉强接受了他的辞。1945年11月26日12时30分，距马歇尔辞职的一周后，美国首都华盛顿五角大楼的庭院内，总统杜鲁门正在宣读一纸橡叶簇奖章的嘉奖令：“在一场规模和惨烈程度都是空前的战争中，成百万的美国人以其杰出的服务贡献给国家，陆军五星上将乔治·卡·马歇尔把胜利贡献给国家。作为政治家和军人，他具有胆略、刚毅和远见，更难能可贵的还具有鲜见的自谦。他作为两位总司令（按，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杜鲁门）的顾问而被倚为干城（按：陆军参谋长）。他的品质、行为和效能，鼓舞了全军、全国和全世界。他对美国前途所作的贡献，不亚于任何一个人。在历史上所有伟大统帅中，他位居前列。”

就是这位为“美国前途”作出了巨大贡献的马歇尔接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他接受的唯一——枚美国军功章，这枚勋章是第二枚橡叶簇奖章，第一枚在1919年授予。在享有如此殊荣的时刻，马歇尔没有被成功所陶醉，也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不动感情，不激动，而是平静地认识战后的世界。他知道和平时期还有比打仗更重要的工作要干。

虽然马歇尔已递交辞呈，但他在接受奖章的答词中意味深长地提醒那些担负着领导责任的人，“你们大多数人都知道，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是多么不同，多么幸运，而国内很多人却不能完全理解。我敢肯定，今天我国是以至诚和深情切望率先采取必要措施以避免世界再发生一场你们刚度过的那种灾难。全世界受苦的人都在期待美国带这个头。然而他们所想的还不仅仅是这个问题。他们更直接更迫切关心的是——口粮从哪儿来，今晚住在哪儿，怎样找到个暖和的地方度过严冬。除了维持和平这个大课题外，我们必须解决食物匮乏。缺衣少穿、燃料短缺和住房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没有一个能够单独解决，它们是相互关联的。”

刀已入鞘，枪已退膛。作为军人的马歇尔仍未放弃战斗。他的言辞中流露出他仍关心“全世界受苦的人”，他强调美国对世界“和平”和“繁荣”的贡献，他希望美国能新的世界秩序中成为唯一的主角，他摸索着美国有效地参与世界事务的道路。这位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已经看到了世界局势的变化，看到了战后欧洲的重要困境，也看到了美国将要面临的种种危险。

马歇尔认为美国的危险首先来自苏联。苏联作为反法西斯联盟中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经受了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考验。以牺牲2000万人的高昂代

价，为打败法西斯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苏联在世界上的影响和威望大大提高。同时，在战争中，苏联从美国获得 100 多亿美元的租借物资，战后又得到上百亿美元的赔偿，其实力在欧洲迅速崛起。欧亚一系列国家相继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苏联摆脱了那种受资本主义包围、孤立无援的境地，加强了同美国抗衡的能力。

马歇尔认为，危险还来自困难重重的西欧。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西欧各国的经济濒于崩溃。显赫一时的大英帝国已是百孔千疮，日薄西山。法国遭受法西斯铁蹄的践踏，也是伤痕累累，债台高筑。西欧其他国家更是凋敝不堪，加之 1946 年底百年罕见的严寒袭击，接连又是几场暴风雪，随后又是洪水泛滥，这一切使得西欧国家险象环生。随之而来的是政局动荡，阶级矛盾尖锐激化无疑是雪上加霜。可以说，战后初期的西欧已下存在政治、经济、军事力量雄厚、影响巨大的强国。当时有人认为，西欧能否重新崛起，“要由今后五十年到一百年的历史来回答。”昔日的欧洲列强，如今已降为美苏争霸棋赛中的卒子。而美国稍有不慎，就将输掉西欧这枚重棋。

马歇尔还认为，美国的危险还有关于德国的问题。战后初期，美国的对德政策是惩治德国。尤其是“摩根索计划”，主张在政治上肢解德国，在经济上把德国降为农业国。随着东西方关系的急剧变化，美国统治集团认识到，一个衰弱的德国无助于美国在欧洲地位的巩固。1946 年 9 月 6 日，国务卿贝尔纳斯声明：“德国是欧洲的一部分。假如具有丰富煤铁资源的德国变成一个贫民窟的话，欧洲的恢复，特别是德国毗连国家的恢复，必将很慢。”马歇尔也认为，德国经济的恢复对欧洲的复兴不可缺少。故，美国如不支持德国经济恢复的话，美国将削弱与苏争霸世界的实力。

面对如此形势，马歇尔再度出山，于 1947 年任国务卿。他一上任便大力支持杜鲁门的扩张战略。美国曾设想用贷款诱苏上钩和借联合国逼苏就范的企图均未得逞。苏联没有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且在联合国中的头四年使用否决权达 43 次之多，美苏同盟破裂，对抗代替了合作。为此，杜鲁门政府制可了扩张战略，即是：遏制苏联，扶助盟友，通过各种援助和建立各种政治军事集团，控制以欧洲为中心的处于美苏之间的广大中间地带，进而独霸全球。只是鉴于苏联的政治威望和军事实力，美国才不敢冒然越过双方业已划定的势力范围的分界线，以“热战”与苏联决一雌雄。

然而，形势对美国相当不利。1947 年 3 月 31 日之后，处于“泥菩萨过河”之状的英国已无法再给希腊和土耳其经济和军事援助了。由于希、土在军事上和战略上的重要性。英国希望美国接过这一班，看守中近东大门，以防“赤色势力”的侵入。美国也意识到，期待已久的抛出全球性扩张主义的时机来临了。

从 1947 年 2 月 21 日起，美国政府这部机器开足马力运转起来。上自总统，国务卿，下至政府各部有关官员都全力以赴，为借助援希、土这个机会，拟订出全球扩张的纲领性文件。3 月 12 日，杜鲁门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宣读了一篇咨文，提出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和援助希、土的具体计划。他要求国会在 1948 年 6 月 30 日以前，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 4 亿美元的援助，派遣美国文职和军事人员前往监督财政和物资援助的使用，指导和训练希、土人员。杜鲁门的这项声明，很快被称为“杜鲁门主义”，要旨在于：以援助方式插手苏联周围邻国，遏制苏联。

支援希、土，插手北非，仅是美国遏制苏联的第一个行动，还远不是最

重要的行动。一手拿着美元，一手拿着原子弹的美国狂妄宣称的是“以拉丁美洲为后院，以太平洋为内湖，以大西洋为内海，以欧洲为重点”的口号，杜鲁门也一再表示：“今天世界正期待我们的领导。”但西欧不堪一击之状却又使美国自身感到问题严重。

欧洲关系到美国重大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位于北大西洋东岸的西欧则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西方地缘论者认为，称霸全球者，必须占据海洋，否则只能据隅一守、四面受困。美国和西欧人的关系犹如英国和欧陆的关系，大西洋对于美国的安全有如 19 世纪英吉利海峡对于英国的安全。西欧是美国的前沿阵地，这正如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不保，英国就失去屏障一样，美国失去西欧，也就要退而下海，面临困守美洲大陆的局面。西方地缘论者还认为。就苏联来说，言攻必须下海，言守必须控制中欧，要控制中欧，又必须控制德国，因为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德国势必使全欧不安。它向东，波兰、苏联及整个东欧不安；向西，则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受压，英国也难保。因此，苏联不能就仅限于守住波兰，而且必须控制中欧，稳住西欧。一旦有变，就可进入西欧滩头阵地，争夺大西洋。对据有两洋天险的美国，要称霸世界，必须遏制苏联，因而就必须坚守西欧阵地。

而且西欧与美国有巨大的经济关系，西欧经济濒于崩溃的局面对美国不利，美国的出口会锐减，曾令美国人惊慌失措的经济危机也会很快“亲近”美国。西欧与北欧的经济关系可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面对困难重重的局面，美国绝下会袖手旁观，听任欧陆沉没。

1947 年 3 月，马歇尔前往莫斯科参加四外长会议。在莫斯科会议的前后，马歇尔耳闻目睹，深感欧洲经济凋敝，民生艰难。他认识到：如美国不援助欧洲复兴经济，欧洲出现的危机就会给资本主义世界带来灾难，莫斯科就会坐收欧洲混乱的果实而把势力一直向西伸延。为此，马歇尔忧心忡忡。

这时的西欧世界也都在瞩目美国。一些政治家为了争取经济好转，稳住政权，也在探索欧洲联合自强的道路。他们提出了各种联合主张。戴高乐一再提到欧洲统一问题，并在实践中侧重于建立以法国为领导的西欧集团。邱吉尔多次提出建立“欧洲台众国”的主张，把欧洲联合称为拯救欧洲的“特效药”。然而，联合与统一又谈何容易？当时的欧洲国家甚至没有重建之能力，它们必须寻求美国的援助和“保护”。

洞悉这一切的马歇尔在结束莫斯科会议后的返美途中下定决心，抛开苏联，撇开联合国，由美国直接掌握欧洲经济复兴的主动权。

1947 年 4 月 28 日，星期一晚上 8 点 30 分，通过全国电台联播，马歇尔向美国国会作关于莫斯科外长会议的报告。他声称，一次意欲达成国际谅解的特别尝试已告失败，共同合作以医治欧洲当前病症的可能性甚小。他着重讲了德国和奥地利对欧洲复兴的重要性，尤其是对德国问题，它“涉及的不单是欧洲和全世界的安全，还有全欧洲的繁荣”。然后，马歇尔又谈到经济问题，工厂、公用事业、铁路和各家庭都需要煤，被破坏的煤矿必须重新开采，这就需要钢，而钢又有赖于更多的煤，煤少生产就少。法国、英国和苏联都严重缺煤，它们都竭力在各占领区增加德国的生产，用产品来支付必需的进口。马歇尔知道德国的重工业越发展，就越使人担心它将来又会侵略。他在谈到长远目标时，也想到了诸如燃料。食物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整个德国处于饥饿状态中，而各占领国又不可能继续投下亿万美元去养活德国，因而德国需要在经济上立即统一，国家要重建，以达到自给自足。

摆出以上那些观点后，马歇尔比较强硬地申述西方盟国的主张，它们试图建立一个可行的德国中央政府，建立经济统一，确定合理的边界，以及缔结一项四强公约以保证德国不能危害盟国的持续安全，为此，他要求美国两党迅速行动起来。他声称：“西欧病人已经奄奄一息，而医生还在踌躇。”他呼吁“必须马上采取行动”。他还强调说：“今天世界的现状和美国所处的地位，在我看来已使美国人民有责任采取一致行动。正是为了这一点，我才如此详细地汇报我对莫斯科会议的看法。”

马歇尔的这次广播演说已流露出后来他在哈佛大学演说的思想。

第二天（4月29日），马歇尔就在国务院指定乔治·凯南为政策设计委员会主席，负责制订一个重建欧洲的总计划。5月15日，政策研究室举行会议，专家们一致同意必须用美国的资源去支援欧洲支离破碎的经济。他们认为，“问题最大最严重的是西欧；最紧急的地区是法国、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的各占领区以及英国；问题是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暂时必须从经济问题着手解决政治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制定出解决长远问题的计划，但为了心理上的需要，有必要采取某种紧急行动。”有了这种共识后，乔治·凯南领导的工作班子就日夜兼程炮制复兴欧洲经济的方案。

这个复兴欧洲经济方案的总要求是美国向欧洲注入大量美元。杜鲁门政府感到兹事重大，对美国公众能否接受和慷慨解囊，未有把握，需要探索，制造舆论。5月8日，杜鲁门授意副国务卿艾奇逊在克利夫兰市代表他发表重要演说。演说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欧洲经济困难和美国必须援助的问题。艾奇逊提出，美国援欧仅是保持美国经济繁荣的需要，而且是遏制苏联保持美国在世界上领导地位的需要。事后有人把这一演说称为“重要的试探气球”，杜鲁门则称之为“马歇尔计划的序幕”。

一月后的6月5日，哈佛大学毕业典礼日，也是欧洲战场诺曼底登陆3周年纪念日的前夕，大清早就温暖宜人。马歇尔是名誉学位接受者之首，他在典礼上发表了演说，正式提出了美国援助欧洲复兴的计划。他首先强调欧洲已是一片废墟，必须获得大量的额外援助，否则就得面临性质非常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恶化；美国应该尽其所能，帮助世界恢复正常的经济秩序。他认为欧洲在今后三四年内需要从外国，主要是从美国进口粮食、其他必要产品和额外的经济援助。希望欧洲各国联合起来，首先提出倡议，向美国提出一项欧洲经济合作发展计划。美国的作用应该是“友好地协助起草一项欧洲计划”，随后尽可能地去支持这项计划。这个演说所提出的“复兴欧洲”的计划，便以享有极高威望的马歇尔的名字命名，被人们通称为“马歇尔计划”。后来，杜鲁门曾实事求是他说：“假如这个计划不是以马歇尔为名，而是以杜鲁门为名，你能想象一个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会在选举年里通过这个计划吗？”由此可见马歇尔的领导才能和他在国内的声望。

马歇尔计划出笼后，英法两国首先响应。《纽约时报》6月7日伦敦电，声称英国对计划“热烈欢迎”，英国可能牵头召集有关国家开会，至少有两个附庸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可能参加。外交大臣贝文则赞扬马歇尔演说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演说之一”，要欧洲负责下一步行动并搞出一个计划来，那是正确的。法国外长皮杜尔则想方设法要在这出戏里当主角，美国驻法大使告诉马歇尔，皮杜尔想当主角。哈佛演说一周后，法国大使亨利·庞内来到国务院表达法国对马歇尔计划的兴趣，他提出由欧洲国家列出他们的总资源和基本需要，把欧洲所不能供应的那些必需的资源按生产资料 and 消费

资料分列。英法反应如此强烈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英法两国都迫切需要“山姆大叔的援助”，以渡难关，而且还企图利用这一时机，充当马歇尔计划的代理人，实现领导西欧集团的雄心。

1947年6月19日，在美国的指使下，英法邀请苏联参加商讨响应马歇尔计划的预备会。这是乔治·凯南等人设的一个“妙计”，如果苏联参加，既可掩盖马歇尔计划的反苏意图，又可套住苏联并通过援助打入东欧，如果苏联拒绝，则可以借题发挥，进一步煽动反苏舆论。

6月26日，莫洛托夫带了一个庞大的由85名专家和工作人员组成的代表团来到巴黎会晤，开始讨论马歇尔计划。在讨论中，莫洛托夫提议各国制定自己的复兴计划。他认为，美国不应该要欧洲各国列出其资源，而应该由各国自己去研究其资源并提出需要什么，然后再把各国所需要的总数交给美国。英法则坚持制定欧洲复兴的总计划。争辩之中，苏联终于弄清了马歇尔计划要控制受援国，为此，莫洛托夫强烈谴责大国驾驭欧洲诸小国并干涉国家主权的行为。尔后，卷起文件，宣布退出会场。苏联代表退会后，美国政府感到高兴，如释重负。马歇尔也认为，下会因计划援助苏联而招致国会的反对了，国会极有可能通过欧洲复兴计划了。

1947年7月12日，巴黎经济会议开幕，除苏联和东欧以外的欧洲16国商量马歇尔的欧洲复兴计划。9月12日，16国批准了第一稿，并把报告交给会议的秘书长贝文，贝文送交马歇尔，马歇尔呈交杜鲁门。征得美国同意后，9月22日，16国签署了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的总报告，要求美国在4年之内提供224亿美元的援助。

在欧洲国家协商的同时，美国一方面忙于同西欧各国洽商，另一方面在国内大造舆论，发起了支持马歇尔计划的运动，并加紧制定援外方案。6月22日，美国政府成立了直属总统的由内务部长哈里曼任主席的对外援助委员会。11月7日，哈里曼委员会发表了“欧洲复兴和美国的援助”的报告，报告全面地论述了援欧和美国的利害关系。欧洲复兴的症结。援欧数额以及如何通过援助控制西欧等问题。报告建议赶紧通过马歇尔计划。

1947年12月19日，杜鲁门向国会提出“美国支持欧洲复兴计划”的咨文。美国国会就此进行了马拉松式的辩论。杜鲁门感到局势紧迫，国会辩论不能再旷日持久地拖下去。他于1948年3月17日又向国会提出了一个特别咨文，声称欧洲局势日益紧张，敦促国会迅速通过马歇尔计划。在一片“反对苏联威胁”的鼓噪声中，1948年4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1948年对外援助法》。次日经杜鲁门签署，马歇尔正式执行。该法规定：美国在头15个月拨款53亿美元，其中40亿用于“复兴”西欧，并坚持逐年审批，不确定4年援助总数。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欧洲国家分别与美国签订了接受贷款的双边协定。其条件是，降低美国商品的进口关税；限制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向美国供给所需的原料；给予美国公民以本国公民在开发本国资源方面的同等权利随后，根据法案，在美国设立了“经济合作总署”（1961年改称“经济与发展合作组织”），在欧洲相应地设立了“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和“欧洲支付同盟”，负责执行复兴欧洲计划。

从1948年4月到1952年6月30日，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结束全部工作，美国共“援”款131.5亿美元，其中90%是赠予，10%是贷款。这些钱确实帮了欧洲国家的人忙，使它们较迅速地摆脱了严重的经济困境，恢复了元气。从1947年到1950年，接受马歇尔计划的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64%。当

时受援国只有 15 个欧洲国家，瑞士因拒绝接纳美国为执行马歇尔计划派驻代表，也就不接受美国的经济援助而退出了原来的 16 国。

对美国来说，欧洲复兴计划方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是杜鲁门、马歇尔、乔治·凯南、艾奇逊、哈里曼等人的“杰作”，唱主角的是马歇尔。他在纷繁复杂的，动荡不安的战后世界中，从美国的利益出发，认识到了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可能发挥的作用。他积极支持杜鲁门主义，并在实践中提出了以“美元”为武器去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设想。一个一个的美元在他的手中化成了美国称霸世界的开路先锋，起到了“一石数鸟”的效应。美元复兴了欧洲经济，稳住了资本主义营垒的阵脚；美元发展了美国经济，既避免了经济危机，又为美国建立了一个由它控制的多边世界贸易网；美元遏制了苏联，阻止了苏联的进一步西扩；美元控制了西欧，美国建立起了在资本主义阵营的霸主地位。马歇尔计划稳住西欧局势，如同杜鲁门主义控制美国在北非、希腊和土耳其的局势一样，一个在近东，一个在欧洲，异曲同工，如同一个核桃的两个半边。马歇尔为欧洲复兴计划方案的制定，洽商及通过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由于他崇高的威望和杰出的领导才能，该计划通称为“马歇尔计划”。这是他一生众多成就中最卓越之处。为此，他受到了整个资产阶级的顶礼膜拜。



## 以色列国创奇迹 伤心沙漠变绿洲

1906年，年仅20岁的波兰籍犹太人本·古里安移居巴勒斯坦。他穿过锈水汪汪的沼泽地，朝拜了那路撒冷的圣迹，之后便去了内格夫沙漠。烈日毫无遮拦地照着这片地区，乱石垒垒的沙漠伸向地干线，零星的小树和颜色发黄的灌木丛在于热的风中懒洋洋地摇曳着。这片沙漠的景致太令人伤心了，但年轻的古里安脸上毫无沮丧之情，他已暗自发誓：要让这片沙漠开出美丽的鲜花。42年之后，就在这片沙漠上，一个新的国家——以色列国诞生了，对沙漠爱得如痴如狂的古里安当上了第一任总理。他开始领导人民用双手去编织夺目的花环。

100多年前，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曾去过巴勒斯坦，他给人们描绘了一幅凄凉的图画：“在所有景色凄凉的地方中，我认为，巴勒斯坦当可首屈一指，那里山上寸草不生，色彩单调，地形不美。谷地是难看的沙漠，沙漠周围是一些孱弱的植物……。这是一块没有希望的，令人伤心沉闷的土地。”

1948年5月14日，英国结束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当天，本·古里安就宣布以色列国成立。犹太人就开始在这片被称作“没有希望的、令人沉闷伤心的土地”上重建自己的家园。刚刚建立的以色列国所在地是一片荒芜，满目疮痍。其国土面积小，根据1947年联合国分治决议分给它的面积仅1.49万平方公里；人烟稀少，人口不到90万；土地贫瘠，92%以上的土地为沙漠、山地、丘陵和沼泽所覆盖，耕地仅为16.5万公顷；少得可怜的水资源且雨量分布不均，以色列理当属于世界上最贫水的国家之列。而且，尽管中东被称为世界的“油库”，但以色列却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它既没有石油，也没什么矿产。有一个广为流传的笑话，说犹太人花了不少于40年的时间在沙漠中寻来觅去，结果却得到了中东这块唯一没有石油的地方。

不仅如此，以色列建国的第二天凌晨，以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为总司令的阿拉伯联军集中了约旦、埃及、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五国的正规军约2.5万之众开进了巴勒斯坦地区，从三个方向对刚刚成立一天的以色列国家宣战。从那以后，中东战事下停。连续的几次中东战争对生存艰难的以色列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因为战争首先是物质实力的较量。为此，以色列从建国那一刻起，就没有放松经济建设。古里安等领导人深深懂得：经济是生存的基础。在本·古里安等人的领导下，以色列人开始了“巧手夺天工”的历史。

几乎白手起家，从零开始的以色列在建国以后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常常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发生的“奇迹”之一，尤其是其农业发展堪称“绝妙”。而农业发展的奥秘之一就是充分发挥公有制经济的优越性。

本·古里安初到内格夫地区时，只是一名极普通的拓殖者，但那时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征服沙漠。也许是出于伟人所特有的政治敏感度、作为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古里安已预见到，这片无人感兴趣的荒漠可能划给犹太人，成为未来犹太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开始全心投入沙漠的建设，来到内格夫的席德包克，参加那里的基布兹的创建工作。在这期间，他和同伴每天被疲劳、饥饿和疟疾轮番折磨，但是热情和乐趣毫不减弱。他们完全被理想的激

情所鼓舞，甚至拒绝妇女参加基布兹建设，生怕孩子拖大家的后腿。基布兹为建国后以色列农业发展提供了别具特色的组织形式。

“基布兹”是希伯来文，意为“集体”，指作为一个集体存在的定居点。基布兹的土地是公有的，是国家的，是向国家租用的；它的全部财产都是公有的，或者说是共有的，属于基布兹的全体成员；基布兹的经营管理奉行直接民主原则，由全体成员共同参与决定；全体成员必须参加劳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没有差别，也不分工种和技术水平，一律享受完全相同的待遇；成员过着一种公社式的大家庭生活，他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文化娱乐以及子女的教育等，全由基布兹统包下来；基布兹内部下流通货币，成员所需的一切全部采用记帐，年底统算的方式结算；基布兹俨然一个小社会，足不出基布兹，一切基本生活要求均可得到。这种农村组织形式充分发挥了公有制经济的优越性，成为以色列农业经济奇迹出现的原因之一。

自建国以后，基布兹发展正常，它和“莫沙夫”（另一种农业生产组织）使用国家的68%的土地，以及约占全国总数5%的劳力，生产出总产量中80%以上的农产品和约50%的出口农产品，为国内生产总值作出约5%的贡献。经营范围还不断扩大到工业、商业和服务业，成为农工商的联合体。梅厄夫人说过，没有基布兹，就没有以色列。基布兹是国家之盐，民族复兴之柱石，以色列国之瑰宝。公有制经济为以色列的生存和发展作出了有口皆碑的重要贡献。

以色列农业发展有一个关键：水资源。成功地开发水资源是以色列农业成功的又一奥秘。

本·古里安走马上任后，他很清楚怎样才能让犹太移民们在巴勒斯坦地区扎下根来，他们也很清楚发展犹太国农业经济的关键问题是什么。总的来说，以色列水资源严重不足。北部地区年降水量为70公分左右，南部为20公分，最南部的沙漠地区几乎不下雨。从区域划分来看，北部水源有余，中部和南部严重缺水，北部地区还因排水不畅而形成许多沼泽地。因此，把北部海拔208米的加利利湖的水向南输送，直到内格夫沙漠，这样可使南北两方同时受益。

从1951年起，按照工程师们设计的一个七年规划开始了排水造田工程。以色列人改造了约旦河的河道，开凿了一条40公里长的运河，使加利利山以东的胡拉湖周围出现了6000公顷肥沃的新耕地，结束了粮食分配制度。随后，北水南调的“水利总计划”的战役打响了。这工程规模浩大，1953年动工，1967年竣工，历时14年。之后，这项工程仍在不断地配套和完善中。全部工程共用250万个劳动日，参加人数最多时达4000人，开挖土方700万立方米，石方170万立方米，浇灌混凝土50万立方米，耗用钢材7.5万吨，总投资1.7亿美元。这个工程既费时又费力，从加利利湖建两级泵站开始的，把湖水抽高365米到输水工程的最高点，然后用直径2.74米的管道向南输送，逢山打洞，遇沟搭桥，沿线共打隧洞3处，总长8.4公里。在水落低谷时，用泵加压提升，沿线共建加压泵站6处。这是一个难度极高的工程。

不仅如此，北水南调工程还遇到了政治和宗教上的一些麻烦。约旦河在虔诚的犹太教徒心目中的地位是神圣的，对它动“外科手术”，无疑有亵渎神灵之嫌，因而，本·古里安的行动遭到来自迷信势力的阻挠。另外，注入加利利湖的约旦河，是以色列、叙利亚和约旦共享的河流，叙、约反对以色列多用河水。但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瓶颈”问题，本·古里安决心要让

这片沙漠得到灌溉。他不顾一切地开始引水工程。叙利亚也不甘示弱，将一些推土机开到了约旦河边，准备从上游把水分走。本·古里安作出强烈的反应：悍然开炮击毁了这些叙方施工机械，北水南调工程得以展开。

1964年5月5日，这条被称为“国家引水渠”的北水南调工程一期工程完工通水。它使南部内格夫地区的供水量增加了75%，沙漠中出现了5.7万公顷的绿洲，“使沙漠开花”不再是梦想。犹太教徒也开始欢欣了，因为他们看到了先知以西结的“有一天将有一条大河从荒漠上流过”、“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能成活”的预言应验了。这是“人定胜天”的结果。

在水资源利用方面，值得一提的是以色列的节水技术，特别是滴灌技术。以色列的喷灌技术都在大面积应用，少则几百公顷，多则几千公顷，而且实现了电脑化。在灌溉季节前编好程序，又可随时变更程序。灌溉开始以后，就由一个计算机中心控制室遥控。事先确定灌水量、灌水时间的最佳选择方案，按程序自动灌水。以色列的滴灌设备由于性能优良，已向几十个国家，包括向中国出口。另外，以色列还大力提倡水的再循环利用，积极开展生活污水和咸水灌溉。1955年，本·古里安又一次登上总理主座时，制定了《水法》，实行用水许可证和计划日水分配制度，用水限量落实到各单位。不但有总限量，还有月限量和日限量，超量用水加倍收费，开采地下水必须经过政府批准，对污水和咸水灌溉用户，水费给予7折优惠。

以色列正是依靠这一整套节水制度和措施，在河谷地区有了发达的农业。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在沙漠中建起了片片绿洲。

有了基布兹公社所显示的集体的力量，有了水资源开发的巨大成就。如何利用这些条件在荒漠上创造奇迹，这又是本·古里安等人所要思虑的了。这时，他们又表现出实干、苦干的精神。

1952年，一位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种棉专家萨姆·汉伯格到以色列探亲。以色列的“伯乐”们知道后，旋即把这一消息报告给本·古里安。古里安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他马上放下手头的工作，把植棉专家请到自己办公室里，并诚恳地邀请他来帮助以色列生产棉花。本·古里安热诚地说：“你种棉花，汉伯格，我们开设纺织厂。”汉伯格被古里安的一片诚心所打动，他答应试试看。但内格夫的干旱和贫瘠又使汉伯格波浪式的摇起了头。当时的陆军参谋长伊扎埃尔·雅丁将军恳请这位专家再到别处看看。汉伯格终于在北部的一个地区找到了适宜植棉的沃土。10天后，汉伯格从美国带来一位水利工程师帮忙，雅丁将军用新兵充当他们的助手，沙漠上终于开出了洁白的棉花。就这样，以色列人只用了10多年的时间就解决了穿衣问题。现在以色列是中东地区的一个重要的棉花出口国，棉花产量居世界首位。

以色列人就这样凭着实干和苦干，在沙漠上种出了棉花，还种出了鲜花，每天有大量产于内格夫地区的鲜花空运运往欧洲市场，也种出了油梨，四分之三的产量销往欧洲市场，种出的葡萄袖还大量运往日本，等等。

几十年过去了，马克·吐温笔下描述的“没有希望的、令人沉闷的土地”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巨变。据以色列自称，1948—1973年，经济的年增长率为10%；工业从无到有，已有一批高科技工业，钻石加工工业在世界上占绝对优势；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始终有入超。但这一切都不可与大自然的变化媲美。昔日流行疟疾的沼泽地被排干了水，改造为旱涝保收的万顷良田；光秃秃的山头栽满了树木，一片郁郁葱葱；公路的两旁，房舍的周围是整齐划一的农田和果园；沙漠中点缀着一块块绿洲，……满目葱绿的色彩及丰收的景

象构成了一幅生动的画面，这使那些见惯了沙地黄色的游客耳目一新。以色列是非产油国家中发展最迅猛和最富足的国家，而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是以色列人在人口增加了6倍并不断与邻国打仗的情况下取得的，因而以色列被誉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奇迹”。为此付出艰辛劳动的本·古里安被称为“以色列国之父”。

令人沉闷伤心的沙漠能够变成片片绿洲，这是“人间巧手夺天工”的结果，这台戏的开场白是由本·古里安唱出的。以色列建国后，本·古里安继续建设基布兹公社。通过公社，公有制经济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这是当今世界上别具特色的农村组织形式。然而，最独特的还是水资源的开发。古里安等人克服技术难度很高的困难，以超人的毅力和果敢力排除政治上和宗教上的麻烦，出色地完成了北水南调的“水利总计划”。从加利利湖的西北角把水抽到360米，然后通过复杂的水渠、隧道、渡槽和直径为2.74米的混凝土管道，经过144.8公里的距离，把水送到了中部和南部地区。由于水的灌溉，大块沙漠出现了片片绿洲。这是巧夺天工的产物。巧干，加上苦干、实干，本·古里安率领以色列人珍惜和善用每一滴水，在干旱的沙漠中长出了棉花、柑桔、梨、柚、鲜花等高质量、高数量的作物。这真是“旧貌换新颜”。经济的发展为以色列的生存提供了条件，为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以色列以强国身份出现于世界增加了至关重要的一个砝码。而作为“以色列国之父”的本·古里安理应受到以色列人的敬慕和犹太民族的爱戴。

## 陈云“快刀”制止通货膨胀统一财经建立奇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面临着财政经济上的严重困难，其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和长期战争破坏的结果，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随着革命战争的迅速发展，军费开支浩大，以及党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国家财政支出日益增多；加上历史原因造成的各个解放区财政经济的下统一，给中央统一财政调度带来困难，使国家的大部分经费开支不得不靠发行钞票来解决。人民币的发行额，以1948年底为基数，到1949年11月约增加100倍，到1950年2月增加270倍。引起币值大跌，物价猛涨。为了制止通货膨胀，实现社会经济的稳定，党中央和毛泽东在指挥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全国进军的同时，成立了以陈云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专抓统一财政、平抑物价这件大事。

为了扭转建国初期财政经济极端困难的局面，奠定新中国经济管理体制的基础，把国民经济引上逐步恢复和发展的道路，以陈云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首先加强了对主融货币的管理，作为控制物价、稳定市场的根本手段。

早在1948年12月，党和政府为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和制止由于金银外币引起的物价波动，就在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中国人民银行券（简称“人民币”），作为华北、华东、西北三大解放区的流通货币。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全国各大城市都建立了人民银行，宣布限期兑换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使人民币占领市场。

鉴于人民币、黄金、银元、外币同时市场流动，投机商人乘机扰乱市场的实际情况，人民政府又于1949年4月至8月间，分别由华东、华中、华南地区颁布金银和外币管理办法，明令严禁金条、银元、外券在市场上自由流通，一律由中国人民银行挂牌收兑，宣布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但是，有些大中城市的投机商对政府法令置若罔闻，继续利用种种手段扰乱金融市场。在北京，投机商人公开摆摊设点买卖金银，招摇撞骗；在上海，银元外币投机猖獗，投机资本乘机捣乱，冲击市场，妄图搞垮国营经济，导致市场出现混乱和不安。

在中财委的指导下，中共上海市委果断作出决定，严厉打击银元投机。1949年6月5日，中共上海市委制定了禁止银元在市场上流通的具体办法。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银元投机，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同意上海、华东打击银元投机的办法，并指出，除采取政治手段外，还须陆续采取经济的步骤，要明令铁路交通及市政公用事业和税收，一律收人民币。按照中央指示精神，上海市即刻部署取缔金融投机。6月10日上午，上海市军管会奉命派出两营军队和400名便衣警察，分5路包围查封了金银、外币投机的大本营——上海证券交易大楼，当场抓获投机分子2100余人，其中对1800余名小的投机者教育后予以释放，而将200余名投机首要分子逮捕法办。届时，上海市人民政府向市民公布了金银、外币管理办法及外汇管理暂行条例，允许人民保存金银，禁止金银、外币在市场上计价流通。人民银行办理折实储蓄存款，以保证职工薪水的实际价值，使金银外币与物价脱节，保证了人民币的价值。

与此同时，在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对金银、外币投机活动，政府也进

行了严厉的取缔和打击。武汉查封了两家投机大钱庄，缉获银元投机分子 200 余人。广州取缔了从事金融投机的地下钱庄 87 家和金银外币兑换店 377 家。这次由中央部署，各大城市的统一行动，沉重地打击了投机商的不法活动，有效地制止了银元涨风而引起的物价波动，大大树立了人民币的地位和威信，从而很快扭转了港币、金银以及美钞长期统治市场的局面。

金融投机活动虽然在较短的时间内被基本制止了，市场也得到了初步稳定。然而，一些投机商转而囤积粮食、棉纱、棉布和煤炭，哄抬价格，牟取暴利。这时，国民党特务也公然叫嚣：只要控制了“两白”（米、棉）“一黑”（煤），就能置上海于死地。由于投机商的大肆活动，1949 年 10 月至 11 月，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物价大涨风，每天上涨 10—30%。到 11 月 25 日止，上海物价比 10 月上旬涨 2 倍以上。面对这种情况，党和政府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在“银元之战”后又领导了一场全国规模的“粮棉之战”。

毛泽东委托陈云在上海进行调查研究的于 1949 年 8 月在上海主持召开了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大区财经工作会议，陈云在会上指出，稳定物价的关键是看我们掌握市场主要物资的多少。粮食、纱布是市场的主要物资，他说：“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纱布。”会议确定了控制物价工作的重点是大城市，又首先是上海，因为它是资本家力量最雄厚的地方，又是投机倒把的老窝子。会议还确定了全力支持解放战争彻底胜利和维持新解放区首先是大城市人民生活的方针，以及统一财政经济、控制物价的措施和步骤。

于是，国家通过国营商业掌握了主要大城市的足够数量的粮食、棉纱的收购和调运。在上海，政府控制了一套完整的商业机构以及煤的 70%、食盐的 60%、纱的 30%、布的 50% 和粮食的 50% 及全部铁路，为战胜投机资本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在北京，1949 年 10 月新中国成立不久，人民政府就依法逮捕和法办了两大投机粮商，为稳定人心、控制市场起了重要的作用。

1949 年 11 月初，以陈云为首的中财委一面部署短期紧缩期货、暂停或推迟一切可以暂缓的开支；一面在全国范围内加紧调集粮食、棉纱等物资。11 月 13 日，中财委发出了《关于对全国物价猛涨应采取方针的指示》，并决定：东北自 11 月 15 日开始，每月运粮 1000 万斤至 1200 万斤入关，以应付京津需要；上海、汉口、西安等大城市，通过调运，准备足够的纱布等物资。指示发出后，仅 10 天左右，全国各城市物资调集等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于是从 25 日开始。全国各大城市统一行动，趁市场高价，大量抛售物资。26 日，物价明显下跌，10 天内降幅达 30% 到 40%，投机商人不得不把抢购、套购和囤积的商品吐出来，赔本出售。1950 年春节期间，上海等地的投机商企图按惯例哄抬物价，政府把继续调集来的粮食、棉纱等敞开供应，并紧缩银根，物价迅速下跌。投机资本家接连抢购三天，到第四天，已经力不从心，想把抢购的东西吐出来，但没有人要。投机冒险的资本家被彻底击败，从事投机冒险的私营粮店、钱庄，纷纷破产倒闭。

在平抑物价的同时，政府还发行了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健全和加强税收管理机制，并开展折实存款，回笼货币，从而进一步紧缩了通货，稳定了物价。

这次开展的全年规模的对投机资本的严厉打击，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对资产阶级斗争中取得的第一回合的胜利，得到了广大群众包括愿意从事合法

经营的资本家的广泛支持。仅在短短几个月内，党和政府就一举战胜了投机私商，平息了从1949年7月到1950年2月所出现的三次物价大波动，抵制了投机资本的冲击，克服了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延续十几年之久的通货膨胀的后遗症和物价飞涨的混乱局面。以1950年3月的批发物价指数为100，那么在12月为85，1951年12月为92.4，1952年12月为92.6。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就初步取得了稳定市场的主动权，把形势险恶的市场物价完全稳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稳定市场、控制物价是同全国财政经济实行统一管理结合进行的。从抗日战争开始到1949年，我解放区的财经工作一直是处于分散管理状态。各解放区自有货币，自管收支，中央只作统一政策领导。这种分散管理的办法，在解放区被分割的情况下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全国解放后，财经工作必须从基本上的分散管理前进到基本上的统一管理原则。否则，收支机关就会脱节，国家财政收支就不可能平衡，金融物价就会继续波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就难以正常进行。

早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已就如何恢复整顿经济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研究部署。会后决定，由陈云主管中央财经工作，并决定统一全国财政金融。1949年8月，陈云在上海主持华东等五大区财经部门领导干部参加的财经工作会议上即指出：“在财政上，一定时间内还有比较大的地方性，但地方如果都各自打算，分散使用力量，就不能应付日前这个局面。现在把所有后备力量统统集中也不可能，但主要的后备力量，必须有步骤地合理地统一使用。”至12月，陈云还多次强调了对财政经济实行统一管理的必要性。此后，国家先后对全国的税则、税目、税章，国营企业的生产计划，外汇使用的分配，内地贸易物资的调拨以及物价等，实行了全国性的统一管理。

1950年2月13日至25日，中财委根据党中央的方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财政经济会议，讨论全国财政收支、贸易、粮食、金融等各方面的情况，决定节约支出，整顿收入，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以实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物资供求平衡、现金出纳平衡和主融物价的稳定。陈云在会上指出，为了战胜暂时的财政困难，在落后贫困的经济基础上前进，必须尽可能地集中物力、财力，加以统一使用。搞财经工作的同志，必须提高自觉性，认识局部服从全体、目前服从长远的原则，树立整体思想，避免陷入局部观念和本位主义。会议作出了《关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标志着我国财政经济工作进入了由分散到基本集中统一的新时期。

1950年3月3日，政务院发布《关于统一国家财经工作的决定》，主要内容是：统一全国财政开支，使国家收入中的主要部分统归国库，集中地使用于国家的主要开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使国家所掌握的重要物资从分散状态集中起来，以利于调剂供求，控制市场价格和对投机资本作有效的斗争；统一全国的现金管理，把所有属于政府的但是分散在各个企业、机关、部队的现款，由国家银行统一管理，集中调度，以减少市场上的货币流通数量，增加国家的流动资金。与此同时，党中央也发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保证政务院决定的迅速全部实现，以便共同努力来克服国家财政上的困难。

与此同时，国家加强了征收公粮和税收工作，采取了紧缩编制、清理仓库、发行公债、整顿机构、节约开支等措施，使国家财政收入迅速增加，支

出相对减少，到 1950 年 4 月，全国财政收支出现了接近平衡的局面。

由于党和人民政府关于财政经济管理等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出台和实施，1950 年全国的财政经济状况迅速取得好转，市场物价趋于稳定。到 1950 年底，全年总收入超过原来概算的 31.7%；虽然由于抗美援朝战争和其他原因使总支出超过原概算的 9.3%，但财政赤字却由原来概算的 18.7% 减少为 4.4%，国家已不再需要依靠增发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此后，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连年好转。1951 年国家财政收支已基本平衡，并节余 106483 万元，占当年总收入的 8.2%；1952 年节余 72266 万元，占当年总收入的 4.4%，而这一切都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正激烈进行，军费开支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取得的。

打击投机资本、稳定市场物价和统一全国财经，是我国处于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取得的成就，是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在经济战线上的巨大胜利。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这一胜利，认为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实现全国财政经济的统一和稳定物价，从此结束了国民党统治时代人民饱受通货膨胀之苦的局面，为安定人民生活，恢复经济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力条件。正如陈云所说：“统一国家财经工作，将不仅有利于克服今天的财政困难，也将为今后不失时机地进行经济建设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建国初期陈云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的历史功绩和经验，将永载史册并启迪后人。

“民以食为天”。物价的稳定是社会秩序安定的基本条件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极其困难的财政经济状态，陈云以“快刀斩乱麻”的雷厉风行之手段，迅速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金融及物价，从而使人民政权巩固，社会生产和流通过程迅速纳入正常运转轨道，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以陈云为首的中财委之所以能取得这一其功“不下于淮海战役”的“战役”的胜利，关键就在于对金融和物资的投机倒把者的猛烈打击，对人民币价值的充分保证，并依靠政权的强力调集充分的物资，打击投机资本的冒险经营活动，这一切手段和措施都在于“快”，从而建立了人民币的信誉。稳定了物价以及国营企业的主导作用。而统一全国财政。更是保证物价稳定的重要基础，自古治史者均知，治乱当用“快刀利斧”，陈云取得这一“战役”的胜利，正是运用了“快刀利斧”的谋略及手段。



## 铁托破传统无畏惧 “自治”建家园结硕果

1892年5月的一天，约瑟夫·布罗兹·铁托作为克罗地亚一个农大的第七个孩子降于世间。这天，彗不贯日，龙不盘梁，天无祥云，地无紫气，一切都千平常，甚至大人们连孩子的生辰八字都没有记下来。幼年的铁托生活平淡无奇，到15岁时，他离家闯荡城市，想的是找一份好职业，穿上一身漂亮的衣服。他进入社会后，先是在工厂当学徒，并初步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后被征入奥匈帝国的军队，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曾成为俄国人的俘虏，目睹了伟大的十月革命。回国后，参加了南斯拉夫共产党。铁托47岁时，被认定为南共总书记。这位“如钢似铁”的人物不仅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谱写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也敢于冲破强权，成为最早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

1945年11月29日，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新成立的国家面临的是千疮百孔、一片废墟。战争使国民经济遭到破坏，农业设施被毁，交通运输陷于瘫痪，大片土地荒芜，许多工厂停产。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铁托领导南斯拉夫人民开始重建家园，发展经济。

南斯拉夫和其它人民民主国家一样，对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经验，故在实践中实行过南斯拉夫后来被称作“行政命令式的、国家集权式的”社会主义。首先是推行社会“改革”。1945年，南斯拉夫在农村实行了土地改革。在城市推行国有化，1946年12月，通过了第一个国有化法令。这时期，南斯拉夫的重点在经济建设。按照苏联的模式，南斯拉夫很快制定了五年计划。五年计划的宗旨，在于开发本国工业的潜力。这个计划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有极强的吸引力，因为它将带来新建工厂生产的商品。较高的生活水平、给工人以就业机会，从而形成一个工业无产阶级，以造就一批未来的共产党的精华。

在具体做法上，五年计划又被分解成年度计划、月计划、同计划、甚至日计划。中央为每个共和国、每个工厂、每个部门规定任务，工厂被告知生产什么产品，被告知销售价格和销往何处。可惜的是，计划虽然在理论上看来完美无缺、包罗万象，但在实践中得到的却是可怕的结局：计划人员忘掉了许多如针、别针、梳子一类的生活必需品，致使老百姓在国营商店买不到它们，黑市价格暴涨。对某些商品，诸如拖鞋等，需要则明显地估计过高，致使它们充斥商店，无人问津，而尤其使领导人作难的是，国家自己不能积累出计划中规定的重工业所需的主要资金。铁托等人意识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僵化的管理制度将越来越束缚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助长官僚主义，为此，铁托毫不犹豫地要打破传统，要寻找一条适合南斯拉夫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管理制度。这正好与历史赋予他的“如钢似铁”的性格相一致。

然而，南斯拉夫要走自己的路，又谈何容易？当时南斯拉夫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十分紧张。由于的里雅斯特的冲突，由于战后南斯拉夫明显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英国与南斯拉夫关系恶化，1946年，美国也不顾南斯拉夫的抗议，飞机侵入南斯拉夫领空几百架次，双方还火力相接，南美关系极为不妙。在这种状况下，铁托把求援的希望寄托于莫斯科。1946年，铁托去苏联与斯大林会晤若干次，就苏联对南斯拉夫经济援助问题，进行了马拉松式谈判。这期间，南苏关系暖暖寒寒，在微妙中发展着、变化着。

后来，经济援助谈判成功了，物资贷款数额确定了，苏联专家陆续进入

各个领域，贸易也在进行，联合股份公司的建立也有了进展。但另一个问题也出来了。南斯拉夫发现，在经济上，自己与苏联实际上处于不平等地位。为此，铁托抗争，南苏关系越来越紧张。在实行不同于苏联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时，南斯拉夫采取的不同于苏联的领导方式，就被指责为“溶化在人民阵线中”，“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南斯拉夫采取的不同于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农村政策，就被指责为“富农道路”；南斯拉夫党同苏联“分裂”，就被认为“在南斯拉夫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建设”，等等。总之，哪个国家如果不按苏联模式去做，敢越雷池半步，就不是社会主义，就要被革出教门。所以，南斯拉夫要打破传统，就必然要遭到打击和围攻。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之前，南苏之间就有无数积怨，怨中加怨就如雪上加霜。1948年，共产党情报局把南斯拉夫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南斯拉夫中断了与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关系，对外贸易骤然停业；大工厂停工待料，经济急剧恶化。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为了以事实证明南斯拉夫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就加快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步伐。1948年4月，颁布了第二个国有化法令。1949年1月，南共五届二中全会后，加快了农业集体化的步伐，但这些激进的措施招致了严重的后果，生产急剧下降。为此，南斯拉夫不得不依靠工人，动员人民的力量，以渡过难关。

于是，铁托等人又重新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时，不论是党的理论工作者，还是党和政府的高层领导人，他们的案头上都有这些著作。如何既保住党的领导权，又能给下层和地方以更大的民主权力，他们想从经典著作中找到答案。铁托和他的战友们为此绞尽了脑汁，奉献出了他们所有的聪明与才能，提出了五花八门的设想和见解，最后确定了一条适合南斯拉夫本国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即自治社会主义。

铁托等人认为，所谓“自治”就是“南斯拉夫为争取自己选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形式的权利和自由而进行的斗争”。“自治是一种社会关系体制，是南斯拉夫对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某些矛盾和选择的答案。在自治的生产关系中，劳动者有可能直接管理和决定自己的劳动资料、劳动条件和劳动成果。劳动者可以自觉地反对使自己成为国家的雇佣者，反对使自己成为任何垄断的雇佣劳动者、官僚机器的消极工具和车轮，或者只是成为由别人决定其工资的消费者而无权对自己的工资自觉地发生影响，或只能通过自发的不满才可能发生影响。”自治也是一种民主形式，它的目的和宗旨在于，劳动者自己以尽量民主的方式解决客观存在的以及社会发展中不断出现的矛盾。其全部的思想来源于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受到巴黎公社榜样的启示。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的解政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的论点为自治提供了基本思想。列宁也说过：“使真正的全体人民都学习管理国家，并且开始管理国家。”巴黎公社的经验，特别是革命导师关于要防止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不仅要注意资产阶级的复辟，而且要防止工人阶级内部的官僚主义；以及工人不仅有权选举而且有权罢免各级领导人的提法，都给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以启示。

南斯拉夫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在历史上长期分离。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如何既保证联邦国家的统一，又给各民族，各共和国以自主，协调它们之间的利益，改善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摆在南共面前一个大课题。实行自治制度给共和国和地方更多的权限，提倡各共和国之间协商，有助于解决上述矛盾，巩固各民族的团结和联邦共和国的统一。所以，南斯拉夫实

行自治应该是既符合经典理论又结合南斯拉夫的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

1950年6月26日南斯拉夫联邦议会通过了《关于劳动集体管理国营经济企业及其更高级的联合组织的法令》。法令规定：“劳动集体通过企业的工人委员会，以及联合几个经济单位的高级联合组织的工人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来管理这些企业。”这标志着南斯拉夫自治制度的正式开始。

南斯拉夫的自治制度在以后的28年中，经历了长期的、复杂的演变过程。

第一个时期：从1950—1963年。这一时期的特点是自治制度在工厂和企业内部发展，它针对的是简单再生产的问题。通常称之为“工人制治”。这一时期的头几年，工人的权限还比较小，国家机关和企业经理作为国家的代表和法律的执行者、保护者，在企业中仍起决定性的作用。1952年以后一段时间里，南联邦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法令，扩大了工人直接管理企业的权限，企业开始可以支配一部分扩大再生产的资金。1961年又实行经济改革，改变了企业的收入分配制度，让企业有更多的分配自己收入的权限。但这一改革也带来了一些混乱现象，主要表现为个人收入比例增加，积累率下降。于是，国家又采取了一些加强干预的措施。如在区、共和国和联邦成立“贯彻纯收入分配”委员会，审查企业的分配。

第二时期：从1963—1971年，1963年和1964年又进行经济改革，主要的一项是取消联邦、共和国和地方的投资基金，并把它转入银行，企业不再向联邦、共和国各区缴纳投资基金税，企业的积累由企业自行支配。1964年举行的南联盟八大确立了进一步扩大工人自治权利的方针。在这个时期，自治越出了工厂范围，国家机关、社会事业单位也实行自治，通称为“社会自治”。

第三时期：从1971年以后。1971年联邦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要求经济部门在工人自治的基础上按联合劳动原则进行改组。1974年5月通过南斯拉夫联邦新宪法和1976年11月通过的《联合劳动法》，对经济部门的组织形式、生产中的相互关系、生产部门与社会事业单位的关系都作了新的规定。1974年举行的南共联盟十大肯定了联合劳动的体制。通过联合劳动，自治原则贯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

在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建立的过程中，经济方面体制的实验主要有：变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为社会所有制；实行企业自治，使企业完全具有作为独立商品生产者所必须的一切权限；改变了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废除了指令性计划，实行社会计划制度，依靠经济手段，利用市场经济；实行劳动者自行决定成果的分配原则；废除外贸、外汇的“国家垄断制”，实行外贸、外汇的自由。从这些措施看，南斯拉夫顶住了苏联的压力，打破了传统，成功地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于僵化体制的社会主义道路。

南斯拉夫的改革和自治体制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其经济的发展。据南斯拉夫联邦统计局1981年出版的《南斯拉夫自治发展三十年》中的材料，从1950—1980年整个社会产值增加了5倍，按人口平均增加了3倍，平均每年增长率为6.3%。工业生产平均年增长率为8.6%，30年中增加了11倍，工人由56万增加到216.2万人。农业的发展比工业缓慢，平均每年增长3.8%，而且自60年代以来，在农村中办起的农工联合企业规模大，机械化程度高，成为南斯拉夫农业的支柱和改造个体农业经济的主要形式和途径。这表明，

南斯拉夫的经济自治制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国有化和私有财产，强大的中央权力和地方分权，工人管理和国家控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合为一体，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而当结果不能令人满意时，铁托便体现出一种灵活性或及时掉转方向，或调整各种成分的比例，而不为预先想出的教条般的概念所束缚，铁托一直忠实地执行莫斯科的指令，但当他发现斯大林的某些做法是在损害南斯拉夫革命的利益，并认定真理在握时，他就毫不犹豫地、毫不犹豫地向斯大林的权威宣战，对传统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

铁托就是这样，为了南斯拉夫美好的家园，艰苦奋斗了一生，谱写了一首有声有色、惊心动魄的诗篇，为社会主义国家坚持独立自主的建设原则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南斯拉夫在没有经验和学不学苏联是衡量搞不搞社会主义标志的历史条件下，几乎都照搬了苏联高度集权的经济模式。这种模式的弊端暴露日多，铁托领导南斯拉夫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顶住了苏联的干扰，逐渐形成了一套以社会主义自治为中心的建设和改革的理论。其中心思想就是，要在建设和改革中发挥广大劳动群众主人翁的作用。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社会主义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依靠千百万群众的主动精神才能得到发展。这是真理，铁托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工厂属于工人，土地属于农民、这不是一句抽象的宣传口号”，推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就是不断地发展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扩大人民群众的自治权利。虽然有人将目光盯在自治制度带来的不利方面，但它在经济方面的作用却无法抹杀。为此，身为国家元首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以上的铁托在南斯拉夫建立了极高的威信，显示出其非凡的领导艺术并为世人瞩目。

## “欧洲之父”联煤钢 西欧经济共市场

西欧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政治概念。地理上的西欧很狭窄，仅包括欧洲西部。政治上的西欧包括除苏联和东欧以外的欧洲国家。几个世纪以来，西欧一直是世界的政治、经济中心，其地位举足轻重。然而，西欧是分散的。敌视的，战争屡屡发生，实力不断消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西欧已是一片废墟。甚至为了生存，不得不乞援于美国。昔日的世界强国如今已降为二、三流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政治家惊呼，欧洲必须统一。方能生存。于是一场以莫内、舒曼等人为代表的寻求欧洲统一的运动在西欧展开。

西欧国家曾经是一些著名的殖民帝国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殖民体系纷纷瓦解、崩溃。国际力量格局的巨大变化，西欧的地位明显下降。由于两个超级大国的出现，西欧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相形见绌了。英法等国虽胜犹败，战争创伤太深；德意等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整个西欧一片衰败景象。为了生存，经济需要恢复，西欧需要联合，否则它就无法在世界上立足、发展，而只能成为美苏争斗的小卒。

自进入 20 世纪以来，西欧战争连绵，两次世界大战均震动了欧洲。人民已经厌恶战争，愤恨战争。因此，要建设，要发展，要繁荣，要使欧洲在世界占据一定的地位，恢复昔日的辉煌，战争决不是可取的手段，它只能使欧洲更弱。历史已经证明：欧洲人只有相互联合、合作，才是复兴的唯一出路。

二战结束后，美苏形成对峙。“冷战”使世界的局势又骤然加紧。苏联势力的西伸，军事、政治、经济实力的渗透，对西欧是个威胁，因而它们逐渐靠拢而倾向于美国。另一方面，美国要与苏联较量，西欧的战略地位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既要控制西欧，又要控制苏联，手无缚鸡之力、一盘散沙的西欧对美不利。美国需要西欧联合，建立起强大的对抗社会主义力量的阵营。

于是，为了生存与发展，西欧国家普遍认识到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复兴和壮大自身。1946 年 9 月 19 日，邱吉尔在苏黎世作了一次反响极大的讲演：“如果所有欧洲国家能联合起来，它们的三四亿居民就会通过一个共同遗产带来的成果而获得任何界限、任何边境都无法限制的繁荣昌盛、灿烂光辉和幸福的生活。……为把这项紧急任务完成好，法国与德国应当和解；英国、不列颠各族人民的大家庭、强大的美国，而且我诚恳地希望还有苏联都应成为朋友和新欧洲的保护者，应该捍卫自己生活和繁荣的权利。”邱吉尔呼吁法德和解是因为他认为法德和解应是一个欧洲组织的基石，法国舆论却认为这种和解还为时过早。但传播欧洲统一的思想并为这种思想努力活动的各个欧洲运动应运而生。

欧洲那么多国家，怎么联合？哪些国家联合？采用什么形式联合？用什么政策、原则、法律联合？这些都是未知数，都是需要探索，需要百倍的艰辛努力的。一些联邦主义者主张建立欧洲联邦，即是把欧洲不同国家编入一个有坚固结构的组织，并有一个拥有真正权力的欧洲政府；有些人则主张建立联盟，即是各主权国之间的一种合作或一种联合。这时的欧洲各国都在专心致力于重建的艰巨任务，对于一个可能产生的欧洲联合，它们所抱的态度并不一致。

英国在大战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享有崇高的“威望”。他们坚信：英国仍是世界第三大国。邱吉尔主张建立“欧洲台众国”，他把欧洲联

合称为拯救欧洲的“特效药”。他提出的英国“三环外交”总方针中的一环就是“联合起来的欧洲”。邱吉尔的如意算盘是以第一环——英联邦和英帝国作为力量的基础，利用第二环英美特殊关系，使英国充当西欧的盟主。1945年8月上台的艾德礼的工党政府则认为维护同美国的联系要比加强欧洲大陆内部的团结一致更为重要，解决安全、平衡和德国复兴的问题的办法应该是让美国人控制德国人，这要比那假设的欧洲联合有效得多。不论怎样，英国表现出的是一种对欧洲大陆的优越感，它总是把自己摆在西欧盟主的位置。

西欧大陆国家的立场与英不尽相同，一些受过德国蹂躏的小国支持一项一体化事业。但他们又害怕大国的统治，因而不愿同英国分道扬镳。法国的处境特别微妙。它像英国一样要维持它的世界大国的地位。1947年，法总理皮杜尔已提到“组织自由欧洲”的必要性，即是在所有苏联控制之外的国家建立起联系的必要性。1948年3月，在国民议会上。他声明：“尽快地并完善地把所剩的欧洲组织起来的时刻已经来临。”皮杜尔还说：“法国首先是个欧洲国家。我们目前的使命就是要使法国成为欧洲联合的先锋。”这已表明，已经恢复起来的法国企图成为欧洲的带头人。他们虽然得到美国的援助，但他们并不甘心做美国的小“伙伴”。他们感到。欧洲经合组织（OECD）、欧洲委员会等组织只是美国人手中的一个工具，因此，他们不认为这是有效的联合手段、他们要搞自己的联合。

法国首先寻求同英国的合作。但英国表示，英国是一个战胜国，在全世界都负有重任，他们并不准备同欧洲建立什么特殊关系，也不愿意同法国建立可能导致法英密切结盟的那种经济关系。因而，法国只好转向法德和解。而且，法国必须立刻采取行动，提出有效的建议，迅速而果断地解决某些现实问题。法国对外政策的负责人，特别是外交部长罗贝尔·舒曼和对对外政策十分关心并已掌管达4年之久的总理乔治·皮杜尔，都更加感到必须有所作为。

罗贝尔·舒曼长期生活在法国和德国边界地区，他一直渴望彻底结束法国与德国两国的争斗，设想着在一个统一的欧洲范围内实现法国与德国和解，1948年7月27日，舒曼出任外交部长后，他意识到，开创新路正是自己的使命所在。1949年9月后，他特别感到了法德和解的重要。1950年1月，舒曼夫波恩访问。由于萨尔问题的出现导致德法关系紧张，因此，舒曼在波恩感到气氛平淡。当他返回巴黎时，据说还听到阿登纳宣称：“欧洲统一的想法在德国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对于舒曼这位以两国人民言归为好作为自己政治生涯的最高目标的非常敏感的人物来说，这已是困惑不安的开始。他经常询问他周围的一些人：“我们如何处置德国？如何创造一种稳定的欧洲环境呢？”

1950年3月26日，舒曼在人民共和运动的中央委员上明确指出，他将首先谋求实现一个欧洲共同体和解法德关系。在舒曼看来，这两个问题是密切相连的，然而，把法德和解置于什么样的欧洲环境中呢？舒曼对于他要求外交部各部门提出的各项建议并不满意，于是他决定采纳让·莫内的计划。

让·莫内自1946年以来担任现代化和设备计划总专员。他制定了战后重建法国的现代化计划，即“莫内计划”。由于他崇高的威望和极大的影响，他的地位比一个部长还要重要得多。

1950年初，法国的计划正在实施中，莫内却比其他人看得更远。他认为，如果欧洲经济得不到繁荣，法国经济就不可能获得协调发展。因此要设法把

欧洲经济组织起来。根据他的行动哲学，他认为有必要采取一项主动行动，提出大胆的倡议，使问题有所改观。办法就是把欧洲组织起来，欧洲人只有共同努力、结为一体，才能有自己的尊严、独立和进步。实现欧洲统一的方法就是寻求共同的根本利益，伙伴之间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同体。

作为 1940 年法英联盟的倡导者，让·莫内首先想到的是建立一个以法英两国为基础的经济上联合的欧洲。1949 年，他和法国计划处处长进行了秘密会议，谈判毫无结果，因为英国对于制定法英共同计划不感兴趣，而只是想发展贸易。于是莫内转向了一个以法国、联邦德国为基础的欧洲。而这时的德国已表现出联合的倾向。1950 年 3 月，西德总理阿登纳就曾建议德法两国全面联合，即合并两国的经济，合并两国的议会，合并两个民族。阿登纳还提出一种设想，“如果有那么一天，法国人和德国人能毫无争论地走进同一座大厦，坐到同一张桌前，一起工作共同负责，那么，事情就会向前迈进一步。”阿登纳的想法是只有目的，无具体方法。

德国与法国是世仇，莫内、舒曼提出法德和解是欧洲统一的关键，这已表明他们比一般的法国人有更卓越的智慧 and 更高的眼界。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对法德和解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莫内提出，首先应该从解决某个具体矛盾出发。一个矛盾解决好，便可为解决另外一些矛盾打下基础，为全面解决德法问题创造条件。因此，德法联合将是渐进的，而且渐进的成败将取决于第一步所产生的原动力。而这第一步，则应该从阻力最大、矛盾最多的地方做起。这样做的结果是淡化分歧，寻求共同点，以达到联合与统一。因此，莫内选择了德法双方共同关心的煤钢入手。因为那个时候还不是十分看重原子弹，更重要是看中钢铁。谁的钢铁多，就是大炮多、坦克多，谁的军事力量就强。而煤炭在当时被认为是“工业的食粮”，仍然是最主要的能源。

煤钢共同市场不是完全的自由市场。莫内从他制定法国现代化计划的经验出发，极力主张某种形式的统制经济。共同的部门要由一个保证竞争自由进行、防止卡特尔出现、消除歧视性措施、保证消费者对生产享受平等权利、指导投资的机构来管理。因此，要想把一个法国与西德之间共同的煤钢市场向其它国家开放，就只能建立起欧洲的机构，要想行之有效，这些机构就不能是政府间性质的，而是超国家性质的。当然，把基础工业，尤其是煤炭和钢铁工业组织起来的思想并不新鲜，但都是通过建立政府间机构来实施的。莫内很少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各种不同的建议的影响，他总是比其他的入走得更远，他考虑的是一个拥有实权的独立机构。他还认为，共同市场不可能永远局限于两种基础产品，人们应该将其逐渐扩大到工业、商业和农业领域。一个负责管理煤钢共同市场的超国家机构的建立已经勾画出一个联邦政府的轮廓，这将是欧洲经济统一进程的最初阶段。这些就是莫内设想的欧洲统一的计划方案。1950 年 4 月，莫内和他的助手们秘密地拟定了这项计划。

舒曼对此反应非常积极。在他看来，莫内所拟的计划值得称赞，它为他深切关注的若干问题提供了一个同时解决的办法，这些问题是：法德和解，为和平而控制煤炭和钢铁，走向欧洲一体化并建设一个欧洲联邦体系。这是一项大胆的倡议，它具有重要的心理作用，有可能缓解和法国与联邦德国两国乃至国际的紧张局势。它可以使法国重新掌握外交主动，提出新建议，发挥想象力。因此，舒曼迅速决定采纳此建议，他说：“我把这看成是我本人的事。”他勇敢地负起了计划的政治责任。几天之内，他谨慎而巧妙地行事，成功地促使法国政府采纳了这项计划。

当舒曼得到政府的原则同意后，他和莫内就认为应该马上大刀阔斧地行动起来，首先不要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谈判，而是先要将计划向公众宣布，以便震动和争取舆论，从而促使各国政府达成一致意见。舒曼和莫内开始采取行动了。

1950年5月9日晚上6时，一次破例的记者招待会在法国外文部大厅举行。法国外长罗贝尔·舒曼以低沉而平淡的语调向记者们宣读了一份真正具有爆炸性的文件，他的情绪略微有些激动，他的声音略带沙哑：“问题不在于说废话，而在于采取一项大胆的行动，一项建设性的行动。……法国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和平。为了使和平真正能来临，首先要有一个欧洲存在。德国无条件投降已将近5年，法国完成了欧洲建设的第一个决定性的行动，并使联邦德国加入进来。欧洲的形势将因此而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一变化将使其它迄今不可能采取的共同行动成为可能的。一个牢固统一、坚不可摧的欧洲将由此诞生。在这个欧洲，由于生产联合，市场扩大，物价下降，生活水平将会提高，鲁尔、萨尔和法国盆地将同心协力地作出努力。”舒曼的这个建议后被称为“舒曼计划”，它犹如一枚“炸弹”，在整个舆论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震撼着各国政府和驻外使馆。

对于舒曼计划，美国几乎是全面赞成，对于它来说，利远远大于弊：一个强大的欧洲对于更好地维护西方阵营的安全是必不可少的。法国舆论对舒曼计划反响很大，态度一般比较积极，法国采取主动行动这一事件本身受到了欢迎。在联邦德国，法国的建议产生了晴天霹雳的效果，阿登纳总理热烈欢迎“法国对联邦德国作出的宽容姿态”。但是很大的一部分联邦德国的舆论持反对或保留态度。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比任何国家都更慎重，他们赞赏舒曼计划的观点，但又提出不少保留意见。计划在意大利受到热烈欢迎，因为舒曼计划确实可以带来政治实惠，使意大利有可能重新获得和它以前的战胜国一样的待遇。英国却表示不合作，不愿参加联盟，英国的这一决定使得欧洲共同体将局限于六个国家，法国将在其中发挥首要作用，1950年6月3日，巴黎、罗马、布鲁塞尔、海牙和卢森堡同时发表了一项公报：“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政府为促进和平、欧洲团结、经济和社会进步而继续采取一项共同行动，以实现共同管理煤钢生产并建立一个新的由法国、联邦德国、比利时、意大利、卢森堡、荷兰和未来的参加国共同决策的高级机构为近期目标。”

谈判在巴黎进行，基本上是在莫内的领导之下。他以坚定的毅力和果断的处事能力使得六国于1951年4月18日正式签订条约成立“欧洲煤钢联营”，其内容与舒曼计划相同。舒曼计划体现了欧洲建设的一个最重要的阶段：它标志着作为一切西欧联合的先决条件，即法德和解的开始，并建立了欧洲第一个超国家机构——“欧洲煤钢联营”集团。它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西欧联合确定了决定性的方针。舒曼计划还使法国获得了主动，取代了迟疑不决的英国而成为欧洲的带头人。同时，煤钢联营促进了法国与西德和解，也促进了六国经济的发展。

在煤钢联营取得成绩的情况下，荷、比、卢三国于1955年5月联合提出一份备忘录，要求六国实行电力、原子能、运输等部门的一体化，并成立关税同盟。6月，六国外长讨论。筹备委员会经过两年的努力才达成妥协。1957年3月25日，六国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签署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联营条约》，统称为罗马条约（1958年1月1



日正式生效)。罗马条约设立了一系列组织机构，含部长理事会、执行委员会、议会和法院，以保证既定目标的实现。1967年，欧洲煤钢联营、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联营三个组织的机构完全合并，统称力欧洲经济共同体，又称西欧共同市场。1993年1月1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欧洲经济共同体演变为欧洲联盟。

欧洲经济共同体经过20余年的发展，成员国由6国发展到15国，1961年8月，英国正式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1973年，英国、爱尔兰、丹麦三国加入；1981年1月1日，希腊成为第10个成员国，1986年1月，西班牙、葡萄牙加入；1995年1月1日，奥地利、瑞典和芬兰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20余年的发展，欧洲经济实现了一体化，共同的农业政策、关税同盟、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及资本、商品、人员、劳务的自由流通等。而且，经济一体化推动了政治一体化，西欧国家形成了共同的外交政策、共同的防卫政策、共同的社会政策等方面。

到1995年1月1日，欧洲联盟已有人口3.7亿，比美国多40%，是日本的3倍。面积323.5万平方公里。国民生产总值6.4亿美元，比美国高10%，比日本高64%。欧洲已成为世界不可缺少的一极，其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从煤钢联营到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立，再到欧洲联盟的正式运转，风风雨雨几十年。尽管道路坎坷、步履维艰，但总算发展下来，沿着矛盾——妥协——前进的路子发展下来了。在人们对欧洲联盟的历史与现状津津乐道的时候，在欧洲联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时候，在欧洲联盟在国际事务发挥重大作用的时候，在各地地区效法欧盟纷纷建立区域性组织的时候，人们没有忘记罗贝尔·舒曼、让·莫内这两个人。他们顺应时代的潮流，顺应西欧联合的趋势，为欧洲统一奉献了个人的全部聪明与才智。尤其是在法德和解问题上，他们表现出宽广的胸怀和非凡的气魄，为了法国的繁荣，为了欧洲的繁荣，他们采取了“求同存异”的方法。莫内找到了德法两国共同关心的问题，即煤与钢的争夺问题。这是欧洲问题的实质和欧洲统一的关键。经过莫内、舒曼的努力，煤钢联营终于成功。就这样，莫内巧用煤钢，在各国维护国家主权的城堡上打开了一个有限的、但又是深深的缺口；找到了一种讲求实效和富于进取精神的创造手段，是欧洲联合的一次部分质变和一次质的飞跃，为欧洲联盟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欧洲经济共同体创始人的莫内与舒曼，为此赢得了欧洲人民的崇敬，在西欧国家享有很高声誉，被共同体各国誉为“欧洲之父”。

## 历尽坎坷艰苦奋斗 王永庆创台塑伟业

王永庆于 1917 年出生在台湾北部的一个小乡村里，少年时生活颇为艰辛，上学时，竟穷得连一双鞋都穿不起，只是勉强读完了小学。幼小的他经受了一般人无法想象的艰难与困苦，也磨炼了他勤学上进、坚韧不拔的意志。困苦使他决心走出家乡，闯荡天下。现在，王永庆已是台湾最大的工业集团——台塑关系企业的董事长。他是“台塑”的创始人，被海内外誉为“台湾企业家精神的代表者”、世界塑胶大王。他领导的“台塑”企业是“亚洲四小龙”六大企业集团之一，资产规模近 40 亿美元，拥有员 14 万人，股东 10 万。王永庆的经营谋略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被视为台湾经济界的神话人物，人们将他与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相比，称他为台湾的“经营之神”。那么，王永庆是如何成为“经营之神”的呢？

“穷则思变”，少年时代的艰辛使王永庆在 15 岁时就到嘉义一家米铺去当打杂的小工。一年之后，他父亲四出向亲友告贷，凑台了几百块钱，让王永庆自己办了一家米店，从此开始了商业道路上的艰难跋涉。

进入 50 年代，台湾急需发展纺织、水泥、塑胶等工业，但从当时世界市场来看，在台湾生产塑胶，根本无法与日本的产品竞争，只有死路一条，所以即使是当时在化学工业方面有良好基础的企业家何义也都不敢在塑胶生产上投资。可是，那时还只是普通商人的王永庆，却作出了大胆的决定。投资塑胶业。

王永庆的看法与众不同，他认识到，烧碱生产遍布台湾全岛各地，制造塑胶粉的氯气资源非常丰富，而且塑胶市场也是未来行业发展的方向。虽然有位化学家讽刺王永庆根本不懂塑胶为何物，竟想要办工厂，断定只会赔本，王永庆同围的人，也觉得王永庆是昏了头，异想干开。但这些不仅没有瓦解王永庆的信心，反而更增添了他的决心。

1954 年，王永庆与人合作，筹借了 50 万美元，创建了台湾第一家塑胶公司——台湾塑胶工业公司，三年以后，“台塑”公司建成投产。开始生产 PVC（聚乙烯化合物）。成为企业王国的开端。当时，台湾正接受美国援助，积极从事经济发展，而塑胶的原料——聚脂几乎全仰赖进口。PVC 应该很有市场。可是，当时的人对 PVC 到底是什么，一点概念都没有。所以尽管“台塑”生产 PVC 的首期月产量就达 100 吨，台湾本地却只能销 20 吨。产品堆在仓库中，就像沉重的巨石，压在王永庆的心中，大多数股东看到台塑公司前景不好，便纷纷要求退股。王永庆眼看被逼上了绝路。

王永庆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供过于求，产量太多，而市场却不需要，企业的经营甚力艰难，但王永庆并不畏惧，反而扩大事业。按一般人的认识，在市场没有销路的情况下，毫无疑问，“台塑”必须大大压缩产量，或者改变品种，才有可能扭转乾坤，但王永庆的对策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大幅度地增加自己的产量，来压低成本和售价，以吸引更多的海内外客户，从而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于是，他决心冒一次人生中最大的风险，他变卖了自己所有的产业，再一次挺而走险，购下台塑公司所有的产权，独自经营。然而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市场上日产的塑胶粉已有很多，且价格优质量好，眼看着自己的产品在仓库越积越多，王永庆心急如焚。

台湾塑胶的市场到底在哪里呢？王永庆动过远销海外的念头，但站在一望无际的海岸上，他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台湾是个孤岛。远程运输的费用

高昂，企业根本无力承担，这是不可能的。王永庆的思路又回到台湾上来，经过对台湾各地的多方考察，他发现台湾的塑胶加工业刚刚起步，生产规模非常有限，那么何不自己发展加工业呢？假如建一个同样规模的塑胶加工厂，市场的问题便迎刃而解。

王永庆心中跳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创造一个新市场！即：我就是市场！这犹如一盘死棋，只有挪动一个子，全盘皆活。千万不要小看王永庆的这一闪念，如果是个蒸蒸日上的企业，这个念头将是锦上添花，而王永庆面对的却是背水一战，“台塑”已经困难重重，濒于停产，这时候再投巨资建新厂是需要相当胆略和勇气的，尽管从理论上看来是条成功之道。王永庆决心已定，便毫不犹豫，果断再投巨资，筹建新厂。于是，王永庆独立设立了南亚塑胶公司，从事塑胶加工，企图扩大PVC的需求量。当时王永庆的心情正如他回忆的那样，“犹如骑在虎背上，骑虎难下。”但不久随着台湾的经济发展，塑胶的生产和加工皆渐上轨道。他利用“台塑”的产品再由“南亚”制造各类塑胶成品，同时投入70万美元更新“台塑”设备扩大产量，降低成本。这一举措惊得商界同仁目瞪口呆，筹款自然困难重重，但王永庆不屈不挠，终于找到了支持者，新厂顺利上马投产。不久，“台塑”的经营效益便显示出来，两厂互补式生产，互为市场，迅速占据了台湾的塑胶市场，任何企业也无法与之抗衡，利润滚滚而来。

王永庆为自己创造的这个市场一举扭转了全局，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应该继续拓展的经营思想，是整个企业发展的生命线，应该沿着它继续走下去。于是王永庆开始了更全面广泛的市场调查。为台塑集团寻找下一个发展良机。不久，王永庆发现木材与塑胶业相结合将有极广阔的发展前景，他决定抢先占领这个未开发的市场。1962年他以从事木材业所获得的经验而创设了“新茂木业有限公司”，成功地扩大国内市场并对美出口。

王永庆以轻工业品为主体，在台湾树立了塑胶和木材业的地位，接着在60、70年代又出口纺织品。南亚塑胶在当时完全是生产PVC塑胶粉，但正好碰上世界苦于棉花进口成本过高，于是为使原料自给，“南亚”开始生产人造丝。人造丝所需的原料木片，可从木材加工的过程中大量取得。以往这些木片皆被废弃。王永庆则根据自己从事合板业所获得经验，利用废材生产人造丝，1964年，“台湾化学纤维有限公司”成立，开始生产人造丝，其后纺织部门也顺利地成长，1968年与日本旭化成合资成立台旭纺织工业，专门从事压克力纤维。当上游事业稳固以后，又设立台丽成衣工业，向成衣部门发展，接着创设台北染整工业，充实染整工程，逐渐向中下游事业扩展。

现在，台塑企业集团生产人造丝、聚脂纤维、尼龙、压克力等四大纤维品，且向最终产品——成衣方面发展，成为充实纺织部门的基础。这种发展模式就如同从生产塑胶扩展到加工部门一样，是为了扩大需求而成立相关事业。在纺织方面，王永庆选择沿海地区设立染色工厂，以降低捆包和运输成本，并且节省能源。塑胶部门则在公司内部设立工程、机械等小部门，以降低成本。有关细部工程则由自己员工动手做，以追求效率。今日南亚塑胶、台湾塑胶两公司的机械部门若各自独立的话，其规模可能成为台湾机械厂商的龙头。机械部门组织的充实对塑胶产业的发展确有极大的贡献，自80年代起，台塑企业集团亦向海运部门发展。利用自己的船只送运原料和成品。彻底追求自动化、加强品质管理等均是该公司追求效率的有效方法之一。

70年代台湾积极发展石化工业、台塑企业集团亦乘此良机扩充石化工厂

的设备，使 pVC 年产量在 1976 年达到 15 万吨。但 70 年代因发生两次石油危机，几乎使“台塑”制造塑胶粉的基础原料供应中断，王永庆决定在海外设厂，确保基础原料的供应，将企业的内部市场扩大到海外。1978 年王永庆有意买下美国路易斯安纳州巴顿路兹的一家化学公司，但被英国的 ICI 公司捷足先登，以致收买不成。不过王永庆对前往美国发展的意志甚坚，1980 年与美国华人合作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从美国调度了 1.1 亿美元，从台湾调度了 7400 万美元，在德州设立了 VCM 工厂。工厂开工后，正值英国 ICI 公司在巴顿路兹化学公司营运失败，宣告撤退，于是，“台塑”买下该公司与工厂设备，开始在德州和路易斯安纳州两个据点生产 VCM。此时，又收购了史坦福化学公司的达拉亚 PVC 工厂，从此，拥有 VCM、PVC 生产能力各 24 万吨的德州工厂遂在 1983 年开工。此外，在 1983 年又以合并方式买下琼斯·曼比尔公司塑胶部门，取得 8 个工厂及加州的办公室。在达拉亚工厂生产出的 PVC 均提供给上述工厂使用。南亚塑胶则掌握这些工厂。到 1983 年为止，台塑集团在美国投资额已达 2 亿美元，PVC 生产能力达 48 万吨，占领了美国塑胶业的一席之地。

今天，台塑公司已成为一个庞大的集团企业，下辖台湾塑胶公司、南亚塑胶公司。台湾化学纤维公司、育志工业公司。朝阳木材公司。新茂木业公司等，在美国还经营着几家大公司，总资本额在 1981 年就达 181 亿元新台币，比初创时增长 3600 多倍；总营业额 1229 亿元新台币，约合 30.7 亿美元，占“台湾国民生产总值”的 5.5%，在民营企业中乃首屈一指。

在现代商战中，把握全局的战略思想是非常重要的。著名兵书《孙子兵法》上说：“智不足，将兵，自恃也。勇不足，将兵，自广也。不知道，数战不足，将兵，幸也。夫安万乘国，广万乘全，全万乘之民命者，唯知道，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心，外知敌情，阵则知八阵之经，见胜而战，弗见而净，此王者之将也。”在《孙子兵法》中，就提出了战场上布阵有要诀，而且把布阵作为将帅的必备条件而提出。“台塑”集团的王永庆用他迅速崛起的事实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最好借鉴。任何一个企业，当单独置身于市场经济的大潮时，所面对的竞争都是全方位的，常常是风浪四起，应对无暇，可一个互补式企业群体便能彻底改变这个局面，把竞争的压力分担在群体之上，使企业获得充分的发展机会，减少风险，互为基础互力市场，并将企业盈利增值到最大限度。人们常说，牵一发而动全局，此话是很有道理的，成功的企业家，正是悟出了这个道理的关键之所在，才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崭新的局面。王永庆创造了“台塑”，创造了“市场”，也创造了全新的人生。

## 经商奇才力挽狂澜 西方公司走向世界

这是一位皮肤黝黑、体格健壮的人，看上去就像一位曾保持不败记录的、退休的中量级拳击冠军，他的名字叫阿德曼·哈默。哈默出生于1898年5月21日，来自纽约曼哈顿区东南部的一个药店。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他就已经是一位百万富翁，担任一家拥有数百万美元资产的制药公司的总裁。在以后的岁月中，他去过苏联、利比亚、秘鲁、委内瑞拉和中国等国，他影响过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的经济，他与宾夕法尼亚州、西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的煤矿有联系。就在他准备从商界隐退的时候，命运又将他与西方石油公司连结起来。

1955年，57岁的阿德曼·哈默在商界奔波已有40年了。一帆风顺且大有名气的他就在此时遇到了较多的麻烦，除了应付天文数字一样的所得税外，他还纠缠于两件棘手的诉讼案：一是他儿子朱利安在洛杉矶被控参与一起杀人案；另一是他的第二位妻子安吉拉在纽约起诉要求同哈默离婚。面对严酷的现实，哈默听从了自己律师的劝告，以有利于安吉拉的宽厚条件办理了离婚手续。哈默在儿子的案件中也获得胜诉，使自己的儿子恢复了自由。作为一种补偿，哈默赢得了他的第三位夫人——弗朗西丝·托尔曼。

经过此番折腾，一向精力充沛、毅力坚定的他感到有些精疲力尽，体力耗竭，他打算休息了。

1956年1月，哈默同弗朗西丝结婚。他们离开东海岸来到景色迷人的加利福尼亚州，度过了蜜月，过上了退休人士所期望的那种生活。无处可去，无约可赴，无信可阅，无电话可接，这一切又使得哈默很快感到无所事事，一种可怕的压抑的情绪向他袭来，他渐渐地变得烦躁不安，精神沮丧。就在此时，一向待他不薄的命运又给了哈默一个机会。一个让哈默翻开新的一页生活的机会。那是在一个鸡尾酒会上，哈默遇到了一位颇有点盛名的会计师，这位会计师给他唱了一首减免税收的动人曲子。

“怎么不搞搞石油，避开一下？”投机石油事业，这是会计师给他寻找的逃避纳税的庇护场所。会计师继续解释，石油钻探的投资可以减少纯税。所有投入勘探而尚未出油的资金，可与税金相抵消。如果一个油井钻出油了，投资者最好又寻求另一次的税务庇护，这种作法，行动要快。

会计师的主意听起来倒好，可是哈默对此一窍不通。会计师给他介绍的理想投资对象却又是如此的失败。那是一家小公司，名字叫西方石油公司，设在加利福尼亚州。自本世纪20年代初创立以来，一直步履艰难，一直在为出路而抗争。该公司可观的60万股票当时正在洛杉矶证券交易所以每股18美分出让，其实，每份股票值不了18美分。连同存放在银行的14万现款，该公司的资产总值不过7.8万美元，且财政收支出现赤字。全部的财源收入只5万多一点。而开销却达9.3万美元，公司的总值实际上只有3.4万美元。这样一个破落、失败、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公司，又有谁愿意拿自己的钱去作赌注呢？

1956年，哈默正在计划用游泳、晒日光浴、分赠珍藏品等活动来消磨自己余年，或许是会计师的曲子点拨了他，或许是石油对他产生了诱惑力，或许是由于税收太重使他损失钱财这件事促使他对石油业产生了兴趣，他携带夫人再度出山了。经过他和西方石油公司的人讨价还价之后，哈默夫妇同意各入借给西方石油公司5万美元，让该公司钻出两口油井。如能出油，则双

方各得 50%，如果不出油，则哈默夫妇可以作为亏损从应缴税款中扣去这笔数字。哈默走这一步非常稳妥，一方面因为他对投机石油事业毫无经验，另一方面因为西方石油公司还处在逆境中，哈默要通过实践来分析研究西方石油公司可能发展的前景。这是 40 年经商生涯经验的积累和总结。

结果让哈默夫妇欣喜若狂，两口油井都出油了，有一口油井平均每天产油约 250 桶。这黑金横流，这滚滚而来的石油着实让哈默夫妇激动了好一阵子，他们甚至萌生了这样的念头：买一辆卧铺汽车，驱车到油田去，陪伴钻机、水泵，在荒原小住。成功的甜蜜让哈默夫妇把更多的现款投放到石油公司，用来购买并修整废弃的阿姆伯油田。1956 年 11 月，哈默又一次与西方石油公司合资，购买了多明各斯油田。此时的哈默仍未放弃对西方石油公司失败的研究和考察。但他已和石油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搞石油，更令人振奋，更饶有兴味，也更为错综复杂，更富冒险性，经济效益也更大。

自那以后，西方石油公司渐渐好转，公司股票也上涨到每股 1 美元，后又涨到 1 美元 50 美分。哈默开始在公开市场上购买股票，他的投资也渐渐地转换成了西方石油公司的股票，直到成为最大的股东，并应邀加入公司的董事会。1957 年 7 月，他被选为董事长和公司的总裁。这年，西方石油公司赚取利润 3.6 万美元。

在以后的几年中，哈默也看到西方石油公司的其他许多石油井，其中有的仍在生产石油，有的已经干涸。对于这个世界上变化无常的投机事业来说，哈默还是一位新手，但他对前途抱有坚定的信念。他在从事威士忌酒事业的经营时已经练就了一套手法，他自信他的经商手法足以应付石油钻探事业中的难题。虽然当时的西方石油公司的前景并不让人太满意，但哈默练就了善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的本领。40 年的经商生涯无疑对他投身于石油事业有莫大的裨益。他坐上石油公司总裁的位置这一事实已表明，他已经看到失败中有可取之处。油田有的是，西方石油公司唯一短缺的是资金。

短缺资金可以通过吸收投资来弥补。哈默本人就将大部分资产都投于西方石油公司。他无限乐观的情绪总是带有感染性，他的朋友来投资，他的朋友的朋友也来投资。在石油行业中，当时有一位极有才干，而工薪也是最高的钻探人员，他的名字叫基恩·雷德。他为规模较大的企业钻探，挣了大把钱，为了切身利益，他又把钱用到自己的钻探工程上去。但就是这样一个石油行业中公认的钻探能手，却偏偏钻井不出油。哈默劝诱他：“我们两人一起干，这样可以组织个大队伍，别自己一个人干了。和我，和西方石油公司一起干，怎么样？……你在公司拿股票并加入董事会，再让你当个副总裁，负责勘探发展，阁下意思如何？”最后，基恩定下来，拿出资金投入西方石油公司。仅仅几年，他的股份就变成 300 万美元之多。通过吸收投资，西方石油公司的资金暂时有了着落。

恰巧这时，有一家叫德士古的石油公司，在旧金山以东萨克拉门托河谷一带寻找天然气，钻井钻到 5600 英尺时，仍不见天然气，公司决策者认为耗资大多，再钻下去很可能徒劳无功，难以自拔，便匆匆鸣锣收兵，宣判此井“死刑”。哈默得知这一消息后，便请来地质学家进行考察。专家们认为，德士古石油公司放弃那个地区过于匆忙了。得到这一结论之后，哈默便将那片地方租借下来，继续钻探。每钻进 1 尺，都令人觉得，像是牙钻钻在西方石油公司的牙根神经上，要是钻探失败，可以肯定，公司股票的价值就会被钻出个大窟窿来。

哈默在焦急中等待消息。当钻到 8000 英尺仍无滴油时，哈默便开始烦躁不安起来，但仍咬牙硬挺。深度到 8600 英尺时，油层戳破了，石油喷出了。这竟然还是加利福尼亚州历史上发现的第二大油田，此举竟值 2 亿美元。几个月之后，哈默又发现了一个油气富矿带。

哈默的成功使得西方石油公司的股票，好像盒子里的弹簧小人，立刻蹦了起来，原来每股 4 美元，立刻升至 7 美元。哈默押下的赌注，终于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凭着这成功的势头，西方石油公司在太平洋油气电力公司的谈判中处于优势、迫使太平洋公司签订长期合同，购买西方公司的油气。

命运之神总是钟情于哈默，到那时，西方石油公司已完全站稳了脚跟，但哈默又开始新的计划：走出国门去寻找富有的油田，在平等条件下，与严酷无情的石油企业竞争。

1966 年，哈默带领他的人马来到了非洲利比亚。他做出了一副富有的派头，乘坐的是白色的罗尔斯·罗伊斯轿车，这大引人注目了，他受到利比亚国王伊德里斯的接见，“真主派您来到了利比亚”，这是国王的评语，而通过最高首脑进行贸易，这又是哈默的一贯作风。

西方石油公司来到利比亚的时候，正值利比亚政府准备进行第二轮出让租借地的谈判，出租的地区原先大部分都是某些公司所政弃了的租借地，它包括埃索石油公司花费几百万美元仍未出油的钻井以及壳牌石油公司耗资大约 5000 万美元打出的一批废井。而且，在第二轮租借地的争夺中，同一大批实力雄厚的大公司相比，哈默无异于小巫见大巫，只不过是一名讨价还价的商贩罢了。面对大公司的失败和自身实力的弱小，哈默没有退缩。他是一个热情奔放、视野广阔的人，他对商业良机具有特别灵敏的嗅觉，更重要的是他有当机立断、行动迅速的处事能力。他相信自身“嗅觉”的灵敏，他需要立即行动来挺过难关。于是，哈默顶着炎炎烈日，同那些一举手就可以把他推倒的石油巨头们进行竞争，同那些自称可以使利比亚国王言听计从的大言不惭的中间商们进行较量。

哈默的投标很出色，也很厉害。他把投标书用羊皮书的形式填写，卷成一卷并用代表利比亚国旗颜色的红、绿、黑三色缎带扎束。在投标书的正文中，哈默以“愿意从利润中抽出 5% 供利比亚发展农业和在国王的家乡（沙漠地带）寻找水源”为投标条件。1966 年，哈默投标成功，在 4 块投标的租借地中得到了 2 块。但这之块租借地不久就成了哈默的一对败家子。西方石油公司钻出的头三口井都是滴油不见的干孔，仅打井一项就花费了 300 万美元，另外还花费 200 万美元用于地震探测和向利比亚政府缴纳的不可告人的贿金。哈默雄心勃勃的计划的受挫，使西方石油公司董事会中有些成员开始感到忧虑，于是有人坦率他说：“我们的事业不应在利比亚，哈默，只有那些大公司才站得住脚。像我们西方石油公司这样的小公司，那里不是我们该去的地方，我们应该撤退。”但哈默的第六感觉促使他不能听从这种劝说，他仍专心致力于在废弃的油田上打井。

近半年的辛劳总算没有白费，1966 年 11 月，哈默的第一口井出油了，这个油田的潜力很大，且质优，含硫量极低，它还是利比亚的第二大油井。以后又陆陆续续地开出了另外 8 口油井。西方石油公司的业务开始运转了。更重要的是，这里出产的石油，可以通过地中海和直布罗陀海峡，在不到 10 天之内就可以运抵石油奇缺的欧洲国家。

哈默在利比亚的成功，使得西方石油公司名声大振，连大公司埃索石油

公司也注意到哈默，并提出要与他合作开发油田的建议。西方石油公司的成功在公司的股票价格上也得到反映，每股价格一下子超过了 100 美元。1968 年，公司把每一股旧股票改为三股后，新股票的价格又升高到 55 美元。

西方石油公司不仅从利比亚的沙漠中引出了油龙，他们还按照许诺为利比亚寻找水源。结果他们在古夫拉发现了一个天然地下水库，其蓄水量估计相当于尼罗河 200 年的流量，地下水的质地纯净甘美。沙地上终于萌出了茁壮的新芽。

在某种程度上，在利比亚打出水井，比打油井更为引人注目。下面就是利比亚国王与哈默的一段对话：

国王：“是真主派你到利比亚来，我的出生地应该易名为‘哈默’。”

哈默：“此举给我的荣誉过高，我怎能接受呢？国王可否同意把 103 号地区的油田，更名为伊德里斯油田？”

国王（开怀大笑）：“我做过什么大事，竟然让我接受如此崇高的荣誉呢？”

哈默：“因为你为利比亚所做的一切，将使你的名字流芳百世。”

由此可见，西方石油公司已在利比亚站稳了脚跟。不仅如此，西方石油公司还为世人瞩目，尤为石油行业公司所叹服。它理所当然地成了世界的石油大公司，1982 年 12 月 3 日，它正式成为美国第 8 大石油公司，被称为石油工业的“八妹”。

西方石油公司本是一个小公司，一个在美国都不起眼的公司，它一直步履艰难、一直为出路而抗争。到 1956 年，它几乎破产崩溃。这时的哈默已从商界隐退，出于偶然的机，他又复出进入了石油行业。最初他只是想在这个世界上变化无端的行业中浅尝辄止，万万没有想到，石油业竟成了他一生中多种经营的实业中的一个核心事业。他在投资过程中，在分析研究过程中，凭着他 40 年经商生涯积累和总结的经验，他看到濒于破产的西方石油公司有发展的前景，因为石油有的是，西方公司短缺的只是资金。于是，哈默大量投资成为最大股东，并登上公司总裁的主座。他通过吸收投资解决资金缺乏的问题，请专家解决技术问题，以其超人的胆识和富有的经验去应付石油钻探业中的各种难题。更多的是，他接收别人抛弃的油田和已经宣判了“死刑”的废井。在这些地方，他的石油滚滚而出。西方石油公司走出低谷，在美国石油行业中脱颖而出。1966 年，公司又打进利比亚，克服了连埃索、壳牌这些国际知名的石油大公司都无法克服的问题，打出了油井。他们还在沙漠中打出了水井。赢得了利比亚国王的青睐。西方石油公司终于走向世界。在公司的发展过程中，哈默充分表现了在别人失败的基础上获取成功的一面。这位被世界誉力“经商奇才”的富翁、又增添了几百万美元的资产。



## “随机应变”商界巨子 蒸蒸日上长江实业

被列为香港十大超级富豪之首，资产近 25 亿美元，并控制有香港股市 15% 的股票。香港长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嘉诚，颇精于“随机应变”之道。李嘉诚所执掌的长江实业集团从单一经营塑料制品转入房地产开发，再转入股票交易和企业兼并的多种经营，每一步都是一次“载体”的创造和把握，是质的飞跃。李嘉诚不仅在创造中恰到好处地把握了机遇，而且机巧善断，统筹全局，变化无穷，堪称企业成功的典范。纵观李嘉诚的成功经历，他的创业史，其中两次最大的、最关键的转折点，都因他的“随机应变”而为他今天的辉煌业绩写下了重要的一笔。其一，正当年轻的李嘉诚惨淡经营塑胶玩具时，突然从杂志上得到灵感，塑胶花将在未来时代进入千家万户。他瞅准这个机会，改道生产塑胶花，结果一举成了“望胶花大王”。其二，当李嘉诚的塑胶花事业正如日中天时，他又瞅

准了地产这一行，理智地放下行将开始衰败的塑胶花，使他的事业又发生了一次飞跃。此外，“九龙仓之战”也充分体现了李嘉诚精于“随机应变”之道的本色。

李嘉诚出身贫寒，幼年随父避难香港，十几岁时便担负起家庭的生活重担，饱受艰辛。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舅父的钟表公司当学徒。工作勤快。踏实的李嘉诚开始了其社会大学的第一课。虽为简单的端茶倒水的行当，却让他学会了观颜察色，揣摩顾客的心理，颇能讨顾客欢心，因而很得舅父赏识，很快就升了职。他天才的应变能力初露端倪。

大凡事业上有成就的人，无一不是具有强烈的独立精神的。李嘉诚 17 岁时，离开了舅父的钟表公司，加入了“行街仔”的行列，成为一间五金制造厂以及塑胶裤带制造公司的推销员，开始了独自闯天下。当时他的年龄最小经验最少，但他的推销成绩最好，是第二名成绩的 7 倍，两年后，他当上了总经理。按理说做了总经理应该满足命运安排了，但李嘉诚看得更长更远，仅两年后他就舍弃了总经理的职位，与几个年轻朋友筹集了 5 万元港币在筲箕湾开办了“长江塑胶厂”，专门生产塑胶玩具和简单日用品。因为，1950 年中国入朝参战，美国实行对华禁运，香港的转口贸易受冲击，却导致制造业兴旺起来，纺织业、塑胶产业等轻工制造业更是应运而生。李嘉诚看中了塑胶产品，廉价、耐用，可代替木材、金属、陶瓷等进入生活中任何一个角落的广阔前景，所以他选择了塑胶制造业。

也像所有刚起步的新企业一样，“长江塑胶厂”也遇到了重重困难和阻力。虽经李嘉诚顽强奋战，“长江”维持了下去，但也避免不了经营的惨淡。经过几年的不断思索，“一定是什么地方不对路”，他想。不对路就要变——毫不犹豫，这是他成功的关键——永不拘束于某一既定的事实，随机应变。

一天深夜，他翻看《塑胶》杂志，在不太显眼的边角，他看到一条消息，是关于意大利公司利用塑料制造的塑胶花即将倾销欧美市场。他仔细地分析了当时的市场潜力，立即踌躇满志地奔赴意大利去学习塑胶花技术，同年取经回来后，“长江”立即转产“塑胶花”，这在当时是冷门行当，许多人都表示不解与怀疑，但这正是李嘉诚独到之处。许多同行还在按部就班，亦步亦趋之际，李嘉诚的“长江塑胶花”已到处开花，大赚其财。欧美及本地的订革像雪片一样飞来，年底，李嘉诚不得不一再扩大生产规模，“长江塑胶厂”也更名为“长江工业有限公司”。

但是，功成名就的李嘉诚并不因此满足，他又一次把眼光投向远处。塑胶花市场不可能永不衰落，一旦衰落，“长江”这条航船将如何躲过风浪而

安全着港？他的思想快马又跑到了前面。一定要找到一个安全的港湾让“长江”靠岸。

一天晚上，他突然发现了理想的目标——地产。没有什么比房地产更适合“长江”了。说变就变。1958年，李嘉诚在北角购地兴建了一座12层高工业大厦，开始涉足地产界。同时“长江”的投资重心也开始转移，减少塑胶花生产线，增加塑胶玩具生产，大力拓展国际玩具市场。

1965年2月，香港暴发银行信用危机，在挤提狂潮中，数家银行的分行倒闭，连实力雄厚的恒生银行也被受控于汇丰银行。在银行危机的冲击下，房地产价格暴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67年5月又暴发反英抗暴事件，地产界更是雪上加霜，此后两年内，港人人心惶惶，纷纷抛售固定资产，远走高飞。在香港地产界最黑暗时期，李嘉诚再次表现了他独具慧眼的胆识。他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不动声色地大量低价吸纳地产物业。1971年6月，李嘉诚成立了长江地产有限公司，“长江”巨舰正式驶进房地产之洋。

在李嘉诚的整个创业生涯中，最值得记载的辉煌年代应该是1977年。这一年乃是李嘉诚与他的李氏财团，在经过20年的奋斗后，终于脱颖而出的一年。

一个清冷的早上，往在港岛深水湾一幢豪华别墅中的李嘉诚，正在苦苦思索着即将公布的香港政府计划于1月14日开始的香港旧邮政局地段的招标竞投消息。位于香港中区的地下铁中环和主钟站，是中区最繁盛的地段，也是世界上最值钱的地皮之一。初期，香港工务局的集体运输研究部曾对这段地皮估价，约值2.443亿港元。如果能在这块有“地王”之称的地皮竞争中夺标成功并发展物业，不仅能够带来丰厚的地润，而且夺标公司还可以由此增强信誉，必将声名大振，为夺标公司日后的发展打下信心与声誉的基础，这一切，对于注重公司信誉，量质兼顾的李嘉诚来说，具有多么巨大的诱惑力是可想而知的。

李嘉诚静静地思索着、权衡着。据获悉的各方资料，参加竞投的不乏其人，而且都是实力雄厚、财大气粗的巨富大亨之辈。这对于“瞅准机会，决不放松”的李嘉诚来说，是十分富有挑战性的。对于这次挑战，李嘉诚信心百倍，早在1976年，李嘉诚就获悉香港地铁为购得中区邮政总局旧址地皮、曾与香港政府进行了多次磋商，希望用部分香港地铁公司的股票、部分现金支付，但是香港政府坚持要用全额现金购买。由此看来，参与邮政局旧址的发展权的竞投，利用现金支付将是成功的必胜条件。于是既精通经营之道，又精通金融之道的李嘉诚再次利用出售楼宇发行新股的方式，集资数亿港元现金，以打有备之战。不仅如此，李嘉诚还获悉，香港地铁公司与政府已达成的有关九尤湾车厂及邮政总局旧址的售地协议，地铁公司必须耗费6亿港元现金用于购地。于是，李嘉诚针对当时地铁公司要用高额贷款筹集现金购地而急需现金回流的情况，提出一个将两个地盘设计成一流的商业中心和写字楼相结合的综合型商业大厦的建议。为了稳操胜券，李嘉诚还相继抛出了另外的诱饵，其一是为满足香港地铁公司急需现金的要求，长江实业主动提出提供现金作建筑费；其二是将商业大厦出售后的利益由地铁和长江实业公司共同分享，并且再超平时各五成的常规，由地铁公司占51%，长江实业占49%。

1979年1月14日，香港地铁公司正式宣布，中环邮政总局旧址公开招标竞投。在竞投初期，各地产公司、财团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彼此都采取

不动声色、外弛内张的战略。3月上旬，素有“地产皇帝”之称的置地公司，曾经一度是夺标呼声最高的公司，似乎大有非置地莫属的势头。消息传到长江实业公司，有人曾悲观地对李嘉诚说：“长江实业公司成功的希望太渺茫了。”但李嘉诚却淡淡一笑：“传说总归是传说，到底名花谁主现在尚无定论。”3月下旬，置地公司稳操胜券的消息已开始动摇，外间再度传闻，由接近港府决策人士透露，与香江置地公司竞逐的长江实业公司已取得优势。这次“地王”公开招标竞投以来，香港地下铁路公司先后收到30个财团，以及地产公司的申请投标。竞投之踊跃竟超过1976年8月九龙湾地段的竞投数目一倍之多。其中前来申请投标的财团及地产公司有长江实业有限公司、香港置地公司、日澳财团、嘉年集团、恒隆有限公司及霍英东集团等。

当政府及有关部门发出招标邀请之后，所有投标者均小心翼翼，异常谨慎地行事。这时，所有的投标者列出的价格和所提出的条件，都处于十分微妙的高度保密阶段。由于大家彼此不知虚实状况，不像在其他生意场可审时度势，见机行事。在这种情况下，投标者必须高度清醒，而且要有十分精明的头脑，如果所提条件过于优厚，中标后无利益可言，失去了投标的目的。但如果过于考虑自己的既得利益，忽略招标邀请方的合作心理，一击不中便会丧失良机。所以能否最后中标，对于迅速发展中的李嘉诚来说，不能不承认这是一次极大的挑战机会，而李嘉诚自燃也不会放弃这个极有利的机会。经过激烈的争夺，李嘉诚终于力挫多家竞争对手，一举击败一度呼声最高的香港地产界巨子——香港置地有限公司，被人们称誉为是“长江实业扩展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

而在李嘉诚经历的无数次吞并与反吞并的商战中，最能反映其随机应变、见风使舵精明本色的一役要算闻名香港的“收购九龙仓大战”了。

1978年，正当深藏不露的“长江”暗地里偷偷吸纳九龙仓股票想控制九龙仓这块肥肉时，突然半路杀出了“船王”包玉刚，后者对九龙仓垂涎已久、志在必得，而且其财力雄厚，完全有实力与英资怡和财团——九龙仓集团真正的主人一比高低。

李嘉诚虽然也想得到九龙仓，但又深知自己势单力薄，与老牌的怡和相比显得敌强我弱，在反收购行动中，怡和又寻求到汇丰银行的支持。势力更是大大加强，何况还有第三者包玉刚的介入。龙虎相争必将两败俱伤。李嘉诚机智地退却下来，转手把1000多万股九龙仓股票卖给了包玉刚，赚取了5000多万港元，同时又得到了包玉刚手中的和黄股份，增加了与船王的友谊，又因退出争夺，赢得汇丰银行的好感，为日后争得和黄打下了基础。因收购战而使九龙仓股票由10多元跃升至100多元，最后以包玉刚成功收购九龙仓而结束。港人在欢庆九龙仓回到中国人手中，并祝贺包玉刚成功之时，却鲜有人知李嘉诚乃真正不露声色的赢家。

在此之后，香港经济开始复苏，地产也蓬勃发展起来，李嘉诚的财富也一夜之间以几何数字飙升。但是，他没有就此坐享其成，而是又开始部署长江实业新的战略进攻。

在李嘉诚整个创业生涯中，充分体现了其随机应变，机巧善断的本色。他将他的战役朝香港、中国乃至全世界三个方向发展。随着中英联合声明：规定中国从1997年7月1日恢复行使香港行政主权后，“长江”立即掉头驶向真正的“长江”怀抱，大量在中国投资、捐款，表达一个赤子的拳拳之心，颇得国人、家乡人民的尊敬和爱戴。李嘉诚还频频进出北京，多次与国家领

导人接触，这更加说明了李嘉诚机智善变的远见卓识。

李嘉诚能够在短短的 20 年间白手起家，从一个小工人成为香港的十大超级富豪之首，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始终坚持并实施“随机应变”的谋略。随机应变，即伺机而作、灵活应付，意思虽然浅显易懂，但实际运用起来却艰深异常，是非常人所能轻易驾驭的。随机应变的关键就在于“瞅准”机会和“善于”变化。俗话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千万不能只知“变”，而疏忽“机”，只有在“机”上作文章，深掘出并紧紧抓住这个“机”，犹如李嘉诚所抓住塑胶花生产这个“机”，大赚一笔，又及时转向于地产这个“机”，使其大获成功一样，才算是真正把握住了随机应变的深奥机理。机会要“瞅准”，这是成功的第一步，变化要“恰当”，这是成功的第二步，这两步是密不可分的。抓不住机会，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调整和转向这类变化；而即使抓住了机会，变化不正确，也不可能获得巨大的成功。所以，随机应变的“机”和“变”是相辅相成的，李嘉诚正可以堪称为是运用“随机应变”这一谋略的典范。

## 以八字方针调国民经济 先抓吃穿用实现农轻重

1960年，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中国已经被饥荒所笼罩。上半年，生产任务完成得不好，粮食供应日益紧张。4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58、59年要讲数量，60年要讲质量、规格、品格。要做的多一点，说的少一点。在7、8月间的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农村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至少5年不变，死死地规定下来，再不要讲3年5年从队基本所有制过渡到社基本所有制。而且提出，要有部分的个人所有制，总要给每个社员留点自留地，使社员能够种菜，喂猪喂鸡喂鸭。会议在保证钢铁、煤炭、运输生产的同时，提出“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从此时起，中国共产党针对大跃进时代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花大力气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制定了一系列调整的政策和措施。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基本上扭转了当时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的局面，国民经济开始复苏，人民生活也有所改善。

1960年，在中共中央上海扩大会议和北戴河工作会议后，8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提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方针。当周恩来听取汇报时，将“整顿”改为“调整”，并建议加上“充实”二字。9月3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周恩来审定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正式提出：“把农业放在第一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至此，对中国经济克服严重困难，纠正大跃进错误起了巨大作用的八字方针就提出来了。但当时并没有立刻转入大幅度调整，仍然还在想如何“争取国民经济在更加牢固的基础上更好地继续跃进”。

随着农村形势进一步严重和对再度兴起的“浮夸风”、“共产风”的认识，纠正强迫命令和干部特殊化问题，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并于11月3日发向全党全国。《紧急指示信》提出必须坚决彻底地纠正“共产风”，重申了以下原则：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坚决反对和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少扣多分，尽量做到90%的社员增加收入；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安排好伙食，办好公共食堂；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认真实行劳逸结合，保证社员每天睡足8小时；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把农村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搞深搞透。

1961年1月，中共中央举行了八届九中全会。在这次会议及为准备这次会议举行的预备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提出要大搞调查研究，1961年要搞一个实事求是年。会后，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指出：最近几年工作中缺点错误之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抗日战争期间进行得很有效果的调查研究工作，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断和决定。这是一个主要教训。全党各级领导同志，切不可忽略和忘记这个付出了代价的教训。

此后，刘少奇率领一个工作组到湖南长沙和宁乡县进行调查。他在了解了一些有关公共食堂的问题后向毛泽东提出：“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

动力，不节省饶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周恩来通过对河北省邯郸地区的调查，也向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绝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都愿意回家做饭，要解决如何把食堂搞好的问题。同时辽提出，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期的评工记分办法。朱德通过对四川省宜宾、自贡、内江等地区的调查，给毛泽东写信，谈了食堂、手工业和自由市场问题。他指出：群众反映食堂有五不好，即社员吃不够标准，浪费劳力，浪费时间，吃饭不方便，一年到头吃糊涂面。邓小平、彭真在对北京市的顺义、怀柔进行调查后向毛泽东报告说：“要进一步全面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对于供给制，粮食征购和余粮分配，三包一奖，评工地 211 记分，食堂，所有制问题的措施，还要加以改进，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同时还指出，三七开供给制办法，带有平均主义性质，害处很多，干部和群众普遍主张取消。

在继续深入调查研究的过程中，中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即《农业 60 条》，这个条例实际上取消了公共食堂和规定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至少 30 年不变。这样，虽然尚未彻底解决人民公社的一些根本矛盾，但是，由于解决了一批当时群众意见最大的紧迫问题，在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了总结过去 12 年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统一全党思想，坚决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战胜经济困难，党中央于 1962 年 1 月 11 日至 2 月 7 日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向大会提出《书面报告》，在肯定 1958 年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绩之后，提出了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以及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的基本经验教训。《书面报告》强调 1962 年是调整国民经济最紧要的一年，要求从各方面加强农业战线，力争多生产粮食、棉花、油料和其他经济作物；积极增加轻工业和手工业生产；坚决实行“精兵简政”的方针，继续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继续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贯彻执行中央制定的各项工作条例或规“七千人大会”后、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全面深入展开。1962 年 2 月 21 日至 23 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 1962 年国家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问题。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等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部分政治局委员和财贸方面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陈云在会上就克服当时的财政经济困难提出 6 点意见，即十年规划分为两段，前 5 年是恢复阶段，后 5 年是发展阶段，以免又要下马，又想发展，又要“精兵简政”，又想扩大规模，彼此矛盾，举棋不定；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否则没有出路；要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分几步做到城市人每月供应 3 斤大豆；每年供应几千万双尼龙袜子；把全国各地价值约 4000 万到 5000 万元的山珍海味等高级副食品用来扩大高价馆子，回笼货币；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

陈云在他的讲话里反复强调，“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我们工作的基点应该是：争取快，准备慢”。陈云的意见得到刘少奇等人的赞同。

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去武汉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商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任组长，李富春任副组长，统一管

理经济工作。同时，党中央将陈云的讲话批转全国，这对统一全党思想，明确国民经济的调整方向和具体办法，起了重要作用。

3月7日，陈云在第一次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讲话指出，“现在调整计划，实质上是要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发展放慢一点，以便把重点真正放在农业和市场上。”“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五亿多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今年的年度计划要做相当大的调整。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重点是‘伤筋动骨’这四个字。要痛痛快快地下来，不要拒绝‘伤筋动骨’。现在。再不能犹豫了。”周恩来插话说：“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高度概括了陈三讲话的基本精神。国家计委根据这些指导性意见，调整了1962年的经济计划。4月下旬，周恩来，李先念向党中央提出《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案）》。

5月7日至1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以及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部分成员，各中央局书记，中央、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有关工作人员，共105人参加了会议包刘少奇主持讨论通过了财经小组的报告。报告全面分析了国民经济存在的严重不平衡的情况和主要困难，提出了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要争取快、准备慢，要解决今年计划平衡和同明年调整任务衔接的问题等重要方针性决策。把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作为克服困难的关键问题。

会议还讨论了有关农业的一些政策问题。邓子恢提出了扩大自留地，进一步解决屋权、林权，允许私养耕牛等问题。朱德提出了发展社员家庭副业，实行两条腿走路，正业、副业两不误的问题。会议认为农村政策方面的问题还要作系统的调查研究，放在下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再作决定。

5月26日，党中央批发了《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指出：“报告中提出的措施是目前情况下，克服困难调整国民经济的一项最积极的措施”，要求“下最大的决心实行这个措施”。此后，大幅度地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并很快取得成效。

大跃进期间，我国职工人数大幅度上升。1957年我国职工总数为2081万人，1958年上升到4531万人，1960年8月达到最高峰，为5100万人，比1957年增加2649万人。城镇人口从1957年的9900万人，增加到1960年底的1.3亿人，增加了3124万人。从而使1960年吃商品粮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1957年的15%左右变为20%，从而使对农民征购粮数字大增。1961年已经进行了精简，职工总数减少了872万人，城镇人口少了1000万人左右。中央决定从1962年起再精减职工1000万人以上，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要求两年完成。由于全党认识统一，政策正确。广大职工群众体谅国家困难，积极响应号召，到1963年6月，精减工作基本结束，两年半（含1961年）净精减国家职工1887万人，减少城镇人口2600万人。吃商品粮的人数减少了2800万人。增加了农业战线的劳动力，减轻了国家粮食负担，减少了货币发行量。

1962年基本建设投资计划67亿元，比1960年减少317亿元。1962年的大中型基建项目1003个，比1960年减少812个。积累率从1960年的39.6%降到1962年的10.4%。

重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以缩短战线。钢产量从1960

年的 1866 万吨降为 1962 年的 667 万吨，煤炭产量从 1960 年的 3.97 亿万吨降为 1962 年的 2.2 亿万吨。全民所有制企业在 1961 年到 1962 年合计减少 43700 个。同时，充实了石油、化纤、塑料、合成洗涤剂等急需工业，保证了国防和尖端技术发展的需要。

在周恩来的督促下，经济和计划部门努力查清了几年来粮食实际产量的底数：1958 年不是庐山会议“核实”的 5000 亿斤，而是 4000 亿斤；1959 年不是公布的 5100 亿斤，而是 3400 亿斤；1960 年不是估计的 3700 亿斤，而是 2870 亿斤；1961 年夏收比上年又减少了 160 亿斤。农业情况真正见了底，加强对农业的支援，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更显得必要和紧迫。

由于精减职工，下放城市人口，停止徒劳无益的水利建设，使农村劳动力由 1960 年的 17019 万人增加到 1962 年 21278 万人和 1963 年的 22468 万人。国家将调整中节省的财力、物力用于支援农业，向农业增拨钢材、木材、毛竹，满足农村制造小农具的需要，把机械工业的 110 个企业约 3 万余人和 5500 台机床转产农业机械。同时增加了化肥、农药、农机、农用汽车、农村用电及煤、油的供应量，减少了粮食征购量，1962 年比 1960 年纯购进减少 214 亿斤。为了解决国内粮食供应不足，1961 年和 1962 年进口粮食 167 亿斤。1961 年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 25%。几年中对农民退赔 20 亿元。农民得到了休养生息，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为稳定市场，回笼货币，消灭财政赤字，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对银行业务实行垂直领导，把货币发行权真正集中到中央。加强财政管理，压缩财政开支，清仓核资，严格控制集团购买力，将库存高级物品冻结，调作国内外市场商品。为了回笼货币，根据陈云的建议，在坚决稳定 18 类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基础上，对糖果、糕点、自行车、尼龙袜子等部分商品实行高价政策。开设高价饭馆，开辟货币回笼渠道。同时加强物价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反对“走后门”。很快回笼货币 60 多亿元，稳定了市场。国家财政状况迅速改善，1962 年收支相抵结余 8.3 亿元。

在全面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党中央还对政治、思想、文化和统一战线等方面的政策进行了必要的调整。

党中央在经济上、政治上进行的调整，紧密地团结了全党和全国人民，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使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迅速取得了成效。到 1962 年底，经济形势开始好转。粮食产量达到 3200 亿斤，比上年增产 250 亿斤；油料产量达 4007 万担，比上年增产 380 万担；大牲畜达 7020 万头。比上年增加 71 万头。城乡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国家财政状况有所好转。1962 年 10 月，党中央在《关于当前城市若干问题的指示》中满怀信心地指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农村、城市的经济形势正在好转。



## 日本政府善计划 收入倍增显腾飞

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以赶超欧美作为奋斗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战败，其推行“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最终化为幻影，但赶超美国的宿愿却一直没有熄灭。1945—1955年，日本完成经济恢复工作，为经济的腾飞奠定了雄厚的基业。1955年，日本开始实行“经济自立计划”。每个计划大体上以5年为期。在执行过程中不断修改，在修改的基础上又制订新的五年计划。在各个经济计划中，最有影响的是池田政府推行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1969年），这个计划历经池田、佐藤内阁，到1968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西德，跃升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位。日本与美国的距离逐渐缩小。

日本经过战后10年的痛苦挣扎，经济终于得到全面恢复，从1955年下半年起，出现了持续增长的势头。在大规模的现代化投资热和技术改进、技术革新的基础上，经济腾飞的形势方兴未艾，日本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当时的日本面临着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究竟应当怎样正确地估价当时日本经济发展的实力和高速增长势头，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发展速度和方针政策，才能适应经济增长形势，并推进经济稳定而迅速地发展，以早日促进经济的腾飞。1956—1960年的“经济自立的五年计划”在执行过程中不断地修改和增补。对此，在日本国内，不论是政府官员，还是经济工作者，还是关心日本发展前途的国民，为经济政策的制定发生过一次争执。

1955年，日本内阁制定的《经济自立五年计划》是高速增长时期的第一个经济计划，也是战后日本以立法程序制定的第一个正式的经济计划。这个计划在性质上可以说是恢复经济的计划向以经济自立并进而以高速增长为目标的计划的转变，起着从恢复经济的计划到高速增长的计划的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个计划所规定的各项指标，多数在2年左右完成。比如，计划期间年经济增长率为5.0%，实际上达到9.1%。1950—1957年，日本经济出现了“神武繁荣”的好形势。

针对这种形势，以当时的经济企划厅调查课长后藤誉之助为代表的一部分经济学者认为，日本经济投资速度增长过快，经济规模过于扩大，导致进口的增长。而投资扩大，超过了经济实力，是进口增加的根源。他们认为，经济过多的依赖进口是危险的，“经济增长越快，遇到阻碍的概率越大”，“日本经济的前方是通货膨胀的山涧”，因而他们主张实行金融紧缩，把增长速度放慢下来。而当时日本的开发银行经济研究所所长下村治则认为，要对国际收支赤字作具体分析。他分析，国际收支赤字可以通过调整进口库存来解决，无须惊慌和恐惧。它不会从根本上影响经济高速增长的进程。而且进口库存多，可以调整库存用于生产，从而可以使生产进一步发展。

1957年12月，日本内阁又制定了《新长期的经济计划》（1958—1962年），这个计划的制订可以说日本已转向了促进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计划的总目标是“继续保持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长率”，以稳定地提高国民生活水平，达到“接近充分就业”。计划以重、化学工业力中心，规定的指标是，到1962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6.5%，出口、进口增长率分别为10.0%和5.6%。一些专家认为，这些指标过高地估计了日本经济增长的可能性。以下村治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则高度评价了日本经济增长的潜力，理由就是进入高速增长时期以来日本经济设备投资的高涨和设备投资实际额的扩大。他

们认为，设备投资的扩大，就是经济基础的加强，供应能力的增长，经济增长条件的加强。而《新长期经济计划》对日本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可能性作了过低的估计，实际上，日本的经济应该会有更高的增长速度。他计算，日本经济的年增长率达到10%是完全可能的，他主张应充分估计日本经济的增长能力和可能性，并通过积极扩大有效需求等政策措施，促进经济的发展。他尖锐地批评了当时低估经济增长能力的看法。而以负责制定计划的经济企划厅综合计划局长的大来佐武郎等人参加了这场争论，他们对下村治的观点表示怀疑或持有疑义。他们认为，下村治想像中的“产出系数”过大，下村治计算时采用的资料也不完全科学，因此，不宜对日本经济发展作过高的估计。

50年代后期关于经济高速增长问题的争论，对日本“有很大的启蒙作用”。下村治的理论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基本符合对日本经济形势的估计。与此同时，和他田交往甚密的一桥大学教授中山伊知郎就提出，要改变贫穷经济面貌，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经济素质。为此，可以抓住“工资提高一倍”这一线索，当时任通产大臣的他田勇人也积极主张“工资倍增论”。池田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时。秘书问他：“当上首相想干些什么？”他回答：“那就是经济政策，实现收入倍增。”

1960年7月19日，池田勇人以优势取胜，就任自民党总裁，组成了第一届池田内阁。这位经济方面称得上行家里手的池田上任后，便立即把他的“收入倍增”的设想作为制定新经济政策的基础，并在其周围组成了一个有各方面专家学者参加的智囊团，协助政府制定经济政策。在制定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问题上，下村、田村进行论战，前者主张增长率为11%，后者坚持7.2%。池田虽倾向于下村的观点，但为慎重起见，确定了前三年年增长率力9%，10年内平均增长率下低于7.8%，实现国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标。

在回答记者问时，池田明晰地阐述了政府对经济政策制定的态度。他说：“所谓政治，就是提高国民生活，保障社会安定，做到十年内收入增长一倍，”“如果经济扩大发展失败了，毫无疑问，一切应由总裁、首相负责。”发表如此有魅力和充满信心的讲话，实为历届首相中所罕见。

1960年11月，经济审议会向池田首相正式提出了关于制定以国民收入增加一倍为目标的经济计划的咨询报告，12月27日，日本内阁会议正式通过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1969年）。这个计划全面地制定计划的方针，计划的总目标和年度分目标。这一计划实际是用增加国民收入（包括增加工人工资）的办法来扩大国内市场。按照这一计划的规定，从1960—1970年的10年内，国民生产总值将增加一倍，工人的工资也将增加一倍，农业人口的大部分将被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所吸收。这一计划试图用提高生产、多产多销、增加企业利润和实现工资翻一番的浅显而有诱惑力的道理，唤起人们努力生产进而改善生活的愿望。

他田在推行“倍增计划”时，根据以自由竞争为原则的自由主义政策，减小政府对私人经济的保护、限制范围，主要采取间接指导方式。另一方面，政府加强公共事业的投资，通过改变国家公共投资的规模和方向，影响私人投资的方向和速度，用不增税、把自然增收的部分税金用于减税等方法，积极为私人资本的发展创造等件。1961年度，池田内阁推行的“超大型财政预算”，正是体现这一方针的例证。他田及其内阁通过政府调整金融政策，控制经济变动。1961年9月，池田就采取了降低输出担保率，提高公定利率和存款准备率等措施，限制放款和投资过多，保证国际收支平衡，使外汇储备

逐年增长，没有出现以前那种入超过多现象。

“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是成功的，日本经济以大大超过原计划指标的速度，取得了惊人的增长。池田执政期间，素以人口稠密，领土狭小、资源贫乏的日本，已出现劳动力供不应求的局面。1964年10月25日，池田因患喉癌辞掉现职。佐藤荣作顺势登上首相宝座，连续执政时期长达7年8个月，创历届首相连任期限最长纪录，还曾获诺贝尔和平奖。

佐藤善于见机行事，长于“人事和金钱”，但他最关心的是经济增长速度。因为佐藤接任时，日本经济景气有所变冷，国民生产增长速度有所减慢，出现了“宏观景气，微观萧条”之状。于是，佐藤内部围绕着如何刺激经济，出现了金融缓和论和金融紧缩论的两种对立意见。佐藤采取了金融缓和论意见，在1965年1至6月，三次降低公定利率。结果表明，单纯依靠调整金融政策，已不能收到刺激经济高度景气的预期效果。

1965年6月，佐藤起用福田纠夫为藏相。福田大胆采用增加政府财政支出，扩大国债发行和大幅度减税等方法。在1965年度追加预算中，发行了赤字国债，增加财政支出以加强住宅、国营铁道和电气公司建设。在1966年财政预算中，又发行国债和实行减税。由此，日本进入“财政新时代”。“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进一步得以实现。

佐藤内阁的财政政策，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从1966年起，趋于不景气的日本很快得以回升，出现了堪与他田时代媲美的“超高速增长”。从1965年11月至1970年7月，日本经济出现了长达57个月的经济高潮，实现了经济腾飞。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有长期性观点，也有具体目标；进一步明确把计划分为政府部门计划和民间部分两大类；计划重视整个社会各种关系的调整，以求社会的均衡发展；重视人的因素，第一次把人才培养列入经济计划。表明对人的重视。计划历经他田、佐藤内阁，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计划成功地将日本由“四等国”跃为“经济大国”。

到1970年，即计划实施结束的第三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已达1975亿美元，实现了平均11.7%的实际增长率。国民生产总值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由1966年的第五位，一跃而为1968年的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而超过联邦德国。日本也已大体上实现了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工业部门的技术装备达到欧美国家的先进水平，工业生产在部门结构、生产流程、企业管理、劳动生产率以及产品质量等方面均达世界先进水平。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上升为34.1%和46.5%。对外贸易结构也发生明显变化。在出口产品中，轻工业所占比重下降到20.6%，重工业及化学工业的产品的比重则增到70%。日本的工业总产值和主要工业品的产量已居世界前列，农业实现了机械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人民生活水准大幅度提高，消费结构产生根本性变化。家庭普遍使用电器产品，汽车使用率也不断增高，而且农村家庭小汽车的普及率比城市居民还高。

池田勇人、佐藤荣作这两位《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的主角曾受到吉田茂的赏识和重用，被称为“吉田学校”的优秀生，并成为吉田茂的左膀右臂，他们在60年代日本的经济发展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根据50年代日本高速发展的情况，在众多政府官员和经济学者的建议中，通过争论，池田勇人集思广议，于1960年12月27日正式通过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是一个典型的促进经济高速增长计划，其目标就是国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

和充分，为此，就要使经济稳定地、最大限度地增长，“10年以内使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一倍”。由于“计划”集大家的意见和智慧，因而取得了好的效果。日本的经济得到发展，人民的收入得到提高，生活状况有所改善，日本国内的经济社会面貌改变，日本的国际竞争能力和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不断加强，与美国的距离日益缩短。计划的执行历经池田、佐藤所组成的内阁，创下了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繁荣时期，被日本称为所谓的“伊弉诺景气”（伊弉诺为日本古代神话的开国主神，天照大神之父）。为此，池田、佐藤所创下的日本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至今仍为日本人津津乐道和赞美。

## 朴正熙析形势定战略 韩国人重人才创奇迹

本世纪 60 年代，拉美和亚洲一些国家的政局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是军人纷纷通过政变掌握政权。韩国军人朴正熙正好赶上这个潮。那是 1961 年 5 月，韩国炎热潮湿的夏天才刚开始，政界的形势却陡然升温，如 6 月的干燥热难当。16 日这天，韩国少壮派军官朴正熙等人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了军事政变，夺取了大韩民国的政权，结束了“文职人员掌握权力的局面”，朴正熙 18 年的军事独裁统治开始了。“破坏是愉快的，但建设是麻烦的事”，就是这位军人在以后的统治中，却成功地进行了“麻烦”的经济建设。韩国的经济出现了第一次腾飞，汉江出现了奇迹。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朝鲜人民终于摆脱了日本的殖民统治。正当朝鲜人民欢庆解放，即将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国家的时候，强权势力却以 38 度纬线为界，将三千里锦绣河山分裂为南北两个部分。1948 年 8 月 15 日，李承晚正式在汉城宣布成立“大韩民国政府”，简称“韩国”。

韩国国土面积狭小，面积不到 10 万平方公里，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是山地，耕地仅占五分之一。人口密度大，每平方公里为 430 人。韩国自然资源严重匮乏，大部分矿产品及部分粮食需依赖进口。资金缺乏，购买力低，社会一片混乱，对外贸易年年逆差。1950—1953 年的朝鲜战争使韩国工业设施半数被毁，经济惨遭破产。直至 1962 年，韩国人均收入也不过 82—83 美元，是当时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面临这种处境，朴正熙吸取李承晚因政治腐败、经济停滞而垮台的教训，决心改革政治体制、大力发展经济，以巩固统治。为了制定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朴正熙等人对形势作了较充分的分析，并结合实践，确定了“出口主导型经济开发战略”。这一战略的选择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国内条件：韩国人口密度大，出生率高，劳动力结构落后，生产效率低下，所以韩国的劳动力具备以下的特点：劳动力资源丰富；由于扶养人口和失业人口多，大都是兢兢业业工作，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相比，显得格外勤奋；技术水平低，太多只会干简单劳动；劳动力廉价，工资低。另一方面，韩国可耕地少，资源贫乏，但由于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便宜，便可进口原材料或中间产品，大力发展加工、装配工业。

国际条件：韩国对美国来说，不仅是亚洲大陆东边的门户，也是“泰国以东亚洲大陆上最后一个非共产党国家”。美国不肯轻易政弃韩国这块战略要地。进入 60 年代以后，虽然美国的实力不断下降，但它仍然要极力扶植韩国。同时由于美日等西方主要国家在 60 年代调整工业结构，形成所谓的新的国际分工，为韩国等地区和国家发展加工出口工业提供了较大的销售市场，从而弥补了这些地区境内市场狭小，不利于发展适度规模工业的缺陷，促进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资金积累。

实践经验：50 年代南美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本国工业，都把进口产品国产化摆在政策的优先地位。他们通过关税和对进口进行直接限制的办法来鼓励本国商品的生产，但由此引起了出口的不振。结果，由于外汇不足，连进口产品国产化所需要的中间材料的进口也越来越困难。致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发生了后退甚至停滞。加之，60 年代初，韩国经济的发展战略基本上是进口替代型战略。经几年实践，由于韩国境内市场狭小，人民收入低，购买力了高等原因，经济发展缓慢。而且一些生产资料的进口，由于外汇不

足而受到限制。因此，朴正熙不得不于 1964 年底和 1965 年初进行经济改革，改进口替代为出口替代，即“出口主导型经济开发战略”。

从 1962 年 12 月起，朴正熙每月一次亲自主持出口促进会，要求“扩大出口第一”，而不是“追逐利润第一”的方针。对出口企业规定硬性出口指标，奖励分明，这样做是为了偿还外债和引进设备和技术所需。为了节约投资，韩国工业发展主要靠扩建和改造原有企业，靠引进技术。韩国的出口第一的目标明确，进口主要是为了出口，绝不将得之不易的宝贵外汇去进口大量高级烟酒和豪华汽车。

在出口主导型经济战略的指导下，韩国政府制定和实施了经济发展五年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1962—1966 年）的口号是“贸易立国，出口第一”，基本目标是摆脱贫穷的恶性循环，奠定“经济独立”的基础。重点放在开发能源，扩大交通及通讯设施等主要困难部门。同时发展化肥、水泥和纤维工业，借以取得消费资料进口替代的效果，打下“高速”增长的经济基础。执行计划的结果是国民生产总值由 23 亿美元增加到 36 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 87 美元增加到 125 美元。但由于资金供应不足，社会公用事业不完备，统计资料不完善以及政治、经济体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等因素，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部分指标未能完成。

第二十五年计划（1967—1971 年）的口号仍为“贸易立国，出口第一”，基本目标是促进产业结构的现代化和继续争取“经济独立”，重点是继续扩大社会公用事业，开始发展钢铁、石化工业，实行开放的经济体制，继续推进进口替代的同时，积极促进出口。计划执行的结果是，国民生产总值从 42.7 亿美元增至 90.9 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 142 美元增加到 277 美元，但工农业差距扩大。

第三个五年计划（1972—1976 年）的口号是“发展重化工业”。基本目标是继续扩大出口，发展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促进产业结构现代化，发展农、渔村经济，争取粮食自给，增加衣、渔收入。计划执行的结果是国民生产总值从 304 美元增加到 752 美元，出口速度增长迅速。

第四个五年计划（1977—1981 年）的口号仍是“发展重化工业”。基本目标是继续促进产业结构现代化，进行社会开发，加强技术革新。重点是继续增加粮食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出口产品竞争力，改善国际收支等，但由于世界性能源危机的冲击，第四个五年计划没有完成，韩国经济逐渐缓慢。

四个五年计划的实施，韩国的经济出现了第一次腾飞，一改贫困不堪、前途暗淡的形象而屹立于世，70 年代进入新兴工业国的行列，被世界称之为“四小龙”之首和第二日本。朴正熙制定出口战略，为什么会取得如此成功？有人说，韩国的发展是因为外援，诚然，韩国的发展因为得到外国大量援助，但得到外援的国家不在少数，或因军费开支过大，或因挥霍浪费，中饱私囊，或因经营不善，外援并没有起到催化剂的作用。韩国的发展固然也靠美国、日本让出一块国内市场，假定韩国的产品质量低劣，美国、日本居民不想消费，那不也是枉然。究其原因，更为突出，也最让世人津津乐道的却是朴正熙政府的人才开发。

一个国家政府机构效率的高低，对该国经济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政府机构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政府官员的素质。因此，韩国政府的人

才开发，首先开始于对官僚体制的整理。

朴正熙上台后，提出了“人事管理合理化，组织机构效率化”的口号。韩国官场中，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等风气很盛。朴正熙为发展经济，锐意进行严格整顿，称之为“庶政刷新”运动。为此朴正熙于1962年6月对高级官员进行了第一次监查。70年代，对整肃官纪工作更加严格，处分范围扩大，处罚加重和进行连带处分。为了合理地选拔、使用、考核和培养人才，朴正熙明确各级官员职责和对官员进行平时的考核。为加强部门间的协作和相互了解，扩大官员视界，增长经验和知识，提高行政效率，朴政府实行人员交流，从1962年7月起，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与地方机关相应人员交换工作岗位。通过上述措施，官员结构逐步得到改变，形成了一套较精干的官员队伍，提高了行政工作的效率。对韩国经济的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随着韩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越来越需要各种专业人才，朴正熙政府积极延揽专业人才。为了便于广泛地选拔人才，对一至五级官员实行公开考试，择优录用，吸收了一批文化水平较高并具有专业知识的新生力量，逐步改变了官员的结构。同时，朴正熙政府还不惜化巨额费用，从海外（尤其是美国）招引大量侨民专家回“国”，将他们安置在政府机关、研究所和大学的重要岗位上，成为国家的宝贵资源。由于归国人员年富力强、文化水平较高、熟悉业务，充分发挥了人力和物力的作用，提高了韩国的竞争能力。

为了促进人才成长，韩政府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改革教育结构，增设技术课程，提高工人技能，讲求教育投资效果，着重发展复杂的劳动技术教育；健全情报体系，增加图书资料；改善专业人员待遇，解除后顾之忧；健全技术职称，承认科技人员的社会地位。造成了全体国民都关心技术的提高和造成在技术上竞争之风，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效力。

由于朴正熙政府在培养人才上下了功夫，为社会提供了人才，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迅速地提高了科技水平。60年代初期，韩国连日用工业品都几乎全靠美国进口。在不到20年的时期内，就能生产彩色电视机、电子计算机、高级小轿车、巨型货轮，远程导弹等高档产品。走完了某些资本主义工业国要经过差不多一个世纪才走完的技术成长路程。朴正熙政府制定的“出口战略”就是要以“出口立国”，大量出口商品。除了廉价外，还须在产品质量上具有竞争力，才能打入国际市场。事实也正是由于韩国产品的价廉物美和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才得以扩大出口。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增长，增加了国民收入。十几年中，韩国经济增长较快，国民收入迅速提高，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得力于发展教育的结果。

总之，朴正熙政府虽在政治上实行的军事独裁，但在经济建设方面，很多作法都很精明和符合客观实际。因而在不久的时期内，使国民经济取得了显著的成长。韩国的第一次腾飞就在这个时期内。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韩国是一个小国，一个穷国，还是一个不独立的国家。腐朽的李承晚政府在美国的大力扶植下，也无所作为，经济、社会一团糟。朴正熙上台后，吸取教训，致力于发展经济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作为军人的朴正熙表现出了他也善长治理经济和政治的一面。他在对韩国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进行充分的分析后，形成了“出口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即是进口原材料或中间产品，进行加工、装配、再销往海外这样一种加工出口型经济。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这个战略之效，朴正熙提出了“人事管理合理化，组织机构效率化”的口号，大力开发人才。朴正熙首先从整顿官僚体

制入手，形成了精干的官员队伍，提高了行政工作的效率；通过广泛延揽人才，高学历低年龄就成为官员结构的特征之一；而且通过教育事业的推进，韩国的全民素质得以提高，生产效率得以大大改善。人是生产关系中最不稳定的因素，朴正熙从“人”着手，重视人才开发，这无疑是其经济出现腾飞，汉江出现奇迹的奥秘所在。



## 布朗库多路出击 巴西国发展经济

形状呈三角形的巴西联邦共和国，领土面积在世界各国中居第5位，在拉丁美洲各国中独占鳌头。大自然赋予幅员辽阔的巴西是茂密的原始森林、广袤无垠的良田牧场，密如蛛网的河流和丰富的地下宝库。巴西有滚滚东流的世界第一大河，有世界最大的冲积平原，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热带森林，也有品种和数量均属第一的植物，还有丰富的金属和非金属矿藏。就是这样一个资源如此丰富的国家却长期遭受列强的掠夺和欺凌。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巴西经济才迅速发展起来，其状况可以与欧洲的联邦德国和亚洲的日本相媲美。

1964年3月，巴西处于一种沉闷的气氛中。自1961年以来的经济危机还在困扰整小国家，经济萧条，人心沮丧。31日这天，巴西陆军参谋长昂贝图·卡斯特洛·布朗库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了军事政变，总统苦昂·贝尔希奥·马克斯·古拉特被迫辞职。当消息传到人民中间，犹如一枚炸弹，震动了整个国家。这在拉丁美洲虽算不上什么，但人民的神经仍被牵动起来。他们纷纷走出家门探听消息，甚至还议论，这位军人能治理好他们的国家吗？

是啊，布朗库能建设好巴西吗？他18岁入伍，去过巴黎的法国陆军大学学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力陆军中校，曾任巴西派赴意大利远征军的参谋长。1962年9月任巴西陆军第四军军长，1963年8月任陆军参谋长。布朗库可谓是戎马一生，没有治国之经验。然而，实行军事独裁和致力于经济的发展是60—70年代拉丁美洲大多数军人政权的共同特点，布朗库自然也在其中。他在政治上推行独裁统治的同时，非常重视经济建设。

布朗库不懂经济，但他善于领导经济建设。他任用经济专家治国，他吸收前几届政府的经验和成果，他顺应时势制订了“出口”战略，他借鸡生蛋重用外资，他因地制宜强调发展近代化工业与农业。总之，他采取了多路出击的战术，其间自然有轻有重，有主有次。

第一路：采用“专家治国”，制定“出口第一”的战略。这是布朗库经济建设中的一大特色。1964年4月15日，布朗库正式就任巴西总统。他就职后，立即起用了一批专家、学者和技术人员，实行“专家治国”，以发展经济。在制订经济发展战略中，他们特别吸收了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提出的“发展主义”经济理论。

劳什·普雷维什是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1948年成立）的执行秘书，他探索了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的道路、方针和政策。普雷维什认为，当今世界经济体系可分为中心和外围两部分。少数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居于世界经济的中心地位，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居于外围部分。中心与外围经济关系的不平等是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根源。美国等中心国家推行霸权主义，故外围经济对中心有“从属性”。从以上认识出发，普雷维什认为拉美只有从工业化中寻找出路。他提出“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即在进口能力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在国内生产一部分原来依靠进口而国内有可能生产的产品，代替进口，以保证另一部分产品的进口，从而逐步实现工业化。通过这个战略，制订发展规划，实行地区经济一体化，改革国际经济秩序，执行出口多样化方针，并强调利用外资，合理使用资金，吸收剩余劳动力以及实行土地改革的重要性。

根据普雷维什的发展主义理论，布朗库提出了“出口即出路”的口号，

制定了全面的出口战略，其基本目标是：努力扩大出口商品的种类，特别是要加强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努力提高出口商品的竞争能力；在努力增加向美、欧等国出口的同时，注意发展和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根据这个目标，巴西采取多种渠道扩大出口，除了大力出口传统农产品（咖啡、可可、棉花等）外，还出口非传统农产品（大豆等）；而且利用本国的技术特点，向北非、中东和拉美出口劳务，承建工程。大量出口刺激了工农业的发展，到1973年，巴西的出口额从1963年的14亿美元增加到50亿美元。布朗库的“出口”战略取得了成效，出口成了巴西建设的主要支柱。

第二路：制定发展规划，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这尾“用人之长，补己之短”战术的运用。

1948年，巴西就有了战后第一个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1949—1953年），规定要大力发展卫生、食品、交通运输和电力四个部门。50年代初又制定了《全国经济重新装备计划》（1952—1956年），体现了鼓励民族经济发展，加速实现工业化的方针，1956年制定的《全国经济发展纲要》（1956—1961年）是一个推动国民经济全面发展的计划。这些计划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由粗略到全面的发展过程，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所以，布朗库上台后，吸收前几届政府的经验，先后制定了几个经济计划：政府经济行动计划、发展战略计划、政府行动目标与基础计划及全国发展计划等。1964年的《行动计划》，把货币、财政、外汇、工资等政策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全面的计划，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干预。

第三路：重视教育、开发人力资源，这是巴西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

巴西经济学家吸收西德和日本的经验，认为拥有高质量的人力，是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教育在提高人口平均收入水平方面所起的作用比物质资本积累还重要”，因此，从1964年起，巴西政府把教育作为优先项目进行投资，重视科技发展，引进国外科技，向国外派遣大批留学生和科技人员。巴西中央银行行长卡洛斯·兰戈尼认为，在1960—1970年间，教育对巴西经济增长的贡献是15.7%，而全民文化程度的提高，为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四路：实现工业化方针，重视农业发展。

执行工业化战略是巴西经济起飞的重要因素，30年代就已开始推行，这为巴西经济打下了基础。布朗库在执行经济战略时，也着重充实基础工业和机械制造业，大力促进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工业部门的发展。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巴西也注意农业的发展。布朗库等人认识到，农牧业是巴西经济发展的基础，在提供食品、工业原料和出口贸易等方面将起重要作用。60年代以后，巴西利用优越的自然条件，发展多种作物，改变了历史上形成的单一作物制，这不仅适应了工业发展的需要，也为出口产品的多样化创造了条件。巴西的大豆，1950年的产量仅为35000吨、1977年增加到1251.3万吨，巴西一跃成为与美、中并驾齐驱的“大豆三王国”之一。为进一步发展农业，巴西积极扩大耕地面积，采用国内外先进技术，吸收国外资金。与此同时，还注意和提倡开发落后地区。

第五路：引用外资，这是布朗库“多路出击”战术中的重点。

巴西是在一个比较脆弱的基础上开始经济起飞的。战后，巴西还比较穷，国内积累能力有限，资金匮乏。正如前计划部长德尔芬·内托所指出的：“巴西国内储蓄不足以维持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必须使用国外储蓄来补充。”

在这种情况下，巴西选择了举借外债、积累建设资金来加速经济发展的进程。1964年，布朗库上台后，明确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废除了古拉特政府颁布的限制外资利润汇出的法令，转而采取鼓励外国投资的办法。可以说，巴西的发展战略在1964年方开始较为明显地得以实施，即是依靠外国的资金、技术和市场，同时利用本国的资源和劳动力来发展民族经济。

战后由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等一系列原因，资本输出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和速度，而外国资本输入巴西的规模和速度的增加与减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巴西国内投资条件的变化。巴西幅员广阔，人口众多。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便宜，经济基础较好，加上巴西战后对外国资本所采取的开放政策，因而使巴西成为西方资本输出的理想场所，这是战后外国资本大量输入巴西的基本原因。战后，英美投资地位逐渐下降，西德和日本等国趁机打入巴西市场，巴西的外资来源日益多样化，这使巴西逐步改变了过去单纯依赖英国或美国一家的局面，以利于巴西在各投资国的竞争中选择条件比较有利的投资对象和建立更广泛的经济贸易关系。

西方国家在巴西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和控制落后国家的经济，但又如列宁所说：“资本输出总要影响到输入资本的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大大加速那里资本主义发展。”外资弥补了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带动了先进技术的引进，因为资金不足是巴西经济发展的一个大问题。不仅如此，借用外资的同时也引进了外国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巴西政府还把科学技术作为推动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手段。在技术引进方面的措施有：在进口机器设备时，购买外国的技术专利；注重技术诀窍的引进，为此制定了专门法规，规定在签定专利合同时必须引进技术诀窍；加强管理，防止盲目引进，法律规定，各企业每年进口外国技术的费用不得超过年营业额的一定比例，引进技术必须由巴西工业产权局审批；规定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的企业必须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配备合适的技术人员掌握这些技术，注意将引进的国外技术与本国技术相结合，创立自己的新技术；设立由政府资助的情报、咨询和服务机构，为企业引进服务，如巴西工业产权局设有技术资料中心等。引进外资和技术还促进某些新兴工业部门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就业机会。

布朗库采用“多路出击”战略，制定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大都为他的继任者所采用，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在1968—1974年间，巴西经济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高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10%以上，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有人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大多数国家都进入了经济恢复和发展时期。其中，三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尤为迅速，它们是欧洲的西德，亚洲的日本和南美洲的巴西。”当有一位曾经在指导巴西经济发展的艰难尝试中起过主要作用的前财政部长，被问到关于巴西的经济奇迹时，他以一种不无自豪的口吻说道：“西德的经济奇迹，正如我们后来发现的，主要是由于马歇尔计划下的大量外援以及本国高度发展的科学和工业基础设施。日本的经济奇迹被说成是由于储蓄率高，有良好纪律的和勤奋的劳动力。任何了解巴西和巴西的人必定作出这样的结论：这才是真正的奇迹。”的确，当一个原来并不发达的国家，在这块被人们一成不变地认为是拉丁美洲的“前途未卜的土地上”，突然创造了引人注目的，长期的经济增长记录时，这件事的确是巴西国内外人士所意想不到的。其发展速度不仅在巴西是创纪录的，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到1982年，巴西国内生产总

值已是 2940 亿美元，在拉美居首位，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第八位。

巴西经济之所以能够在战后短短的几十年内迅猛发展，跻自于世界经济强国之列，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它采取了一条适合国情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这条战略是在布朗库总统时期形成和开始实施的。布朗库为发展经济采取了“多路出击”的战术。最具特色的是任用经济专家治国，发展经济其重点措施就是扩大出口和吸收外资，缓解国内资金不足的状况，这是布朗库利用专家左思右虑制定的战略，也是布朗库的着力之处，还是巴西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在国内，布朗库还重视工农业发展，加强教育，开发人力资源，也不放弃边远落后山区的建设。布朗库的多路出击战略中，有主有次，有重有轻，巴西经济因此而引人注目。他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和效仿的东西，比如：实施外资来源多样化的方针，重视外资使用的合理化，更多地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在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高度重视对引进技术的吸收、消化，改造和提高，避免技术引进中的盲目倾向等方面。作为军人的布朗库在他不长的执政生涯中（仅 3 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写下了属于自己的一页。

## 李光耀务实求发展 新加坡鱼虾变小龙

1965年8月9日，星期一。李光耀在新加坡市政厅宣布新马谈判破裂，新加坡正式退出马来西亚联邦。李光耀在电视台上宣布此决定时涕泪交流，他沉痛而坚定地说：“世界犹如大海，在大海中大鱼可以生存，小虾也可以生存，新加坡将以一年小虾生存于国际大海中。”他号召新加坡人要勇敢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开拓自己的前途”。然而，在风雨中飘摇独立的新加坡弱小无援，又有准相信它竟能成为一个政治上独立的、经济上繁荣的国家？又曾几何时，新加坡成了亚洲的巨人，创造了亚洲经济奇迹，跻身于“四小龙”之列，成为第三世界中新兴国家的典范。李光耀由此被公认为是一位善于治理国家的领袖，一位独特的、成就显赫的政治家。

新加坡不大，国土面积仅618平方公里，人口却有217万（1992年数据）。既无矿山又无农田；几条小河最长的也不过15公里，而且无鱼可捕，利用价值极小；饮水要靠马来西亚提供。所以，当新加坡在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时，许多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预言，没有资援、没有市场的新加坡将很难生存下去。然而，李光耀却不气馁，他一直认为新加坡不可能改变世界，但可以去适应世界，使自己成为对世界有用的国家。在李光耀看来，只有发展经济并对世界有所作为，才能使国家生存下来，故他决心塑造一个能高度适应纷繁复杂的世界的务实政府，作为发展经济的有效工具。

李光耀一上台便和他的同僚们分析新加坡的地理环境和当时的世界形势。他们在仔细地研究了瑞士和以色列这两个在人口和面积上与新加坡相似的小国经验后，得出的结论却相当乐观：新加坡地理位置极为优越，又是天然的良港，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完全可以实现繁荣和强大。

当然，李光耀政府也清醒地认识到：新加坡工业落后，仅限于对转口产品的初级加工工业和力港口服务的机械、车船修理等小型工业，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略者的破坏，整个新加坡满目疮痍。自1959年6月成立的以李光耀为首的自治政府，初始时局势极为严峻，转口贸易日益削弱造成经济极不景气，失业问题极其严重，由此引起社会动荡不安。加之，新加坡地小人口密度大，没有自然资源，又夹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两大伊斯兰势力之间，且是个多种族、多文化、多宗教、多语言的移民国家。李光耀经常强调这些特点，强调新加坡在政治经济上的“脆弱性”。他在考虑和制定政策时都十分注意紧密结合新加坡的国情，绝不人云亦云，绝不东施效颦，而是从实际出发，以务实的态度求发展。

新加坡面临几乎没有工业又缺乏发展条件而且人口密度高的困境，新成立的政府的当务之急就是尽快解决就业问题。只有解决了就业，人民的收入才有保障，人民的生计才有着落；只有解决了人民生计，社会才能得以稳定，经济发展才有保证。而要求得经济的长足发展，则必须改变殖民的、畸形的经济结构。由单一型经济发展成多元化经济结构。著名的经济学家当时的经济部长吴庆瑞就指出：“新加坡要解决的是，一、失业问题；二、摆脱过分依赖转口贸易的殖民地形态经济结构，为此必须走工业化道路。”在这种认识和指导下，李光耀政府推行以迅速实行工业化力主要内容，以多元化经济力目标的经济发展战略。

新加坡国小，基础脆弱、资主严重短缺，要发展工业、从而带动经济各部门发展，以便彻底解决就业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引进外资。为了不受制

于大国，新加坡政府提出了外资来源多边化的办法。以引进多边外资作为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途径，是唯一切实可行之计。

从务实出发，新加坡政府制订了经济发展战略：通过发展工业，实现工业化以改变单一的经济结构，从而形成多元化经济结构；通过对外开放吸引多国资本同时卷入，以解决资金缺乏的问题；通过发挥优势，变不利为有利，促进经济全面持续地发展。新加坡政府也从务实出发，根据内外环境的变化，在各发展阶段又确定了不同发展重点。

1959—1967年为第一阶段，经济处于恢复阶段。新加坡政府以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进口替代”工业为重点，以此来改变单纯依赖于转口贸易的畸形经济结构，发展多元化的国民经济，并籍以解决就业问题。1959年11月，吴庆瑞就根据总体战略目标做了国家预算报告，宣布成立经济开发委员会，这是一个独立的、政府负责制定加速工业化计划的机构，拥有充分权力。同时，颁布了《新兴工业法》和《工业扩展法》，对投资者给予免征一定期限的所得税，获得新兴工业地位的工业企业在头五年内不必缴纳所得税。而且给予关税保护。1960年4月，政府又决定大规模开发裕廊区。为工业化打基础。同年政府还制订了1961—1965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62年成立经济发展局，统筹实施五年计划事项。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新加坡经济取得一些进展，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7%，初步建立了工业化的基础。

根据国际有利形势和国内现状，新加坡政府制订了第二十五年计划（1965年8月—1970年），把工业发展战略从发展替代进口迅速转为以发展面向国际市场的出口导向型工业。

1968—1979年为第二阶段，经济处于扩张阶段。新加坡由“进口替代”转向发展出口工业化时期，也是新加坡经济的起飞时期。1965年8月，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联邦。迫使新加坡政府在经济发展战略方向上作出新的选择，实行“出口导向”方针，即利用外部经济力量大力发展出口加工业，以此带动外贸、交通、通讯、金融等行业，实现经济高速增长。1967年底颁布的《经济扩展法案》，于1968年1月1日生效。这是对1959年法案有关新兴工业资格的内涵作重新界定，1968年新加坡政府设立国家贸易公司，以开辟国外新市场，大力发展对外贸易。1969年新加坡又在几个港区设自由贸易区，以加强转口贸易，进一步发挥海港航运能力。在吸取外资方面，从1968年起掀起了一股投资热潮，伴随而来的是新加坡开展的金融业务活动。8月，诞生了以美国花旗银行为主的金融市场。接着，金融业迅速发展起来。至1978年11月，新加坡黄金交易所正式成立，成为亚太地区第一家提供黄金买卖的交易所。

到1979年，李光耀执政已是第20个年头。在工业化迅速发展的推动下，新加坡的国民经济结构起了根本性变化。新加坡城市也从一个落后的殖民地都市变成了一个人均国民收入达8291新元，仅次于日本的闻名遐迩的新兴工业国家。

1979—1986年是第三阶段，经济处于调整、深化经济结构时期。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处于滞胀状态，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发展中国家也竟相走上工业化道路，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原有优势逐渐丧失。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下，如果继续让大量劳动密集型工业存在下去，势必处于不利地位。审时度势，新加坡必须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1979年7月，新加坡政府提出了为期10年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鼓励发展技术集约型工业，采用先进技术以提

高工业企业的技术层次，调整和深化经济结构。为此，李光耀充满信心，他认定：“新加坡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一定会成功。”

1980年是新加坡经济发展关键的一年，这一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05亿美元，人均收入达4600美元，这时新加坡经济已被世界确认为战后亚洲经济奇迹之一。1981年新加坡政府根据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基本精神，制定了“十年经济发展计划”，计划的总目标是以科技为基础，把新加坡建成一个现代化工业国。通过低工资转向高工资；以吸引外资为目标，奖励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工业的投资；鼓励“研究与开发”工作；加强科技教育和训练工作等措施，新加坡经济得到长足发展。虽然有石油危机的冲击，新加坡经济仍取得一定的进展。并且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经济衰退时，新加坡的发展是首屈一指的。

1986年以后，新加坡经济进入发展新方向时期，新加坡政府又逐渐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所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而且形成了一个包括短期、中期与长期的新政策、新措施体系。

从1959年李光耀执政到1992年退出政界的几十年中，新加坡的经济取得了迅速发展与令人瞩目的成绩，它的国内生产总值从1959年的19.68亿新元增长到1992年的644.2亿新元，增长了32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59年的404.5美元增加到1992年的14714美元，增加了35倍。以建立多元化经济结构为中心的经济战略得到了较好的实现：从一个以转口贸易为基础的、殖民地的、畸形的经济结构转变成了一个以制造业为中心，商业贸易、交通运输、金融、旅游与国际服务业全面发展的多元化经济结构；制造业内部结构也从一个以初级产品初步加工与港口海事服务的造船修船、机械工业为主的结构转变为一个以电子电气工业、炼油工业、工业用化学材料工业为中心的门类比较齐全、生产技术比较先进的制造业体系；贸易结构从以转口贸易为主转变成为以出口本国工业产品为主；在原有的转口贸易与自由港的基础上，目前新加坡已发展成为亚太地区的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航运等国际服务中心。

纵观几十年经济的发展，新加坡成功地由虾变成了龙。自1965年独立以来的29年中，除了1985年由于受世界石油危机的影响外，新加坡经济一直迅速增长，成为新兴工业国家，被称为亚洲的“四小龙”之一。值得重视的是新加坡的高速发展一直很平稳，无大起大落。李光耀主张靠平稳求发展，靠持续创高速。怎样做对经济有利就怎样做。新加坡是个争强好胜的国家，凡事都要争第一，但不愿挂上发达国家的名头。李光耀在1980年8月庆祝新加坡独立15年的大会上告诫大家：“我们不能以过去15年的成就而自满，时代是进步的，形势在不断发展，我们要谋求生存，确保成功，不能拘泥不变；只能追随进步的时代，适应变化的形势。……东南亚国家都步入工业化，他们有原料，又有比较廉价的劳动力，新加坡如维持原有的工业水平，势难与他们竞争，……新加坡的工业，不能以现有水平为满足，应该追踪日本，学习日本，向高度精密工业迈进。”重利不重名，李光耀就是这样一个务实的实用主义者。几十年来，李光耀领导的政府从不随波逐流，也不言从西方的流行观点，而且体察国内外动向，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李光耀政府的这种务实态度是新加坡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真谛。

“如果诺贝尔奖设最佳国家领导人奖的话，李光耀一定是得主，而且可能不只得奖一次。”这是香港《亚洲周刊》罗伯特·乌德卢在1984年11月

对李光耀的赞语。我们可以说，持这种看法的人，绝不只乌德卢一人。

李光耀，这位华人出身的新加坡政府首脑，身居弹丸之地，却作出了惊天动地的业绩。他在位 30 多年，经济发展成就令人瞩目。国际上许多专家、学者竞相研究他的治国经验，一些国家的首脑也竞相效仿他。李光耀以务实的态度发展新加坡，他总是根据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及时地采取灵活的、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1956 年新加坡自治政府建立时，面对转口贸易受到威胁时，就积极地推行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1968 年又根据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进行调整的情况，及时地将经济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70 年代末，新加坡又根据国内外的不利经济条件，提出了调整与深化经济结构的发展战略。由于经济政策过激，1985—1986 年出现了经济危机，李光耀等人及时检讨，提出新加坡发展新方向，在今后的 10 年内着重发展服务业。李光耀的这种务实精神保证了几十年来新加坡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使新加坡率先进入“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行列，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李光耀这位新加坡繁荣的奠基人，在 20 世纪的世界经济舞台上唱出了一场好戏，成功地使新加坡由虾变成了龙。其经济发展经验值得所有发展中国家借鉴。



## 印度大力发展农业 绿色革命挽救危机

1984年10月的最后一个早晨，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人之一——执掌印度总理大权达15年之久的英迪拉·甘地在总理宅邸和办公室之间的一道小门旁被她的警卫暗杀了。而仅仅在48小时之前，英迪拉还提起过她被谋杀的可能性，但她无畏地说：“当我死时，我的每一滴血都会滋润国家，增强一个统一的印度的力量。”在英迪拉遇难几天以后，人们发现了她不久前写下的遗书：“对待死亡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泰然自若……一小撮人在策划使我意外地死去。如果那样，我将坦然而去，但那些谋害我的人将备受煎熬。”就是这位为一个强大的印度而不知疲倦地奋斗了一生的英·甘地成功地推动了印度的“绿色革命”，使印度粮食能够自给。那屈辱地依靠别人的日子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英迪拉·甘地是印度在位17年的开国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独生女。她从小就受到祖父和父亲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的熏陶，这是尼赫鲁家族留给英迪拉的一份无价的遗产。完成学业后，英迪拉开始在印度政坛崭露头角，1955年任国大党主席。1966年，她打败了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登上了印度统治巅峰——出任印度总理。英迪拉以后的政治生涯非常曲折。她奇迹般地登上统治巅峰且深孚众望，旋即又在1977年的大选中出人意料地滑下低谷，随后再度急遽崛起，1980年重登总理宝座。第一次当政期间，英迪拉大力开展了“绿色革命”，旨在发展印度的农业生产。“民以食为天”，这是客观现实，英迪拉没有忽略这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印度独立之前。广大农民受到封建制度的束缚，在“猛于虎”的苛捐杂税的重压下，印度农业濒临破产的境地。印度每年需要大量进口粮食，但进口的粮食又何以能解决一个人口大国的生计？人民面临着饥饿的巨大威胁，多少人被无情的饥荒夺去了生命，又有多少人挣扎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最可怜的是孩子们，他们因饥饿而不得不流落街头，沿街乞讨。可他们又能讨到什么呢？人们都穷啊。1947年8月印度独立后，摆脱缺粮的困境成了新政府工作的重点，国大党还专门成立土改委员会进行土地改革，取消封建租佃制度，建立自营农制度，并且限制土地的持有数量。土地改革使农民所受的封建剥削有一定程度的减轻，但由于印度政府不敢触动地富的根本利益，穷困的农民仍然无法取得维持其生活的必需的土地，农民的境况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为此，尼赫鲁政府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把农业作为发展的重点，把增产粮食作为主要目标，规定对农业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如兴修水利，加强水土保持，实施乡村发展计划等等。这些措施推动了农业的发展，使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增加15%，粮食总产增加近1000万吨。但是，尼赫鲁政府制定的第二、三两个五年计划，却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或农业与工业平行发展，相应地忽视了农业的发展。这使得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农业增长率下降，1961—1965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4%，加上人口无计划地增长（年增长率竟达2.5%），又使得粮食更加短缺，年年入不敷出。印度每年进口粮食600万吨左右，最多的是1966年，进口粮食达1034万吨。整个印度经济陷入困境，很多人都在担心印度能否养活大量的和正在增长的人口。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已是历史的必然。

1964年尼赫鲁去世后，新上台的总理夏斯特里和当时的农业部长苏布拉姆尼亚提出发展农业的新战略，把尼赫鲁的以乡村建设为基础的农业战略转

向使用和推广新技术的绿色革命。夏斯特里仅仅当了 18 个月的总理就撒手西归了。他留给英迪拉的却是一个不好收拾的烂摊子。1965 年和 1966 年，印度两年干旱，几乎滴雨未下，这对经济支柱的农业来说，简直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饥饿的幽灵徘徊在全国大片土地上。由于对外贸易数额的减少，谷物的进口变得难上加难。物价急剧上涨，经济面临困境，公众普遍不满。最令人头疼的是喀拉拉邦居民已习惯吃稻米，拒绝吃其它粮食。为了号召喀拉拉邦居民暂时改变食物习惯，英迪拉宣布在有足够的稻米供应该邦之前，她本人也绝不吃米饭或接受稻米供应。

在这严重的危机面前，英迪拉在 1966 年上台之后，继承并大力推行了绿色革命。印度经济发展的重点自然就从以前的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到了优先发展农业上来。

英迪拉开展绿色革命不是盲目的，她是根据印度的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地开展了这场向天地要粮食的革命的。印度有着发展粮食生产的有利条件，地处热带与亚热带地区，有着优越的农业生产环境，作物一年可两熟、三熟，大部分国土是平缓的高原和平原，耕作条件相当好。印度地大，有耕地 21 亿亩左右，其中 50% 是冲积土和黑土，只要使用合理，可以取得较高的产量。季风气候使印度几乎全年都可以从事农业生产；高温季节很长，适于热带和亚热带作物生长；雨季雨水充沛，如果合理地加以利用，则足以保证农业用水。还因为，印度是世界第二人口大国，拥有众多的劳动力资源，农业人口占总人数的 75%。英迪拉政府正是充分利用这些发展农业生产的有利条件，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绿色革命。

所谓“绿色革命”，简言之，就是广泛引进农作物高产良种，提高复种指数，全面引进现代农业技术、提高农作物产量的革命。英迪拉针对印度当时作物产量低、复种指数低、缺乏现代农业技术的情况，因地制宜，选择条件好的地区首先开展绿色革命，以增加商品粮，解决缺粮问题。经过英迪拉及其部下们的日夜斟酌，雨量充足且灌溉条件较好的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和北方邦西部地区被选为首先开展绿色革命的“特区”。英迪拉政府在这些地区集中施用高产品种、化肥、农药，增加灌溉设施和改进习惯的灌溉做法，增加农业机械和信贷，管理好水，保证科学地用水，加大作物种植密度。科学地使用土地，推广各种现代化农业技术，从而在这一地区达到增加粮食生产的目的。

以后，绿色革命逐步向其他地区推广。而首先开展绿色革命的地区就成了其它地区的表率，同时为其它地区的绿色革命提供了一定经验，增加了商品粮产量。因此，选择条件好的地区首先开展绿色革命称得上是英迪拉的明智之举。

1966 年，印度引进墨西哥高产小麦，并扩大高产小麦品种的面积。1970 年，发展到 35%，1973 年增加到 57%，1976 年又进一步扩大到 70%。与此同时，菲律宾的高产水稻也被引进，这个品种特别适合恒河与印度河上游地区，因而大量种植，收到很好的产量。总之，大量引进高产粮种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扩大了耕种面积，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自绿色革命以来，英迪拉还不断地开动她智慧的脑筋，采取了比以前更大规模地利用外援进行农业投资的措施。她认识到，仅靠国内非常有限的资金对农业进行投资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和各国挂钩，同世界银行挂钩，争取引进尽可能多的外来资金，更好地促进农业的发展。1951—1952 年度到

1977—1978 年度，印度共接受农业贷款近 179 亿卢比，这些贷款对印度农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另外，政府还每年花费巨额资金对化肥、种籽、农药、农用水电和粮食进行财政补贴。1969—1970 年度政府对粮食的价格补贴为 0.3 亿卢比，至 1980—1981 年度增加到 65 亿卢比，在 11 年中增加了近 209 倍。这是一个显著的飞跃，充分表明政府对农业和人民生活的重视。

为了更好地推行绿色革命，印度政府还高度重视农业教育和农业研究。第六个五年计划（1980—1984 年，人民党拟定，英迪拉制定）同第一个五年计划（1956—1960 年）相比，政府用于农业教育和研究的费用，增加了 232 倍。另外，政府还举办了 20 余所农业大学，培养专门的农业人才；建立中央农业干部学院以培养精通农业生产及管理的干部人才，以提高干部的素质，优化农业管理；开办农业高级研究中心，选拔较高水平的农业技术人员进修；对农民进行农业技术教育和训练，使广大农民了解基本的农业生产知识，改进耕作方法，提高粮食产量。印度的农业科学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效，特别是在水的使用和管理、小麦、水稻、黍类、豆类以及杂粮育种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这些成果被推广运用到印度各地区，收效甚好。

然而，英迪拉推行绿色革命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她所推广的先进技术和先进设施并不能得到所有印度人的赞同。有一次，作家 V·S 奈保尔在拉贾斯坦的沙漠参观访问时，当地的政治家对英迪拉用管道向缺水地区引水表示“强烈的反对”，原因是按照传统习惯，人们只能饮用井水，对英迪拉并不崇拜的奈保尔转而同情英迪拉了。我们可以从中想象英迪拉在推行绿色革命时，总要有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必然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必然要历经重重困难。但是，为了增加粮食，为了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她不得不大胆打破印度的一些传统的社会习惯或宗教习俗，忍受一些人的不满和非议，甚至是仇恨。但英迪拉并不畏惧，正如她在遗言中写到的：“对我的任何仇恨都无法减弱我对我的同胞和祖国的热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动摇我的决心，使我放弃带领我的祖国走向前进的努力。”

尽管有人强烈地反对她，但她的人民，特别是那些贫穷到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人和腹中空空的人以及被蹂躏的那部分人仍然爱戴她。从国家的一端到另一端，数以百万的人席地而坐，聆听她站在讲台上发表讲话。英迪拉总是能深深地吸引住她的人民，尽管她讲的东西，他们并不能全部理解。有时为了能看上她一眼，人们也不惜顶着炎炎烈日或冒着倾盆大雨，在路边等候几个小时。她的绿色革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与帮助。

绿色革命取得了很大成功，它无疑是英迪拉的几大成就之一。1969 年，英迪拉就说过，她的经济政策将永远服务于“保护印度政治经济利益的最高目的”。实际上她也这样做了。绿色革命使印度农业生产率和粮食产量有了较大提高，商品粮得以大幅度增加。1967—1979 年粮食平均每年递增 3.3%，而在此前 10 年，每年仅增 1.2%。更为突出的是，在 1973—1974 年度到 1978—1979 年度期间，全印粮食总产量增长 26%。印度的商品粮主要集中在旁遮普、哈里亚纳和北方邦西部地区，它们提供了印度政府收购商品粮的四分之三以上。绿色革命取得的显著成果还表现在印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到 1977 年，印度不仅停止进口粮食，而且在 1978 年偿还了苏联 140 万吨小麦外，还向越南、印度尼西亚西、阿富汗等国出口粮食。印度人口增长与粮食供应不足的矛盾有所缓和，农民的生活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饿殍遍地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由此，英迪拉得到了下层人民的拥护和热爱。

1977年，粮食危机已基本解除了，英迪拉该松口气了吧，然而就在这一年，她却被人民党拉下总理宝座。大选失败之后，英迪拉又被人民党监禁起来。在她被短暂监禁期间，上万人不惜以坐牢来抗议人民党的这一行为。人民党在巨大的压力下释放了英迪拉。此后，如潮涌般的人群特别是穷人聚结到她身边，成为英迪拉的忠实支持者，使她得以在短短的3年后东山再起。因此可以认为，《经济学家》杂志将她称为“印度女王”是不算过分的。她所肩负的重任“使喜马拉雅山都显得渺小”，她所推行的绿色革命不失为印度历史上一页光辉的篇章。英迪拉为自己是个印度人而感到自豪，同样，她的人民也为有这样一位女总理而感到骄傲。

民以食为天，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像印度这样一个人多、地大、贫穷、缺粮的国家，农业无疑占有重要地位。强调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把农业政在首位，应是印度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事件。1966年，印度女政治家英迪拉·甘地上台时，印度正面临粮食严重短缺的危机时刻。针对这种情况，英迪拉从广袤的国土上找到了印度发展粮食的优势，即是优越的自然条件、土地肥沃、可耕地比例大、劳动力资源丰富等因素。基于这种认识，英迪拉果断而大胆地排除世俗和宗教的偏见，推行了适合印度农业发展的，旨在解决粮食危机的“绿色革命”。英迪拉十几年不懈努力，把环境优势加以科学地利用，取得了好的效果。到1977年，印度基本上停止了粮食进口，并有少量粮食出口，基本解决了6.8亿人的吃饭问题。这不能不说是英迪拉一生的一项不小的成就，她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的举措和成功的经验值得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借鉴。

## 利比亚卡扎菲施计 外国石油公司就范

1969年8月31日夜晚的黎波里一片宁静，劳累了一天的人们早已伴着地中海的凉风进入了梦乡，没有谁知道发生了“地震”。9月1日早上6点30分，广播里传出的声明使人们睡意全消：伊德里斯国王已被推翻，一个由青年军官组成的革命指挥委员会接管了政权。一周以后人们才知道一个27岁的年轻人成了国家元首，这个年轻人就是穆阿迈尔·卡扎菲。卡扎菲1942年9月出生于利比亚锡尔特附近的一个贫苦的贝督因人家庭，他在中学时期就受到纳赛尔思想的影响，开始参加政治活动。1963年他考入班加西军事学院学习，建立了自由军官组织，进行推翻伊德里斯王朝的活动。卡扎菲执政后，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撤除了美国和英国的军事基地。他即将在利比亚的外国石油产业收归国有，正是这一举措使他名扬国际政坛，他成了国际上第一个把石油作武器的领导人。

利比亚是非洲北部濒临地中海的一个阿拉伯国家，面积约176万平方公里，境内大部地区为海拔500米的高原，95%以上是沙漠和半沙漠，北部沿海一带为平原，南部散落着一些绿洲，荒漠的土地下埋藏着巨大的财富——石油。1952年元旦，利比亚获得独立，实行的是君主专制统治，谈不上什么工业，经济上完全依赖英国和美国，英国和美国租用军事基地的租金是王国最重要的经济来源。1959年石油的发现，才彻底改变了利比亚人的观念和生活，把利比亚人带入了20世纪。

发现石油的消息一经传出，各大石油公司像狗找骨头一样涌入了利比亚。国际石油公司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看中了亲英美的伊德里斯王朝，看中了在这个国家里存在的英美两国的军事基地所起的保护作用。一时间，利比亚的城市到处挤满了石油人士、顾问、银行家、骗子和政治家，你抢我夺，像是赌博，到处乱哄哄，他们的脑子里只有“石油”这两个字，他们抛出几个金元便轻而易举地从王国的大臣们手中攫取了石油开采权。这帮人利用王国政府在石油税收方面的无知，他们向利比亚政府提出劝告，只花去少量的一点钱就按照自己的意愿订立了理想的合同，这样的合同极大地损害了利比亚人的利益，使国际石油公司品尝到了生活在天堂的滋味。国际石油公司利用自身的经营和市场优势、技术和资金优势，任意规定原油标价（又称参考价，是石油生产国为向在当地开采石油的西方石油垄断公司征收油矿土地税和石油税而制定的一种作为税收依据的价格，不是石油在国际市场出售的实际价格），疯狂地进行开采，财源滚滚流进了他们的口袋，一个个心里乐得喘不过气来。而利比亚则未得到多少好处，人民生活依然贫困，只有那些王公大臣和与王室关系密切的人员鼓起了腰包，贪污、舞弊、裙带风充塞着整个利比亚，特权阶层的醉生梦死，过着奢侈腐朽的生活，任由外国资本对国家宝贵资源的疯狂掠夺和破坏。

外国资本对利比亚资源的掠夺深深地刺激着青年卡扎菲，他从纳赛尔的《革命哲学》中读到了这样的句子，“石油是物质文明中重要的因素，没有石油，所有机器都将停止运转”。纳赛尔把石油作为阿拉伯力量的三大支柱之一，只有卡扎菲读懂了他的含义，他虽然不是世界上第一个知道石油重要性的领导人，但他无疑是世界上第一个知道如何使用石油来达到自己目的的领导人。他决定以石油作为与外国公司战斗的武器，向他们讨回公道，夺回利比亚人民应有的权利，维护国家的资源主权。

凡事预则立。卡扎菲在行动之前是作了充分的考虑的：一是利比亚1969

年的原油日产量达 300 万桶，产量已跃居世界第 4 位，完全成了产油大国，它在国际石油市场的影响力是可以想像的；二是利比亚石油埋藏浅，纯度高，含硫低，属优质油，在国际市场十分抢手；三是利比亚与其他产油国相比距离欧洲更近，欧洲国家用利比亚的石油更为划算；四是外国石油公司在利比亚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只要还有利可图，他们是不会轻易撤出利比亚的。这四条坚定了卡扎菲与外国公司作斗争的决心。正如利比亚政府中的经济界人士说道：“如果按照我们定的价格，利比亚的石油在国际市场上碰到困难，那么我们就仍将让它留在地壳里。利比亚人在过去没有石油的情况下已经生活了 5000 年，今后我们照样可以在没有石油的情况下生活”。

1969 年底，利比亚同相邻的阿尔及利亚达成了石油开采技术合作协定，以此来提高美国公司在阿尔及利亚获得开采权时所付的代价。1970 年 1 月，卡扎菲召集在利比亚的外国石油公司的代表开会，提出每桶原油标价多收 40 美分。同时，国家石油公司也向外国石油公司提出意见，要求利比亚政府在石油生产中的份额增加 20%。外国石油公司在听到这些意见后，并不以为然，根本未予理睬。他们固然是出于不愿从所得到的利润中分出更多的份额，同时他们也担心利比亚提出的要求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其他产油国同样起来与他们作斗争，要求涨价和扩大份额。以前的伊德里斯国王也曾提出过类似要求，他们根本未予理睬，结果是不了了之，他们一直都是赢家。然而这一回，他们彻底错了，他们根本不了解卡扎菲、他们将为自己的自命不凡付出代价。

卡扎菲和他的战友们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很快就找到了突破口，那就是在利比亚的美国公司——西方石油公司。西方石油公司于 1966 年进入利比亚投标找油，1967 年 9—11 月间发现了奥几拉大油田，但由于美国的其他公司歧视它，它不得不自力更生地建立自己的炼油厂、输油管道和销售渠道。从而由小小的公司一跃而成了大公司。这样一来，就使西方石油公司几乎所有的家当都摆在了利比亚，到 1969 年，公司在利比亚的产油量占了公司全部产油量的 90% 以上，可以说利比亚的油田成了它的命根子，而其他的大石油公司则不是这样的。于是，利比亚政府通知西方石油公司，认为公司每天产油 80 万桶，远远超出了资源保护的允许值。6 月 12 日，利比亚要求西方石油公司把石油产量降为每天 50 万桶，8 月 19 日，又要求降至 44 万桶。这样做的结果是虽然在利比亚的所有石油公司都被勒令减产，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损失，但西方公司首当其冲，损失最惨重。

西方石油公司也不是那么好惹的，它可不甘心不作抵抗就投降，公司总裁试图与其他在利比亚的大公司一起，联合对抗利比亚。他找到世界上最大的埃索石油公司的总裁，希望埃索公司能卖给他石油，“照原价，加上合理的利润，比如 10%”，来弥补在利比亚的缺额以完成合同。这个时候到哪里去找原价，由于叙利亚关闭了将沙特阿拉伯原油运送到地中海口岸的输油管，造成石油价格大幅度上涨，埃索公司当然不干，要求按浮动的市场价格卖油，西方石油公司的努力成为泡影。卡扎菲知道西方公司不会成功，于是在 8 月下旬使出了杀手锏，宣布将对西方石油公司的油田实行国有化，但如果西方公司同意每桶原油多付出 30% 的价钱。它就可以把生产恢复到几乎相当于原来的水平。这样一来，两方石油公司再也沉不住气了，双方坐到了谈判桌前。西方公司同意每桶原油价钱提高 30 美分，并且同意在今后 5 年内。每年每桶再多付 2 美分，税率由原来的 50% 提高到 58%。卡扎菲赢得了第一

个回合的胜利。

西方石油公司与利比亚的协议一经公开，立即在西方国家石油公司中引起了震荡。一些在利比亚有利益的公司叫苦连天，怒不可遏，英国壳牌公司的人说，“西方石油公司的作法，不是退缩，就是溃败。”而先前拒绝支持西方石油公司的那些公司则咬牙切齿，悲恸欲绝，后悔莫及，他们一下子明白了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9月7日，美国国务卿与石油公司首席决策人代表团举行会议，讨论利比亚石油问题。除了大家都认为利比亚情况严重外，会议作不出任何决定。这时，某些大石油公司困兽犹斗，英国壳牌石油公司和英国石油公司还试图组织对抗。大卫·巴兰爵士拜访了美国所有的大公司，希望大家联合起来并肩战斗。但是利益决定了一切，索科公司和德士古公司很快接受了利比亚的条件，其他公司也先后接受了利比亚的条件，国际石油公司在利比亚败下阵来。

“利比亚的要求就像闪电划破了夏天的长空，显示出新的形势”。卡扎菲的行动极大地鼓舞了其他产油国，他们以利比亚为榜样，发起了捍卫石油资源和主权的斗争，伊朗、阿尔及利亚、伊拉克、科威特等国都宣布将石油开采税提高到55%。1970年12月9日，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举行部长级会议，提出了提高原油标价和税率统一的要求，并决定采取集体行动。1971年1月，石油输出国组织与西方国家的石油公司在德黑兰举行会议。2月，签订了德黑兰协定，把税率从50%增加到55%，原油标价每桶加价35美分。西方国家石油公司还被迫与地中海成员国和拉丁美洲成员国签订了相类似的加价和增税协定。这些协定，打破了西方石油垄断组织单方面制定原油标价的特权，1972年和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又两次迫使西方国家石油公司同意提高原油标价，以弥补美元两次贬值给石油输出国所造成的损失。这两次提价标志着国际石油垄断组织制走原油标价，任意掠夺廉价原油时代的结束，宣告了产油国独立行使制定原油标价主权新时代的开始。卡扎菲功不可没。

要捍卫国家的石油资源和主权，仅提高石油标价和税率是不够的。关键的问题是油田的所有权不在利比亚国家手中，西方国家的石油公司拼命开采，仍大获其利，利比亚的资源带给人民的财富远远不是人民应该得到的，卡扎菲清楚地认识到了这点，为了祖国为了人民的利益，他还得继续与那些石油公司斗下去。

1971年底，利比亚宣布对外国石油公司的油田开始实行国有化运动，要求外国油田股份的51%归利比亚所有。卡扎菲首先把矛头对准了英国的公司，因为英国念念不忘自己曾风光一时的殖民统治，时常插手阿拉伯国家事务，长期对阿拉伯国家采取不友好态度。12月7日，卡扎菲宣布对英国石油公司在兴旺的萨里尔油田所占的50%的股份实行国有化。英国人企图以其他石油公司抵制萨里尔石油的销售来进行报复，但是卡扎菲让油田的石油在苏联和东欧找到了广阔的市场，又让意大利扩大了对它的需求，英国人无可奈何，只有接受条件。到1973年，利比亚对所有在其土地上开采石油的其他西方国家石油公司的股份都提出了51%的股份要求，石油公司大都被迫答应，因为即使这样，石油公司仍十分有利可图。对那些拒绝接受条件的公司；如亨特石油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卡扎菲绝不手软，立即将它们国有化了，1971年10月；卡扎菲还宣布提高石油价格，即提供给各石油公司的由利比亚政府掌握的国有石油股份原油从每桶6.9美元提高到每桶

### 7.1 美元。

卡扎菲对在利比亚的外国石油公司实行的减产、提价、国有化和增加本国参股权等措施，极大地削弱了西方石油财团在利比亚的垄断地位，维护了国家的资源主权，大大增加了国家的收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970年利比亚石油收入达13亿美元，比上年增加2亿美元，1973年增加到23亿美元，1974年猛增到60亿美元，1979年更达到163亿美元。石油收入的增加，使利比亚得以发展其他产业，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内生产总值从1969年的38亿美元上升到1974年的137亿美元和1979年的245亿美元。人均收入也从独立时的几十美元增加到1979年8170美元，这个数字比同期英国和意大利的平均数还要高，成了非洲大陆发展最快、收入最高的国家。

卡扎菲在利比亚领导的这场斗争，以利比亚的胜利而告终。时代造就了卡扎菲，卡扎菲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个时代。卡扎菲的成功，在于他根植于利比亚的土地，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在于他在战略上和战术上做得恰到好处，充分利用了资本家唯利是图的弱点而各个击破之；在于他顺应时代的潮流，率先为第三世界国家以资源作武器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进行斗争做出了榜样，第三世界国家由此而引发了一场震撼世界的。冲击西方经济的石油斗争。正因为他触痛了西方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心，才遭到了一些西方国家的仇视和诅咒，美国更是对他恨之入骨，数次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但迄今为止还未达到自己的目的。



## “声东击西”英资惨败 “合纵抗强”船王得胜

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对香港经济命脉的掌握，就成了华资和英资经济势力的较量。自从1842年鸦片战争以后，香港沦为英国的殖民地，经济命脉长期被怡和、太古、会德丰、和记黄埔四大英资集团所操纵。从70年代起，以李嘉诚、包玉刚等为代表的新兴华资财团形成“合纵”一方，联手与英资财团抗衡。他们抓住机遇，多谋善断，主动出击，通过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而惊心动魄的收购大战，大大削弱了英资财团的实力，造就了香港新的经济格局。九龙仓位于香港著名旅游区和商业区尖沙咀的西侧，是全港最大的码头，拥有资产18亿港币，侄九龙仓一直归英国著名财团，号称“地王”的怡和洋行所控制，九龙仓有限公司的产业，包括位于九龙尖沙咀，新界和香港岛上的一些码头、仓库、酒店、大厦、有轨电车以及港九之间的小型轮渡，可谓是一家有钱有势的大洋行。而能与英国财团争夺九龙仓者，只有两家华人财团，那就是地产商李嘉诚和船王包玉刚。

1977年，香港经济界开始忽然注视英资怡和财团控制的九龙仓。

九龙仓原为怡和集团的一员“悍将”，在70年代，怡和集团通过九龙仓将天星小轮及电车公司股权全部收购。而且，海运大厦的建成，为九龙仓在尖沙咀重建展示了美妙的前景。但是，这样却导致了大量投入和资金一时难以回收，资金流动十分缓慢，结果令公司负债累累。影响了其股票的市值。

怡和集团是操纵香港的四大势力之一，是一个老牌的英资集团。在70年代初期，怡和集团的发展已基本成型。其总公司是怡和洋行，经营的业务包罗万象，怡和洋行又控制着怡和系内其他上市公司，如置地、九龙仓、海港企业、天星小轮及电车公司等。

由于怡和洋行向外发展失败，投资效益欠佳，盈利停滞不前。于是，怡和集团在香港投资者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面临着华资财团的挑战。又由于怡和是借债发展的，九龙仓的大部分股票掌握在众多散户手中，怡和只占一部分。因此，对之心怀收购之心的财团大有人在。例如精明莫测的李嘉诚早在1978年初就开始偷偷吸纳九龙仓股票，企望在不声不响中完成收购计划。

当时，有“船王”之称的包玉刚正着手他的“登陆计划”，准备向陆上拓展，目光敏锐的包玉刚当然没有看漏九龙仓。如果得到九龙仓将会给他的日后登陆战役的顺利进行铺平道路，九龙仓拥有完善的货运设备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故能得到包玉刚的青睐。此时，包玉刚的资产仍主要在船队上，而九龙仓背倚九龙，面临广阔的海洋，与他的船队事业正好结合，包玉刚因此对九龙仓志在必得。

1978年初，包玉刚就开始不太明显地吸纳九龙仓股，希望能取得对九龙仓的控制权。他暗中去调查持有九龙仓股票的散户，然后找上门去与之交涉。绝大部分人一见包玉刚亲自上门，出于对包氏的尊敬。忙把手中的九龙仓股票悉数转让给包玉刚。

经周密调查，包玉刚发现李嘉诚是众多散户中的“大户”，持有九龙仓股票1000多万股，曾想暗中收购九龙仓。但由于自己的出现及汇丰银行的介入，形势峰回路转，李嘉诚一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包玉刚分析李嘉诚的意图：李氏生性老谋深算，从不意气用事，一定不轻易冒毫无把握取胜及得罪汇丰银行的险，李氏一定在暗中摇摆不定。

为了不让李嘉诚倒向怡和，包玉刚决定主动出击，先发制人。1978年7月的一个晚上，包玉刚秘密约见了李嘉诚。在中环文华一间幽密的客厅里，一个海上巨人和一个陆上巨人相见了，两人虽是第一次谋面，但都早已熟知对方大名。特别是李嘉诚一见包玉刚立即感到，果然是一个豪气昂然之君，敬意油然而生，两人一见如故，双手紧握。一阵寒暄之后，话锋转到正题，购买怡和洋行的股票上，李嘉诚提出愿把已购得的九龙仓2000万股票，转让给包玉刚。

包玉刚岂能不知“转让”的代价？他已了解到，并不是李嘉诚不想要九龙仓，而是他正在筹划收购另一家英资洋行——和记黄埔，这比九龙仓更为重要。李先生更有自知之明，他毕竟是刚刚崛起的富翁，若两地都要，等于两个拳头同时出击，不仅无此实力，相反会被英资洋行钻空子，对己对华人财团均不利。如主动“转让”，包玉刚刚可帮李搭桥，从汇丰银行中承接英资和记黄埔股票9000万股。到那时，和记黄埔的董事会主席非李莫属。两人都心照不宣，伸出手，击掌定盘，皆大欢喜。

为什么说皆大欢喜？因为李嘉诚是有名的股票商，他买股票是从每股10元买起，最后到每股30元。“转让”给包玉刚，却以每股30余元脱手，仅这笔交易，即可获利两三千万港元。同时，他不费吹灰之力，又从包玉刚手中接过了和记黄埔9000万股票。而在维护华人利益上，又为包玉刚买下九龙仓铺平了道路。这叫他怎能不喜？

而包玉刚素以精明练达闻名于市场角斗之中，对这神明知吃亏的事却能视而不见，个中原因就在于他表面上损失了几千万港元，而把三号英资和记洋行的9000万股黄埔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卖李嘉诚，更是损兵又折将，但他实际获得的东西比失去的更多。他从李氏手中接过九龙仓2000万股票，再加上他原有的一些股票，他已经可以和怡和洋行公开竞购，一旦获胜，他就可以稳操价值10亿美元的九龙仓。这叫他怎能不高兴。而这笔交易是秘密进行，当时惟有天知地知，包知李知，怡和洋行完全蒙在鼓里！

怡和洋行向来傲慢，把和他竞争的对手，看作是乌龟和兔子赛跑，以兔子自喻。它发觉李嘉诚在购买九龙仓股票，后又见李停手不干，包玉刚接手购买，便嘲笑包玉刚比李嘉诚更不如，它这只兔子笃定可以去睡觉了。哪知包玉刚的攻势比李嘉诚更为猛烈，大刀阔斧干起来，仅用80天时间又吸入了另外1000万股，一下子占有30%的九龙仓股票，大大超过了怡和洋行，顺利地加入了九龙仓集团董事局。

1978年9月以来，香港股市大幅下跌，包玉刚一直在不太明显地吸纳九龙仓股，希望能取得对九龙仓的控制权。而怡和集团也不甘心放弃。也正暗中收集九龙仓股。在双方的吸纳下，九龙仓的股票扶摇直上。两家已由暗斗转向明争。1980年1月，怡和集团首先有些按捺不住，开始蠢蠢欲动了。首先出招的是“铁三角”计划，由置地公司发行新股，购入怡和证券手上的九龙仓股。同时，怡和又售出大批股票和地产，投资9.8亿，准备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包玉刚是何等乖觉精明！他早知怡和洋行会做出反击，到4月初，他突然宣布把九龙仓股票转卖给隆丰国际有限公司，作价每股55港元。不知内情的人，均以为包玉刚被怡和洋行的反击吓坏了。他们不知就里，隆丰国际有限公司乃是包氏财团下属的一间上市公司。包玉刚转此一手是名转实不转，不但不是退却，反倒是做好了决战的准备，真不失为一招进可攻退可守的妙

棋！一旦得手即可得到九龙仓，一旦失利赔掉一个隆丰，就能推卸全部法律责任，此乃舍车马保将帅的高招。

怡和集团老谋深算，又出奇兵，希望能出奇制胜。它趁包玉刚正在巴黎的时机，突然由置地公司宣布以“两股置地新股加75元6角周息10厘的债券”购入九龙仓。

怡和摆出一副决一死战的架势，隆丰集团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不免有人惊惶失措。

远在巴黎的包玉刚接到告急以后也有点大惊失色。但他不愧为沙场老将，他慢慢地冷静下来，精心策划，准备针锋相对、迎头痛击怡和。包玉刚并没有回香港，而是取道去了英国伦敦。

船王很熟悉伦敦，也喜欢这个“雾都”。他与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是至交好友。此时此刻，船王的心也像伦敦一样罩着一层浓雾，能不能筹集到巨款，压倒怡和洋行这个地王？当飞机在希思罗机场降落后，他就驱车直去伦敦城，与汇丰银行的副总经理协商，最后去找桑达士的继承者沈碧。沈碧继任汇丰银行的首脑后，和包氏的环球集团仍保持密切的伙伴关系，将股份维持到37.7%。包氏懂得银行是企业的输血机构，企业是银行的造血系统，两者一旦结成伙伴关系，谁也少不了谁。能得到沈碧的支持，战胜怡和洋行就有了一半希望。

那些与包玉刚有联系的伦敦金融机构，都表示愿意借款给船王。这使他心里有了底，感到巴黎飞抵伦敦这一着棋走对了。他马不停蹄地当即驱车去希恩罗机场，搭班机星夜返回香港。

包玉刚回到香港以后，立即举行了全港记者招待会。会上，他当众宣布：怡和洋行趁他人不在搞突然袭击，以每股100港元收购九龙仓股票。他决定迎战，在两天内向股市收购股票2000万股，每股出现金105港元。与此同时，又在全港各大报纸上登载大幅广告宣布反击。这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顿时全港轰动，家喻户晓，那些手中持着九龙仓股票的人成群结队地涌向和记大厦，抛售九龙仓股。在短短两小时之内，包玉刚以21亿现金买入2000万股九龙仓股。

怡和洋行闻听包玉刚的宣布，犹如当头炸了一个晴天霹雳、现金收购2000万股股票，他们是输定了。但他们不相信包氏两天之内能拿出如此多的现金——21亿港元。然而，事实是无情的，包玉刚像变戏法一样，从23日上午9：30分开始付款，股市经纪人全部出马还是应接不暇。包玉刚果真履行了诺言，在两天内付出20多亿港元，收足了2000万股股票，从而以拥有5000万股股票压倒怡和洋行。出任九龙仓董事会主席。怡和洋行只得认输败北。

船王一跃成为第一个非怡和洋行的华人九龙仓主席。由于这场闪电战是一场动用巨额资金的权益较量，使得不少人呆若木鸡，出不了声。人们全被这位平素不太在交际场台中露面的船王的气魄、胆略，雷厉风行的果断、刚毅的性格和气质所折服。实际上，收购九龙仓股权是一个长期投资计划，从暂时经济获益的角度可能一下子看不清它的意义。但是包氏此举深得在港华人的赞赏，他的声望从此与日俱增。

“声东击西”是兵法上常用的谋略。是指为了迷惑敌人，表面上宣扬要攻打这一方面，其实是攻打另一方面，是造成敌人错觉的一种方法。“合纵抗强”，是战国时期公孙衍和苏秦发起并实施的外交谋略。这一谋略，起于公元前333年，秦国经商鞅变法，国势日盛，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

家。燕、赵、韩、魏、齐、楚等六国为了不被强秦所灭亡，采取“合纵抗强”之谋，联合起来对付秦国，从而使战国七雄的局面维持百年之久。在现代商战中、竞争的各方实力参差不齐，有声名显赫、实力雄厚的大财团，它们属于“强”的一方；而更多的中小企业其财力人力均有限，属于较弱的一方。这些实力较弱的企业为了免遭“弱肉强食”的结局。往往会以各种方式联合起来，以群体的实力来与“强敌”抗衡，从而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包玉刚九龙仓收购战的成功，不仅在于他的胆略和气魄，还在于他成功地运用了“声东击西”和“合纵抗强”等战略思想。当他仅用 80 天时间就吸纳了 1000 万股，加上李嘉诚转让的 2000 万股，一下子就拥有九龙仓股票的 30% 以后，又突然宣布把九龙仓的股票转卖给隆丰国际有限公司以造成怡和洋行的错觉。另外，由于怡和洋行是一个英资在港的实力雄厚的大财团，即使是李嘉诚或包玉刚，也都艰难与之相匹敌，因此，他们只有联合起来抓住“强”方的弱点和夫误，集中他们的群体优势兵力，主动出击，才能最终战胜强敌。九龙仓之战就充分体现了“合纵抗强”的新的内涵。

## 不列颠闹通货膨胀 “铁女人”行货币主义

1979年初，不列颠满地积雪，一片沉闷的气氛。公路货运司机们罢工的口号在空气中久久回荡，停止干活的浪潮席卷了全国，无数吃尽了苦头的下层劳动者奔波呐喊。不列颠大地在颤抖。通货膨胀明显地摆在所有的英国人面前，100万贫困线以下的工人似饥饿的小鸟，嗷嗷待哺。不列颠，这个强大的岛国，实在是衰病得不行了，喘着重重的粗气，显得死气沉沉。人们站在十字架下，诚惶诚恐，翘首以待，呼唤着“救世主”。5月份，大西洋上吹来的海风，挟着春天的诱惑，向人们报告着一个消息：一个新的执政领导诞生了，她，就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一位女性。人们似乎从她自信的眼里看到了希望，他们确信她会带来温暖，他们相信自己的命运会得到改变。

那是1979年5月3日，英国大选，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率领的保守党以在下院多出44个席位的多数执政。她本人荣登英国首相宝座。

在史密斯广场大楼，玛格丽特第一次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感情，热泪盈眶，激动万分。首相这个礼物实在让她开心了。她应该高兴。高兴的泪水里，流淌着她历经的艰辛。

她于1925年10月13日出生在英格兰中部林肯郡宁静的格兰瑟姆镇，父亲是一位默默无闻的杂货商。笃信基督的她实在不是一匹驯顺的羔羊，按中国十二生肖来排列，她属牛，而且确切地说，她是一条犟牛。在1976年，她曾攻击苏联扩张，而被苏联报刊回击，说她是“可怕的冷战的巫婆”，是“铁女人”。从此，铁女人的绰号流传于世。在34岁那年，她以比前任议员多3500张选票的结果获胜，成为一名保守党议会会员。从此，她踏上了坎坷的政治之路。

在以后的日子里，不管情况怎么糟，她总是努力坚持，信心百倍。她的勤劳、友爱、牢不可摧的自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以及她无与伦比的口才、遇事果决的魄力。让睹其风采的人似乎看到了英国未来的希望。人们果断地把信任投给了她，她终于登上了政治的顶峰，拿到了开启伦敦唐宁街10号大门的钥匙。

在她面前，拓展出一副更广阔的视野。舆论把所有的荣耀都赠与了玛格丽特。“撒切尔以全新的面貌登上了帝国首相的宝座。她的胜利不仅在英国史上而且在西方世界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先例。”“撒切尔的大选获胜给英国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是领袖的个性本质的体现。它不是一般的政治转折，而是根本性的转变。在这次大选中，工党政治和社会主义似乎一败涂地。”“她的上台标志着跟威尔逊、希思、卡拉汉（及更早的首相们）的做法实行决裂。”“撒切尔夫人登上首相宝座，好似大西洋上吹来一股清新的海风。”如此等等。撒切尔夫人仿佛应该翩翩然了。

然而，高兴似乎为时过早。激动过后，撒切尔夫人不得不平心静气。摆在她面前的形势实在不容乐观。人们对她的评价，与其说是褒扬，不如说是期望。期望她能在“谁能治理好英国？”这道题目下做出一篇好文章来。

撒切尔夫人的前任是1976年接替威尔逊的工党领袖詹姆斯·卡拉汉，他在发生“愤怒的冬天”和剧烈的产业动荡以后下台。卡拉汉理应下台，他做得实在太糟，留给撒切尔夫人的只是满目疮痍。

那时候，很多工厂、医院和学校关了门。地铁停止运转，掘墓人不再掘墓，连清扫垃圾的人也在罢工，弄得大街垃圾遍地、老鼠成群。物价像断了

线的风筝，不断上涨。122 万的失业大军，从一家工厂的大门踉跄到另一家工厂的大门，盼望着一个茫然的未来。在农村，1950 年尚有 30 万匹使役用的马，此时只剩下 3500 多匹。国家收支出现巨额逆差。卡拉汉政府所宣布的 5% 的限制收入政策，不但没起作用，反而成为引逗通货膨胀这条公牛的红布。撒切尔夫人上台时，通货膨胀率高达 10%，而且还有不断上升的趋势，成为一种以不同方法影响着不同类型生活者的令人不安的力量。英镑受到了威胁，国际竞争能力下降，这又直接影响到贸易收支平衡。

这还不算，放眼一看，西欧大陆的伙伴们已把它丢得太远了。

就在撒切尔夫人上台的前一年，人均财富超过英国 50% 以上的国家计有：西德、荷兰、挪威、丹麦、比利时和瑞典，法国恰好超过它的一半。最难让英国人接受的事实是：大英帝国衰落了。在资本主义的黄金发展时期，不列颠不过是喘着粗气跟着小跑了一段。正如 1979 年大选之后，新任财政大臣杰弗里·豪在他的首次预算报告中说的一样：“在过去几年中，我们的相对衰落的铁的事实也越来越清楚了，绝对衰落的威胁，已经逐渐变得非常真实。”

撒切尔夫人走马上任时，她曾引用天主教圣徒、方济各会和方济各修女会创始人圣方济各的话向国人承诺：“凡是出现不和的地方，我们要为亲善而努力；凡是发生过错误的地方，我们要纠正；凡是产生过怀疑的地方，我们要努力树立坚定的信念；凡是有悲观失望的地方，我们要赋予希望。”5 月 15 日，她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在下院发表演说，宣称该年的选举是个“分水岭”，暗示了她要大刀阔斧进行改革。

要改革，从何入手？那时企业开工不足，工会无法无天，福利负担沉重……，然而，最重要的还是惊人的通货膨胀，它在人们心中的阴影无法抹去。正如撒切尔夫人曾说的那样：“通货膨胀从道义上讲是害人匪浅的恶魔。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虽然可憎，然而通货膨胀更狰狞，是我们的头号死敌，我们必须消灭它。”不言而喻，只有控制住通货膨胀，才能为经济持续与稳定的增长创造条件。然而，要控制通货膨胀，实在不是一件易事。撒切尔夫人当时曾对以色列的梅厄夫人说过：“这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然而，我们并不是诚惶诚恐的朝圣者，即使前进道路上布满荆棘，我们也绝不后退半步。”此时的撒切尔夫人真是一往无前，拿出“铁女人”的风范，要行动了。

撒切尔夫人不是经济院校的毕业生，也不曾经商理财，从政后也没有主管经济工作，然而，她并非对经济一窍不通。希思政府的卫生和社会保险大臣基思·约瑟夫爵士的思想，1958 年退出麦克米伦政府的伊诺克·鲍威尔的观点，利物浦大学学者帕特里克·明福特的见解等，她都曾一一领教。何况，她那位对她一生影响很大的杂货商父亲的精于计算。克勤克俭，使她在童稚时期就懂得管好钱、节省零用钱及健全货币的重要性。在反通货膨胀方面，她应用这些理论和经验对症下药，时间一到，疗效果然不错。后人把她的经济政策上升为理论：货币主义。

其实，撒切尔夫人不是货币主义的发明家，她只是一个坚定的实践者而已。货币主义是由一个叫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提倡的，它继承了 19 世纪经济学家戴维·里卡多的思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在德国分化出社会市场思想，让德国人蓬蓬勃勃地干出了一番事业。在英国，1974 年 9 月 5 日，基恩·约瑟夫爵士发表讲话，第一次把货币主义的新经济思想介绍给英国。而英国第一个实行货币主义的财政大臣是工党的丹尼斯·希利。当然，真正挽

起袖子大干的还是撒切尔夫人。

货币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货币是一道杠杆。它无形地操纵着国家的经济和生活。工商业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稳定都依赖于货币运行的规律，依赖于货币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货币流通额和经济状况之间存在着极其重要的关系。通货膨胀不是由于工资和物价的增长引起的，而是由于政府印行钞票泛滥造成货币积累过剩导致的。通货膨胀率的高低是由货币供应量决定的。解决通货膨胀的出路在于：国家在宏观上依据经济形势确定一个具体指标控制货币供应量，减少公共开支。政府不应干预失业或生产产量问题，在经济和工业方面介入得越少越好，即放弃经济管理而把它交给市场力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依托个人的能动性和责任感，让货币自动增值，使经济步入正轨。

货币主义的指导思想是自由主义，即依靠市场的自由调节和经济活动参与者的主观能动，国家的行动只须落在货币供应量这个出口，即把好这个关，之后便用不着过多插手经济事物，以免帮倒忙，费力不讨好。”我们管得太多，花费太多，征税太多，借钱太多，用人太多”。约瑟夫这样说，其结果自然很糟。而单个的经济活动参与者呢？撒切尔夫人有言：“宗教教导我们，每个人都是宝贵的。一个人必须在自救下做出努力。”“关心自己，为自己负责是理所当然的。”当然，还要”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别人。”即人们在基督的眼光下，自爱爱人，发挥主观能动性。

在具体措施上，撒切尔夫人采取了：

第一，严格控制货币供给量，辅以高利率和高汇率两个宏观经济手段。撒切尔政府摒弃卡拉汉工党执政时期 8—12%的货币供给指标的增长率，而把这一增长率降为 9%。既然通货膨胀的罪恶源头在于滥发行货币，那么就在此小心，再小心，以免让沉甸甸的货币把国民经济给压趴下。对货币发行量的控制伴之以高汇率和高利率政策。英镑实际汇率一直上升到 1981 年，与 1979 年相比，升值 14%，对降低通货膨胀率先起了先导作用。在高利率政策上，为期 20 年的政府债券的长期利率在 1981 年达到了 14.7 的高峰，这吸引了大量游资，使政府在控制货币上不再显得捉襟见肘。

第二，降低预算，使预算政策从属于货币政策。撒切尔夫人任首相后的第二个月，财政大臣杰弗里·豪提出了一个连保守党内阁成员也感到惊讶的极苛刻的预算。预算把所得税减少，增值税增加 15%，且宣布政府开支要减少 40 亿英镑。而在此前一天，政府已宣布即将裁减 7.5 万至 15 万名文职人员，在三个月内暂停聘任新工作人员，以便每个月减少 2.2 万英镑的工资开支。数天之后，政府又宣布，地方对工业的援助将在 3 年内减少 2.33 亿英镑。紧接着又宣布。国家企业委员会要逐步缩小，并开始先出卖 1 亿英镑的资产。政府还宣布，停止扩大国家卫生保健服务。卖掉国家在英国航空公司和英国石油公司的部分股份。在工党执政时国有化了的英国造船厂要在两年内自食其力。所有这些，都为了减少赤字财政，让国家在货币政策上有进退余地。

第三，以管理家务的方式管理经济，控制公共开支。对撒切尔夫人来说，“理家之道”是有效的经济管理原则。她那杂货商父亲井井有条操持家务的经验，对她影响实在太大了。她念念不忘勤俭持家的信条和铺张浪费的教训。家务管理式的经济管理方针，是撒切尔夫人在保守党在野期间多次提到的方针。执政以后，成为她经济规划的指导方针，而且一点也没有失去魅力。撒切尔夫人决定把公共开支减少 3%；削减公职部门借款额；制定水准标点税

收政策，控制公共开支和国营企业的惜贷；不同意工会增加 15% 工资的要求，而只允诺增加 7%；减少福利开支等。撒切尔政府这样做，显然是想把货币政策实行得更为彻底。

尽管撒切尔夫人的这些措施不可避免地带来非议和反对，这些非议与反对甚至冲走了撒切尔夫人统治的“蜜月期”，但后来不可否认的事实证明，撒切尔夫人的货币主义确实有效。从 1980 年起，英国的通货膨胀明显地不断下降。而且从 1983 年撒切尔夫人的第二个任期开始，通货膨胀率明显地低于 1978 年的水平，由 1978 年的 8.3% 下降到 1983 年的 4.6%。1986 年，英国的通货膨胀率降到了 3.4%，达到 1967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人民的实际生活也有所改善。而且，自 1982 年以来，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高于欧共体的平均数，年平均通货膨胀率又低于欧共体的平均数。1987 年经济增长的速度更是高于联邦德国、法国、日本和美国，其中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居世界首位。这种状况较之 1979 年以前，对比就更加明显了。

可以说，撒切尔夫人的货币主义是有效的，出成绩的。她在反通货膨胀方面的成功，使她再次赢得英国人民的拥戴。1987 年，撒切尔赢得三连任，成为英国本世纪内在位时间最长的首相。

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本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小杂货商的女儿，但她却以顽强的性格、过人的聪颖过五夫斩六将，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还是英国保守党在本世纪首次蝉连且连任三次首相的领袖。她身为女性尤其引起了世界的瞩目。她上台时，英国处于明显的通货膨胀的阴影中。与西方各主要国家相比，其经济发展相形见绌，国力急剧衰退，当时人们认为英国是罹患沉疴“英国病”的“欧洲病夫”。撒切尔夫人却自信地宣称 1979 年是英国的“分水岭”。当选首相后，她以牛一般的犟劲、铁一般的性格大刀阔斧进行经济改革。针对英国当时的情况，撒切尔夫人一反二战后流行的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政策，率先在西方各国中奉行货币主义。她强调依靠严格控制货币供给量，辅以高利率和高汇率两个宏观经济手段，她使财政预算服从于货币政策，她主张以管理家务的方式管理经济，控制公共开支。货币主义理论本身有时代的局限性，又有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但在当时条件下，撒切尔夫人推行货币主义理论是有成效的，它使英国通货膨胀的严重危机得到了缓解。



## 高瞻远瞩建特区 对外开放促腾飞

1977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许多老同志的反复提议和坚持下，“千呼万唤始出来”的邓小平重新走到了台上。中国的历史将因邓小平的重新出山变得灿烂夺目。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果断地决议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早已不适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口号，明确提出党的工作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应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把改革开放提到了议事日程。

以史为鉴，这是兴国强邦的治国之道。邓小平站在历史的高度，放眼世界，思考未来，明智地作出了对外开放，让中国走出贫穷和落后，走向现代世界的战略决策。

封建统治者以闭关锁国、妄自尊大，作为防止外界冲击的治国之本。正如马克思所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邓小平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从明朝中叶到鸦片战争300多年的专制统治和闭关自守，特别是从康熙算起到鸦片战争这近200年的专制统治和闭关自守，是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的主要原因。他尖锐地指出：中国在历史上的落后是锁国政策造成的，新中国成立后也由于闭关自守产生了许多困难。拉大了我们同发达国家的历史差距。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100年不变，才能使我们赶上世界比较发达的国家。因此，中国经济要发展，必须实行对外开放。

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大思路中，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而不是封闭的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社会主义社会本质上应该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关起门来搞建设，发展不起来，丁开政不行。因此，在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广东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习仲勋、杨尚昆谈到要发挥广东的优势时，邓小平提出了办特区的办法。他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在邓小平的设计中，对外开放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开放，经济特区则是对外开放的窗口。根据邓小平的倡导，党中央国务院派出工作组赴广东、福建考察，同两省的领导人研究办特区问题。考察的结论认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地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雨量充足，物产丰富，风景秀丽，有利于发展旅游业，且地处沿海，有利于吸收侨资、外资发展工商业，又都是天然良港；深圳、珠海与港、澳为邻，有引进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的便利条件，有获取国际经济信息的便利条件，适宜建立经济特区。根据这一考察结论，1979年7月，中央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可以实行特殊的政策和灵活的措施，其主要内容包括：两省的财政和外汇实行定额包干；物资、商业在国家计划指导下适当利用市场调节；在计划、物价、劳动工资、企业管理和对外经济活动等方面扩大地方权限；试办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汕头、厦门的设置问题。

选择深圳试办特区，主要出于这样一些考虑：地理位置优越，毗邻国际经济和海运中心香港；交通方便，是我国重要的对外经济活动口岸，素有祖国南大门之称。深圳土地广阔，全市面积为2000多平方公里，可用面积占

70%，相当于香港、九尤、新界面积之和的一倍。背负青山，面临大海，海岸线长，风景秀丽，宜于共建海滨游泳场、住宅和其他户外娱乐场所。经济作物和水产资源丰富。更重要的是当地人民与港澳同胞、海外华侨有历史和习惯上的经济联系。而不利的因素主要是工业基础差、资源缺乏、文化基础水平低。

根据对深圳的自然、经济和历史条件的客观分析，从充分发挥优势、扬长避短来考虑，不宜建成类似我国单项性的出口加工区，宜于建成一个工、商、农、牧、渔、旅游、住宅以及科学教育的综合性特区。其内涵要比单纯的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广泛得多。故后来将深圳称为“经济特区”。1980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提出经济特区的经济发展主要实行市场调节，经济特区的建设主要是吸收侨资和外资。

1980年8月26日，五届人大常委会十五次会议批准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样，历时16月的孕育，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中的第一号特区在深圳诞生了，它的诞生被国际舆论誉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催生的“伟大圣婴”。

于是，深圳这个本来不过是一个懒洋洋地躺在梧桐山和羊台山边默默无闻的贫穷镇，在邓小平这位巨人的设计下，真的依靠改革开放的政策而“杀出一条血路”了。创办特区前的深圳，仅有20多家生产小农具、小五金和加工农副产品的小工厂，当时深圳所在的安定县是广东省的落后县份之一，1979年，它的工业总产值只有6160万元。而创办特区后，它的工业总产值突飞猛进，1986年达356500万元，1989年达1165000万元，1991年达2552000万元，11年增长了412倍，平均每年递增的百分比为65.5%；与此同时，出口贸易额也以每达63.7%的速度递增，1991年达344600万美元；国民收入以每年达44%的速度递增，1991年达1275700万元；国民生产总值以每年达45.4%的速度递增，1991年达1744600万元。这是什么速度？这是什么发展？哪里仅仅是发展！而是腾飞，其腾飞之快，连美国的舆论都称之为“一夜崛起之城”。

尽管有人把对外开政指责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先声”，“特区姓‘资’不姓‘社’”等等。但是，邓小平说他有一个最大的发明，就是不去争论，让事实来说话。实践是最好的证明，从特区开始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捷报频传，中国的经济发生了巨变，新中国真正迈上了现代化的建设行列，开始起势腾飞了。

1984年1月，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充分肯定了特区建设的成就。他指出：“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并要求“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在回京的一次谈话中又指出：“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政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邓小平还概括了经济特区的作用。他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开放的窗口”。这些讲话的主要精神。提出了我国特区建设的根本方针和完整的指导思想，是对我国建立经济特区的正确政策的高度概括和科学总结。

深圳等特区的成功经验，推动我国改革开放事业迈出新的步伐。1984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北京联合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着重研究沿海部分港口城市如何进一步开放的问题。在这次会上，广东省和深圳市委负责人介绍了深圳这个昔日荒滩上的边陲小镇是如何迅速崛起成为一

座现代化的中等城市的。深圳的成功主要靠两条：一是靠中央给予特区的特殊政策，这些政策对外资、外商有吸引力；二是跳出现行体制的框框，大胆改革经济体制和管理办法。蛇口工业区负责人袁庚介绍了蛇口经验。他说：蛇口凭着可以审批 500 万美元项目的自主权和交通部招商局利润留成中 5000 万元投资的自主权，在两平方公里多一点的海滩上进行了大胆改革，在干部体制上，先后从全国理工科大学毕业生、研究生中，经过考试招聘了近 5000 名富有进取心的“冒险家”，加以培训、考察，量才任用，建立起了一支业务骨干队伍；在劳动体制、用人制度上试行合同制，试用期满，双方同意再签正式任用合同，违反厂方制度，教育无效者，厂方有权解雇；工资真正实行按劳分配；工人对厂方不满，可以自由流动。一切工作都讲求效率、效益。这个近乎“冒险的改革尝试”成为与会者关注的焦点。

为了发挥我国广大沿海地区特别是沿海重要城市的优势，形成自南向北足以影响全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前沿地带。1983 年，中央决定在海南岛对外开放，规定以对外开放促岛内开发的方针；1984 年，中央又确定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 14 个沿海港口城市。这是为发挥沿海大中港口城市的优势。开创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新局面，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步骤。中央明确提出了以对外开放，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即：开放沿海城市和办好经济特区，一是给前来投资和提供先进技术的外商以优惠待遇，税收低一些，内销市场让一些，使其有利可图；二是扩大沿海港口城市自主权，使其有充分活力开展对外经济活动。这样做，实际上是对传统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若干重要的改革。

进一步开放 14 个沿海港口城市，使开放的浪潮涌向中国整个沿海地区，推动着中国经济向新台阶迈进，从而震撼了世界。国际舆论认为，“开放整个海岸，意味着实际开放了半个中国”。这个战略决策是建国 35 年来“采取的最大胆的行动”，“是中国从明朝以来的第一次开放”。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企业界人士纷纷到这些城市考察和洽谈。这些城市引进外资和技术的工作有了长足发展。仅 1984 年，这些城市签订的利用外资合同数目及协议金额，就相当于 1983 年以

1985 年 1 月，根据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意见，中央又决定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逐步形成“贸——工——农”的生产结构，即按出口贸易的需要发展加工工业、按加工的需要发展农业和其他原材料的生产。1988 年又决定将辽东半岛、胶东半岛等一些沿海市、县列入沿海经济开放区。沿海经济开放区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雄厚的工农业基础和优惠政策，很快就进入高速发展的阶段，使我国从北到南的漫长的黄金海岸上，镶嵌了一串流光溢彩的明珠。

1987 年 8 月，国务院建议设立海南省。1988 年 4 月。经七届人大批准，海南成为我国第 31 个省，同时也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和台湾同为我国两大海岛，面积相近，气候相似，自然条件大体相同。虽然经过建国后 30 多年的建设，但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还是落后的，与我国的台湾省相比，差别更加悬殊。建立经济特区后，经济得以迅速的腾飞，对我国的经济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

经过 10 年的改革努力，使我国已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

放总体格局，在沿海形成了包括 32 万平方公里，2 个直辖市、25 个省辖市、67 个县、约 1.5 亿人口的对外开放前沿阵地。这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发展。

对外开放，作为强国之路，已在中华大地产生奇特效应。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步伐加快，增强了出口创汇能力。到 1988 年，已累计批准外商独资、中外合资及合作经营的企业达 16000 家，投资金额为 280 多亿美元；14 个沿海开放城市引进技术改造项目 5000 余项，成交额达 34.5 亿美元，推动了现在企业的技术改造产品的更新换代和结构的调整，并引进了一批高新技术，发展了一批新产品，有的还填补了国内空白。我国已与世界上近 200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广泛的贸易联系，并与其中 89 个国家和欧洲共同体签订了贸易协定或议定书。10 年内，对外贸易额从 381 亿美元增长到 1154 亿美元。比 1978 年增长 5.6 倍。1979 年至 1990 年的进出口总额比改革开放前的 29 年增长 3.7 倍。我国平均每天的出口额达 1 亿美元。出口总额在世界的位次，由 1978 年的 32 位上升到 1988 年的 16 位。技术出口从无到有，到 1988 年底，我国已出口技术 500 多项，换回外汇 5 亿多美元，打破了长期以来我国技术只进不出的局面。我国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局面已初步形成。到 1988 年，全国已有 84 家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公司与 125 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 7500 多项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合同，总主额达 106 亿美元。

我国沿海开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到 1988 年，已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沿海开放地区的实际经济水平已接近了“亚洲四小龙”的水平。沿海“中国龙”已经起飞，并必然带动整个中国经济的起飞了。只有在此时，我们对特区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所起的窗口和排头兵作用或许才有更清楚的认识。

中国闭关锁国的时间太久了，并且已经形成了一种定势，在当时要改变这种局面是艰难的。邓小平以“杀出一条血路”的谋略决定建立经济特区，可以说是极其成功的。小范围的“试验”，可以减少反对的阻力；“试验”的成功可以起到窗口和排头兵的作用，逐渐转变人们的认识，从而支持改革开放。办特区的战略目标，并不仅仅是为了引进外资，增加外汇收入，扩大劳动就业，繁荣当地经济，主要是从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出发，利用特区、直接观察和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并试验经济体制改革，从中找出对全国适用的带有共性的经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同时，办好特区，对于稳定港、澳人心、收回港、澳主权，促进台湾回归祖国也具有重要意义。实践证明，我国特区建设是基本实现了这些目的的。改革开放已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党的十三大报告即已对我国对外开放的总体战略作出了全面的总结和阐述：“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我们已经在实行对外开放这个基本国策中取得了重大成就。今后，我们必须以更加果敢的姿态进入世界经济舞台，正确选择进出口战略和利用外资战略，进一步扩展同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交流，为加快我国科技进步和提高经济效益创造更好的条件。”

## “包”字进城破除大锅饭 企业改革落实“责权利”

当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展示在人们面前时，“承包”在一时间似乎成了对中国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灵丹妙药。尽管承包并非万能，但在长期大锅饭的习惯环境中，“承包”确实产生了非凡的效力。人们所谈论的“包”字，已远远超出其文字本身所表达的信息覆盖面，而几乎成了改革的象征。人们从农村的改革实践中似乎悟到了许多，明白了许多。于是，作为中国国民经济的命脉的城市企业再也不甘寂寞了。1984年，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此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吸收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让“包”字在城市经济领域中也大显身手。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使城市企业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发展方向。邓小平指出：“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强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去。”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并不仅仅在于承包经营这种形式本身，而是在于它所体现出的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本质要求。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所实行的承包经营，使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这给城市企业改革带来新的思考。马克思曾把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分为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四个层面，并认为“四权”可以分离。商品经济越发达，所有者不再直接占有、支配和使用生产资料的现象就越多。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正是由集体享有土地的最终所有权，个体农户也具有相对所有权，即独立经营的自主权。这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更紧密更合理地结合起来，从而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和利益。农村改革的形成，也基本适合于城市工业企业。城市企业的瘤疾，正在于长期没有解决好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关系问题。虽然城市企业由于社会化生产程度高，生产体系和过程复杂，不像农村生产那么简单明了。但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的思路，正是城市可以广泛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理论基础之一。

农村改革使责、权、利三者紧密结合，为城市的经营体制改革指明了入手的途径。责、权、利三者的关系实际上是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在生产者身上的统一和具体表现。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正确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摆正它们的位置的途径。但是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不仅仅限于农村，而体现在一切经济活动的领域内，自然包括城市企业。简洁、明了地摆正生产者个人的责权利，是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之间关系的前提。责权利问题解决了，才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恰当地摆正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关系和利益。因此，城市经济体制，也可遵循这条途径，打开改革的突破口。

农村改革突出按劳分配原则，为打破城市企业“大锅饭”提供了榜样。三中全会前的农村，与城市企业一样吃“大锅饭”，在平均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思路下，劳动与物质利益脱节，结果就是养懒汉，生产没人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农民的劳动与物质利益联系起来，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多劳多得，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工人和农民一样，现阶段都是商品生产者，在商品经济和按劳分配的关系上，二者是一致的。城市改革的关键，也就在于打破企业中的“大锅饭”，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在邓小平的经济体制改革思路中，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就是实

行生产责任制。他明确强调：“基本原则是搞责任制，这点是肯定的。”在总结城市改革经验时，他又指出：“深圳特区效率高的原因是搞了承包制，赏罚分明。”而实行责任制，就在于把责权利结合起来，“责任到人就要权力到人”，“只交责任，下文权利，责任制非落空不可”。

农村改革的成功为城市改革提供了经验和思路，而农村经济的发展，又为城市企业扩大了市场，增强了改革的助力。三中全会前夕，从四川开始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1978年10月，四川省在重庆钢铁公司等6家企业进行扩权，试点，当时只是给这些企业分别定出当年增产增收目标，年终实现目标后提留少量利润，并可给职工发少量奖金。这一措施迅速见效，广大职工积极性高涨，当年生产就有大幅度提高，1979年伊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鼓舞下，全国确定了第一批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验的企业。而在四川省，扩权企业达100个。到1980年，全国扩权试点的工业企业已达6600多家，其产值和利润分别占国有企业的60%和70%；到1981年，全国已有80%的国营企业进行了扩权改革。

这些试点企业虽然仅仅是开始有了部分计划权、利润留成权、资金运用权、部分产品销售权和部分劳动人事权，但这些就给企业注入了活力，使试验获得显著成效。更重要的是，扩大企业自主权一开始就明确提出要使所有企业都能够成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者，因此它一推行就对旧的经济体制造成了冲击，为我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打开了缺口。但是，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只是解决了经济体制中的一部分问题，改革必须深化，国家与企业间的经济关系需要规范化，这就要求进一步明确和获得企业经营的责、权、利。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验，很自然也合逻辑地运用到了企业的改革中。

早在1979年扩权之初，就出现了企业上缴利税承包的做法。但那时的承包，还更多地是针对小型企业、亏损企业，同时也没有较为明确的具体的责权利规定。我国正式试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是在1981年由首都钢铁公司开始的。

1982年3月，首钢领导和部分经济学家一起研究制定了以递增包干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方案，并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开始进行试验。其中主要内容是：以1981年的利润上交任务为基数，每年递增7.2%，一定8年不变，既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又鼓舞企业提高实现利润率增长速度，调动企业的积极性；规定企业留成利润的使用比例，其中60%用于企业技术改造，发展生产，20%用于集体福利，主要用于职工的住房建设；20%用于奖励职工。为了更好地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改革工资制度，允许企业运用留成的奖励基金，每年在企业内部调整部分职工工资，实行内部工资制。明确企业对国家除利润上交之外。在执行国家计划方面的经济责任，赋予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后可根据市场等需要调节生产的权利，以生产更多适销对路产品。

首钢实行的承包制，实质是企业职工以全民生产资料主人的身份，承包对国家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承包的主体是作为企业主人的全体职工，它是对全民、对国家应负责任的承担，是责权利的有机结合和国家、企业、职工三者利益的统一。首钢承包后，经济效益实现持续大幅度增产。1986年与实行递增包干前的1981年相比，实现利润从44455万元提高到112106万元，增长1.52倍、平均每年递增20.32%；上交利润1986年达53987万元，平均每年递增18.24%；1982—1986年，首钢累计上缴国家35.04亿元，相当于改革前的

30年（1949—1978年）累计上缴国家利税36.29亿元的97%；承包5年，首钢新增固定资产8.3亿元。首钢改革5年的实践证明，要使企业特别是大中型老企业的国有资产不断增殖，必须从根本上摒弃由国家投资改造老企业的老路，通过承包，推动企业在自我积累的基础上进行自我改造，自我发展，这样才能打破供给制的“大锅饭”。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提出：必须巩固和发展经济体制已经进行的初步改革。要在继续执行现行财政体制和保障企业应有自主权的同时，适当调整中央、地方财政收入的分配比例和企业利润留存的比例；继续改革所有制结构，在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要在国营企业或集体企业中，认真实行经营管理上的责任制，以推动生产的发展。

十二大以后，工业改革以实行利改税和用改革精神整顿企业为重点。1984年5月，国务院在加快城市经济改革精神指导下，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规定》，扩大了生产经营计划、产品销售、产品价格、物资运用、资金运用、资产处理、机构设置、人事劳动管理、工资奖金、联合经营10个方面的自主权。这对搞活企业、提高企业素质和经济效益，起了巨大推动作用。

在工业体制改革的同时，商业体制、建筑体制、外贸体制、金融体制、计划体制等多方面的改革措施纷纷出台，中国城市经济在改革的大潮下，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跃。

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1986年12月5日，国务院及时发布了《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决定》，明确提出在小型企业和一些亏损微利的中型企业中实行租赁制；在有条件的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的试点。这无疑是对城市企业广泛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发出了号令。1986年以来出台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与80年代初期的利润承包相比较，已经更加强调国有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更加明确承包企业必须承担的经济责任，更加落实了承包经营的主体。正因为如此，所以它一推行就深受企业的普遍欢迎。并引起国内外瞩目。后来的事实亦证明，自国务院的这一决定下发后，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向前迈出了新的步伐。

从1987年5月开始，我国推行企业承包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这年底，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实行承包制的面已达78%，其中大型国有工业企业达82%，大中型商业企业达61%，全国供销合作社达90%，原定长期承包合同的大中企业达64%。

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推行，使城市工业的面貌发生了新的变化。它改变了传统体制下企业作为各级政府行政机关的依附物地位，开始实现企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适当分离，使企业能按照国家计划和市场的需要进行自主决策和自主经营，“责、权、利”得到进一步明确。从实质上说它实现了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正确结合，一扫过去企业“等、靠、要”的不良习气，提高了企业竞争意识，开始以商品生产者的身份面向市场，不断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在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同时，许多城市还做了新的大胆探索，主要有股份制经济、租赁经营制、资产经营责任制。

一些企业近年来广泛推行两种形式的股份经济，一种是企业股份共有

制，不仅资金可以入股，而且所有生产要素都可入股。另一种是企业之间的台股股份制。具有代表性的是 1986 年 9 月成立的重庆包装印刷工贸联合公司。这个由市内外 113 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入股的 413 万元组建起来的股份制企业，已成为重庆包装印刷行业的主体。

从 1984 年起，我国一些城市逐步在全民所有制小型商业企业中试行租赁经营。1986 年，有的城市把这一经验移植到全民所有制小型工业企业中，这是一种在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进行转让的经营方式。其特点是上级政府行政管理机构与企业生产经营和利益脱钩，而且因租赁经营对承租经营者采取的招标和投标制度，一种在平等基础上通过竞争选拔企业干部制度应运而生。

资产经营责任制的目的是改变全民所有制企业单一的经营方式，使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使经营者的责权利公私结合的一种新的经营方式。

与上述改革措施相配套，从沈阳市开始，各大城市还陆续出现了对那些由于经营管理不善而造成亏损的企业，采取了破产警告的公开拍卖的办法，这无疑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的一个新生事物。

在城市和工矿企业进行承包经营改革和实验具有积极的意义。尽管这些改革各有千秋，并有一定风险，但毕竟是社会主义改革的一种可贵的探索。而且可以肯定，即使是具有重大成效和历史功绩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也还存在各种问题和不足。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只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一定阶段的选择，但绝不意味着最终模式。新的发展之路，只能在改革的进程中探索。

面对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和难局，邓小平提出了明确的原则：“我们现在确定的原则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所谓胆子要大，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搞下去；步子要稳，发现问题就赶快改。”



## 里根政府使解数 滞胀经济得复苏

一直到投票前夕，鹿死谁手尚不得而知，这种状况在美国的总统选举中实属罕见。经过一番激烈的角逐，罗纳德·里根获胜，当选为美国第40任总统。以“古稀”之年入主白宫，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开天辟地头一回。里根的经历颇丰富，曾当过电影明星、电视节目主持人，还担任过州长的职务。在美国东部官场中的山姆大叔的眼里，里根是个微不足道的放牛娃式的人物，尽管如此，他还是接替南部农场主出身的卡特先生的职务，而荣登了总统的宝座。当时的美国因经济危机而笼罩在一片惶恐不安的气氛中。里根领导下的共和党政权，又将采取什么样的方针和政策呢？

1981年1月20日，罗纳德·里根作为第40任总统入主白宫，美国正值经济危机之中，这次危机自1979年4月开始，持续时间长达44个月，而且在危机过程中生产大起大落，呈W形态，为战后历次危机中仅有的现象。1982年11月美国有失业人数1.2万人，失业率高达10.8%，是战后最高的失业。企业破产在1982年为2.53万家。美国的经济发展陷入了“滞胀”状态。

经济滞胀始于1973年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生产停滞和物价高涨的现象，二者同时并存，互相交织，这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实属罕见。生产停滞与物价上涨奇怪地结合了起来，西方经济学家对此大惑不解。无以名之，不得不又编出“滞胀”这个新名词。生产停滞和物价上涨的并存，不是短期的、周期式的现象，而是一个长期的，持续多年的现象。从1973年起，至80年代初至少到1982年，整个持续了10年之久。这期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形势全面逆转：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大大下降，固定资本投资增长速度下降，失业大增，出口增长减慢。尼克松、福特和卡特三位总统都曾鼓起勇气，去同“滞胀”这头怪兽进行斗争。但到头来都被那猛兽吞噬了。

里根上台时的美国经济就是如此让人沮丧。世界银行一位官员说：“我确信，在通货膨胀继续下去的情况下，现代社会将会破产。”美国参议院民主党多数派领袖也曾大声疾呼，要两党合作治理“滞胀”，他说：“如果我们没有一起在这方面采取共同行动，那么就无需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明天将为我们全体敲响。”这些描述性的语言让人回想起1929年开始的那场大危机，似乎那场灾难又要降临美国，一种强烈的恐惧感正向美国人民袭来。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美国的经济走入滞胀？就造成生产停滞来说，其原因主要有：美国经济地位的相对衰落。日本经济实力尤其是出口商品竞争力的迅速上升，使美国失去了一部分原来的市场。1965年以前，美国对外贸易一直是顺差，对主要贸易伙伴如西德、日本、加拿大都有顺差。到1965年，美国对日本出现了逆差，1966年对西德出现逆差，1968年对加拿大也出现了逆差。出口竞争力的威胁明显地影响到经济增长和就业。第三次科技革命在战后推动了美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到60年代后期，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力已明显减弱，而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还处于酝酿时期，未能形成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美国跨国公司为了追逐海外利润，极力向世界各个地区扩张，而国内的传统工业、汽车业、钢铁业却由于工资高、利润低、资本家不愿投资而难以进行更新改造，以至丧失了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经济结构畸形，军事开支比重过人，造成企业平均利润率下降，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放慢，劳动生产率急剧下降。居民负债沉重，影响到购买力的提高。

就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来说，主要有：美国长期推行军事扩张政策，严重影响国际收支的平衡，由于滥发美元，美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70年代两次石油提价的冲击，对美国的物价涨势无异于火上浇油，成为美国通货膨胀加剧的重要外部原因。更力重要的是战后美国历届政府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的刺激社会需求的扩张性财政和金融政策。

对此，里根有清醒的认识。为了解决困难，他需要人民的支持，他需要在惊恐的人民心里注入一支兴奋剂。他巧妙地利用了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威望，他在首次就职演说词中采用罗斯福的风格：“合众国面临着极大的经济困难。我们现在遭受的是我国历史上历时最久的通货膨胀，也是最严重的通货膨胀之一。这种通货膨胀使我们在经济方面的决定不能顺利执行，使储蓄的人反而受到惩罚，并且使力生活而挣扎的年轻人和靠固定收入为生的老年人都受到严重打击。它有可能使我国千百万人民的生活无法维持。工厂停工使工人们失业，蒙受痛苦和失去个人尊严。那些的确有工作做的人的劳动无法得到公正的报偿，因为赋税制度使取得成就受到惩罚，并使我们无法保持高度的生产率。为了明天的生存，我们今天必须采取行动。请不要误解——我们今天就开始采取行动了。我们的目标必须是建立一个健全的、生气蓬勃的、日益发展的经济，使所有的美国人都有均等的机会，不受偏见或歧视造成的障碍之害。”

里根的就职演说词无一下显示出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痕迹，使人们再回忆起那句名言：“除了恐惧本身，没有什么东西能使我们感到恐惧，”“现在就行动起来”，“唯有空谈无用”。里根的讲演从罗斯福的新政中获取了灵感和同藻，由于借助了罗斯福的词藻的装饰而大力增色，罗斯福的话语以及对罗斯福的回忆能赢得劳动人民的首肯并煽旺蕴藏在他们心中的爱国主义火焰。

树立人民信心，重振美国精神，里根政府正式上路了。他又如何具体行动呢？他不赞成罗斯福以来的改良主义，他要树立的形象是一位有坚定信念、强硬手段和某种灵活性的保守主义总统。凯恩斯主义显然提不出摆脱困境的方案，那套刺激社会总需求的办法走到了尽头。历来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各种学派又空前活跃起来，其代表人物一齐把“滞胀”归咎于凯恩斯学派，宣称唯有他们的理论观点，才能拯救陷入“滞胀”困境的经济，使之重新走上正轨。货币主义学派一向主张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特别是反对政府扩大货币发行量，认为这是导致通货膨胀的病根；供应学派主张把重点放在减税上，只有降低税率才能增加投资，从而促使生产摆脱停滞，重新增长；传统的保守经济学派则强调经济滞胀的病源在于政府开支过大，他们主张大大削减投资开支大量削减政府财政支出，只有这样，才能减少预算赤字，促进经济的增长。里根将这些理论混合起来，形成了“里根经济学”。

“里根经济学”就其萌芽状态或最初阶段来讲，不过是“供应经济学”的同义语。1980年，里根竞选总统时所提出的经济政策模型，便是以供应学派的理论为依据，采纳了他们的大规模减税、削减政府开支和放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的基本主张。不过，这对的“里根经济学”还停留在口头上，仅仅具有竞选口号的意义。但是，由于它彻底否定凯恩斯主义，鼓吹要为美国经济的发展找到“新”的道路，因而帮助里根赢得了竞选，成为“第一个供应学派的总统”。在以后的“里根经济学”，则比较集中地体现在1981年2月18日提出的《经济复兴计划》。这一计划包含四大方面：第一，削减政府

开支（不包括军费），减少财政赤字。至 1984 年实现预算收支平衡；第二，大规模减税，3 年内减少个人所得税 30%，对企业通过实施“加快成本回收制度”给以税收优惠；第三，减少对企业的规章制度限制；第四，严格控制货币供应，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显然，从这一计划的理论依据来看，“里根经济学”是供应学派理论、货币主义学说和保守党传统的平衡预算主张的大“拼盘”。减税，这是里根最有号召力和最打动人心之作。1981 年的税制改革把最高累进税率从 70% 降到 28%（一部分高收入者最高税率为 33%），大大削弱了税收的累进税，形成了对美国经济的较大刺激。里根在第一任期还实行了加速折旧法和对投资的课税扣除，这时 1983—1984 年资本投资的急剧增长起了很大作用。1985 年的税制改革能够在各种利益集团的强烈抵制下获得通过，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它将堵塞住许多税收漏洞，而有利于行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它还把累进所得税率降低到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水平，为美国创造了吸收外国资本的良好环境。里根减税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增收目的，但它确实给上中收入阶层带来了很大好处而受到这些人的拥护。

减少政府开支，这是里根最少成就的领域。里根的初衷是用削减政府开支的手段，达到实现小政府的目的。但他的这一打算实现却不尽人意。原因在于：里根过分地热衷于重建美国在世界范围的军事优势；他为解决社会保障基金主人不敷出的时候，曾企图削减社会保障支出，但遭到了国会内外的猛烈抨击，里根便迅即收回成命。里根对于一般社会福利的削减，如食物券、住房补贴、教育津贴、医疗救济等等是并不手软的。这些项目金额有限，不足以抵消其它方面开支的增长。

减少政府干预和对企业的规章制度的限制。里根就职之后，立即宣布所有新颁布的联邦规章制度暂缓执行，并建立了一个由副总统布什牵头的工作班干研究政松管制问题。可是里根的愿望与美国的现实并不相符。里根主张自由贸易，但是巨额贸易逆差以及由此在国会中酝酿的各种保护主义立法迫使他在国际贸易方面不得不实行许多严厉限制，此等例子不仅这一个，这些又迫使里根政府不得不违反初衷而大踏步后退。

反通货膨胀。这是里根值得夸耀的成绩。里根上台后支持了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尔克自 1978 年开始实行的货币紧缩政策，甚至在经济出现严重衰退时也未动摇，这是里根第一任期内美国消费物价涨势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 1980—1985 年期间，里根实行了高汇率和高利率政策，使进口货物价格下跌，对国内物价起平抑作用。同时，高利率和高汇率又吸引了大量外资流入美国，弥补了巨额预算赤字，也减轻了通货膨胀的压力。里根政府对罢工的镇压和压低工人工资也对物价上涨有重要的抑制作用。里根上台不久就对机场塔台指挥员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用强硬手段进行镇压，工运处于低潮，职工工资增长缓慢，实际工资下降。另外，国际油价的下跌对美国消费物价涨势尤其是里根第二任期的物价起了很大的平抑作用。

里根的经济政策在两届总统任期内取得了哪些成就？里根自己在 1988 年的总统经济报告中说：“这届政府的政策已经促成创纪录持久的经济扩张——美国在和平时期最长的一次。在经济扩张中创造了 1500 万个就业机会。丰富的收益遍及各个行业的和各种人口组合。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在 5 年中上升了近 23%。”又说：“在当前经济的扩张中，就业的有力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率、高生产率增长相结合，意味着美国人民生活水准的上升”，“过去 5 年已经记载下美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极为出色的时期”。里根的话固然有些夸

耀，而且他的经济政策也隐藏着许多不利的因素，但不能否认，美国的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经济走出了“滞胀”。从经济增长来说，在 1982 年危机以后的 6 年中，经济增长 26%，年平均增长 3.9%，经济回升持续 73 个月，而消费物价平均每年仅为 3.5%。随着这种经济成就的取得，里根政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扫除了 70 年代以来的那种沉闷空气，至 80 年代，美国又显示出其咄咄逼人的一面。

里根“古稀”之年入主白宫，手中接过的摊子并不让人轻松。自 1973 年以来的经济“滞胀”难倒了不少的经济学专家。在他以前的三位住在白宫里的领导人都被“滞胀”这头猛兽吞噬。面对现实，里根使出了浑身解数。他并不完全赞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主张，但他却把卡特比作胡佛，而将自己比作罗斯福。他的“我们今天必须采取行动”的演说词，如同当年罗斯福所说的“祖国要求我们行动，现在就立即行动”的演说词一样，激励了美国人民去勇敢面对恐惧的信心。他不知道何种理论对美国发展有利，于是他不拘泥，并处心积虑地从各种经济理论中寻找适合美国现状的东西。“里根经济学”本身就是供应学派、货币主义学派及传统的保守经济学派拼成的一盘大杂烩。当他的方案得不到赞同时，他又变着戏法尽力去实施。里根就是这样一个实用主义者，他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不完美，而且表现出浓厚的资产阶级的特点，但他让滞胀经济得到复苏的成绩却在美国历史上留下了极重要的一页。

## 尤伯罗斯施连环计 奥运盛会大获成功

世界著名的奥运会“经营大师”彼得·尤伯罗斯自小酷爱体育，而且运动成绩相当不错。他曾在美国棒球队有相当的名气。随后，他的兴趣转移到水球，曾一度入选美国水球队。1956年，尤伯罗斯为能够参加在墨尔本举行的奥运会而格外卖力地训练和比赛，结果因五次被打断了鼻梁骨而未能参赛。尤伯罗斯年轻时候辉煌的体育梦始终没有能实现。23年后，现代体育的大舞台终于再次提供了让尤伯罗斯施展才华的“大赛场”，梦想中追求的事业终究要在特定的时刻以特定的方式实现了。1979年，第23届奥运会——洛杉矶奥运会组委会把担任主办人的“机会”和自筹资金的重担压在了他的肩上。

能够有幸举办奥运会，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实力的象征。奥运会能够给主办国带来荣誉，提高主办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声望，提高主办城市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多少城市梦寐以求！多少国家趋之若鹜！

然而，主办如此大规模的运动必须支付巨额的经费开支，洛杉矶奥运会之前的各届奥运会，经济上无不亏损甚巨，有的城市还为此欠下了长期债务。

1972年，第20届奥运会在联邦德国的慕尼黑市举行，欠下了6亿美元的债务。1976年，第21届奥运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举行，亏损高达10亿美元。至今，加拿大人还要为此交纳“奥运特别税”，预计要到下个世纪上半叶，才能还清全部债务。1980年，第22届奥运会在前苏联莫斯科市举行，耗资90多亿美元，亏损更是空前的高。为此，许多国家对奥运会不敢问津，然而，1984年的奥运会就要在美国的洛杉矶市举行，这已是一个不容怀疑的事实。

一想到巨额投资所带来的庞大债务，美国人就不寒而栗。美国政府宣布对洛杉矶奥运会不予经济援助，洛杉矶的市民也纷纷扬言：在我们这里举行奥运会当然是好事，但我们的税金一分一毫都不能挪用。洛杉矶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还作出规定，不准用事先发行彩票的办法为奥运会筹款。

洛杉矶奥运会面临夭折的危险。

1978年8月下旬，国际奥委会召开紧急会议，只好同意执行奥运会章程第四条的规定，奥运会经费可以不由主办城市承担。这样，洛杉矶市政当局才最后答应在该市举办奥运会。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谁敢担任本届奥运会的主办人？谁又有能力担任本届奥运会的主办人？时势能创造出英雄吗？英雄又能解救危机吗？

洛杉矶奥运会筹备小组一筹莫展，只好向一家企业管理咨询咨询公司求援，让他们义务帮助寻找一位能在行政当局不补贴一分钱的情况下办好奥运会的人才。

电脑在搜寻，它根据储存的资料和奥运会筹备小组提出的人选条件，一次又一次地多角度全方位进行筛选。电脑显示屏上反复跳动着一个名字——尤伯罗斯。

尤伯罗斯何许人也？他究竟有什么特殊的经历和过人的本事，能使电脑一再推荐他来充当英雄，解救迫在眉睫的危机？

尤伯罗斯，1937年出生在美国伊利诺斯州埃文斯敦的一个铝村推销商家庭。他的父亲维克托身上兼有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的两种血液，精明能干，知识渊博，为人诚恳，好奇心强。每当全家一起吃晚饭时，维克托的话题犹如

一部百科全书，从猪肉到马铃薯，从国内政治经济、世界新闻到当前大事，谈话之间还下时地向 3 个孩子提问题。这种潜移默化的教育，使尤伯罗斯受益匪浅。

4 岁时失去母爱的尤伯罗斯比同龄人更具有独立和开拓精神。上中学时，尤伯罗斯为了自己付学费，经常和大孩子一起，到煤气站和购物中心等地干些杂活。大学四年期间，他一边读书，一边靠在学校校队里打水球得到的补贴勉强度日。

大学毕业后，尤伯罗斯先在夏威夷一家经营不定期航班的小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随后他获得了经济学学士学位，去了夏威夷的联合航空公司任职。尤伯罗斯干得非常出色，不久公司经理委怔尤伯罗斯为该公司驻夏威夷办事处的负责人。骄人的成绩使他不到一年就被提升为公司的副总经理，而此时他年仅 22 岁。

没过多久，尤伯罗斯就迈出了独立创业的第一步。在他 24 岁那年，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在好莱坞开办了一家“国际运输咨询公司”，这项业务极受欢迎，发展很快，短时间内就在全美建立起十几个类似的服务机构。28 岁时，尤伯罗斯应邀加入美国青年董事长协会，成为该协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委员。

1972 年，福斯特旅游公司拍卖，尤伯罗斯出资近百万美元买了下来。1974 年，他创办第一旅游公司。随着旅游娱乐业的日益兴盛，1978 年该公司即发展成为在全世界拥有 200 多个办事处、1500 名工作人员的北美第二大旅游公司，年总收入超过 3 亿美元。

正当尤伯罗斯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洛杉矶奥运会筹备小组极力邀请他担任本届奥运会主办人。盛情难却，最终他接受了下来。他想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不靠政府的施舍，照样可以干好一件事”。他以 1060 万美元的价格卖掉了他的第一旅游公司，义无反顾地闯进了主办奥运会的全新领域。正像他开始兴办旅游业一样，他不得不又一次从头开始，这体现了尤伯罗斯何等惊人的气魄和胆略！

尤伯罗斯走马上任的第一天，迎接他的是一间空荡荡的办公室，没有职员，没有资金，还是他自己拿出 100 美元，到银行为奥运会开了一个户头，举世瞩目的洛杉矶奥运会这才正式拉开筹建的序幕。说实话，尤伯罗斯拥有的只有“举世瞩目”这项虽然独特但看起来却虚无缥缈的“资源”。如何炒作这一题材？尤伯罗斯经过认真思考，从纷繁的头绪中理出了两条主“纲”：

第一，要计利。在高度商业化的当今世界，如何将“举世瞩目”这项无价之主变成滚滚财源？

第二，要造势。运用多种手法，通过各种途径，让拥有财富的人自动自愿地来和“举世瞩目”这四个字亲近；激发占有欲，最好是独占欲；让富有能力和怀有兴趣的人加入到奥运会的组织工作中来，对突发事件能迅速完善地加以处理，确保本届奥运会圆满成功。

如何计利造势：临危受命的尤伯罗斯施展出了连环计第一计，以利趋之。

在电视业日益普及的当今世界，电视实况转播权理应是奥运会能够售出的第一项商品。尤伯罗斯的工作班子提出。准备把电视实况转播权的最高索价定为 1.5 亿美元。尽管这个数目比蒙特利尔奥运会的 3400 多万美元和莫斯科奥运会近 9000 万美元多得多，但尤伯罗斯认定这个价格太低。经过仔细分析后，他破天荒地把奥运会实况转播权作为专利拍卖，底价为 2.35 亿美元。

尤伯罗斯亲自出马，到美国最大的两家广播公司——美国广播公司（ABC）和全国广播公司（NBC）进行游说。ABC请了几十位智囊经过仔细计算，发现还是有利可图，便抢在NBC之前买下了电视实况转播权。再加上售给外国公司的电视实况转播权的收入，仅此一项，尤伯罗斯就筹集到2.8亿多美元。

旗开得胜，尤伯罗斯马上又策划了第二个筹资高招。他总结了前几届奥运会的经验，发现一些大公司之所以对奥运会慷慨赞助，无非是为名利两端，既欲图利又想挣名。除从中追求高额商业利润外，各大公司还想借助奥运会的声势提高自己在国内外的知名度，与同行竞争对手拉开距离。针对各大厂商的这一心理，尤伯罗斯别出心裁地提出：“本届奥运会正式赞助单位只有30家，每一行业选择一家，赞助者可以得到本届奥运会某项商品专门供应权。条件也只有一条，每家至少应赞助400万美元。”经过一番尤争虎斗，尤伯罗斯又筹集到3.85亿美元的巨款。

尤伯罗斯广辟财源的第三个高招是向参加火炬接力的人收费。奥运会火炬从希腊奥林匹亚村点燃空运到纽约后，要绕行美国32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全程1.5万公里，最后才到洛杉矶。尤伯罗斯利用能举奥运火炬一跑为人生难得机会这一特殊商品的稀缺性，规定“参加接力者每跑一公里，需交纳赞助费3000美元”。殊不知，收取赞助费这一招反倒大大刺激了美国人的胃口，结果尤伯罗斯成功地让接力者心甘情愿地费力又费钱，自己也顺利地筹集到3000万美元。

尤伯罗斯筹资的高招接连不断：设立“赞助人计划票”，凡愿赞助2.5万美元者，保证奥运会期间每天可以获得2个最佳看台座位；规定只有赞助50万美元者，才能把奥运会的生意交给他们做；制作各种各样的纪念品、纪念币，高价出售等等。

第二计，以理晓之。

奥运会急需IBM生产的电子设备，但却有消息说该公司下打算参加赞助。尤伯罗斯立即打电话给IBM公司的董事长，一句话到位——“赞助本届奥运会的公司都能在全世界的下一代人心中树起形象”。IBM终于签署了赞助合同。

第三计，以害屈之。

柯达公司自恃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胶片公司，大摆架子，讨价还价，甚至放出风声“不会有任何胶片公司愿出400万美元的赞助费”。半年之后，尤伯罗斯毅然决定把赞助权和胶卷供应权给予主动联系并愿出资700万美元的富士公司。消息传开，柯达公司悔之晚矣，不但撤了广告部主任的职务，还得花费1000多万美金的代价进行外围战。

尤伯罗斯此计成功，更进一步加剧了各大公司对奥运会的“稀缺商品”的争夺战。索斯兰公司急于加入赞助者之列，甚至还没搞清要它建造的一座室内赛车场是什么模式，便答应了组委会的条件。最后，尤伯罗斯以从五个赞助者中选一个的比例（要求申请赞助单位为实际需要单位数目的五倍）选定了23家赞助公司。由于可以任意挑选，尤伯罗斯当然大肆抬价，从而筹得巨款。

第四计，以业役之。

尤伯罗斯看到奥运会的开支之所以一年比一年多，主要是因为花在建造奥运村、众多的比赛场地和各种生活设施，以及雇佣大批工作人员方面的资金越来越多。只有把这部分开支尽可能用在刀刃上，但这实非易事。

尤伯罗斯亲自出马，经多方努力，结果大获成功：奥运会各项比赛分散进行的 23 个场地，只有游泳场、射击场和赛车场是新建的，其中游泳场由生产“汉堡包”闻名于世的麦克唐纳公司出资 400 万美元建成。而其余比赛场地都是改建扩建而成，如本届奥运会举行开、闭幕式和田径赛的主体体育场，就是由 60 年代的老运动场改建而成，其费用共 900 万美元，全部由总部设在洛杉矶的大西洋奇菲尔德石油公司投资。供运动员和记者乘坐的交通车，是从各学校借来的用于接送中小学生的轿车。

至于工作人员，尤伯罗斯看准不少美国人把能力奥运会服务当作最大荣幸这一优点，公开招聘不领报酬的志愿人员。果然如他所料，应聘者蜂拥而至。洛杉矶奥运会所用的 5 万名工作人员，竟有一半以上是自愿人员。

以上各项为组委会节约了巨资。

第五计，以情动之。

洛杉矶奥运会能否如朗地圆满举行，还取决于两大因素：第一，世界各国“重在参与”的运动员们能否如期前来？第二，来自世界各地的老记们能否以最快速度报告这届盛会？

首先，尤伯罗斯以情动之，多方奔走，让尽可能多的运动员高兴而来。

尤伯罗斯经常提醒自己，随时准备应付那些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正当他乘胜前进时，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1984 年 5 月 8 日，前苏联因美国拒绝参加 1980 年莫斯科奥运会，宣布抵制洛杉矶奥运会！而此时奥运会开幕在即，时间紧迫，这一突发事件如果引起连锁反应，后果将不堪设想。

尤伯罗斯率组委会立即出动，当务之急是避免更多的国家退出奥运会，消除这一突发事件时门票销售等方面的影响，特别要防止发生由于不能达到预计的电视观众人数而下得不把电视实况转播权的价格大大降低，因为 ABC 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就留有尾巴：“如果苏联不派队参加比赛，本公司的付款将相应减少到可商量的价格。”

不能责怪 ABC 公司狡猾。商场如战场，谁也不愿血本无归。尤伯罗斯只有靠自己努力，请来运动员，留住观众。才不致于功亏一篑！在他的精心安排下，一批批经验丰富的特使分别前往指定的国家，一架架飞机飞往数十个非洲国家，把运动员接到洛杉矶，他本人则亲临古巴。

“莫斯科冲击波”终于过去了，连锁反应最终没有发生。共有 140 个国家和地区的 1.7 万名运动员参加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比赛，比赛项目达 221 项，同时还有 8000 多名记者前来采访报道，这 3 个数字在奥运会的历史上都是空前的。ABC 公司最后分文不少地支付了全部款项。

与此同时，尤伯罗斯还以情感动记者，提供免费服务，让妙笔生花的老记们尽兴发挥。

尤伯罗斯专门为奥运会配备了价值 5000 万美元的通讯系统，利用 300 台电子计算机统计比赛结果，并迅速输入电子信息系统的存储器中。在新闻中心，还向各国摄影记者免费供应胶卷；几台高速复印机昼夜为记者免费复印材料；记者们的午、晚餐也免费供应；在各国记者公用工作室内，700 多台打字机、300 台彩电、近百部显示器也供记者免费使用。结果，洛杉矶奥运会的新闻报道工作极为出色。

五环计谋施展的结果，解救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危机，使五环旗高高飘扬在奥运盛会上。奥运会圆满成功，尤伯罗斯主办这次奥运会盈余 1.5 亿美元。洛杉矶奥运会闭幕那天，尤伯罗斯应邀站在运动场中间的表演台上，赢得了



近十万观众雷鸣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奥运会闭幕后，里根总统热情地邀请尤伯罗斯到白宫作客，并请他去领导一个救灾委员会，以动员私人企业承担解决世界饥荒问题的义务。

1985年，美国《时代》周刊第一期的封面上刊印了他的照片，赞扬他为“美国正在兴起的企业家精神的化身”。

具有20年丰富的商战经验的尤伯罗斯，既是商界奇才，又丁愧为出色的心理学家。1979年，他临危受命，接过了主办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一世纪性的难题。他在纷繁复杂的头绪中，找到了计利造势这条主线，即是凭借有利于自己的条件而掌握行动的主动权。尤伯罗斯首先抓住的是“举世瞩目”的奥运商品“奇货可居”这一独特性和有利条件，同时准确地把握住了从一般人到大财团巨头们的各种心理。攻心为上，对症下药，作了一系列出手下凡的造势——以利趋之，以理晓之，以害屈之，以业役之和以情动之，从而使自己在商战中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五环计谋施展的结果，是财源滚滚而来。洛杉矶奥运会不仅规模空前，而且开创了在政府不进行财政补贴的情况下，举办奥运会不负债，反而盈余巨款的先例。尤伯罗斯为奥运会的“经营大师”，他以财政上前所未有的成功为未来的奥运会主办者树立了榜样。

## 矢志高峡出平湖 三峡梦想终成真

1992年4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长江三峡工程决议》。据资料显示，新中国正在兴建的长江三峡工程是世界上目前最大的水电工程，这项工程将创造几十个世界之“最”：它是世界上防洪效益最大的水利枢纽，三峡水库总库容达393亿立方米，运行时预留的防洪库容为221.5亿立方米，水库调洪可削减的洪峰流量达每秒2.7—3.3万立方米；它是世界上航运效益最为显著的工程，可改善川江650公里航程，使年单向通航能力由1000万吨提高到5000万吨；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将安装26台单机容量为70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为1820万千瓦，年均发电量达846.8亿千瓦时。可是，这一项伟大工程从酝酿到真实实施，却前前后后历经了70年的论证，差不多20世纪的中国伟人都对这项工程予以过关注。

中国的长江三峡以其雄险奇美的自然风光，曾使历代骚人墨客为之叹服。而更重要的是，它有闻名于世的大峡谷，天下罕见的水力资源“富矿”。如果在这里筑坝拦洪，可以兼收防洪、发电、航运之利，于是，中国的几代志士仁人力设计综合治理长江、福汲子孙后代的三峡工程而在这里构想了半个多世纪。

最早提出三峡工程设想的，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1919年，他在《实业计划》一书中为发展内陆交通而提出一个大胆设想，他认为长江是内河交通的主动脉，其卡口就在川江，于是他提出：“自宜昌而上，入峡行，约一百英里而达四川之低地，……改良此上游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其滩石应行爆开除去。于是水深十尺之航路，下起汉口，上达重庆，可得而致。而内地直通水路运输，可自重庆北走直达北京，南走直至广东，乃至全国通航之港无不可达。”

孙中山之所以在《实业计划》中提到三峡并阐述其作用，是因为在孙中山的实业蓝图上，除了交通，还要兴建粮食工业、衣服工业、居室工业、行动工业、印刷工业；还要开采铁、油、煤、铜矿并创办矿机、冶矿机等制造厂。而创办这一切皆需要电，长江三峡恰恰就是一个最理想的大电站。只需建闸抬高水头，即可发电，同时又可改善航运，对长江中下游的冲积平原还有防洪的作用。

孙中山在他以后的实践中，又不断地丰富、完善了他关于三峡工程的惊人创见。1924年，当他在广州宣讲三民主义中的民主主义时，就具体阐述了长江三峡水力资源的丰富，以及开发三峡水电的重要性和用途。他说：“像扬子江上游夔峡的水力，更是很大。有人考察由宜昌到万县一带的水力，可以发生三千余匹马力的电力，像这样大的电力，比现在各国所发生的电力都要大得多；不但是可以供给全国火车、电车和各种工厂之用，并且可以用来制造大宗的肥料。”孙中山在这里所具体提出的三峡工程方案是具有一定科学性的，他的三峡设想对后来延续70年的三峡梦起了震聋发聩的意义。

到了30年代，美国在科罗拉多河上修筑当时世界第一的胡佛大坝，标志世界坝工技术有了飞跃性发展。在此影响下，国民党政府组织工程师勘察长江上游水电资源，并提出葛洲坝、黄陵庙两个低坝方案以资比较，这在孙中山先生以改善航路为主的筑坝设想上前进了一大步。

1944年5月，美国垦务局设计总工程师、世界著名坝工专家萨凡奇博士带着对三峡的浓厚兴趣来华访问，他不顾当时宜昌就驻有日军的危险，前往

三峡实地考察，并用 40 天时间完成了三峡工程的初步设计报告。由于萨凡奇在世界工程界的影响和他的奔走和宣传，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对中国的三峡工程产生了兴趣。中国政府随后与美国政府签约，两国政府联合起来开展三峡工程的研究和设计。可惜好景不长，国民党政府忙于打内战，于 1947 年 5 月下令暂停三峡水力发电计划，并从美国召回了参加中美联合设计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认为根治长江，除害兴利，是振兴中华的重要措施，因而始终关注长江水利建设。1953 年 2 月 19 日，毛泽东在“长江”号军舰上，与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就长江的防洪问题进行了长谈。

话题从南水北调一直谈到三峡工程。毛泽东询问林一山怎样才能解决长江洪水灾难，林一山认真向毛泽东介绍了筑堤、修库、活湖等一系列手段，并提出修支流水库群拦蓄洪水和修三峡工程的设想。毛泽东兴奋了，举手在长江防洪规划草图上标有水库群的地方划了个大圆圈，问林一山：“费了那么大的力量修支流水库，还达不到控制洪水的目的，为什么不集中在三峡卡住它呢？”

此后不久，爆发了 1954 年的特大洪灾，长江区域损失极为严重。这次水灾促使毛泽东下了最后的决心。1954 年冬，在北上的专列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召见林一山，就我国兴建三峡工程的技术能力问题详细听取了林一山的汇报，并就南津关石灰岩坝址和三斗坪花岗岩坝址问题进行了探讨。林一山惊奇地发现，毛泽东对建坝地址的了解有相当的专业深度。这次汇报之后，毛泽东决定立即开展三峡工程的规划工作，并于 1955 年请来苏联专家组及航空测量队。中苏联手，开始了新中国建国后第一次大规模的三峡勘察。1956 年，毛泽东大江横渡，挥毫写下了“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于湖”的不朽诗篇，以他特有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兴建三峡伟业的雄心壮志。

毛泽东对于推动三峡工程的进程是积极的，但对于三峡工程的决策又是十分慎重的。他不仅注意倾听专家们的意见，多次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三峡工程，而且还注意听取不同意见。1958 年 1 月，在中共中央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亲自听取了林一山和李锐关于三峡工程的不同见解，并在会议上印发了他们俩人的文章。1958 年 1 月，毛泽东委托周恩来总理亲自抓三峡工程。毛泽东伸出 4 个手指头，笑着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来抓三峡工程，一年抓 4 次。”

1958 年 2 月至 3 月间，周恩来率中央和地方有关负责人及中外专家 100 多人察勘了荆江大堤和三峡坝址，并在途中主持了讨论会议。绝大多数人都赞同兴建三峡工程，也有极少数同志持不同的看法。周恩来对这次考察和讨论作了总结性讲话，他赞同“三峡工程必须搞，而且也能够搞”的意见，要求“从现在开始，必须积极准备，做到既充分又可能”，并提出了长江流域规划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应处理好的 7 种关系。

1958 年 3 月，中央政治局在成都开会，周恩来从三峡赶到成都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周恩来率队考察三峡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这次会议指出过去曾有过的坝高 220 米甚至更高的设想是不现实的。会议第一次明确坝高不超过 200 米，重庆不能受淹，并确定了长江流域规划的基本原则是：统一规划，全面发展，适当分工、分期进行。

《意见》非常审慎地指出：“从国家的长远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估计三峡工程的整个勘测设计和施工时间约需 15 至 20 年。”

1958 年 11 月，林一山主持下的长委完成了《三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要点报告》，将正常蓄水位定力 200 米，并首次推荐了三斗坪坝址。此后，长委又针对一些争论较大的问题，开展了对工程防护泥沙淤积、坝址选择、水库寿命、船闸、机组等一系列重大技术问题的深入研究。长委、水电部等 200 个单位，华罗庚、周培源、张文佑等近万名科研人员参加了这项工程。

1960 年 5 月 16 日，国家主席刘少奇也在林一山陪同下考察了三峡。他详细了解了三峡工程的方方面面后，颇有信心地对林一山说：“我看，现在进行三峡施工准备工作没有什么问题了，是上坝线或是中坝线，对我们要进行的准备工作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了。”

此时，一切准备就绪，水电部已计划在“二五”期间列 4 亿元投资，准备 1961 年三峡工程开工了。然而，历史偏偏爱开大玩笑，当“三峡梦”序幕刚刚在紧锣密鼓声中拉开时，突然又嘎然而止降下帷幕了。这是因为客观规律这位极为冷酷的“隐形人”已开始冥冥中对“大跃进”施行报复了，几亿人民挣扎在饥饿线上，空前的经济困难阴影将“大跃进”的热浪掩盖得无影无踪。饭都吃不饱，谁还能顾及到三峡。1960 年 8 月，周恩来亲自调整了三峡建设步伐，留下“雄心不变，加强科研，加强人防”的口号，原订的两年科研计划改力十年，上千的三峡设计人员仅保留了 40 人。

历史跨入 70 年代，湖北省搞起了“大建设”，省革委会副主任张体学、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都向毛泽东提出修建三峡工程的请求。毛泽东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他说：“现在要备战，建三峡不宜做此想。”他伸出两个指头反问张体学：“脑壳上顶 200 亿方水，你怕不怕？”

然而，三峡工程巨大的经济效益，宛如强大的磁场。强烈地吸引着新中国一代又一代领袖们和有识之士。尽管他们的经历不同，专长不同，但在兴建三峡工程上，却能自然而然地取得共识。

1977 年 7 月，邓小平恢复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他雄心不减，高屋建瓴地引导全党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描绘中国四个现代化宏伟蓝图时，三峡工程又被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国务院多次开会研究它，中央领导人多次视察了三峡大坝坝址。1979 年，为了加快中国水电建设，邓小平在访美期间，与美国副总统蒙代尔签订了一项两国政府五年技术援助协定，美国贷款 20 亿元，帮助中国搞水电建设。

国务院加紧了三峡工程的步伐，多次召集高层次会议研究三峡工程，万里副总理率领中央和有关部委的负责人，专程赴宜昌察勘三峡坝址。1981 年 2 月，邓小平在北京听取了国家计委关于 2000 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汇报，当汇报准备兴建三峡工程时，邓小平说：“我赞成搞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

1984 年 11 月，重庆市委向中央提出：三峡大坝 150 米方案的回水末端在重庆以下的洛碛与忠县之间，使重庆以下较长一段天然航道得不到改善，万吨级船队难以直达重庆……希望中央采用 180 米方案，以改善川江航运问题，中央对这个意见十分重视，并作了批示，认为重庆市的意见必须认真考虑。邓小平在与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谈经济问题时说：“关于三峡问题，我

扎李鹏来谈了一下，了解到现在的方案，万吨轮开不到重庆，这不能解决问题，如果你们采取了中坝方案，增加 50 万人搬迁，可以增加装机容量 700 万千瓦，有了这一条就可以把那 50 万人养活下来，万吨轮也可以到重庆，如果万吨轮不能到重庆，就没有意义了。”

对于三峡工程这样一个规模大、影响深远的巨型工程的利弊得失和各类技术经济问题，难免会产生不同的看法。美国在 30 年代决策修建西部的几个大型水利工程、埃及在 50 年代修建阿斯旺大坝，都有过极为激烈的争论，而且始终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但是，美国罗斯福总统在当时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境况下，果断决策修建大古力等大型水利工程，不仅没发生某些人所担心的恶果，而且为美国经济复苏和二次大战军工生产起到了巨大作用。埃及纳赛尔总统在国内外沸沸扬扬的争吵声中，坚定地接受苏联的援助，修建了阿斯旺大坝，后成为埃及工农业的生命线。所以，当 1984 年以后，国内有些人对兴建三峡工程提出不同的看法，并在报刊上和全国政协会议上展开了争论，一时间，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应该说是一件好事。

面对国内关于三峡工程的争论，邓小平的态度是既积极推动三峡工程的进程，又慎重地对待最后的一锤定音。1986 年 3 月 31 日，他和杨尚昆一起，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美国《中报》董事长傅朝枢，在回答有关三峡工程的问题时，邓小平说：“中国政府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人民，对于兴建三峡工程这样关系千秋万代的大事，一定会周密考虑，有了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时，才会决定开工，是决不会草率从事的。”

1990 年，江泽民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7 月中旬，400 多名专家被党中央请进中南海，开了 9 天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江泽民、李鹏、姚依林、宋平、田纪云等 20 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与会的全体专家。为了一项工程，把这么多专家请进中南海，而且一连开了 9 天会，这在新中国的建设史上是少有的，其对三峡工程的重视程度可想而知。

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当水电部副部长期间，就和万里副总理一起，到三峡勘察了太平溪坝址和三斗坪坝址。在此前后，李鹏多次召开会议，商讨兴建三峡工程的有关问题。1984 年 3 月末，李鹏副总理与有关领导一起，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开展三峡工程筹备工作的报告》，明确提出成立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李鹏任组长。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这个报告。为了加深对三峡工程的研究，1984 年 11 月，李鹏又率领一批干部对三峡地区进行了考察，并视察了长江科学院几座三峡水利试验模型。在总结会上，李鹏强调：三峡工程肯定是要上的，问题是如何做得好些、省些、快些；泥沙问题要作出进一步的验证；移民问题要搞开发型移民。

当三峡工程的争论引起国内外普遍关注时，1986 年 4 月，李鹏在六届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的第二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了记者关于三峡工程的提问：“对于这项关系重大的工程；中国政府采取既积极又慎重的态度，现在还没有对这项工程作出是否开工的决定。虽然我们已经作了 30 年的准备工作，进行了大量调查和科研工作，收集了大量资料，但有许多问题还需进一步研究。因此，国务院准备成立三峡工程论证委员会，不仅要吸收国内各方面专家、学者参加。听取他们的意见，还要向一些建设水电有经验的外国专家们进行咨询，听取意见。论证的情况，委员会将及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汇报，同全国政协协商。”

经过两年半的重新论证，1989 年 3 月，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审议稿终于

在第十次论证领导小组扩大会上顺利通过。三峡工程论证的主要结论是：三峡工程对四化建设是必要的，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建议早作决策。

1992年4月3日下午3时20分，全国七届人大五次会议最后一次全体会议，2663名出席代表庄严地按动了面前的表决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两侧巨大的蓝色荧屏上，跳出了白色的数字：赞成：1767；反对：177；弃权：604；未按表决器：25。万里委员长宣布三峡工程议案通过。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三峡工程从这一瞬开始走出梦境。

人们有理由相信，几代中国伟人所关注的三峡工程将给长江流域乃至全中国带来无限光明和美好的前景！

以全国人大会议表决的方式来决定一项工程的命运，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这项工程在中国社会发展和民族心理上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三峡工程从孙中山起，梦想了70年，其中论证了40年，争论了30年，几代中国伟人都在这上面花费过心血：孙中山只能谈理想，他无力去设想如何实施；毛泽东在梦幻与现实的边缘徘徊；邓小平雄心勃勃、续做三峡梦……

三峡工程的经济谋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决策过程中的反复论证，充分吸取各方面意见，使之决策达到最为科学的程度。这毕竟是一项太大的工程，弄好了是大利，弄不好就可能是大弊。决策过程的民主化、科学化是保证这一工程充分发挥大利。把可能出现的弊端减少到最低程度的最佳手段。二是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敢于决策，从而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长江中下游的防洪，华中、华东和川东的能源以及提高川江航运能力等问题。尤其是防洪问题，可以解决长江中下游两岸人民乃至国家、民族的心腹之患。而防洪、能源、航运，都是与国家经济息息相关的重大问题。三峡工程建成后的经济效益，必将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资源之一。

## 抓经济改革宏儒目标 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江泽民总书记在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表明我党在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问题上实现了重大突破和质的飞跃。与此同时、一段时间跨度几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等同的计划与市场的争战，终于可以画一个句号了。然而，纵观市场与计划的理论纷争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最终确立，我们不能不感叹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远见卓识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领域，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巨大勇气。

在1949—1978年间，由于国际、国内多方面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片面理解，把马克思主义设想中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与中国现实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为一谈，导致在我国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发展理论认为：商品、货币和市场交换与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质上是互相排斥的，而不是内生的、兼容的；计划才是社会主义经济所固有的，是无所不包的，资源配置、经济循环和利益协调等一切问题都可以由国家计划来解决。在这种思想导向下，我国在理论上奉行市场无用论和统一计划论，实践中建立了以轻视、限制商品货币关系为主旨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导致了以行政命令、行政手段和行政组织机构为中心；高度集中的宏观决策取代分散化的微观决策；政府直接干预企业；整个经济受行政力量的驱动，缺乏市场机制内在的组织功能。

粉碎“四人帮”后，众望所归地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鲜明地提出“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时代性口号，给理论界注入了强大的活力，长期被斥为资本主义“黑货”的市场机制理论研究获得了新的生机。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回答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教授的提问时，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著名论断。邓小平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社会主义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的论断推动了理论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

1980年9月，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商品经济，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体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应当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和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自觉地运用经济规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在理论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然而，正当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或“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报刊在1981年4月以后发表了一系列的批判文章，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1982年，在十二大报告的起草过程中，理论界仍有人认为，把所有的企业都变成独立的经济实体，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主要由市场调节的观点，必然会削弱计划经济，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

1984年9月，邓小平、陈云等同志在批示国务院主要领导于9月9日致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时，同意以下意见：“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首次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决定》提出：“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动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邓小平对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在通过《决定》的会议上指出：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政治经济学”，并且说，“这次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这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否则是“四人帮”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陈云也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规模比50年代大得多，也更复杂得多。50年代适用的一些做法，很多现在已不再适用。”“如果现在再照搬50年代的做法，是不行的”。

1985年10月23日，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企业家访华团。当美方代表团团长格隆瓦尔德问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时，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办法更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过去我们搞计划经济，这当然是一个好办法。但多年的经验证明，光用这个办法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应该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样就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加速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根本的问题是发展生产力。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就是坚持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导地位，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避免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作了进一步描述。十三大的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机制，并进一步阐明：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自觉保持国民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可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利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这两种形式和手段，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要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同时提出了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即在总体上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

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论的提出，结束了长期以来理论上计划与市场在关系论和实践中都是“两张皮”的二元格局。据此提出了改革的任务，即：重新构造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使企业从僵化的行政附属物转变为自主经营、反应灵敏的市场主体；重新构造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系统，完成从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大力发展和完善作为传导系统和经济运行载体的市场体



系，强化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发表重要谈话。他指出：“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灵活一些。以后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绝不能重复回到过去那样，把经济搞得死死的。”

1990年12月，邓小平针对理论战线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争论，又指出：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是计划、市场这样的内容。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调节，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回事。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都得要。不搞市场，自甘落后，世界信息都不知道。

伟人之所以伟大，在于他能较常人更敏锐，更深刻，更准确，更有力地按住时代的脉搏，适时适度地竟显历史龙头的雄威。邓小平就是这样的伟人。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正是中国人特别重视的春节期间，在万家乐、乐万家，天寒人暖的氛围中，中国改革大厦的奠基人、中国改革战略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接连南巡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这位时刻关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伟大政治家，再一次把他这几年经过反复观察、深思深虑的关于改革开放、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成熟思想，无私地奉献给中国改革者和正在向小康奋进的中国人民。

邓小平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实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在神州大地再次响起阵阵春雷。“中国大陆又刮起了一股改革开放的‘邓旋风’。”其中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中国理论界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的确，改革开放10多年来，市场范围已逐步扩大，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已经放开，计划直接管理的领域显著缩小，市场对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大大增强。实践已表明，市场作用发挥比较充分的地方，经济活力就比较强，发展态势也比较好。我国经济要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加快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就必须继续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

1992年10月，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我们要大力发展全国的统一市场，进一步扩大市场的作用，并依据客观规律的要求，运用好经济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管理，引导市场健康发展。”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在邓小平、陈云等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以及改革开放 10 多年来的实践的基础上，终于确立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并领导中国人民抓住机遇，迎接世纪末的挑战。可以相信，按照这个目标发展下去，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立，已不会是遥远的将来，21 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

## 参考文献

1. 徐天新、梁志明主编《世界现代史（1917—1945）》，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
2. 王春良主编《世界现代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1月第5版。
3. 戴志先编著《战后世界史》，湖南大学出版社，1985年11月。
4. 王斯德主编《世界当代史（1945—1991）》，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4月。
5. 徐天新等编《当代世界史（1945—1987）》，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
6. 黄健主编《经济战略比较研究》，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6月。
7. [日]大森实著《汽车大王福特》（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6月。
8. [日]田中义著《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10月。
9. [美]鲍勃·托马斯著《娱乐大王迪斯尼》（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6月。
10. [苏]普·凯尔往采夫著《列宁传》（中译本），三联书店，1975年10月。
11. 樊元主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七十年》，北京出版社，1992年4月。
12. 刘克明、金挥主编《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9月。
13. 周尚文等著《新编苏联史（1917—198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月。
14.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3卷，三联书店，1980年10月。
15. 刘达永著《走出经济困境》，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0年6月。
16. [美]阿瑟·林克等著《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6月。
17. 沈永兴主编《外国历史大事集》（现代部分，第2分册），重庆出版社，1987年11月。
18. [美]罗伯特·海尔布罗纳著《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7月。
19. 周荣耀著《戴高乐评传》，东方出版社，1994年12月。
20. [法]让·拉古都尔著《戴高乐全传》（中译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5月。
21. 让·莫内著《欧洲之父——莫内回忆录》，国际文化出版社，1989年4月。
22. 杨栋梁著《日本历届首相小传》，新华出版社，1987年10月。
23. [日]猪木正道著《吉田茂的执政生涯》，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年3月。
24. 陈秀山、雷达著《市场·国家·国际协调》，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2月。
25. 朱正圻、林树众等编著《联邦德国的发展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88年6月。

26. [美]福雷斯特·C·波格著《马歇尔（1945—195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2月。

27. 达洲等著《中国人看以色列》，新华出版社，1990年11月。

28. 杨曼苏主编《以色列——谜一般的国家》，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5月。

29. 州长治著《如钢似铁——铁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7月。

30. 江春泽、张德修编《南斯拉夫经济》，北京出版社，1979年10月。

31. 《世界经济》编辑部编《南斯拉夫经济情况介绍》，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8年11月。

32. 江苏省政治学会编《当代世界经济政治与国际关系文选》，1986年9月。

33. [匈]久尔科·拉斯洛著《卡达尔——历史背景下的肖像素描》，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6月。

34. 中国苏联东欧学会编《苏联东欧问题探讨》，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

35. [美]阿德曼·哈默著《哈默自传——历史的见证》，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年10月。

36. [美]鲍勃·唐西丁著《不平凡的一生——哈默传》，知识出版社，1987年10月。

37. [日]中央大学经济研究所编《战后日本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8月。

38. [日]正村公宏著《战后日本经济政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

39. 杨永骝、沈圣英编著《南朝鲜》，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4月。

40. 金挥等主编《苏联经济概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11月。

41. 陈岳、陈翠华编著《李光耀——新加坡的奠基人》，时事出版社，1990年8月。

42. [印]因德尔·马尔豪特拉著《英迪拉·甘地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9月。

43. [印尼]苏哈托《苏哈托自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1月。

44. 吴秀慧、余金义编著《印尼总统苏哈托》，时事出版社，1992年9月。

45. [英]黛安·K·莫齐主编《东盟国家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

46. [英]戴维·布伦蒂著《卡扎菲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2月。

47. [英]彭尼·朱娜著《撒切尔夫人传》，长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

48. [英]雨果·杨格著《铁女人撒切尔夫人传》，西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1月。

49. [美]赫德里克·史密斯等著《里根和里根总统》，商务印书馆，1982年2月。

50.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印《战后国际关系简史》。

51. 《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1983年第4期、第1期，1982年第11

期。

52. 《世界经济》（人大复印资料），1995 年第 5 期，1984 年第 1 期。
53. 《世界经济文汇》，1995 年第 4 期，1994 年第 3 期。
54. 《社会科学战线》，1994 年第 4 期。
55. 《名人传记》，1994 年第 4 期。
56. 袁纯清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红旗出版社 1994 年版。
57. 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年版。
58. 红冬、紫夏《二十世纪中国纪实》（一、二、三卷），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59. 金小明著《风雨三峡梦——三峡工程七十年纪实》，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60. 辛向阳等主编《再造中国：中国百年大走势》，大众文艺出版社 1993 年版。
61. 余习广等主编《大潮新起：邓小平南巡前前后后》，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2 年版。
62. 江水等著《毛泽东军事哲学与现代商战》，广西民族出版社 1991 年版。
63. 李济琛著《千秋功过》，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4 年版。
64. 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65. 陈文主编《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成都出版社 1992 年版。
66. 楚庭仁编著《商战 88 计》，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 年版。
67. 刘凡编著《现代商战与古兵法》，武汉出版社，

改革伊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对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旧的经济管理体制中存在的“严重缺点”作了深刻的分析，认为这一体制中存在着“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邓小平抓住怎样正确理解和处理计划与市场关系这个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核心问题，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社会主义也需要而且必须要有市场经济的问题，给我国的经济改革注入了商品经济的活力。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那么，将已在生产力较我们更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巨大作用的市场经济体制引入中国，也可以说是“洋为中用”的谋略吧！但是，这种“引进”又不是原封不动地改搬，而是根据我国的国情加以调整，并在不断实验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再逐渐丰富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在 14 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中国经济体制的探索和改革，总是高屋建瓴地一下子就抓住了事物的根本，使关于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认识、讨论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党的十四大所确立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长期探讨的科学总结，它提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思路，拓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视野。

